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9-1-2014

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

Chieh Ming Y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楊傑銘 (2014)。 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 (博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etd/33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

楊傑銘

哲學博士

嶺南大學

二零一四年

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

楊傑銘

此論文為中文哲學博士學位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一四年

論文撮要

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

楊傑銘

哲學博士

本論文旨在探討冷戰體制下魯迅思想在台、港兩地的傳播與演繹。論文主要處理三個問題:第一,這些人的魯迅論述如何與冷戰與國民黨反共體制縫合。第二，魯迅思想如何置入大一統的文化架構中。第三，海外魯迅論述如何逆反中國或於海外在地演繹。論文共分成六個章節：

第一章先概述冷戰體制與華語語系文學概念，並整理現今魯迅文化史的研究狀況。透過系譜化魯迅研究來理解百年來的研究成果，並且提出在冷戰體制架構解讀台港兩地魯迅思想傳播與演繹的可能。

第二章則以蘇雪林為論述焦點，討論蘇從擁魯走向反魯的轉折，以及在台灣創造怎樣的魯迅形象。而她的激進反魯言論又是如何影響台港兩地，而這之中又與台、港的社會情形的差異有怎樣的關係，並造成兩地文化人的反彈。

第三章討論台、港的兩本魯迅傳記，在「人的魯迅」的共識上創造出不同的魯迅形象。鄭學稼的《魯迅正傳》的兩個版本，在不同的時代氛圍下有大幅的更動，以符合時代的現況。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某程度是為了反對鄭學稼言論而寫，將魯迅形塑為永遠的反叛者與民族主義立場作家，所反映的是個人對海峽兩岸分治的看法。

第四章討論台、港、美三地的現代文學史。夏志清的《現代小說史》以西方美學標準審視魯迅的作品，成為西方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強調的中國特性以及去政治的美學觀，反映對兩岸政治體制介入文學的反感。劉心皇的《現代文學史話》表現出個人礙於體制的監控，而迂迴表述對魯迅的看法。

第五章則梳理夏濟安、李歐梵一脈的魯迅研究，並比較夏濟安與舒蕪《野草》

解讀之異同。這一脈的魯迅研究更為注重魯迅的心靈反覆、矛盾，以及其創作的象徵與隱喻，呈現精神意涵與創作技巧並重的研究。這一流派的研究在 1980 年代以後被介紹回中國，影響了中國新時期的魯迅研究方向，成為當前魯迅研究重要的一支。

第六章結論部分，先整理冷戰體制下台港魯迅研究的三大問題，並且嘗試以東亞視域來了解魯迅研究的跨國交流。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論文為原創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楊傑銘）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畢業論文核准頁

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台、港傳播與演繹

楊傑銘

哲學博士課程

論文審查委員會 ：

SIGNED （ 主席）

李雄溪教授

SIGNED （ 校外考試委員）

王曉明教授

SIGNED （校內考試委員）

黃子平教授

SIGNED （校內考試委員）

許子東教授

導師 ：
許子東教授

副教授
陳惠英副教授

代教務會核准 ：

SIGNED

夏爾馬教授
高級學位課程委員會主席

1/9/2014

日期

目錄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迷霧中的靈魂.....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設定.....5
第三節　魯迅學研究的六大類型.....14
第四節　章節架構安排.....35

第二章　世紀之爭：蘇雪林反魯論述成因與在台、港的文化共振.....38
第一節　冷戰體制下的華語語系文學：蘇雪林反魯論述的（不）代表性..38
第二節　蘇雪林走向反魯道路的「兩個問題」與「三種可能」.....40
第三節　蘇雪林的反魯論述在台灣文學場域的波瀾.....55
第四節　蘇雪林言論在香港文壇的發酵.....66
第五節　小結.....73

第三章　「人」的魯迅：曹聚仁、鄭學稼的魯迅傳記書寫.....76
第一節　台港文化共振下「人」的魯迅論爭.....76
第二節　敘事者的權力：鄭學稼《魯迅正傳》中的魯迅形象再現.....82
第三節　反共政策下《魯迅正傳》的版本差異.....87
第四節　包括在外：曹聚仁《魯迅評傳》的魯迅形象重構.....94
第五節　真實與虛幻的辯證：曹聚仁《魯迅評傳》寫史的趨力與障礙....101
第六節　小結.....108

第四章 典範的轉移:夏志清、劉心皇、司馬長風海外文學史的魯迅形象建構 111
第一節　文學史的「經典」論爭.....111
第二節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偏見與洞見.....115
第三節　言說的艱難：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1971）中被隱藏的魯迅.....122
第四節　民族大義的美學觀：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1978）的魯迅形象建構.....128
第五節　小結.....137

第五章　海外的回聲：魯迅《野草》中黑暗面的研究及其演繹.....141
第一節　庸眾與孤獨者：魯迅研究的不同道路.....141
第二節　冷戰體制下夏濟安的魯迅研究的位置.....143
第三節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與〈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的研究.....147
第四節　舒蕪與夏濟安魯迅黑暗面研究的兩種路徑.....155
第五節　李歐梵的繼承海外魯迅研究.....160
第六節　小結.....166

第六章　魯迅思想的東亞區域框架思考..... 170

參考書目.....183

致謝

字句的串連呈現一個人的溫度，在追索與思辯之中，我與前人的迷藏就此展開。有時他們進入夢裡給我提示，指引的道路看似接近真理卻又矛盾；有時則在微卷與文獻中想像各種似是而非的語句，欲言又止且言不及義的言說讓人摸不著頭緒。我只能透過語氣猜測背後的動機，以及時代下種種無以名狀的情緒。

很多時候在魯迅的小說與雜文裡感覺的到他在我身旁，那廉價的菸味與酸腐的體味透過文字暈染，瀰漫的抑鬱濃烈得令人無法喘氣。他教我如何浪漫，卻又極其現實打碎一切可能的幻想。時代是否有進步，這很難有個定論，但可以確信的是，跨國、跨地域的極權體制與資本家共構出更為複雜且龐大的體系，以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各個層面控制著人民。甚或以金錢與權力分贓、挑動國族歷史仇恨與衝突的方式，分化人民之間的互信。時至今日，鐵屋子裡的人們是否還在沉睡，依然的愚昧不堪？我與我的時代，魯迅與魯迅的時代，是如此的相似，也如此的荒謬。

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許子東教授，這篇論文若有任何的長處或貢獻，都必須歸功於他對我的指導。永遠記得第一次的見面，在他的辦公室閒聊，並且留給我一樣功課：「多讀書，多思考。」這六個字是這三年來唯一的作業。微言重聽，永遠謹記在心。另外還要感謝黃子平教授與王曉明教授，兩人在口試過程中的提問與意見，都是激發我進一步思考與觀照自身的盲點，能獲得兩位魯迅專家的提點，讓這小小的研究成果得以更為完整。自覺是最幸福的研究生，最後一年有幸能遇到兩位老師，都是深化我思考魯迅研究，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相關課題。

此外也要感謝系上照顧過我的老師們：陳惠英老師是三年來我論文的忠實讀者，他不吝惜在我論文仍處於粗淺、幼稚概念時期就給予我意見與指導。其實自己一直都知道自己書寫的盲點和缺陷，但惠英老師總是鼓勵多過批評，這樣的包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李雄溪教授在生活上的溫暖照顧，驅散異鄉人的漂泊與孤獨，哪怕是一頓飯或是一陣寒暄，都讓我感受到嶺南大學永遠是我的家。黃淑嫻老師在課堂與課後的指點更是獲益良多，若說我對香港文學、電影產生任何一點的體會與興趣，全都來自於她的教導與啟發。未來我會繼續在香港文學與電影的領域繼續深造，希望能不辜負黃老師的栽培。

另外還要謝謝曾經在我生命中留下足跡的朋友們，因為你們的存在讓我的生命更為完整且豐厚。在香港的一千多個日子，很短，卻改變很多。香港之於我，已然是另一個家。三年來，每當寫作陷入低潮時，我總會幻想畢業這一日，我該說甚麼，寫甚麼。生命中存在太多美好，一一細數後，悲觀的情緒也就杳然而逝。追尋魯迅、追尋閱讀魯迅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此刻我是如此認為，相信未來也是這樣想的吧。

第一章　緒論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恭維讚嘆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再面前。

魯迅《華蓋集續編　無花的薔薇》

第一節　迷霧中的靈魂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最多不同解讀和詮釋角度的作家，到目前為止可以查到超過千本與魯迅相關的著作，遍佈華語甚至是全球各地的文學市場。1999 年《亞洲週刊》票選「中文小說一百強」時，這個由全球華人學者共同票選的排名，魯迅的《吶喊》（第一名）、《徬徨》（第十二名）分別入選其中。由此可以看見魯迅的作品在讀書市場佔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早已是華語文學重要的一章。劉再復曾在一場研討會公開說過：「如果要在魯迅、張愛玲、沈從文、李劼人、蕭紅五位作家中挑選一個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會在魯迅與張愛玲之間徬徨，然後把票投給魯迅。」[1]面對現當代文學人才輩出，魯迅的地位依然屹立不搖，即便是風靡華人讀書市場的張愛玲，也依然無法取代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經典地位。

魯迅的著作是如何形成中國新文學的經典代表，除了是作品內容成熟且與時代、社會產生共鳴之外，魯迅在新文學的重要位置，同樣也是成為經典作家的原因。但如果說魯迅成為中國新文學的代表作家是「被建構的」，如此的建構過程中內部摻雜了怎樣的因素？而這背後又反映了甚麼樣的時代風貌？

不可否認的，魯迅之所以受到重視與中國共產黨的「造神運動」有關，與此同時華語文化圈甚或是日本、世界其他各國，對於魯迅思想與文學作品的研

[1] 許子東，〈二十世紀中文文學的發展：從吶喊到流言？〉，《香港短篇小說初探》（香港：天地出版社，2005）頁 242。

也是為數可觀，其中包含諸多因素也都影響著當代人們對他的喜愛與厭惡。在戰亂的年代文學必須服膺於政治成為附屬工具，而歷史的變動往往隨著時代的演進有所改變，特別是政治力的介入主導了意識形態的走向，魯迅作為文化符碼的「被詮釋」、「被建構」，也會受到政權的更替與政黨的利用形塑出不同的樣貌。

雖說從中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中共主導魯迅符號的話語權，但因為戰爭關係文化整合工作並未強制，裡頭還是可以分成：馬克思主義務實派（瞿秋白、馮雪峰）、馬克思主義精神啟蒙派（胡風）、實踐的政治革命家（毛澤東）等路線。[2]這些不同的路線展現了中共內部思想的多元與複雜，直到毛澤東逐漸掌握黨內領導權才讓魯迅研究由多元走向單一。

若說「記憶」是一種建構，「遺忘」也只是另一種的形式。當中共以自我意識形態加諸於人民，同時間國民黨政權也以「遺忘」與「抹黑」來建構魯迅的形象。1942 年開始，國民黨在爭取魯迅形象的文化戰場上受挫後，繼而轉向以圍堵方式排斥魯迅的一切，開啟了國民黨政權的反魯論述。特別是國府 1950 年撤退來台，國共以台灣海峽為界的形式日益明確，反魯論述也在此情形下夾雜中華道統的論述形塑成多重層次的面貌。

這裡的道統所指涉的是政治上的，國共兩黨究竟誰向全球說明代表正統中國，這不僅是政治上的論述、聯合國席位的爭奪、邦交國的爭議，同時在文化層面的沿襲儒家所建立的道德體系，透過確立歷史系譜來表彰自我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回到當時的社會語境，所謂「一個中國」的文化道統的繼承性問題大略分成三種：一個是擁有全中國領土，但希望反叛傳統中華文化，建

[2] 王富仁將一九三O年代的中共體制下魯迅研究路線分成這三類，但其實有更多不同的研究者而呈現出不一的立場。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現狀》（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3）。

立起屬於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自詡繼承孫文三民主義理想，背負著傳統文化的大旗卻流亡海外，依附美、日勢力偏安一隅的中華民國；另外還有一個是散佈在海外的文化知識份子群體，包括新儒學家或是自由主義學者，像是：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他們雖然沒有政治實體的保護，但在強大的論述與知識建構中，超越國共兩黨黨派的文化民族主義框架，仍讓他們的論述建立起異於兩黨的另一支文化道統。

二戰結束之後，魯迅的文學與思想討論只剩下擁魯與反魯兩種立場，並在海峽兩岸的分治情勢下形成兩大陣營。換言之，國府與共黨在建構魯迅形象上存在極大的不同，中共積極的宣揚魯迅思想，將魯迅推向神格化的境地，反觀國府利用查禁魯迅相關著作、推動反共文藝政策，來建構反魯論述。[3]1950 年代以後的台灣文化圈是無法看見魯迅的書籍，雖說政府不積極介入建構反魯論述，但卻以國家機器監控文化圈中的魯迅論述發展。[4]

相較於海峽兩岸，香港又是不一樣的風貌，從中日戰爭到國共戰爭時期，香港集結著大批的南來文人，連帶的使香港社會存在著反魯／擁魯、左翼／右翼兩種論述，彼此之間在文化場域相互拮抗，展現出異於中、台兩地的特殊文化現象。雖然在冷戰體制架構下，香港被歸類於「自由世界」陣營，與英美之間從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一直有密切的合作，但是英國與美國對中（中華人民共

[3] 如古大勇所概述的：「中國大陸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使該時期的魯迅研究呈現高度“一體化”的特徵，魯迅研究緊密配合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成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註腳”，魯迅研究受到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影響，研究者無法從真正的學理層面來研究魯迅，而多從政治的、革命的、階級的、社會的等具有進步意義和功利色彩的角度來闡釋魯迅，不敢涉及魯迅身上的那些個人的、孤獨的、彷徨的、虛無的、絕望的等維度的內容，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魯迅被詮釋成單一的、教條式的“高大全”的完美英雄。」古大勇，〈論夏志清對“神話魯迅”研究範式突破的意義〉，《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4 期，2012.8，頁 42。

[4] 國民黨文藝政策的總舵手張道藩在〈略述民生主義社會的文藝政策〉中這樣說道：「自五四到大陸淪陷這一階段，政府可說沒有訂定甚麼文藝政策的，而這一階段的文藝發展竟偏向於邪惡方面去了，卻沒有走上正常的軌道，可說是我們很大的教訓。」也因此在訂立文藝政策中，推行文化清潔運動，將不配合政府反共政策的異議份子一律塑造為他者進行清算。

和國）的立場存在著差異，主要原因是英國要持續保有統治香港的權力，擔心中共越界解放香港，所以在外交政策上傾向支持中國，與美國的親台（國民黨政權）立場呈現不同調的情況。

香港是美國防堵共產世界的重要陣地，在英國寬鬆政策下並未如台灣全面肅清共黨分子，給予左、右翼人士一定活動空間。英國因為包括香港因素在內的諸多原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旋即與之締結邦誼（1950），相反的，美國卻遲至一 1979 年才與中國建交。從這裡就可以看到，冷戰體制下英、美兩國雖然許多議題有所合作，但兩國在中國問題上的不同立場，也使反共聯合陣線出現擺盪、協商。也就是說，對比於美國對中國的立場強硬，英國反倒給予中國較多的空間，連帶開放香港的社會空間，使其存在著左、右兩派的勢力相互拮抗。總括來說，五四以降的中國現代文學火種，因戰亂而從中國向外流動，主要的一個支脈是隨著南來文人飄流到台、港，並因應台、港政府的政治體制發展出屬於在地的華語文學，而魯迅的作品、思想同樣也循此脈絡在兩地呈現出特殊的文化風景。

是此，筆者在本論文聚焦討論冷戰體制台、港兩地的魯迅思想傳播與演繹，當魯迅符碼（Code）在不同的閱讀者、講述者、書寫者的文化語境下，是如何演繹出繽紛樣貌。基本上來說，本論文探討的問題為兩大命題：第一、冷戰體制下台、港兩地如何各自發展出差異的意識形態。第二、魯迅思想作為中國資源是怎樣被轉介、運用於台、港兩地。而這之中牽涉到魯迅的思想如何轉向，他在傳統與反傳統之間的看法又是如何，甚或是魯迅個人與政黨政治之間的關連等等諸多問題，都將是被涵括這兩大命題中待解決的諸多子題。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設定

1.兩種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

在範圍設定上，本論文將針對台、港魯迅思想傳播與演繹進行細部研究，如此的分析不只觀照南來文人到台、港之後是如何論述魯迅、建構魯迅形象，也必須討論戰後兩地政治體制與文學之間的互動，而這時間中也包含了全球的冷戰體制在亞太之間的影響。[5]自從魯迅去世之後魯迅符碼再也無法擺脫政治性的干擾，一切的魯迅研究、討論都帶有意識型態的「偏見」。當然，在華語語系所呈現的魯迅面貌，正好與同時期的中國魯迅研究有著呼應，兩岸之間的魯迅論述雖看似各唱各的調未有直接性的對話，但在彼此的陣地裡有著對方的影子。所以我們可以藉此討論魯迅思想在華語語系文學脈絡的流動，在解釋「華語語系文學」一詞時，史書美與王德威分別提出不同的說法值得我們仔細討論，並從中理解魯迅思想置於華語語系文學框架中可產生如何的解讀視角。

2004 年由史書美提出「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其目的是要批判中國本土中心主義對於海外的華文文學的漠視。她倡議將「中國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區分開來，前者指涉中國大陸的現當代文學，後者則是指中國以外世界各地的「華語文學」。當然，這樣的說法除了將華語語系（Sinophone）與英語語系（Anglophone）、法語語系（Francophone）置於類似的意義，為凸顯華語書寫在中國以外其他地區的「殖民」意涵，同時也是比較「中國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觀看兩者之間的互動與交互滲透。[6]史書美的說法著重

[5] 袁良駿說：「1987 年台灣解嚴之前的魯迅研究，雖然不無具有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的評述，但總體上政治色彩過強，於魯迅乃至於歷史多有悖誤；解嚴之後，隨著文化氛圍的開放，魯迅研究才有了符合魯迅乃至歷史本來面目的長足進展。」袁良駿，〈走出政治陰影的台港魯迅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 2 期，1995，頁 71。

[6] 史書美這樣提道：「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創造出「華語語系文學」這個新詞，以便抵抗中文文學界的不公平現狀：在中國本土之外發表的華文文學被漠視，被邊緣化；這些在中國本土之外的華文文學是否被文學史認可，都被不公平的、意識形態作祟的、專斷的因素所決定。」史書美，〈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頁 21。

於強調華語語系的「反離散」特性，認為中國人的離散（the Chinese diaspora）帶有中原中心的視角，相對來說華語語系反倒能看到各個族群之間的權力關係，強調原居住民的在地性，並更加重視華文／華語書寫離開中國後所產生的變化。[7]

對比於史書美以「華語語系文學」拮抗中國文學，將其視為策略、暫時的空間來安置海外華語文學的不同風貌，強調各地區所存在的在地性，以及文化的流動與演繹。王德威則認為「華語語系文學」應跳脫國家疆界以語言作為依歸的集合體，不必然存在著中心與邊緣的對立，而在空間上提出「逆反」於中國文學的概念，不同於史書美的「演繹」。這種逆反同樣也是針對離散而來，過往在討論離散時是帶有原初的、中心的嚮往，但此刻的華語語系文學，則是具海外的獨特思想與資源重新與中國進行對話。[8]

所以我們可以說，兩人對於「華語語系文學」有著不同解釋：史書美著重於中國文學離散後在海外的演繹，這演繹是對應於原初的中心，形成中國文學／華語語系文學的對立而具有抗拒收編的意圖。王德威則將此概念擴大範圍，以文化層面建構起「去政治」的大中華共同體，以此涵括了中國與海外的華語書寫。但我認為兩人的說法同時忽略了一個客觀的事實：不論是 1. 政治化的關照弱勢族裔，或是 2. 以去政治化的建構更大框架的文化中國，史書美與王德威都未涉及冷戰體制下中國文學與海外華語文學發展脈絡的對立關係，以及美國勢力介入海外華語文學的問題。

---

[7] 史書美說道：「因此，與離散中國人概念不同的是，華語語系概念所強調的並不是個人的民族或種族，而是再興盛或衰退的語言社群中所使用的那些語言。華語語系並不是國族血脈相連，其本質上是跨國的與全球的，包括所有使用中的漢語語言。由於這種殘存的特性，華語語系以移民社群為主，橫跨各州大陸以及漢人為多數的社會中，包括台灣、新加坡、與回歸前的香港。」史書美，《視覺與認同　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頁 56。

[8] 王德威說道：「華語語系文學因此不是以往海外華文文學的翻版，他的版圖始自海外，卻理應擴及大陸中國文學，並且由此形成對話。」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華文作家在哈佛大學〉，《聯合報》E07 版，2006.7.8、7.9。

換言之，史書美是將華語語系視為獨立的群體現象，而王德威則將華語語系包括了中國大陸的文學，這兩者的差異表現出兩人視域的不同，以及不一樣的中心文化抵制方式。然而，較為令人擔心的是，史書美所聲稱海外華語文學是邊緣的、弱勢族裔時，似乎並未關注到冷戰體制中美國對於資本主義陣營中的華語國家、地區的挹注，甚至提供優渥的獎學金與學術研究資源培養一批符合其意識形態的中國文學、文化研究者；王德威同樣也以「去政治化」策略來模糊美國冷戰體制在亞太地區圍堵中國的文化政策，甚而我們可以進一步的聯想，「華語語系文學」的說法是否成為延續冷戰體制以文化層面由海外收編中國文學的方式。

當兩人的說法漠視冷戰體制的歷史脈絡時，將無法理解「華語語系文學」一詞背後的美國所扮演的角色，而忽略了當代的邊緣很有可能才是應當最迫切被解構的中心。也就是說，中原中心的思考固然必須受到質疑，而且必須時時保持警覺來解構原初、本質的中心論調，但是現今處於邊緣的華語語系，其組成與立場是否真能擺脫冷戰體制下以美國為首的價值觀，也是我們必須留意的問題。

2.冷戰體制下台港兩地的位置

不論是史書美或王德威都未明言，甚或忽略「華語語系文學」一詞的內涵所存在、延續冷戰體制的文學架構。也就是說，「華語語系文學」所欲針對的除了中國中心的中國文學外，同時也是放諸歷史視野中討論冷戰體制下中國與海外意識形態拮抗的重要方法，這本質上仍然在冷戰體制或是後冷戰體制之中，但卻是史書美、王德威在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理所略而不談。

回到歷史脈絡來看，1949 年後兩個中國的兩岸對峙情勢，不只是中華民

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道統中國之爭，同時也是離散文人將中國思潮輸出的重要時期，包括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方都有大量的移民湧入，另外也有許多中國文人逃到美國、法國等國家避難。如此的情形讓華文書寫因政治情勢一分為二，其一是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共產世界，另一則為依附美國勢力的資本主義陣營，而華語語系所討論的範疇也與資本主義陣營互為重疊，呈現了中國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中國共產黨統治區域／美帝為首西方資本主義統治區域的劃分。

因應全球體系的「冷戰體制」架構下不同地方起始與終止的時間點不一，而出現時間上的落差，是故並沒有一個真正的完結冷戰後、去冷戰的時間點，時至今日的世界仍有許多冷戰的殘餘問題在全球各地製造國與國之間的紛爭。對美國而言 1947 年美國外交人才肯楠（George F. Kennan）提出對共產勢力進行圍堵策略，希望美國聯合理念相近的各地方勢力，對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進行圍堵，開啟了美國將全世界一分為二的防線規劃。然而，台、港兩地真正被鑲嵌進入冷戰體制是在 1949～1952 年這段期間，一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海峽。而 1950 年爆發韓戰美國第七艦隊的介入國共鬥爭，也讓國民黨政權與美國之間形成軍事上的盟友關係。其次是美國在香港所設立的新聞、文化傳播相關體系，美新處於 1950 年創刊《今日美國》其後改為《今日世界》，並設立出版社出版相關書籍、宣傳品對亞太中文地區傳播美國文化、政策。換言之，美國以外交、政治、經濟、軍事各種方式介入亞太地區的事務，試圖圍堵共產黨並將觸角伸入日本及其東亞周邊國家、地區，這包括了南韓、台灣、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等都程度不一的受到美國的干預。[9]

[9] 可參考：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語文化政治〉，彭小妍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的中國、日本與西方》（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

基本上在討論冷戰時多半是聚焦於美、蘇兩大帝國主義在全球的對抗，然而在亞太地區因為美國尼克森總統「聯中制俄」的政策，試圖瓦解中國與俄國的結盟，打亂共產陣營在亞洲區的布局。台、港兩地命運相似都有著被殖民的歷史，也是如此的政權遞嬗讓兩地「被迫」承受歷史的傷痕，且隨著時間發展出混雜（hybridity）的文化內涵。但整體來說，華語語系在冷戰體制下的文化交流情況，確實是值得我們持續關注與探討。由此，比較五、六十年代可得到如此的結論：

> 在美蘇冷戰與國共內鬥的影響下，在東亞華語語系中，中國、台灣、香港等三塊板塊逐漸成形，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基本上，台港兩地皆屬於美國勢力範圍內的「自由世界」陣營中，台灣作為軍事堡壘，香港則是文化情報站。當時台灣島內處於較為閉鎖的白色恐怖時代，恰好藉由美國和台灣的友好關係，使香港的美援刊物得以進入台灣；提供台港交流的文藝平台，加之五〇年代台港南來文人群（香港稱之為南來文人；台灣稱為省外作家）彼此之間的意識型態與歷史記憶皆較為接近，有得更早有深交往來，透過此一層人脈關係及台港共通文藝平台的運作下，使得台港不再如同平行線，呈現跨地文化交流的可能性。[10]

上述是台灣學者吳佳馨對台港文化圈交流的看法，香港在全球美蘇冷戰的關係中在亞太扮演著重要的樞紐，一方面是維護中華文化道統價值，另一方面又是華人社會中唯一較為自由的地區。也因為如此的情況，使香港在當時出版了大量的書籍，成為華人社會中重要的文化重鎮，與當時的台灣文化圈有密切的交流，人員之間的流通也相當頻繁。

對台灣而言，1972 年中美簽定聯合公報（上海公報），美國對中國的立場從防堵走向對話，直到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才正式斷交轉而與中共建交。如此的轉變也讓國民黨政權認知到，「一個中國」屬於中華民國的說

[10] 吳佳馨，《1950 年代台港現代文學系統關係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濟安、葉維廉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8，頁 42。

法已不再被國際接受，改變自身原有的反共策略而重新摸索對外態度。但真正對台灣社會有結構性改變的，是 1987 年 7 月 15 日的「解除戒嚴令」，雖然台灣社會依然受到「國安法」的限制，但隨後的開放大陸探親（1987.10.15）、解除報禁（1987.12.1）等政策，都可以解讀國民黨對中政策的修正，並逐漸解除國家體制限制人民生活的情況。至於香港，1982 年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就香港問題開始談判，1984 年 12 月 19 日英國與中國共同簽屬的「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後香港回歸中國，也讓香港從冷戰體制的反共位置走向與中國協商的政治道路。台、港兩地都約莫在相近的時間點上轉變了對中國立場，從過去反共政策下的圍堵、拮抗、甚至是不承認的態度，轉而以務實的交流、溝通的方式面對中國。

延伸來看，戰後台、港文化場域受到美國外交戰略的東亞島鏈框架影響，在出版市場的流通，經貿、文化的往來交流形成特殊的華人共同圈。而使共同圈更加緊密的原因是：中共除去對傳統文化的信仰，特別是化繁為簡的字體改造，其原本的目的是為了讓中國一般大眾都能識字，但如此的改造形成差異化的中華文化，使得中國境外仍使用繁體字的地方，因出版市場的流通、文字使用的相近、人員交流往來密切後，成為繼承中華文化的使命感的政治、文化共同體。[11]誠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

> 在積極的意義上促使新的共同體成為可想像的，是一種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一種傳播科技（印刷品），和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個因素之間半偶然的，但卻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12]

[11] 松永正義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文有所論及，文中內容說明了國府在台實行的「大中國意識」的國家意識型態建立過程。他這樣寫道：「至 1960 年代止，台灣島內唯一為人所知的意識型態，就是國民黨所憑藉的立場——在此我們可以稱之為『正統中國論』……站在正統中國論的立場，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唯一可代表中國的政府，它是唯一承續、體現中國文化傳統的政府，台灣透過教育等各種方式被注入了正統性，並依此正統性而成為收復大陸的基地。」松永正義，〈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收錄於若林正丈編，《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台北：故鄉出版社，1988。

[12]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4）頁 53。

文字、印刷統一了文化圈的語言甚或是認同，當中國揚棄信仰孔孟傳統文化時，境外以延續傳統文化自居的華人，便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他者，走向建構兩種截然不同的中華文化圈。[13]而使用繁體字的台、港兩地，因為地理位置、歷史因素、人員流動等諸多原因，讓這兩地的文化、出版交流格外密切，進而發展出文化共振的現象。

這裡的「文化共振」意指台、港兩地同時因為單一議題而有所反響，但彼此又在反響之間相互影響。所謂的文化共振在「書寫魯迅」的脈絡下共包含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別作家、研究者。第二，傳統文化脈絡下的台、港兩地。三、美、蘇冷戰體制影響的亞太布局。這三個層次之間彼此交互影響，導致魯迅相關論述不必然的只是反映作者本身，其牽涉了當時代的社會脈絡，折射出繁複的個人與時代的共相。

借用「華語語系文學」來說，本論文的「魯迅」符碼、意義討論並非著眼於文本與真實的魯迅之間的異同，甚或是對中國文化呈現怎樣的效忠，而是透過對照中國與台、港的魯迅論述之差異，探討背後意識形態的抗拮以及在地化的演繹。除此之外，透過關注台、港兩地個別作家、評論者的論述，希冀分梳在政治框架下作家之間的不同，而這之中又與地域、對中國問題、與美國態度的多方面因素形成複雜的影響與對話。

3.文學場域中錯綜複雜的權力網絡

[13] 如同蕭阿勤對此時期國民黨政府性質所做的陳述：「在文化上，國民黨政府強調自己是中國傳統文化「正統」－－尤其是儒家思想－－堅決的捍衛者。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被形容為融合了中西思想的創造性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則是源自西方的異端邪說，破壞中國文化傳統。1966 年蔣中正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代表了國民黨典型的文化政策。這個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激進又反傳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往後二十年左右台灣的領域影響重大。官方對許多具有中國大陸色彩的文化價值、象徵、藝術、音樂、戲劇、工藝等的提倡，和推行國語一樣，都壓抑、犧牲了台灣本土文化。」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頁 280。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魯迅」←→「評論者」←→「時代」之間存在複雜的權力網絡關係。借用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場域」（Culture Field）概念，該理論強調了人民在「場」（Field）中所具有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值得我們引以作為思考的方式。[14]而「生存心態」（habitus）一詞亦是其理論的核心，所謂的「生存心態」指的是一般大眾在社會結構中既非不受限制的自由選擇，也不是絕對地被迫受限於社會規範，而是在特定的歷史與社會環境中所形塑而成的個人和集體行為。換句話說，「生存心態」展示了人在主體的行動力與自我意識，但「生存心態」同樣的也是社會環境的條件所形塑而成的。此種說法不但超越了主客體二元對立的結構型態，也展現社會結構的「多樣」卻又「固著」的樣貌，呈現了「人」在社會中均非機械式的死守規則，而有不同的策略。換句話說，每位文化人雖會以為自身論述完全出自於自由意志，但在文化場域中每一個人的行動、論述都涉及權力網絡中的主動與被動關係。

以「生存心態」延伸來看，每位「文化人」（或是稱：「行動者」）因為不同的階級、職業、意識形態所衍伸、共構的環境就可以稱為「場域」。也就是說，「場域」是一個開放的概念，是各種位置共同處在的權力關係網絡。在布爾迪厄來看，人們會依據不同利益進行特殊的交換活動，而這些場域如同市場一般，會進行特殊資本的競爭與交換。也因此，場域中的權力、資本的分配結構，決定著這些位置的處境和佔據位置的文化人（行動者）的特徵，且也決定著位置與位置之間的關係，如支配關係、屈從關係或結構上的對應關係。[15]

文化場域網絡所展現權力的流動，除了會因外在社會因素而改變，也會因為文化人自身的思維、選擇而有所影響。更重要的是「文化」有兩種形式：一

[14] 在布爾迪厄的說法中雖然強調了人的自主性，但他也不否認「文化場域」最終還是會受限於「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與「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影響。
[15] 張意，〈文學場：一種社會學解讀〉，《文化與符號權力　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73。

是物質性的占有，此為「經濟資本」的條件；二是象徵性的占有，此為「文化資本」的條件。而這兩種資本形式是具有流通性的，彼此之間是可以轉換的，卻不可以完全取代。「場域」是文化人鬥爭的場所，不論是經濟或是文化皆是可以累積的資本，而每一個文化人都希冀在場域之中累積資本作為下一次競逐、鬥爭的籌碼。

筆者在本論文雖主要觀照台、港兩地的魯迅論述，但也會將中國因素、美國因素納入研究視域，觀看意識形態鬥爭下的台、港兩地魯迅形象的演繹，並分別以幾位海外重要的魯迅研究學者，包括蘇雪林、曹聚仁、鄭學稼、夏濟安、李歐梵、夏志清、司馬長風、劉心皇等多位的論述為主軸，展演出他們的論述對於海外華文世界的影響。所以在華語語系文學一詞援用時，筆者並不會刻意選擇史書美或王德威一人的說法，而會依據不同的海外魯迅研究者的時空脈絡借用兩人的觀點。由於兩人的「華語語系文學」所側重的角度有所不同，史書美是在地化的演繹，王德威則是跨國、跨地區的流動，故在撰寫本論文時會同時穿插援用兩人的看法，針對不同的海外魯迅研究者進行討論。

由上述可知，海外的魯迅論述不同於中國內部有更為極端的意識形態，且又因國家、地區的政治體制不同而發展出相異的魯迅論述。但這種相異卻也不至於是眾聲喧嘩，因為所謂的眾聲喧嘩也有其一定的脈絡，甚或是跨地域、時空的對話，但卻由於長期的政治因素導致魯迅研究至今仍處於中國熱、海外冷的特殊狀況。雖說近年來魯迅研究界已逐步反轉這種文化現象，希望能重新賦予魯迅「人」的性格，而不是受到革命導師、文化旗手等政治術語綁架。但早已進入神壇的魯迅要走下來似乎也不是那麼容易，裡頭暗藏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非一時片刻可以改變。

當然，由於冷戰體制的對立，海外魯迅論述多半被歸類為反魯論述，而這

些反魯論述之所以重要，並不只於其濃厚的政治色彩或是國家機器介入，而是這聲音同時在華語語系中呈現複雜的權力網絡，在跨地域的反共大旗下以不同的方式評論魯迅，呈現的魯迅面貌看似扁平卻也有差異。但在討論海外學者是如何論述魯迅之前，我將先概述目前魯迅研究議題的六大類型，這六個大類型涵括了現今魯迅學研究的相關重要問題，而海外作家、研究者所討論的魯迅相關問題也都可以歸納為這六大類型之中。透過了解目前魯迅學研究現況，才能理解魯迅思想傳播與演繹時必然涉及的幾個重要的面向。

第三節　魯迅學研究的六大類型

「論述」作為創造及複製意義的方法，其所表現的是說話者的位置以及觀看他者的方式，透過論述所再現的不僅是他人的形象而已，而在論述的話語間也表明了自我的立場與態度。換言之，討論他人如何描寫魯迅，其焦點不只是「建構如何的魯迅形象」，更是藉由言說者的論述來觀看其發聲的位置。

我們可以將時間與議題類型分別視為魯迅學研究的經線與緯線，其所交織而成的便是複雜的魯迅學研究系譜與座標。若將魯迅文化史整個歸納與分類，共可分成九大事件與三大脈絡，九個大事件分別如下：（1）1926 年左右魯迅同時與右派陳西瀅、林語堂，左派的創造社、太陽社的論爭。（2）1930 年魯迅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3）1936 年魯迅逝世。（4）1942 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5）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6）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1952 反右整風運動。（8）1966 年文化大革命。（9）1976 年文革結束進入新時期。三大脈絡是：一是主體研究，研究魯迅的「立人」價值，探討其內心世界的複雜、矛盾面貌。二是實證研究，將魯迅當成是客觀的實體，分梳其以及過往時代的歷史文獻。三是文本研究，以新批評的文本細讀方式，發掘魯迅文學作品裡的意涵，以重建魯迅在中國文化界的位置。

進一步來看，從這三大脈絡裡今日的「魯迅學」更在文學、政治、歷史、文化等多層次的建構形成最為主要的六個大類型議題：

1.魯迅小說中的傳統與反傳統

2.魯迅《吶喊》與《徬徨》文學成就

3.魯迅思想的轉向以及與左聯之間的關係

4.建構傳記中的魯迅形象

5.魯迅雜文的價值與社會意義

6.魯迅思想的播散與演繹

若以 1913 年 4 月屬名焦木（惲鐵樵）針對魯迅第一篇小說〈懷舊〉小說的隨文評點開始算起，魯迅研究至今已有一百餘年的歷史，所累積的成果是五四新文學以來其他作家難以企及的高度。當然除了時間與議題外，同樣也因群體的差異會造成魯迅作品解讀方向的不同，這部分我將在每個類型的討論中一一述及，並作簡單的介紹。

1.魯迅作品的傳統與反傳統

魯迅最早受到矚目是因為他作品反傳統精神，與五四文化運動浪潮密切呼應，不論是過去或是現在的魯迅研究學者通常都以「反抗」一詞概括魯迅精神。像是傅斯年在 1919 年 2 月 1 日《新潮》上所發表的〈書報介紹〉，評論魯迅的〈狂人日記〉時，說在小說中讀到：「瘋子是烏托邦的發明家，未來社會的製造者。」[16]從這句話中傅斯年似乎在魯迅身上看到了中國文化改革的方向。傅斯年之後的吳虞則在〈狂人日記〉談及「吃人禮教」的部分，此概念也成為後來的評論者所依循閱讀的方式。[17]除了上述的傅、吳二人之外，周作人、茅盾、

[16] 傅斯年，〈書報介紹〉，《新潮》，1919.2.1。
[17] 吳虞，〈吃人與禮教〉，《新青年》第 6 卷第 6 號，1919.11。

張定璜等人都談及魯迅作品所表現的社會改革的層面，並將這種改革定位為啟蒙、改造國民性，以此將魯迅推向中國現代文壇啟蒙、改造國民性的作家角色。

回到當時來說，魯迅雖不是五四浪潮最重要旗手，但卻是創作中最受矚目的作家，像是〈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小說都是在那時期寫成的，奠定了魯迅在文壇的地位。換言之，這股反抗、改革的力量源自於魯迅青年時期不斷摸索、自問的核心問題：「如何才能改造國民性」。如他自己在給友人的書信所提：

> 其實這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脫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哪裡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甚麼甚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18]

也就是說，1919 年前後的文學革命與五四文化運動帶動了中國整體的文化重建，一方面批判傳統中國的專制制度，一方面大量翻譯西方文學文化思潮，推動民國以來的文化運動進入新的浪潮。由於軍閥割據看不到中國未來，作家們痛恨不合理的社會現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問題成為當時候作品關注的議題。當然在改革陷入困境沒法成功時，人們往往都會喪志，魯迅也不例外，也對於這種改革抱持的些許的懷疑，懷疑「新是否真的不如舊」，以及「改造真能成功嗎」。

而這種情緒在留日歸國的新一代左翼知識份子眼中是阻撓革命的反應，所以到了 1925 年以後順應全球左傾的思潮，中國文壇也流行起了社會主義，並由新一代知識青年打著改革的大旗，批判魯迅等人思想保守。1920 年代中期開始，社會主義思潮與共產黨給予知識份子希望，社會主義的道路似乎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對民國成立後的一連串政治腐敗有了解決方法，

[18] 魯迅，《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 31。

試圖從推翻封建體制後的官僚、菁英手中取回政治的主導權。這群左翼知識青年的「革命文學」概念建立於積極的鬥爭精神，以及擁抱無產階級大眾的集體主義，從 1926 年中期開始打著「革命文學」的口號挑戰五四文學世代。

雖然在革命文學議題發展初期魯迅已受人檢討，但真正成為論爭的焦點是 1928 年 3 月錢杏邨〈死去了的阿 Q 時代〉一文。錢杏邨通篇的議論有兩個層面：第一，認為魯迅是落伍的完全跟不上時代，僅是個人主義情緒的抒發，而沒有為佔多數的無產階級人民發言。第二，魯迅的文學創作過於灰暗，不具革命的光明面。[19]也在這層面上魯迅被視為保守、傳統的小資產階級，一如郭沫若對魯迅的定位：「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20]在短短的十多年時間，魯迅在他人眼中從啟蒙的改革角色轉變為社會的保守份子，如此的改變所顯現的左傾思潮逐漸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同樣也透露出傳統與反傳統的二元論所具有的相對性。

到了 1920 年代後期，魯迅與左右翼之間的鬥爭後，其個人立場的逐漸左傾也讓他與左翼陣線之間開始合作，反抗與反傳統的精神意涵成為他與左翼精神交會重要樞紐，但也同時與共產黨的體制之間有所摩擦，直到魯迅逝世之前，他與黨的幹部一直有衝突。魯迅逝世之後，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勢力日益穩固，黨對於作家、評論者的文化政策越來越具指導性，而魯迅符號由共產黨主導的大規模造神運動使其成為左翼陣營的代言人。當然，最早是瞿秋白、馮雪峰等馬克思務實派學者，將五四文化運動的思想改革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革命

[19] 錢杏邨在〈死去了的阿 Q 時代〉在革命文學議題上是這樣說道：「魯迅的兩部創作集名稱《吶喊》、《彷徨》實在說明了他自己。我們把他的這兩部創作和《野草》合看的結果，覺得他始終沒有找到一條出路，始終的在吶喊，始終的在彷徨，始終的如一束叢生的野草不能變成一棵喬木!實在的，我們從魯迅的創作裡所能夠找到的，只有過去，只有過去，充其量亦不過說到現在為止，是沒有將來的。」原載於 1928.3.1《太陽月刊》三月號。

[20] 郭沫若，〈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創造月刊》1928.8.10。

相連起來，透過此方式將魯迅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達到統一。

當然除了反傳統的路線外，仍有魯迅研究者在他的作品中看見中國傳統文學的影響，跳脫將中國新文學運動與傳統文學的二元論，在文學形式與內容上考究魯迅與傳統文學的關係。王瑤的〈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關係〉[21]就探討魯迅著作中的古典文學影子，包括了雜文與魏晉文學的關係，小說創作手法上與《儒林外史》、《金瓶梅》、《紅樓夢》有參照學習之處，為當時中國大陸的魯迅研就開闢不同的討論方向。羅稷南也以文學史的角度敘述魯迅在詩壇的位置：「魯迅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的，因為他是舊中國最後的詩人和新中國最初的詩人。…」在新與舊的劃分之間，羅稷南表述了魯迅所處繼承與轉化。

自 1950 年代中期以後，一連串的反右運動讓魯迅的反傳統精神不斷被放大，同時魯迅繼承、猶疑與傳統的關係這部分卻鮮為被人討論。姚文元可以算是文革時期的魯迅研究代表，他在《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22]中將魯迅的思想、藝術創作相連階級鬥爭，將魯迅思想成為鬥爭工具。其後到文革時期的魯迅研究，基本上都在黨的階級革命與民族主義論述中發展，隱蔽了魯迅與傳統文學之間的關係，放大其反傳統鬥爭的意識，塑造魯迅與黨的緊密合作。

相對於中國大陸深化反傳統脈絡，海外的研究有較多學者討論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學的關聯，以及魯迅面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包括了夏濟安、夏志清、林毓生、李歐梵等人。這部份將會是本論文著重梳理之處，在此不做太多贅述。但可以說明的是，他們的研究並非討論魯迅如何走過傳統的陰影而面對未來的

[21] 王瑤，〈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關係〉，《文藝報》第 19 期、第 20 期，1956.10.15、30。

[22] 姚文元，《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光明，而是看到魯迅面對傳統與現代的兩難，思想在這光與影之間的擺盪更顯其價值與高度。這一脈絡的論述對文革之後的中國魯迅研究者影響頗深，或說中國與海外在此時期形成某程度對魯迅研究的共鳴，同樣表現其在新與舊、傳統與反傳統之間的曖昧與複雜。

而在中國文革結束之後，開始避免用進化論、馬克思主義或毛主義的理論來討論魯迅，而重新復歸於追尋精神性。包括王得后以「立人」貫穿來談魯迅的思想與創作，與其後的王富仁、錢理群、楊義、汪暉等後進者，也以切入精神哲學的角度，揚棄過去傳統、反傳統的立論，提出「中間物」等說法，解釋魯迅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猶疑與抵抗。這些都是自 1980 年代後逐漸為研究者所深化論述，挖掘魯迅思想的複雜，成為現今中國魯迅研究者的主流探討。

2.魯迅《吶喊》、《徬徨》文學成就辯證

魯迅的創作裡小說這一文類獲得最多重視，他一生只有三部的小說集子，分別為《吶喊》、《彷徨》、《故事新編》，而其中《故事新編》是改編自傳統民間故事，是否屬於原創上頗具爭議，所以在小說討論上這裡將聚焦於《吶喊》、《彷徨》兩部。從 1923 年《吶喊》出版後旋即獲得反響，茅盾在〈讀《吶喊》〉中說道：「在中國文壇上，魯迅君長嘗試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裡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又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23]給予該書極高的好評。但同時成仿吾在〈《吶喊》的評論〉逐一批評各篇的壞處，說「《狂人日記》很平凡」、「《阿 Q 正傳》描寫雖佳，而結構極壞」、「《孔乙己》、《藥》、《明天》皆為免庸俗」，僅稱讚《不周山》認為是全書唯一的傑作。

[23] 茅盾，〈讀《吶喊》〉，《時事新報》「文學」第 91 期，1923.10.8。

雖說坊間對於《吶喊》的評價兩極，但該書不斷再版與熱銷，也讓魯迅在文壇的地位扶搖直上。特別是〈狂人日記〉與〈阿 Q 正傳〉受到海內外最多的討論，論敵陳西瀅也稱讚小說中的阿 Q 形象描繪，可以媲美李逵、魯智深、劉姥姥般的有趣且不朽。羅曼．羅蘭在看過〈阿 Q 正傳〉後也讚其為「充滿諷刺的寫實藝術」，表現出人類普世的弱點。至於《彷徨》出版後也獲得許多關注，裡頭的〈祝福〉、〈在酒樓上〉、〈傷逝〉等篇章都獲得不少的討論。像是茅盾在〈魯迅論〉中談到魯迅筆下的中國人，相當精準的描繪了中國人的神態與苦悶：「這些『老中國兒女』的靈魂上，負著幾千年的傳統的重擔子，他們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們的生活是可以咒詛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並且不能不凜凜地反省自己的靈魂究竟已否完全脫卸了幾千年的傳統重擔。」[24]茅盾看到魯迅作品裡面深層的的傳統枷鎖，這是新與舊之間的拔河，世世代代的相傳成了無法卸下的重擔，千百年來禁錮於中國人的身分。此文精準的抓住了魯迅的精神意涵，成為早期解讀魯迅小說重要的代表作。然而， 1950 年代以後魯迅小說研究進入新的階段，以許杰、王瑤、陳涌的成果最為人所矚目，系統化的探討魯迅的小說。

許杰的《魯迅小說講話》[25]是中國第一本魯迅小說研究的專書，同時也堪稱 1950 年代魯迅小說研究的代表作。他在評論中強調魯迅小說的技巧，認為魯迅所描寫的時代已經逝去，不應只再著眼與社會性的意義，而因探討其藝術創作的表現方式。綜觀許杰整本書，除了闡析藝術表現外，也深刻的分析內容，裡頭細緻的文本細讀成最大的特色。較為可惜的是，雖然許杰不以小說內容是否具戰鬥色彩來決定作品的好壞，但其論點還是受到政治的影響，而帶有光明、戰鬥的美學觀。另一本值得注意的是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26]此書也在許杰的《魯迅小說講話》不久後出版，其內容大篇幅的介紹魯迅的《吶喊》與《彷

[24] 茅盾，〈魯迅論〉發表於《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11 期。
[25] 許杰，《魯迅小說講話》（上海：泥土社，1951）。
[26]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2）。

徨》，包括〈狂人日記〉、〈藥〉、〈祝福〉、〈故鄉〉、〈在酒樓上〉等篇章。王瑤解釋魯迅作品繼承中國古典小說優秀的傳統，並且創造了現代小說現實主義的道路。這說法不同於以往的評論者，往往強調魯迅開闢了現代文學的新頁，卻忽視其創作中與傳統的密切關聯。陳涌的〈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27]與〈魯迅小說的思想力量和藝術力量〉[28]兩篇論文，直指魯迅小說創作的「求真」是其藝術上的特色。陳涌認為，魯迅小說人物內心的刻劃反映了真實的中國人的性格，並表現中國國民性的問題，呈現小說高度的歷史感。

除了 1950 年代的高峰外，在 1980 年代以後魯迅的小說研究進入另一個百花齊放的年代，出版的專書就有：李希凡《《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29]（1981）、王富仁《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30]（1983）、《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31]（1986）、屈正平《論魯迅小說中的人物》[32]（1984）、楊義《魯迅小說綜論》[33]（1984）、丁爾綱《魯迅小說講話》[34]（1985）、范伯群、曾華鵬《魯迅小說新論》[35]（1986）等多部。而這些論作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避諱的批判過去論述，不同於過去作實證上的考究，改以唯心的角度來詮釋小說中的意涵，藉以提出新的看法。

在這些評論者之中又以王富仁與楊義成就較為突出，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將研究主軸重新圍繞於「反封建」的議題上，認為國民性的愚昧是造就中國不斷處於動盪的根本原因。他

[27] 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人民文學》第 10 期，1956.10。
[28] 陳涌，〈魯迅小說的思想力量和藝術力量〉，《甘肅文藝》第 1 期，1962。
[29] 李希凡，《《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30] 王富仁，《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
[31] 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32] 屈正平，《論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33] 楊義，《魯迅小說綜論》（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34] 丁爾綱，《魯迅小說講話》（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
[35] 范伯群、曾華鵬，《魯迅小說新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透過解讀魯迅小說是如何批判中國的國民性，有意思索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巨大戕害，以此將魯迅真正的價值從革命者的形象覆歸為思想家。楊義《魯迅小說綜論》則從文學與文化史的角度切入，觀看魯迅小說如何一方面繼承中國文學的傳統與思想，同時也學習到哪些外國文學的養分，進而形成融合中西文化思潮的小說。

海外評論者的魯迅小說研究形成特別的論述，蘇雪林稱讚《阿 Q 正傳》認為他描寫出中國人的氣質典型，夏志清則推崇〈藥〉、〈肥皂〉裡頭對主人公的心裡描繪之深刻，司馬長風則喜歡〈故鄉〉、〈在酒樓上〉小說裡所流露出來的中國風情。由此可見海外評論者不一的美學標準，因而喜歡魯迅的作品也有所不同。時至今日魯迅的小說研究依然是魯迅學中最為熱門的研究主題，這也表現了其小說創作對同時代的重要意義，以及其卓越的藝術技巧早已獲得評論者的肯定，成為文學史的經典著作。

3.魯迅思想的「轉向」過程以及與左聯的關係

1920 年代中期，魯迅受到新一代左、右翼知識份子的夾擊，這令其內心處於辯證的狀態，被迫走出《彷徨》、《野草》的猶疑，以及對於自我生命的懷疑，進而走向理解、認同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一段心靈史的掙扎與轉向，成了研究者感興趣的討論議題。

如前述，魯迅終其一生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最終所欲探討的核心仍是「國民性」的問題，如何改造「國民性」一直都是他在文學作品裡所探究的。誠如許壽裳回憶魯迅所描述的，魯迅在青年求學時期開始思考「國民性」的問題：

> 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關聯

> 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甚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魯迅是為了探索救國的道路，為了改變國家的命運思考這些題目。[36]

可以看到魯迅一直在思索：中國的未來應該要往何處去？一如他「棄醫從文」的決定，以及在《晨報　副刊》「開心話」上連載〈阿Q正傳〉，都可以看到他一生的作品裡不論是小說、雜文、翻譯，所圍繞的核心依然是三個相關聯性問題。

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左翼青年論戰同時，也面臨梁實秋因翻譯問題以及「人」的文學展開論辯，並在文學的性質問題上兩人有所爭執。梁實秋認為政治不應當介入文學，不論是三民主義文學或是社會主義文學都是如此；[37]魯迅則認為，文學作品難免都具宣傳性質，而面對現實的中國社會環境的殘破、腐敗，文學應更積極的改造社會，不論是三民主義文學也好，社會主義文學也好都可以嘗試，都有可能是治癒中國的一帖藥。[38]

根據王富仁的說法，討論魯迅思想轉向可以分成兩大派別，一是馬克思主義務實派，以瞿秋白、馮雪峰、雪葦、唐弢為代表。主要論點是承認魯迅思想進入 1930 年代是有轉向，這樣的思想轉向在（1）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2）從進化論走到階級論。而如此的論點日後成為共產黨解讀魯迅轉向問題的主流論述。[39]另一為馬克思主義精神啟蒙派，有王任叔、胡風、舒蕪等人。他們反對將魯迅與共產黨的合作視為魯迅的轉向，認為魯迅一直以來都站在現

---

[36] 許壽裳，〈懷亡友魯迅〉收錄於黃英哲編《許壽裳：台灣時代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頁 84。

[37] 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月號，1929.9。魯迅，〈無產階級文學〉，《新月》，1929.11.10。

[38] 魯迅，〈“硬譯”文學的“階級性”〉，《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0.1。魯迅，〈好政府主義〉，《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30.5。

[39] 瞿秋白說：「正是這期間魯迅的思想反映著一般被蹂躪被污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徬徨和憤激，他才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瞿秋白，〈序言〉，《魯迅雜感選集》（上海：青光書店，1933）。

實主義的道路上，並存在著社會主義關心大眾的精神。為了要貫穿魯迅思想前後的一致，他們認為魯迅具有一以貫之的內在精神，這內在精神是近似於社會主義的人道關懷。如此的解讀將早期的魯迅思想涵括於後期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視其思想具一致性，與日本學者竹內好的「回心」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日本研究者在探討魯迅心靈流動中解讀他的轉向，且成為日本的魯迅研究的重要議題。竹內好於 1944 年出版《魯迅》一書，就在思考若僅僅以啟蒙、革命的視角閱讀魯迅，是否會僵化了魯迅的思想，也因為這問題讓他關注到 1930 年代魯迅的轉向。他在書中主要的論點認為：魯迅走向與共產黨結盟的過程不是「轉向」而是「回心」，這兩者的差別在於「轉向」是方向的轉變，是路線上的走向迥異的道路，但回心是指透過不斷的保持自我而使自我有所變化，是種自我否定的過程而並非有完整的實體思想。進一步來說，「回心」是指具動態的思想結構，一個不斷生成卻也不斷否定劇變動性的概念，而這也是貫穿於魯迅思想脈絡的核心本質。

在日本由竹內好所開啟的魯迅轉向研究形成日本魯學的一座大山，後來的研究者丸山升、北岡正子、伊藤虎丸等人都以此為目標繼續深化研究魯迅的心靈探究。由此可以看到，中國的馬克思精神啟蒙派與日本學者同樣關照到魯迅思想更為深層的流動，探討魯迅內在精神趨力的來源，特別是 1940 年代的研究者舒蕪以《野草》作為分析焦點，為當時的魯迅研究留下非常突出的貢獻。[40]

到了 1950 年代以後，因政治上的壓力評論者不再涉及魯迅是如何轉向的問題，好像從一開始魯迅就理所當然的存在於共產陣營。1956 年茅盾的〈魯迅

[40] 誠如張寧所述：「竹內好、舒蕪均認為，魯迅之為魯迅的本質特徵，不在於它擁有何種實體性思想，而在於它擁有一個動態的思想『結構』。」張寧，《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53。

－－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就是鮮明的代表，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反右運動下作家、評論者的公開表態，魯迅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不再也不能是一個問題。一直到文革結束的 1970 年代末期，唐弢、林非、陳涌等人都開始又再談及「魯迅為何向左轉」，開啟中國大陸的魯迅轉向問題的探討，雖然他們的論點仍不脫前行研究者，甚至還帶有部分文革時期的教條式的左翼色彩，但他們的發言已為僵化的魯迅論述注入了新的思考活水。

2000 年後謝泳編的《胡適還是魯迅》[41]一書，收錄了許多研究者的反思與辯論魯迅評價的文章，包括了謝泳、李慎之、林賢治、王毅等。謝泳〈魯迅研究之謎〉對於學術圈對魯迅、胡適評價兩極的再思考，李慎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的「褒胡貶魯」言論，都重新反思魯迅是否獲得過喻的評價，並從魯迅的轉向思考過去的「革命運動」的抉擇是否不一定優於「改良」。這樣的討論是對數十年來由官方發起魯迅神格化評價的反動，同時也思索五四文化運動其他重要的代表人物於中國新文學史上的意義。錢理群、邵燕祥等人在座談會上則強調魯迅自我否定的精神，認為如此的自我批判讓他時時警戒自己的權力與對他人的態度，這一點是不同於共產黨的，不能將魯迅加入左聯就與左聯的行動混為一談。由此可以看到，文革後有關魯迅思想轉向以及與左聯關係重新成為學界的話題，各種說法都浮上檯面，為魯迅的研究更增添多樣化的樣貌。但在多樣化的背後，魯迅研究者們都認為並不應該把 1930 年代魯迅與左聯合為一體，兩者之間有許多矛盾與爭執成為當代研究的熱門議題。

對比於中國的研究者以內心探索來理解魯迅思想的轉向，右派評論者則多以政治或性格角度來解讀，如蘇雪林、夏志清都認為：魯迅是一名投機份子，為了博得群眾愛戴才轉向。但兩人不同之處在於，蘇雪林認為魯迅加入左聯後

[41] 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

成了左聯的領導人，並帶領青年走向激進之路；反觀夏志清則認為魯迅加入左聯是被左聯所利用，包括其後被視為革命家、戰鬥者的形象都是受到共產黨的操縱。少數如夏濟安、李歐梵等人願意貼近魯迅的思想來做學術研究，剖析其矛盾與掙扎的心情轉折，以及其與左聯之間的關係。夏、李兩人的研究都針對魯迅與左聯之間的論爭有詳細的討論，在整個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實屬中國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中特別的一支，這部份我們將於論文的正文中再詳細說明。

4. 建構傳記中的魯迅形象

根據張夢陽統計，百餘年的魯迅文化史出現了 40 部的魯迅傳記，是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人物中少能披靡的。[42]魯迅在生前就有許多人為其作傳，最早的一篇來自於 1933 年由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後經過魯迅親自修改而成，1935 年發表於美國《亞洲》雜誌上。另一篇則由日本學者曾田涉所撰寫，1931 年他來到上海後與魯迅有密切的往來，歷時十個月的時間寫下《魯迅傳》，並於日本《改造》雜誌上發表。在日本魯迅傳記書寫上，小田岳夫接續於增田涉之後於 1941 年出版《魯迅傳》，1946 年由范泉翻譯後印行中文版名為《民族導師魯迅先生的一生》[43]，這本著作讓小田岳夫與竹內好成為 1940 年代日本魯迅研究的代表人物。

在中國方面則有 1934 年王森然的〈周樹人評傳〉，收錄於《近代二十家評傳》一書中，簡短、概要的呈現魯迅生平，為後世寫魯迅傳留下良好的素材。魯迅逝世之後，許多短篇文章述及其生平，但由於戰爭動員等諸多原因，魯迅傳記出版是到了 1942 年的事情。3 月鄭學稼出版了《魯迅正傳》[44]、5 月份歐

[42] 參考自：張夢陽，《魯迅學　在中國在東亞》（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頁 346。
[43] 小田岳夫著、范泉譯，《民族導師魯迅先生的一生》（上海：上海開明書店，1946）。
[44] 鄭學稼，《魯迅正傳》（四川：勝利出版社，1942）。

陽凡海《魯迅的書》也問世[45]，一正一反的表述了魯迅的兩種樣貌。鄭學稼的《魯迅正傳》是首部魯迅的傳記，也是一本反魯傳記，內容對魯迅多做批評，更以「浪子之王」形容魯迅是文氓的特殊階級，帶領一群無所事事卻又崇尚革命、反動的浪人，對社會一切的不滿進行破壞。關於撰寫魯迅的傳記一事，在魯迅逝世後一直是討論的話題，不論是許廣平、許壽裳、茅盾、周作人等人都曾被點名是合適為魯迅作傳的人選。

歐揚凡海一開始的書寫就著重於其的左翼思想，其後在 1948 年王士菁出版的《魯迅傳》更將魯迅推向革命戰鬥的方向，以傳記書寫確立了左翼的魯迅形象。王士菁並於 1959 年再寫了一本《魯迅傳》[46]，整體內容不脫戰鬥色彩，唯一不同是此書是針對青年讀者所寫，所以在部分內容較為簡略且通俗。此外，此時期出過兩本魯迅傳記的還有朱正，1956 年出版《魯迅傳略》，到了 1982 年又以擴充、改寫重新出版。朱正撰文的特色就是以考證的方式進行傳記的書寫，沒有太多的個人詮釋，而做魯迅生平客觀的考據、拼湊。

到了新時期之後魯迅傳記如雨後春筍般冒出，1981 年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時期更達到高峰，曾慶端的《魯迅評傳》（1981）、吳中杰《魯迅傳略》（1981）、林志浩《魯迅傳》（1981）、林非、劉再復《魯迅傳》（1981）、彭定安《魯迅評傳》（1982）都可視為這波潮流下的出版物。其後 1990 年代更有許多研究者繼續投入傳記書寫，林賢治《人間魯迅》（1990）以最大的篇幅使人無法忽略其意義，並有意識的透過描繪魯迅的戀愛、創作、求學、社交等諸多面向，展現人的魯迅形象。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1993）則專注描寫魯迅思想精神與內心轉折，由於其創作跳脫考究形式，許多部分的內容融合自己主觀意識加以詮釋而在當時獨樹一格。另外還有陳漱瑜的《魯迅》

[45] 歐陽凡海，《魯迅的書》（廣西：桂林文獻出版社，1942）。
[46] 王士菁，《魯迅傳》（上海：新知書店，1948）。

（1997）、紐岱峰《魯迅傳》（1999）、陳越《魯迅傳論》（2000），也都描繪魯迅的生命更多不同的面向，為魯迅的形象留下繁複的樣貌。

5.魯迅雜文的價值與社會意義

魯迅的雜文被稱作匕首式的短文，由於其內容帶有批評時政的意義，也因此往往也會隨著政治立場不同影響其雜文評價。伴隨著冷戰體制架構，魯迅的雜文形成中國褒揚、海外貶抑的情形，甚而牽涉到了文學應與政治之間保持怎樣的關係，而這些便成為評價魯迅雜文的關鍵。

傅斯年與孫伏園兩人最早評價魯迅的雜文，兩人在評述中提到：魯迅文字之深沉，不容易懂卻也令人印象深刻。[47]「深刻」成為了魯迅雜文的表徵，不只表現於魯迅內心，同樣也表現於外在的討論社會、時政。我們可以從 1928 年前後魯迅與陳源、梁實秋、創造社、太陽社左右翼文人論爭，看當時代其他作家是如何評述魯迅的雜文。最先批評魯迅雜文是陳源，他〈閑話〉的評論成為批評魯迅雜文說法的代表：「除了《熱風》中兩、三篇文章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48]另外像是錢杏邨也在論爭時期批評魯迅的雜文，他說：「魯迅的小說雖不曾表現時代思想，雜感卻確實很能表現。及至找來一讀，這個迷夢是更進一步的根本上被摧毀了！」[49]不論左右派在同一時期都批評魯迅的雜文，其更多的是針對魯迅在文壇的經典地位。因為在當時魯迅成為了不可忽視的大山，為了獲得文壇論述的主導權，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在詮釋權、地位的爭奪上便要攻擊魯迅。

---

[47] 傅斯年說：「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發和內涵兩種。外發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內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傅斯年，〈隨感錄〉，《新潮》第一卷第五號，1919.5。

[48] 陳源，〈閑話〉，《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一期，1926.4.17。

[49] 錢杏邨，〈死去了的魯迅〉收錄於《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一卷（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

隨著以瞿秋白為首的左翼作家與魯迅和解，也造就新一波的讚揚魯迅雜文的評論，包括了瞿秋白、馮雪峰、刑桐華等人都以左翼的反抗、戰鬥精神角度詮釋雜文，而同時間魯迅也閱讀了馬克思主義與俄國作家的作品，使其雜文帶有社會主義慣用的詞彙，與共產黨、左翼文化人士之間有更多的合作空間。瞿秋白在 1933 年出版的《魯迅雜感選集》的序言上，稱魯迅的雜感是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其所批判的不是個人，而是中國人某種的典型。[50]這說法為魯迅雜文立下了重要的評價標準，後來的左翼文化人士在討論魯迅雜文的意義時，都以瞿秋白的論述為討論的基礎。像是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 散文卷》就說魯迅的雜文像匕首能一刀見血，這說法就與瞿秋白頗為相似。

而第一部魯迅雜文的專作是 1940 年巴人的《論魯迅的雜文》，這本也是至 1980 年以前中國的唯一一部魯迅雜文研究著作。巴人（王任叔）歸結了魯迅創作上的四個特點：以小見大的論述、針對個別事物的邏輯與矛盾點、對於事情與人之關係的批評是統一的、永遠觀照當下的現實，並矚望未來發展與變化。從這四點中可看到巴人強調魯迅雜文與大時代密切的特性，政治性的批評是評論雜文的重心，反觀在藝術層面上就鮮少著墨。

說到討論雜文的藝術層面，1956 唐弢的《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徵》則認為雜文是最能代表魯迅個人的藝術形式。他認為魯迅的雜文創作貼近人民，以淺顯、生活的方式表述嚴肅的議題，漫畫化了文字中所表述的人物和事物，一如普希金的詩、巴爾札克的小說等等是最能代表魯迅個人的創作形式。同年，王瑤的〈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關係〉也由魯迅的雜文連結傳統的魏晉文章，從中觀看魯迅繼承的筆調與典故運用，為雜文研究開創另一片風貌。至於朱彤、劉授松、李何林等人都有在魯迅相關文章中提及雜文時，多半不脫「戰鬥文章」之說的老調，或是考證魯迅雜文時代下了人、事、物。

[50] 瞿秋白（何凝）編，《魯迅雜感選集》（上海：青光書局，1933）。

1980 年代後雜文研究也隨著魯迅學的復興有了較顯著的發展，林非《中國現代散文史稿》[51]中說明了雜文在現代散文中的重要，並比較魯迅與李大釗、劉半農、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雜文書寫之差異，藉以說明魯迅雜文的社會性色彩，使其比其他作家來得豐富與複雜。劉再復在〈論魯迅雜感文學中的『社會相』類型形象〉[52]不斷強調雜文的社會性意義，認為魯迅以雜文通古鑑今，既討論普遍性又論述相異之處，是新興的文學題材，不應用舊有的文學、美學觀來評價。邵伯周在〈魯迅雜文藝術淺論〉[53]將先秦諸子之言、韓愈、三袁都置入雜文脈絡，來建構中國由傳統到現代的雜文系譜，藉以觀看魯迅雜文在中國文學脈絡上的位置與貢獻。除了上述三篇之外，另外還有許懷中、吳中杰、潘頌德、王獻永等人，相較於前一世代具濃厚政治色彩，新一代的研究者著重以藝術技巧、心理分析等新的研究方向看魯迅的雜文。

比較來看，海外的評論者在討論到雜文時往往對魯迅進行人身攻擊：夏志清說魯迅的雜文是一團草，根本不值得一看；蘇雪林更痛斥魯迅的雜文所表現的是「屠戶文化」；鄭學稼、梅子等更是完全沒有評論魯迅的雜文，而是透過魯迅雜文內容來攻擊他個人氣量狹小、善妒等等；司馬長風的文學史沒有收錄魯迅的雜文，而單就《野草》、《朝花夕拾》談其散文語言精煉，似乎不將雜文視為文學創作；曹聚仁將魯迅雜文詮釋為紹興師爺的刀筆之風，是海外評論者中較為理解魯迅雜文創作生成原因的人；李歐梵則嘗試為魯迅雜文辯護，但卻也不否認其創作仍是早期優於後期，後期政治介入過深所以成就較差。

總結來看，多數的海外研究者並不將魯迅的雜文視為創作的文類，而只將其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所以在討論魯迅的文學作品時往往忽略了雜文。相對來看，左翼文化人士一直在嘗試文學與社會、政治作連接的同時，對於文體、

[51] 林非，《中國現代散文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52] 劉再復，〈論魯迅雜感文學中的『社會相』類型形象〉《文學評論》第 5 期，1981.5。
[53] 邵伯周，〈魯迅雜文藝術淺論〉《魯迅研究》第四集，1981.7。

文類的認可標準就比較廣泛，將魯迅的雜文視作新形式的創作體裁。

6.魯迅思想的播散與演繹

魯迅研究史仍屬新興議題，透過整理過往魯迅研究成果，可以拼湊魯迅作品、思想與當代之間的意義，於這二、三十年間是中國與海外魯迅學研究的熱點。目前討論中國魯迅研究史的論作成果頗豐，包括袁良駿、王富仁、張夢陽等人的研究，都為後人留下理解魯迅學輪廓與切入角度。

袁良駿《魯迅研究史》[54]是第一本綜合性以「魯迅研究」為主體的專書，該書將 1949 年之前的魯迅研究史分成五個時期，為魯迅研究史奠定了基礎。其後的《當代魯迅研究史》[55]更在原有的基礎上補足了 1949 年以後的魯迅研究史的輪廓，配合著中國的政治情勢發展討論魯迅研究的意識形態挪移的原因。

王富仁的《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56]以編年史分期將魯迅研究系譜化，雖說僅處理到 1989 年，但已足以我們理解中國 50 年來的魯迅研究情況。除了延續袁良駿的分期研究外，王富仁更注重每個集團、流派是如何評價魯迅，並比較各個流派之間對魯迅研究的差異，像是藝術派、馬克思主義國家政治派、新時期啟蒙派等等，展現了中共統治下魯迅研究的複雜與多樣化。

張夢陽是魯迅研究史中著力最深的研究者，其代表作是一系列共三本的《中國魯迅學通史》[57]詳實的析論了中國魯迅學的發展，其後出版的《魯迅學在中國在東亞》[58]雖部分內容與先前重覆，但也從原有的研究基礎上在開展了

54 袁良駿，《魯迅研究史》（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55 袁良駿，《當代魯迅研究史》（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56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7 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
58 張夢陽，《魯迅學在中國在東亞》（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

海外包括日本、韓國的魯迅學研究，並且以議題式討論《野草》、《阿 Q 正傳》、《故事新編》等個別作品的研究史。相較於王富仁將魯迅研究論述的系譜化，張夢陽則更為細究個別研究者的論述，在其論述上加以點評、分析，可說是目前為止最詳實的魯迅研究史。

除了中國的魯迅研究史外，部分學者也將焦點移往海外，鄒賢堯的《征服時空　魯迅影響論》[59]共討論兩個面向，第一，魯迅受到哪些外國作家的影響。第二，魯迅又怎樣影響其他地方。在這兩大面向中魯迅成為中介，一方面受到世界思潮影響，另一方面也再去影響世界其他國家、地方，在書中提到了香港、台灣、新馬、美國，都是其關注的幾個華人的國家和地區。此書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將魯迅置於全球的文化場域體系，觀看思想在交互影響中的傳播與接受。

葛濤《魯迅文化史》[60]以時間序列並陳的方式詳細整理資料，談全球各地是如何閱讀魯迅、理解魯迅。在討論中國境內的魯迅傳播時，將依照現實情況會區分為：解放區、國統區，以便讀者了解不同的政治實體下魯迅思想是如何被運用。同樣處理海外魯迅研究史的還有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61]，該書以冷戰前中後三個分期方式，分梳魯迅思想在日本、越南、韓國、蘇聯、北美等地的傳播，並將冷戰因素置於討論視角，來觀看各地的魯迅研究。

至於海外學者也有多本魯迅研究史的論作，在台灣方面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是：中島利郎編的《台灣新文學與魯迅》[62]。該書一共收錄了七位台、日學者的文章，是台灣有關魯迅傳播的第一本專書。文章中主要梳理日本統治時期

[59] 鄒賢堯，《征服時空 魯迅影響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60] 葛濤，《魯迅文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61] 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 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62] 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魯迅在台灣的傳播，可謂是最早談論魯迅在台影響的集結著作。通過此書的討論可以理解魯迅對台灣的一定影響力，並且呈現魯迅在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中所扮演重要的領航角色。

另外還有王潤華《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63]著重討論魯迅與日本關係，以及魯迅對新馬地區的影響。王潤華首先將題目上的「越界跨國」做了清楚的定義，他認為：越界跨國不單指涉跨越民族國家的區域界線，同時也是跨學科、文化、方法、文類的，在此定義不但擴大了魯迅研究的邊界，也讓魯迅學進入社會學、傳播學、比較文學的脈絡，繼而深化研究的範疇。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所謂的越界跨國並非抹除國族、區域的差異，反倒因為魯迅學的越界跨國而發生在地化，繼而演繹出不一的魯迅思想與影響。

以上就是現今魯迅研究史的大概發展脈絡，不論海內外的學者都以影響論與接受美學的視域來觀看魯迅在中國與全球的影響力。而本論文的研究最主要也在此範疇下進行，希望以冷戰時期的台港兩地為討論焦點，來看這群南來文人、新移民作家群，是如何在政治高壓的情勢下言說魯迅，並且與時代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

總結來看，從上述可以了解當代魯迅學研究發展在這六大問題中的討論情況，不論是「魯迅小說中的傳統與反傳統」、「魯迅思想的轉向以及與左聯之間的關係」、「魯迅雜文的價值與社會意義」等等問題的研究，都與時代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如同前面所述的，在冷戰體制下將魯迅研究史劃分為中國與海外兩大系統，其研究論點形成南轅北轍的鏡像對立，但同時之間彼此也呈現交流、對話。是此，筆者將以海外的魯迅研究史為討論核心，除了分梳海外魯迅研究者論述之差異，也希望透過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來觀看海外研究成果，以及逆

[63] 王潤華，《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

反爭奪魯迅研究詮釋權的情形。

第四節　章節架構安排

從上面的魯迅學研究六大類型討論來看，現今有關魯迅研究的成果，仍然只在中國獲得系譜化的整理。海外地區的魯迅學鮮少具有有系統的建制，少數如張夢陽、葛濤、古遠清、王家平、徐紀揚等中國研究者，關注到海外魯迅思想傳播的情況，並著眼不同國家、地區進行討論。而本論文除了在前行論述上持續深化外，希冀將焦點聚焦於台、港兩地，建構海外的魯迅學研究，進而分析海外的魯迅論爭與多位戰後重量級魯迅研究者的論作，透過個別的討論建立起冷戰體制下海外魯迅學的系譜。

而本論文的章節如下：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一面之緣．世紀之爭：蘇雪林反魯論述的台、港文化共振

第三章、「人」的魯迅：曹聚仁、鄭學稼的魯迅傳記書寫比較

第四章、典範的轉移：從夏志清、司馬長風、劉心皇三部海外文學史看魯迅形象的建構

第五章、海外的回聲：魯迅《野草》中黑暗面的研究及演繹

第六章、結論：魯迅思想的東亞區域框架思考

除了緒論和結論外，本論文的正文一共四章，主要是試圖透過各類傳播模式、作家群體間的論爭與對話，來觀看台港兩地魯迅思想的交流。也因而在論

文的梳理上並不以編年分期方式，改以人作為主體的系譜化歸納為四種傳播模式，展現冷戰體制海外華語語系文學的多樣化傳播樣貌。

第二章則以蘇雪林為討論核心，觀看蘇雪林的反魯論述對台港兩地所造成的影響，並激起兩地的其他評論者反駁，包括劉心皇、寒爵、鳳兮、曹聚仁、徐訏等人都對她的魯迅評論有所回應，形成台港兩地的文化共振。而這之中將聚焦討論蘇雪林為何反魯，其反魯背後動機為何，透過梳理這些問題理解她半世紀以來的激進、的反魯論述形成的原因。此外，也將著力討論蘇雪林的反魯論述對台港兩地所造成的影響，台灣方面在反共框架上，蘇雪林與寒爵、劉心皇雙方的論爭存在私人恩怨與美學觀的差異；至於在香港雖未引起論爭，但香港評論著的反響則帶有見證者的澄清與左、右翼論述的對抗模式。

第三章將觀看鄭學稼與曹聚仁兩位台、港文化人的魯迅傳記書寫的爭論，藉此可以看到「人的魯迅」討論背後所潛藏與中國神格化魯迅之對話。不同於蘇雪林個人的反魯論述影響台港兩地，鄭學稼與曹聚仁皆借用自己所撰寫的魯迅傳記來與對方對話，而對話的過程中也因時代的演進重修自己原本的魯迅論述，形成台港兩地交互對話、交互影響的實證案例。此外，傳記書寫在追求真實的同時，鄭、曹兩人都有意識到真實的歷史之難以觸及，故書寫時一方面可以看到作者本身的陳述的欲望，同時間也可發現面對歷史的不真實感的猶疑。

第四章時則聚焦於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這三部正好代表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三大場域：美國、台灣、香港。而這三地在冷戰的反共架構下所書寫的文學史有其個別的策略與意識形態，而魯迅也在此文學史的論述中受到策略性的描繪。即便如司馬長風所述希望文學回歸文學，其倡導背後表現出大時代下政治對文學領域的干預的反感，也正反映香港在冷戰體制中的尷尬處境。所以可以看到，

三部海外文學史的書寫，不論將時間斷代於 1949 或者是延伸至當代，作者皆有意識的回望中國，與中國左翼文化人的文學史呈現對話。同時在海外台、港、美三地的文學史，也因個人美學觀、地區的政治社會氛圍不同建構成不同風貌的文學史。

第五章將以夏濟安作為軸心，一方面比較其與中國研究者舒蕪對《野草》闡析的異同，另一方面觀看夏濟安的魯迅在海外的影響與傳承，並談及李歐梵的繼承與演繹，林毓生、王德威等人的持續撰寫，成為了海外魯迅研究的重要一支系譜。而這支魯迅研究者的影響力也伴隨美國冷戰體制所建構的教育體系位階，於逐漸緩和的台海政治局勢中滲透至台、港、中三地，並成為現今魯迅研究或華語文學研究最具影響力的一支。

總結來看，透過魯迅思想在台港傳播的研究課題，我們要反思的不只是「魯迅」在地化的傳播途徑或其思想離散的過程，因為相關問題的探討不可避免的將帶出關於台、港兩地文化史研究應該如何定位的問題。無庸置疑的是，台、港兩地都有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但過於大中國一元式的、中原中心的思想傳播研究，只是製造中國／優等、台、港／次等的文化位階，忽略掉兩地曾經有過的殖民地經驗，以及冷戰體制中被收編於自由主義陣營的特殊性。相反的，僅是強調本土論述，而缺乏觀照台、港兩地文化人如何運用中國資源的歷史知識，拒絕承認中國思想資源對兩地的深厚影響（不論好壞），將無助於解決當前台、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不論是迎合中國史論述的大一統意識，或是過於強調本土論述而忽略與他國間的連結，均會使台、港兩地的歷史過於失實，無助於釐清兩地的特殊位置。魯迅思想如何在冷戰時期成為海外華人的思想資源，並藉此與自身身分、現實社會進行對話，這將是本論文著重梳理之處。

第二章　世紀之爭：蘇雪林反魯論述成因與在台、港的文化共振

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恨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魯迅《且介亭雜文　答〈戲〉周刊編者信》

第一節　冷戰體制下的華語語系文學：蘇雪林反魯論述的（不）代表性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因為時代的動盪、政黨的惡鬥，魯迅以極為複雜的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歷史的變動往往隨著時代的演進有所改變，政治力量的介入主導了意識形態的走向，而魯迅的「被詮釋」、「被建構」也受到政權的更替與政黨的利用，形塑出不同的魯迅樣貌。在中國魯迅長期被神格化為民族的英雄、青年的導師，將魯迅話語建構出中國式的「聖經」，成了領導階級挪用的思想資源。即便魯迅生前的論敵郭沫若、周揚等人，也都在魯迅神格化後抱持尊魯態度。與此同時的台灣正好處於完全相反的情況，誰與魯迅沾染上關係都有可能被扣上紅色帽子，像是長期受到魯迅照顧的學生臺靜農、黎烈文，在台灣都絕口不提自己過往與魯迅的交情，擔心會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歷史往往在極端政治中創造出了光譜的另外一端，面對中共借用魯迅符碼的大肆宣傳，同時間也出現了反彈的聲浪，這樣的反彈力道最大的並非來自國民黨內部，而是與國府友好的學者、評論人。[64]蘇雪林於 1937 年 3 月所刊登的〈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內容強烈的批判魯迅與中共，就是一明顯的實例。1942 年在紀念魯迅逝世六周年時，勝利出版社出版了《關於魯迅》，共收錄了梁實秋、鄭學稼、梅子等人批評魯迅的文章。隔年，鄭學稼同樣在勝利出版社出版《魯迅正傳》，以更為激進的傳記形式批判魯迅的人格、著作。這些論述

[64] 事實上，在當時國民黨也舉辦紀念魯迅的活動，舉例來說，1939 年的重慶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主導下舉辦「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活動，與會文人有：陳紹禹、博古、董必武、葉劍英、潘公展等人。

都在魯迅逝世後出現，是對左派神格化魯迅的反彈，欲挑戰共產黨大肆的宣傳魯迅精神。

這一系列的反魯聲音在「抗日救國」、「紀念魯迅」的聲浪中雖顯薄弱，但魯迅形象逐漸成為共產黨專利的同時，這異質的聲音所展現的不只是對於魯迅與共產黨的不滿，更是批判社會神格化魯迅的現象。但這種批判不自覺的也陷入了擁共／反共、擁魯／反魯的二元對立架構，特別是在國府撤退來台後，國共兩黨以台灣海峽為界，反共論述伴隨著「一個中國」的代表權之爭而浮上檯面，反魯也在此情形下夾雜中國道統的論述建構多重層次的面貌。

進一步來說，蘇雪林既是反魯系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同時她的言論卻也是最不能代表反魯陣營。說蘇雪林具有代表性，是因為她是少有敢以真實姓名寫作批評魯迅，且堅持反魯立場的評論者；說蘇雪林不具有代表性，同樣也是因為她的激進言論，最終招致反魯陣營其他評論者的攻擊。誠如她自己說的：「反魯，幾乎成了我半生的事業。」[65]這項橫跨中、台兩地的「事業」貫穿了她的生命歷程，同時也與國府的反共政策縫合。

緣此，本章節以蘇雪林為個案，探討國民黨政權的反魯論述是如何在反共旗幟下書寫與運用，並從中梳理反魯論述的差異，以及如何影響台灣。本章將聚焦於兩個部分：第一，蘇雪林的反魯論述的成因，而這與社會脈動的關聯性有哪些？在這部分筆者將以她的生命史為軸線切入，理解她的反魯論述與大時代的對話。第二，蘇雪林的反魯論述在台、港文學場域造成的怎樣的反響。作為忠貞的魯迅反對者，她一直堅持「反魯」的信念，其行文刻薄、毒辣也招致文化人士的批評，掀起關於魯迅形象的論爭。

[65] 蘇雪林，《我論魯迅》（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1。

下面我將透過縱向的分析蘇雪林反魯言論的形成，以及橫向的探討蘇雪林與寒爵、劉心皇、曹聚仁、徐訏的論爭，藉此理解她的反魯論述在台、港文學場域的特殊位置。而這特殊位置讓冷戰體制下的反魯陣營，不只討論反對魯迅的內容而已，同樣也針對如何反對魯迅的形式提出了思辯。

第二節　蘇雪林走向反魯道路的「兩個問題」與「三種可能」

蘇雪林出生於 1897 年，那是中國最為疲弱不堪的年代。1915 年進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1919 年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師承胡適、周作人。也因為就讀於北京學校的因素，這讓蘇雪林非常早就已是五四文化運動下女性的代表人物。[66]1925 年蘇雪林自法國里昂留學歸國，在蘇州景海女師國文系任教，並於 1927、1928 年分別出版了研究論述《李義山戀愛事蹟考》、小說《綠天》，開啟了回到中國後的研究與創作，並與袁昌英、凌淑華被文壇稱為「珞珈三劍客」。後來因為國共戰爭國民黨戰敗，她先去法國再到台灣，先後在台灣師範大學與成功大學任職，在學院裡留下豐富的學術論著。

蘇雪林豐富的生命經歷都沒有她的反魯論述來得受到關注，長期激進的反魯言論使她在自由主義陣營獲得特殊的地位。擁魯人士以她為標靶攻擊她，而反魯陣營裡也有人不贊同她的觀點。但究竟蘇雪林是如何走上反魯的道路，而且半生事業都在反魯，成為反魯論述中態度最強硬的一位。這謎一般的話題我認為是值得探索的，也希望透過了解蘇雪林的反魯，來梳理個人在時代之中的交互配合。當然，現今也有許多評論者討論過蘇雪林「為何反魯」，多半將蘇雪林對魯迅的態度流於漫罵、歇斯底里的狀態與女師大風波接連上關係，藉以說明她的反魯是新仇與舊恨的總合。但事實真是如此？或者有其他可能？我認

[66] 蘇雪林受到五四運動影響後，也開啟了他的文字創作歷程，她以「蘇梅」、「雪陵」等筆名發表在各大新文學雜誌，比如：《晨報》、《語絲》、《新月》、《現代》、《文學》、《文藝月刊》、《青年界》、《奔濤》、《東方雜誌》。

為值得進一步來了解。

蘇雪林反魯的心理意識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學者吳佳燕認為，蘇之所以會偏執是因為「童年陰影」與「婚姻不順遂」的所導致；邢紅靜則覺得蘇是陷入了壓抑性的「強迫性重複」、「自居作用」、「盲目的自我」的精神意識。[67]這種由蘇雪林的生命經驗來探究其反魯原因有其可以詮釋之處，但不論是因為童年裹小腳的陰影、婚姻的不順，還是其他生命歷程的影響，都只能詮釋為是蘇雪林的性格所造就其走上激進的道路。當然也有評論者認為那是蘇雪林的投機性格使然，希望藉由批評魯迅來獲得更大的名聲。[68]但實際情形是如何，還是必須回到她從擁魯到反魯轉變的時代脈絡，才能夠了解是怎樣的情形使她態度轉變。依據蘇雪林的自傳所述，她與魯迅之間的不合可上溯到 1928 年在上海的會面，她這樣形容第一次會面的情況：

> 那時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在一家酒樓辦了一席，請凡在他書店出過書的人。北新是當時印行五四後新文藝唯一的書局。因為我曾在書店出了三本書，故亦在被邀之列。林語堂、郁達夫、章依萍登在座。魯迅對我神情傲慢，我也僅對他點了一下頭，並未說一句話。魯迅之所以恨我緣故，我知道。他在北京鬧女師大風潮，被教育部長革去他那區區的僉事之職，南下到廣州及廈門大學轉了一遭，因我曾在現代評論發表過文章，又與留英的袁昌英等人保持友好關係。魯迅因陳源寫給徐志摩的一封信，恨陳源連帶恨現代評論，恨現代評論連帶恨現代評論上寫文章的我，遂有那天局面的出現。[69]

自傳當然很有可能是「後見之明」的加油添醋，魯迅是否真如蘇雪林所述那樣的神情傲慢，現今我們不得而知。而至於魯迅的「神情傲慢」是不是來自於討厭蘇雪林，魯、蘇兩人在當時就有心結？這問題我們會在下面做詳細分析。不

---

[67] 吳佳燕，〈殘缺：對蘇雪林反魯的一種深層心理探索〉，《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第 12 卷第 3 期（2005.9）。邢紅靜，〈強迫性重複、自居作用與盲目的自我－－蘇雪林反對魯迅的精神分析闡釋〉，《大家》第 23 期（2011）。

[68] 劉心皇，《文壇往事辨偽》（台北：自費出版，1963）頁 16。

[69] 蘇雪林，《蘇雪林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 74。

論那次的聚餐情形如何，蘇雪林在 1934 年以〈〈阿 Q 正傳〉及魯迅創作藝術〉首次評論魯迅的作品，文章中讚賞魯迅是中國最早且是最成功的鄉土文學作家，《吶喊》、《徬徨》是文學史的經典作品。[70]這是蘇雪林唯一一篇正面評價魯迅的文章，而這篇文章也為蘇雪林往後的反魯事業帶來「麻煩」，她的「昨是今非」(「昨非今是」)令人有許多的猜想，在擁魯與反魯問題上被視為投機份子。

相較於〈〈阿 Q 正傳〉及魯迅創作藝術〉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稱讚，在公開的發表作品中，蘇雪林最早的反魯論述出現在 1937 年 3 月份的《奔濤》雜誌所刊登的〈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由於當時魯迅逝世不久，中國社會瀰漫著紀念魯迅的熱潮，並以魯迅符碼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勢力。「魯迅逝世」作為魯迅思想傳播重要的轉折，主要的原因在於魯迅存在的權威性，使得言說者的話語與其想表達的意志是一致且同一的，言說者會使用各種方式來確保這穩定的情況不會改變。然而當言說者消失後，其讀者對於文本無限上綱的詮釋，開創了多重意義的意涵，創造出連作者可能都沒有想過的閱讀方式。

誠如語言學家利科（P. Ricoeur）所言，文本可能超越了作者原有的有限見識，並且對於現今社會來說，「文本」表達了甚麼比「作者」想要表達甚麼更為重要。[71]也因為如此，魯迅逝世後「魯迅符碼」的詮釋權進入了爭奪的時代，除了共產黨外，當時候國民黨也有紀念魯迅的活動。換句話說，蘇雪林的反魯並非來自於國民黨政權的鼓動，而是自發性的針對當時社會的魯迅風潮提出不滿，這種出於自身的反抗與國府取得微妙的平衡。

關於蘇雪林走上反魯的道路，我們要問的是：蘇雪林何時開始反魯？為什麼？這裡有幾個層次的問題值得討論。第一個問題是，如前文所述，既然 1928

[70] 蘇雪林，〈〈阿 Q 正傳〉及魯迅創作藝術〉，《國聞周報》第 11 卷第 44 期（1934.11.5）。
[71] P. Ricoeur , "What is a text? Explanations & Understanding",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年的聚會時魯迅就對她沒有好感，兩人的關係在當時就產生問題，為何在蘇雪林在 1934 年〈〈阿 Q 正傳〉及魯迅創作藝術〉還要稱讚魯迅呢？第二問題則為，1934 年的稱讚又因為怎樣的原因到了 1936 年會轉換成反魯立場？這雖然是兩個問題但兩者之間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第一個問題解釋的可能性有三：第一種可能是自傳所言是真，兩人之間也真的有心結，魯迅也因為陳源的關係（女師大風潮）討厭蘇雪林。第二種可能是自傳所言是真，但是僅是蘇雪林自我感受的投射，魯迅並沒有對蘇雪林有任何成見。第三種可能是自傳所言的是假，1928 年那一次聚會魯、蘇兩人根本沒有交惡。

而這三種可能中以第一種的可能性最小，因為翻閱魯迅日記的記載，魯迅對此次的聚會並沒有太多的記述，只草草提道：「下午得小峰柬招飲於悅賓樓，同席茅盾、欽文、蘇梅、達夫、映霞、玉堂及其夫人及侄，小峰及其夫人並侄等。」[72]沒有針對蘇雪林（蘇梅）有太多描述。以魯迅大鳴大放「一個都不寬恕」的個性，不論是與左派之間的爭執還是與自由主義人士的論爭，包括胡適、陳源、梁實秋、林語堂等人都曾被魯迅罵過，但是卻沒見魯迅在公開文本或私密的信件、日記中批評過蘇雪林，要說魯迅對蘇雪林不滿，這可能性是相當低的。所以我認為，有可能是蘇雪林個人的想法和感受，又或那一次的聚餐雙方根本沒有不滿。假使第二種、第三種解釋的可能性較高，那我們再把這兩種解釋扣緊第二個問題同時思考。如果說魯、蘇心結是蘇雪林所想像出來的話，為何在 1934 年依然要讚許魯迅？又或自傳所言為假，一切都是蘇雪林回憶時所加油添醋，若是如此，蘇雪林到了 1936 年的反魯原因又是甚麼？

[72] 日記記載時間為 1928.7.7。魯迅，《魯迅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87。

我認為 1928 年的那一場餐會，魯、蘇兩人不僅沒有交惡，同時蘇雪林對於魯迅也抱持著一定的崇敬。這也才能解釋蘇雪林在 1934 年〈〈阿 Q 正傳〉及魯迅創作藝術〉文章中對魯迅作品讚許，同樣也是出自於對他的尊敬，所以才會寫下「（魯迅）是一個受西洋教育而不失其華夏靈魂的中國人。」[73]高度肯定魯迅的話語。換言之，蘇雪林自傳高度的修正過去的看法，而將自己與魯迅之間的不和往前推移了八年，並透過形塑魯迅與她的心結，來表現自己在「現代評論派」裡的角色和位置。一如劉心皇對蘇雪林的評價，認為她的論述常帶有自我膨脹的成分，「蘇女士的「反魯」與「擁魯」，心理是一樣的，無非想鑽一個「空隙」，使身邊「生」點兒「風」雲，以顯示自己的「偉大」罷了。」[74]劉的看法呈現了蘇雪林性格的某一部分，從蘇的反魯事業來看她在胡適逝世時所寫的〈悼大師 話往事〉系列文章，雖名為悼念胡適，但文章內容卻著重談論自己的生命經驗，具十分濃厚自我吹捧意味。回過頭來說，蘇雪林在《蘇雪林自傳》裡同樣也有潤飾、修正了自我生命經歷，強化描述魯迅與自己的心結，以合理化自我在反魯論述的合理性與重要性。

若是如此，蘇雪林到了 1936 年魯迅逝世後才開始反魯，代表魯迅逝世一事可能是影響其由擁魯走向反魯的關鍵因素，究竟在 1934 年到 1936 年間魯迅的形象又有何改變呢？為何也改變了蘇雪林對魯迅的態度？這問題我認為這和當時的中國政治情勢以及魯迅的生命史有關，必須回到時代脈絡來看，才能理解蘇雪林由擁魯到反魯態度的轉折。

1936 年〈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是她第一篇反魯的作品，同時間的〈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也以類似的內容，反對魯迅逝世所引發魯迅熱潮。但不同的地方在於，蔡元培並未回信給蘇雪林，對於看法做出呼應或反駁。

[73] 蘇雪林，〈〈阿 Q 正傳〉及魯迅創作藝術〉，《國聞周報》第 11 卷第 44 期（1934.11.5）。
[74] 劉心皇編，《文壇往事辨偽》，頁 8。

反觀胡適在收到蘇雪林的信件後，便回覆了一封長信，一方面安撫蘇雪林的情緒，同時也為魯迅做出持平的見解與看法。

回過頭來看，在〈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通篇文章針對時下的魯迅風潮提出質疑，強調魯迅的病態心理對青年學子的不良影響，且他的人格矛盾不應成為國人的所效法的楷模。此外，在文章的最後他憂心的談及，魯迅符碼逐漸成了左派利用的宣傳偶像，未來會成為國民黨政權的大患。蘇雪林毫不掩飾與避諱的以「惡毒」的語彙來形容魯迅，包括了：「劣跡多端」、「虛榮心極熾」、「行事尤為可恥」等等，已然超越評論者應在文字上的表述。進一步來說，蘇雪林情緒性批判貫穿其一生，從中國大陸到台灣，不論政治時局如何的轉變，都沒有改變其批評魯迅的力道。她曾這樣評價魯迅：

> 叫我來評判魯迅，很簡單，三段話便可概括：魯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個渺小；魯迅的性情是凶惡，兇惡，第三個兇惡；魯迅的行為是卑劣，卑劣，第三個卑劣。更以一言概括之，是個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都夠不著的角色。[75]

蘇語言的刻薄獨樹一格，在反魯陣營裡有其鮮明的戰鬥位置，翻開整個反魯論述的歷史脈絡，多數評論者並不會以這樣激烈的言論來批評魯迅。若使用激烈的言詞的評論者，通常都以匿名形式發布文章，現今依然不知道撰寫者的真實姓名。不同於其他人，蘇雪林是唯一敢以真名激進批判的評論者，一如王富仁所述：「蘇雪林對魯迅的攻擊直接而又激烈，同時也顯示著她的一種真誠。」[76] 確實，這樣毫不顧忌的以真名發表反魯言論，在魯迅逝世後的熱潮下尤顯突兀，真實的表述自我政治立場與對魯迅的謾罵態度是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筆者以為，蘇雪林仇恨不見得是完全針對魯迅，更多的是因為社會、時代

[75] 蘇雪林，〈自序〉，《我論魯迅》，頁 7。
[76]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233。

的環境因素導致於她走上激進的道路。回到時間脈絡來看，1928 年北伐成功後旋即又進入了國、共內戰的局勢，雖然在文化層面共產黨比國民黨有更多的論述能力與支持群眾，但軍事上的節節敗退，1934 年棄守根據地瑞金，更加顯示國民黨逐步在內戰中的獲得勝利。魯迅雖在 1930 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但與「左聯」之間僅保持著一定的合作，特別是周揚主導下的「左聯」政策，一直都不是魯迅所期待的運動路線。1934 年開始與周揚、田漢、徐懋庸、夏衍「四條漢子」在報章雜誌打筆戰，與左聯決策中心在路線上的矛盾浮上檯面，其後的「兩個口號的論爭」更是與左聯領導集團的決裂。

而這樣的分裂一直要到魯迅逝世時，為了弔念魯迅兩個集團才又合而為一。左翼文化人士透過「魯迅治喪委員會」名義發起的遊行活動，當時遊行口號是：「紀念魯迅先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紀念魯迅先生，打倒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紀念魯迅先生，努力為民族解放運動鬥爭！」。[77]其論述是透過紀念魯迅鏈結人民與國家情感，以輿論的力量迫使國民黨停止剿共，以合作對抗日本的侵華戰爭。自魯迅逝世後這樣的輿論戰在短短兩個月內發生了效用，「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挾持蔣介石要求一致對外抗日，也緩解了共產黨被國民黨軍隊殲滅的可能。

從上面的歷史背景介紹我們可以理解，蘇雪林由 1934 年〈〈阿 Q 正傳〉及魯迅創作藝術〉（擁魯）到 1936 年〈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反魯）之轉變。原因在於 1934 年的魯迅雖然名義上加入左聯，但與共產黨所指派的左聯核心成員之間理念有重大分歧，加上共產黨遭受國民黨全力掃蕩，所以她一方面並不認為魯迅完全屬於共產黨的一員，另一方面依據國民黨有利的情勢，也沒有必要撰寫反共的言論。[78]換言之，〈〈阿 Q

[77] 轉引自：葛濤，《魯迅文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頁 41。

[78] 蘇雪林在文章的自白曾這樣說道：「魯迅於民國十九年開始加入左翼聯盟，那時他叛國的罪惡尚未十分顯著，我那時也沒開始反魯，為什麼不能提他呢？」蘇雪林，〈為國聞周報舊帳敬答

正傳〉及魯迅創作藝術〉一文依然將魯迅放入五四新文化思潮下的位置，所以她這樣詮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

> 中國將來的新文學似乎僅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文學國語化，實行胡適「國語的文學」教訓。第二條路，創造一種適合全國人民誦讀的「標準白話」。能走第一條路固好，否則便走第二條。這種「標準白話」，要不蹈襲前人窠臼，不抄襲歐化皮毛，充分表現民族性。像魯迅這類文字，以舊式小說質樸有力的文體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變化，我覺得很合我理想的標準。[79]

蘇雪林認為，胡適與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代表，而未來的發展道路也只有兩條，不是胡適就是魯迅，但在兩相比較之下蘇更支持魯迅承襲舊體開展新式的「標準白話」道路。極為有趣的是，她在稱讚魯迅的同時就曾在文章中談及，中國將來的新文學似乎僅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胡適的，一條是魯迅的。當時原意是要稱讚魯迅的創作已然是現代文學的經典，與胡適兩人分屬不同的路線，但這兩人文壇的左右分裂讓蘇雪林 1934 年的「預言」隱然成真，國、共兩黨的在台灣海峽的對立，真的走上了魯迅的與胡適的兩條不同的路子。

魯迅逝世後死訊鋪天蓋地淹沒了整個文壇，中國新文學之父之死固然是中國的大事，但其背後不乏有共產黨的政治操作，刻意打著魯迅的旗號製造與國民黨「求和」的輿論。誠如蘇雪林所擔心，魯迅的話語權在「民族魂」旗幟的蓋棺論定下成了眾人詮釋的空間。眾人似乎忘記了魯迅生前遺囑中的叮嚀:「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反倒因為魯迅的死使得中國的民族情緒更加熱烈，在海內外各地到處都看得到紀念魯迅的文章，將紀念魯迅與抗日之間加以縫合。

寒爵先生〉，收錄於劉心皇編，《文壇往事辨偽》，頁 99。

[79] 蘇雪林，〈〈阿 Q 正傳〉及魯迅創作藝術〉。後收錄於：蘇雪林，《蘇雪林代表作》（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魯迅從個人的位置被提升為「共產黨的魯迅」、「民族的魯迅」、「國家的魯迅」，在逝世紀念會、遊行與文章的的形構，結合出個人、黨、國家「三位一體」的魯迅形象。魯迅再也不僅是個人的魯迅，同時也是國家的，更是共產黨的。蘇雪林面對這種受到共產黨掌控的「魯迅宗教」現象大感不滿，她在〈理水與出關〉這樣說道：「近來文壇巨匠魯迅先生死了。報章雜誌，這兒也在悼魯迅，那兒也在哭魯迅，拉拉雜雜，如火如荼，似乎比甚麼綏東戰訊、華北危急，還來得熱鬧而緊張。」[80]她痛斥這種現象，同時也開始了建構「反魯」論述，有意透過批判魯迅的過程從「左派的手中取回新文化的問題」。[81]

我們可從蘇雪林的文字裡看到這種時代的焦慮感，她所要批評的不一定是魯迅，是卻排斥與厭惡當時代的「魯迅熱潮」，尤其是共產黨刻意在魯迅符碼上強加反動意識，這一點令她感到害怕。她在致蔡孑民的信上這樣提道：

> 近聞魯黨議醵金為魯迅立銅像，設立魯迅圖書館，發起各學校各界人民追悼會。又以魯喪未得政府當局慰問，表示不滿（見大公報）。若當局對魯迅略表好感，則彼等宣傳，可得合法之保障，國人觀聽，更將為之混淆，吾信更進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國葬，宣付國史館立傳，各大學設立講座，各中小學採取魯迅著作為教材，皆將隨之來。日本利用「以華制華」，左派及魯黨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設計之狡，用心之苦，亦相彷彿。[82]

蘇雪林相當敏感的感受到弔念魯迅風潮的蔓延，很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為「神格化魯迅」的現象，所以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儘速遏止這樣的情況持續，並擔心左派與「魯黨」會透過魯迅逝世的事情大作文章，在「話語權」上取得先機。蘇雪林對於「話語權」的焦慮感，反映在致蔡孑民、胡適的書信裡，在信中雖然處處痛斥魯迅，但有更多的篇幅是批判左派所營造的「魯迅風潮」，而非針對

[80] 蘇雪林，〈理水和出關〉，寫於 1936.11.23。根據蘇雪林的說法是，原本要在陶亢德的《宇宙風》發表，後來因為左派風潮過盛而作罷。後收錄於蘇雪林，《我論魯迅》，頁 72。
[81] 蘇雪林，〈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奔濤》第 1 卷第 3 期（1937）。
[82] 蘇雪林，〈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奔濤》第 1 卷第 2 期（1937）。

魯迅個人。這就可以解釋為何魯迅左傾之後她並未馬上攻擊魯迅，而是到了魯迅逝世之後才出現反魯言論，由此反映出蘇雪林所針對的對象仍是共產黨與魯迅風潮。

她在寫給胡適的信件上就非常清楚的表示，應儘速取回新文化的主導權，不能讓左派以「國防文學」的口號接收了民族主義路線論述。她說道：

> 好像他們從前高唱工人無祖國，現在也來甚麼「國防文學」了；從前只講階級鬥爭，諱言民族利益，現在也有甚麼「民族解放」、「民族戰線」，連書信煞尾都要來個「民族敬禮」了。先生等在五四時代辛苦造成的新文化，被他們巧取豪奪，全盤接收去，自由享用，不但不感謝先生，還要痛罵先生呢。[83]

當民族主義路線的話語權被左派利用「國防文學」口號奪取，並到了「魯迅逝世」時以「民族魂」擴大佔據後，伴隨焦慮心情而來的是蘇雪林積極的反抗，希望打破「魯迅神話」重新取回民族論述話語權。

面對蘇雪林的焦慮，胡適在回信中嘗試安撫其情緒，陳述青年朋友左傾是正常的現象，不必太過大驚小怪。並且反對攻擊魯迅私德問題，而應針對其思想來做出客觀評價。他這樣說：「我很同情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所於我們一絲一毫？他以私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甚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84]也因為這封信讓蘇雪林一生都尊稱胡適為老師，並在其逝世之後一連多天發文悼念，並提及此次書信往來的過程。但顯然的蘇雪林並未聽進胡適的勸告，依然陷入與左派的鬥爭之中，並且持續的攻擊魯迅的人格，最終釀成在台灣內部其他人的反擊。

---

[83] 蘇雪林，〈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
[84] 胡適，〈胡適之先生答書〉，《奔濤》半月刊創刊號，1925.12.14。後收錄於蘇雪林，《我論魯迅》，頁 66。

事實上同時間，在武漢親近國民黨的作家群為了因應左翼的「國防文學」口號也串連提出〈武漢宣言〉，希望在民族論述上持續保持優勢，而不被共產黨掠奪話語權。所以可以看到〈武漢宣言〉部分內容是回應左翼作家論述上的轉變：

> 於是，左翼作家來了一個轉變，這轉變的動機，一方面是自己受著民族浪潮的打擊，一方面反映著殘餘赤匪的政治策略，因為殘匪自身感到日暮途窮，同時受著第三國際的命令，將所謂階級鬥爭，改為民族革命，所謂蘇維埃政權，改為人民陣線，殘殺口號改正為聯合口號，於是左翼作家變喊出「統一戰線」、「國防文學」了…。[85]

國民黨陣營中並非沒有實際作為來因應「國防文學」口號，只是面對魯迅逝世時鋪天蓋的的言論，讓共產黨的民族統一陣線的論述獲得更多人的支持。這種統一的框架下讓國民黨欲切割兩黨之間民族論述之差異，這件事很難讓一般人民所接受，認為國民黨在搞民族分裂，也因此逐漸的在民族統一戰線上漸漸敗退，甚或到了後來的魯迅符碼爭奪也失去了主導的地位。

不同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採取合作，蘇雪林陷入了擁魯／反魯、擁共／反共的二元對立泥淖。當左派積極的吹捧魯迅，蘇雪林便極盡能事的汙衊、羞辱魯迅，嘗試以此方式解構逐漸成型的魯迅神話。蘇在寫信給蔡孑民、胡適之後，又在 1936 年末到 1937 年之間一連寫了〈理水與出關〉、〈說妒〉、〈富貴神仙〉、〈論偶像〉、〈論汙衊〉、〈論是非〉等多篇反魯論述批評魯迅的人格。換句話說，蘇雪林之所以轉向批判魯迅，並不完全是對其本人的不滿，更多的是對左派所形塑的魯迅形象感到厭惡。因此，要打破左派的神格化魯迅形象重拾「話語權」，就必須批判魯迅、攻擊魯迅，以瓦解左派所建構起來的魯迅經典。

蘇雪林的作法並非特例，1942 年鄭學稼的《魯迅正傳》同樣也以此方式批

[85] 〈武漢宣言〉，《文藝》第四卷第一期，1937.2.1。

評魯迅，並且對抗共產黨神格化魯迅的論述。不同的地方在於蘇雪林到了台灣之後仍堅持激進的反魯言論，並沒又因時空遞移而有所改變。鄭學稼則因與曹聚仁有所論爭，並且因應時代的改變後修正了原本的路線，改採較為中性的角度將魯迅與共產黨作適度的切割。換句話說，蘇雪林並沒有因地制宜的改變論述魯迅的策略，不斷的回望過往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內戰傷痕，繼而加強了她的反魯論述。反觀鄭學稼的反魯論述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所修正，策略性的調整了《魯迅正傳》的內容以符合時代的需要，關於這一點我將會在下一章中詳細說明。

而即便到了 1950 年代以後，蘇雪林在台灣也不時的在文章中批判魯迅，重述過往的反魯基調。但由於國府在台灣禁絕了所有左派作家作品，連帶的在報章雜誌上也不能提及他們的名字、作品、事蹟，不論是正面評價或是負面的批評基本上都不被允許，唯有少數的親國民黨文宣系統的人，被默許的可以在報章雜誌上討論左派作家。[86]蘇雪林反魯論述便是在清潔運動下展開，於攻擊共產黨與左派的同時將自身論述與國民黨政權縫合成為擁護體制的一環。如前所述，國民黨所建構的是在不斷的賤斥裡試圖創造純淨的空間，希望透過製造與攻擊他者的方式確保自身政權的價值。

蘇雪林的反魯立場到了台灣之後更趨強烈，並未因時間的關係而有所淡化，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她依然對魯迅所抱持的懷恨態度。像是於 1956 年寫的〈與共匪互相利用的魯迅〉，老調重彈的指控〈阿 Q 正傳〉抄襲日本作家的作品，而雜文根本是政治鬥爭的產物，魯迅與左翼的關係只是相互利用。1958 年所寫的〈琵琶鮑魚之成神者－－魯迅〉[87]，諷刺魯迅之所以能獲得今天的地位都是

[86] 如此的禁制情形，雖受到出版法的限制，但同時執法者擁有極大的衡量權力，因應作者與國府之間的關係，以及以當時候的政治情式來調整。根據向芬的《國民黨新聞傳播制度研究》的分析，當時新聞傳播主管單位，包括了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政（行政院新聞局）、特（警備總部）三大部分。向芬，《國民黨新聞傳播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37。

[87] 蘇雪林，〈琵琶鮑魚之成神者－－魯迅〉，原發表於《軍友報》，1958。後收錄於《我論魯迅》

吹捧的結果，其創作或研究成果都並不足以獲得溢美的評價。這些攻擊都在在顯示蘇雪林內心所顯現對戰爭、共產黨的焦慮，希望以二元式的攻擊魯迅有效達到文化陣地戰，並未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轉變而改變。

也就是說，不論是國、共兩黨都陷入了相同的處境，為了排斥他者形塑純淨的自我主體，因而形成循環式的排他與建構。自我與他者之間在疆界差異的對照過程以鏡像的方式相互對照、相互滲透彼此的呈現，而「他者」是在自身的假想中建構出來的產物，透過自我想像「他者」的過程將他者排除在自我疆界之外。然而，建構自我疆界時主體的形塑就宛如皮膚一般具有毛細孔與縫隙，他者／自我之間會透過縫隙相互滲透和混雜，不論在情緒上、生理上產生「交互對話」的情形，但也因為主體會不斷遭受他者的滲透、干擾，使得自身主體會加強鞏固主體的疆界以防止他者的入侵。這成了不斷因果循環的主體建構過程：因恐懼疆界的縫隙而加強自我主體建構以補強疆界的縫隙，但也因為他者是存在於自我主體的想像過程中，因此縫隙必然存在。[88]

總的來說，在戒嚴體制所建構的「淨化」的國家領域，蘇雪林因為過往的赤色風暴的創傷使其變得更加激進，批判魯迅的立場也走向更為絕對的態度。如同社會學者巴斯（Frederik Barth）在〈民族群體與疆界〉所言，任何群體的認同情感都具有排他性，我族與他族的建立過程中，是在二元辯證的過程所形塑出來的。[89]也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下，蘇雪林的「反魯」意識在左翼思潮的激化又再興起，反魯情緒宛若回聲一般在左派相關訊息出現時就重新被召喚回於跟前。舉例來說，蘇雪林在 1956 年所寫的〈論魯迅〉就是因為胡風事件與魯迅逝世二十周年而來；1957 年所寫〈琵琶鮑魚之成神者－－魯迅〉所欲對話的，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6）。

88 Sara Ahmed(2000) , *Strange Encounters*, “Strange Encounters：Embodied Others in Post-Coloniality” , New York: U.S.A.

89 Frede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ergen: Universitatsfur paget, 1969.

就是台港兩地的文化人對魯迅有所同情者，希望他們不要因為中國的反右清算與魯迅有關聯的作家因而對他心生同情，說出假若魯迅還在世必然反共此般假設性的話語。[90]

到了 1950 年代後期左翼思潮就如「地下火」般春風吹又生，這當然與世界浪潮息息相關，尤其是受到美國反戰浪潮影響，台灣社會之間又逐漸興起閱讀左派書籍的秘密活動。1960 年代全球瀰漫在反戰、左翼文化崛起的時代，美國黑人平權運動、反越戰輿論日益興盛，法國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風起雲湧，世界各地都在反思 1950 年代冷戰秩序對人類生活的囿限，新一波的公民自主運動也透過留美青年影響了台灣的新一代。至於在台灣方面，1964 年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1968 年陳映真、李作成、吳耀忠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的罪名遭到逮捕，都可見到社會左翼力量的興起，反動勢力在社會成為伏流。

而這全球左翼勢力的抬頭，也讓沉寂一陣的蘇雪林又重新恐懼了起來，蘇雪林就提到：「魯迅偶像一入台灣，我敢保證：半年內文風丕變，一二年內，全台的知識階級的心靈，均將屈服於共產主義之下，共匪武力尚未到達台灣，文化戰就先奏了極大勝利，假如共匪對台發動攻擊，台灣還能保得住嗎？」[91]她在談及魯迅時所呈現的焦慮，也正反映了國民黨擔心若將魯迅作品開放在市場流通，會影響自身政權在台灣的地位。故國民黨政權透過暗中幫助滋長「反魯」論述，以利 1950 年代推行反共文藝政策，建構起由國府官方所主導的文學美

[90] 她在文中這樣說道：「香港論壇，談魯迅的更多，將魯迅列為近五六十年中國文化領導人之列。現因魯迅大弟子胡風被共匪清算，談論魯迅興趣更濃厚了。他們總說以魯迅性情之倔強剛直，以魯迅嫉惡如仇，此時若還在世，定然要遭受共匪的迫害。〔…〕魯迅若還活著，真心反共，甚至被共匪整肅，他過去的罪惡，仍不能抵銷萬一，何況以他這樣一個『世故老人』，其實是不會故蹈虎尾，自取滅身之凶的。」蘇雪林，〈琵琶鮑魚之成神者－－魯迅〉，原發表於《軍友報》，1958。後收錄於《我論魯迅》（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6），頁 138。

[91] 蘇雪林，《我論魯迅》（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5。

學觀。[92]至於她 1966 年出版的《我論魯迅》，則是因台灣島內受到美國反戰思想影響，以及魯迅逝世三十周年所致。這些都說明了蘇雪林在戰後的反魯論述與時代密切關聯，只要在中國大陸或是台灣之間有左翼相關消息，都可以牽動其「複述」反魯論述的防衛機制。

進一步來說，這「複述」反魯論述的防衛機制並非建構於具系統性的、深化的論述，而是不斷以重複言說的方式來療癒一整個時代的人，尤其是這群隨國民黨軍隊漂泊來台的中國人。當言說的過程是一種治療，可能可以緩解病痛並打開原有的僵局，但同時重複的面對傷痛卻也是不斷讓人陷入無法自拔的憤怒情緒，並強化自我對他者的理解，形塑成單一、固著的魯迅面容，以及一整個時代的反共集體恐懼氛圍。當然這也有可能是透過複數的方式在發明傳統，如霍布斯邦所言：「『創發傳統』在本質上是種形式化和儀式化的程式，這個程序只是藉由反覆運作，賦予其相關歷史過往的特徵。」[93] 蘇雪林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雖然蘇雪林的反魯極其強，烈且為人覺得到了胡鬧的境地，但筆者並不認為蘇雪林對魯迅有如此深厚的深仇大恨，或者說兩人之間在魯迅生前真有明顯的衝突。

從蘇雪林寫給蔡元培與胡適的信件可以了解，她已深刻體會到魯迅符碼背後的共產黨勢力的操作，這迫使她獻身／聲爭奪魯迅符碼的文化詮釋權。換言之，她的反魯並不完全建立於討厭魯迅本人，而是具更高層次的國共文化領導權的對抗，而魯迅符碼只是主要的爭論場域而已。但在感知層面上，也因為 1936 年魯迅逝世時的造神運動，以及西安事變等重大國共鬥爭因素，更將蘇雪林對魯迅的感受推向極端厭惡的方向，這種情緒的表現落入了擁魯與反魯的二

[92] 反共戒嚴的一九五Ｏ年代，國府對於魯迅論述控管相當嚴格，當時文壇確實僅出現「反魯」的聲浪。但自一九六Ｏ年代夏志清、李歐梵等海外學者對於魯迅的評論出現較為中性的說法後，台灣文壇才開始出現部分的「擁魯」論述。到了一九八Ｏ年代以後，周令飛的來台（魯迅之孫）、以及一九八七年的解嚴，「魯迅」才正式成為公開可以討論、閱讀的作家。

[93] 霍布斯邦，《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文化出版社，2002）頁 14。

元框架，失去了可以論證的空間。

接下來的討論，筆者將處理蘇雪林在「複述」反魯論述時於台港文學場域所掀起的波瀾：在 1962 年胡適在台灣去世時，蘇雪林曾於《台灣新生報》上連載〈悼大師 話往事－－適之先生和我的關係〉來表示對這位師長的敬意，部分具爭議性的內容後來也掀起劉心皇與寒爵的批判。事實上透過討論這次論爭，更加複雜化反共文化體制內反魯論述的重層面貌，繼而了解在失去敵人（中共）的國家內部，又是如何的製造與攻擊「敵人」。

第三節　蘇雪林的反魯論述在台灣文學場域的波瀾

現今中國大陸的魯迅思想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甚或是東亞其他國家、地區的魯迅思想傳播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相較來說台灣因政治的關係，閱讀魯迅的傳統在冷戰體制受到壓制，取而代之的是反魯相關論述。蘇雪林自 1952 年來到台灣後壯大了原有的反魯陣營，成為台灣反魯評論者中最為激烈、堅持的一員。[94]

台灣的反魯論述最早出現在戰後初期，是 1946 年發表於軍系雜誌《正氣》上署名「遊客」所撰寫的〈中華民族之魂！〉，文中批判許壽裳在台灣極力吹捧魯迅的功績，並認為魯迅不配為中國「民族之魂」。〈中華民族之魂！〉雖為台灣反魯論述的先聲，但放在戰後初期中、台知識份子熱烈讚揚、討論魯迅的文章中，卻也顯勢單力薄。一直到 1949 年之後台灣出現過兩次的反魯風潮，第一次出現於 1950 年代初期在《台灣新生報》上一系列的反魯文章，此次的反魯論述全為匿名者所撰寫，是有系統的打壓左翼思潮與魯迅思想。第二次則

[94] 這裡之所以會認為中斷，主要是在描述國民黨政權下禁止人民閱讀左派書籍，但實際上仍有部分台灣人仍私下閱讀，形成魯迅思想傳播的伏流。

為 1960 年代，多位與魯迅有過論爭的作家重新出版與魯迅相關論著或回憶性文章，同樣也引起台灣讀者的重視，包括陳西瀅的《西瀅閒話》、梁實秋的〈關於魯迅〉、〈魯迅與我〉等等，都回憶過往與魯迅的交往與交鋒情況。而在這一次的反魯風潮中以蘇雪林最受關注且引起許多的回應，主要的原因在於蘇的論述偏激且具攻擊性，因而引起其他人討論這種的反共、反魯的方式是否有用。

蘇雪林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也出版文學雜記，而這之中有許多篇章都談及與魯迅的恩怨，以及不滿魯迅的表裡不一。當然有許多關於魯迅的內容是舊文重出沒有太大的改寫，但蘇雪林基本上對魯迅的態度是數十年不變的。而她的著作中與魯迅相關或述及魯迅的有以下七本：

時間	書名	出版社
1959	《雪林自選集》	神州出版社
1966	《我論魯迅》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69	《文壇話舊》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7	《蘇雪林自選集》	黎明文化公司
1982	《猶大之吻》	文鏡文化事業公司
1983	《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	純文學出版社
1989	《遯齋隨筆》	中央日報出版部

她的言論真正引起台灣文壇其他作家反彈的，是 1962 年在《台灣新生報》上的一系列擁胡反魯文章，引爆了其他人質疑她的反魯立場。1962 年胡適在中央研究院因為心臟病發逝世，蘇雪林的〈悼大師 話往事－－適之先生和我的關係〉於《台灣新生報》連載，敘述過往與胡適的交往情形與共同經歷。

在一連七次的連載中有關「反魯」就有〈反魯風波〉、〈一篇擁胡討魯的文

章〉兩篇，這兩篇文章都是：「蘇雪林如何反魯多，追憶胡適部分少」，就連立場支持蘇雪林的連赫侯，在文末也不免擔心的說道：

> 但我們卻真不知這文章是「擁胡」還是「擁蘇」？但願讀它的人也不要「羞得連頭都抬不起來」，而摔報紙「一溜煙逃走了」才好。如果那樣，可就太使蘇女士失望了。[95]

連赫侯是少數在論爭中支持蘇的人，但是他在文末憂心蘇文章的寫法，不但沒有辦法反共、反魯，還製造了反效果。多數作家更是反對蘇雪林這一系列文章，認為她過於自大的吹捧自己，無限上綱自己在過往的重要。當然，偏執、激進這是蘇雪林一貫的風格，而這個性也讓她在文壇結下不少樑子，比方說與覃子豪關於新詩問題的爭執、與年輕一輩的張明仁、王憲陽的論爭，甚至是與香港學者陳炳良因神話研究的筆戰，都展現了她的好鬥與直白性格。[96]必須說明的是，蘇雪林對胡適於 1920~30 年代文壇的回憶當然帶有濃厚的自我主觀詮釋，但這樣的敘述在寒爵、劉心皇、林祈登等人看來是一種「謊言」，也因而激起他們批判蘇雪林。[97]

細看〈反魯風波〉、〈一篇擁胡討魯的文章〉二文，內容談及蘇雪林在 1930 年代如何反魯，而在發表〈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受到左派的攻擊後又怎樣牽連了胡適。蘇雪林在弔念胡適時會提到自己過往「反魯」的功績，原是希望利用批判魯迅來強化胡適在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性，鋪陳自由主義思想來反左傾的社會主義路線。但由於濃厚自誇的寫作風格，以致於支持她的人

---

[95] 連赫侯，〈蘇雪林女士的「絕妙好辭」〉，《世界評論》第十年第一期（1962.3.16）。

[96] 關於蘇雪林的性格如何，並非本篇討論的焦點，但翻閱其過往評述文章、日記等等，可以發現蘇雪林在性格上較為自我中心的一面，且因為她直白的人生態度，也讓其反魯論述極為激烈。可參考：林祈登，〈女作家・老教授－－向蘇雪林先生進一言〉，收錄於劉心皇編，《文壇往事辨偽》。

[97] 劉心皇就曾說道：「讀過這七篇文章的人，都有一個印象：那不是追悼胡先生，而是蘇女士藉題目來自我吹擂自我烘染。她欺侮台灣無人，以為抗戰前夕的中國文壇狀況，事隔二十幾年，年輕一代沒有人知道了，便可以大吹大擂一番了，於是他不僅把自己描繪成文壇的盟主一般，而且也好像當時的反共鬥士。縱然希特拉曾發明過謊言說一百遍便不再是謊言，但謊言畢竟是謊言，一遇事實，謊言便會「破產」的。」劉心皇編，《文壇往事辨偽》，頁 7。

也認為她的文章可能形成「反反共」的現象，容易讓閱讀者感到不舒服轉而走上擁共。

蘇雪林〈悼大師 話往事－－適之先生和我的關係〉雖然熱烈引發的反響，但論爭僅聚焦於蘇雪林與寒爵、劉心皇三人，其餘的評論者如：連赫侯、林祈登、鳳兮都僅是點綴並未實質參與論爭。回顧三人的恩怨情仇並非在 1962 年才結下，而可回溯至 1954 年，雙方因為文藝觀的不同以及私人恩怨已經有所爭執。寒爵過去長期在劉心皇所編輯的雜誌發表文章，連帶的也將劉心皇捲入與蘇雪林敵對關係，但到了 1962 年因悼念胡適才有進一步的論爭。[98]

極為可惜的是 1954 年間的爭論究竟如何，因為蘇雪林日記的散佚我們不得而知，唯能從 1962 年的再次論爭中推測過往所發生的爭執。但大略可以了解的是，因為蘇雪林在鍾梅音《母親的憶念》一書序言而來。撇開兩造情緒化的私人恩怨，在雙方的爭執上牽涉的是「趣味小品」與「文以載道」之間歧異的文藝價值觀。蘇雪林在該書序言是這樣評述的：

> 過去語堂先生之提倡小品散文，曾飽受左派文人「小擺設」、「有閒階級的玩意」依類別有用心的攻擊，現在文壇對於語堂先生的誤會仍未盡消除，這都是左派文人的遺毒，我們非極力於以澄清不可。倘有人見了絮語家常的文字，而即擺起衛道的臉孔來，我不知別人意見如何，我個人卻要惋惜他中左派的毒太深。[99]

蘇雪林的創作是走抒情、浪漫的路線，認為過於寫實與具教化性的文藝觀是「中左派的毒太深」。對此，寒爵發文反擊，他在〈所謂「左派的毒」〉[100]中批評蘇以扣帽子的方式，向任何與她文藝觀不同的評論者羅織罪名。蘇雪林也因為寒

[98] 關於這段往事，劉心皇在與何忍往來的信件裡都有詳記的記載，後發表於〈不預備發表的通信〉，收錄於劉心皇編，《文壇往事辨偽》。
[99] 鍾梅音，《母親的憶念》（台北：復興出版社，1954）。（目前已經散佚）轉引自：寒爵，〈蘇雪林先生可以休矣！〉。
[100] 寒爵，〈所謂『左派的毒』〉，《反攻月刊》第 109 期，1954.6.1。

爵的回應感到不快，自此種下之後論爭的遠因。

回顧過往蘇雪林的文學品味，多半是提倡「風花雪月」（寒爵之語）或幽默小品，從她選擇評論徐志摩、林語堂、陳源、朱湘、梁實秋等人的作品，就已經表現出美學價值。此外，蘇雪林的學術研究領域，也多半都偏向於喜好「唯美文學」，[101]也因此，她在戰爭時期時就曾對自己的文藝觀這樣說道：

> 然則，幽默並非有閒階級的玩意兒，倒是實際生活的必需品，於此可證，要罵還得先考慮一下才對呢。……照他們之所敘述，則那個可憐人陷身於這險惡環境，確已逃生無路，他啜蜜固不免於死，不啜蜜也不免於死，以瞬息即將歸於幻滅的生命，而啜取樹頭數滴之蜜，聊以自娛，我們不忍再責備他吧。[102]

她認為在現實生活已不易，「可憐人陷身於這險惡環境，確已逃生無路」，因而追求文學中美好的事物實屬人之常情，透過文學帶給人們的趣味與美感，也許能夠讓戰爭下的人們獲得撫慰與緩解。蘇雪林的文藝觀與「新月派」的調性十分相似，在講求格律與美感當中將古典與現代融合，像是梁實秋的《雅舍小品》也是在戰爭時期所寫下的經典散文，就是表現文學趣味的代表作品。[103]

相較來說寒爵的文藝觀就較接近「文學研究會」，認為文學的功用就是反映現實、反映人生，在意識型態的光譜上也是較為中立，既不認同以政治為導向的文學，也不如此強調文學中美學技巧之重要。換言之，兩人的爭論不僅是

---

[101] 可參考：蘇雪林〈我所愛讀的書〉、〈談寫作的樂趣〉，皆收錄於：蘇雪林，《蘇雪林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7）。

[102] 蘇雪林〈《屠龍集》自序〉，寫於 1940.11.25。後收錄於：蘇雪林，《蘇雪林散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頁 185。

[103] 蘇雪林自己說道：「他在那裏大事（按：肆）提倡風花雪月文學，她對於『無非是一個歲月過得相當清閒，而生活也相當舒適的家庭主婦的身邊瑣事』，還有『雲呀、月呀、花呀、樹呀、雞呀、狗呀、丈夫呀、孩子呀、油鹽材米的日常呀，青遊雅集的快樂呀，在生活小圈子裡一味開放地甜潤的割喉，歌唱個人的幸福……就是所謂『按頭清共』一類的玩意兒，只能供有閒階級的流連晤對，摩娑玩賞』的小品文，頗為激賞。」轉引自：寒爵，〈蘇雪林先生可以休矣！〉，自立晚報 1962.4.13～19。（劉心皇：109）

私人恩怨，同時也是美學價值的不同所造成，只不過在一連串情緒交鋒背後模糊了兩人文藝觀的討論。寒爵在批評時曾說道：

> 雪林先生曾經「代表一般讀者的意見」，為這種小市民的意識，加以瑣事謳歌。不過我覺得一個文藝工作者，如果僅囿於小市民意識的小宇宙內，而不能領導時代、反映時代，縱然可以在他的小園庭中建起象牙之塔，縱然可以在一朵花又一朵花的自綴其桂冠，但是這種自我欣賞，自我陶醉的表現，即使受不到「中左派的毒太深」的「別有用心的攻擊」，然而由於他的塔基既建築於沙堆之上，桂冠上的花多又禁不起風吹日曬，他的榮光，也會旋即黯淡的；更何況時代所起的揚棄作用，一向不留情呢！[104]

面對動亂的時代，寒爵希望文學能負擔多些的社會責任，不論是在反抗日本侵略或是對抗共產黨，都表現如此的態度。與此相反的，蘇雪林則強調文學的獨立性，在美學、美感、幽默的追求上有其自主之處，而不容時代、政治力的介入。只不過蘇雪林將反應時代與社會現實的文學觀，不分青紅皂白的將其歸結為「中左派的毒太深」所以讓寒爵反彈。畢竟在戒嚴時代下被歸類為「左派」是相當危險的事情，也引起寒爵、鳳兮、劉心皇等人的不滿，看不慣蘇雪林扣紅帽子的行徑。

所以在蘇雪林〈悼大師 話往事－－適之先生和我的關係〉後，寒爵即刻寫了〈替蘇雪林先生算一筆舊賬〉[105]揭發蘇雪林過往在《國聞周報》正面評價魯迅的評論，以此質疑蘇雪林反魯的真實性，並同時帶有私人恩怨的反扣蘇雪林「紅帽子」。文章主要的分析有二：第一，蘇雪林並非一開始就是反對魯迅；第二，蘇雪林由擁魯到擁胡的轉變，與胡適曾回應她的信件有關。在這兩點分析中，寒爵的論點希望揭穿蘇雪林反魯的虛偽，認為她是因為得不到魯迅的關愛才轉向擁胡，繼而在反魯書信中得到胡適書信回覆而成為熱切的胡適支持

[104] 寒爵，〈替蘇雪林先生算一筆舊賬〉，《反攻月刊》，1962.4。
[105] 寒爵，〈替蘇雪林先生算一筆舊賬〉，《反攻月刊》，1962.4。

者。

面對寒爵翻舊賬挖掘過往擁魯事蹟，蘇雪林在日記中這樣提道：「昨晚因看寒爵第一段文章，精神又大受刺激以致不能入睡。到了十二時許服安眠藥一丸仍無濟於事，直到天明始稍入夢。」[106]蘇沒有想到過往的文章竟被宿敵寒爵作為素材引用批評，這對她在建構的反魯形象是很大的傷害，也因此以〈為國聞周報舊帳敬答寒爵先生〉一文反駁。也許是為了回應寒爵「刀筆文學」的指控，蘇雪林在文章中一反過往的犀利風格，採取哀兵姿態應對。文章解釋自己過去評論〈阿 Q 正傳〉的原因，並不如寒爵說的簡單，裡頭仍帶有批判的成分等等。在文末蘇雪林只說，「寫了這一篇之後，任憑人家怎麼再罵，決不回答。」似乎有意在此打住，但寒爵、劉心皇卻並未因此而收手持續的攻擊她。

由此觀之，魯迅成為討論焦點並非在作品或思想層面，而是將魯迅作工具化的鬥爭武器，當誰被冠上左派或是與魯迅友好，就會陷入政治不正確的境地。寒爵等人不滿蘇雪林扣帽子，所以趁著蘇撰寫反魯相關評論時，拿她過去正面評價魯迅《阿 Q 正傳》的文章解構其反魯的經典地位。回到兩造針對魯迅符碼的攻防，蘇雪林在〈悼大師 話往事－－適之先生和我的關係〉系列中，描述自己在魯迅風潮中是如何的寫下反魯相關評論來對應，並且致信於胡適而獲得回信與指導：

> 我洞燭左派之姦，不能再行容忍，寫了一封長信給蔡孑民先生，詳述魯迅品格之惡劣及左派手段之惡毒，勸他不能上當。同時知道胡適之先生將自海外歸來，又寫了一封長四五千字的信給他。[107]

通篇來看，蘇的說法強調了她與胡適兩人通信內容在當時對抗魯迅風潮的重要。

---

[106]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　日記卷》第三冊（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蘇雪林作品集編輯小組，1999）頁 352。

[107] 蘇雪林，〈反魯風波〉，《台灣新生報》（1962.3.6）。

然而左派之所以攻擊胡適，也是源自於蘇公開了與胡適來往反魯的信件，這一點也是寒、劉兩人聚焦反擊之處。寒、劉認為蘇雪林兀自的公布私密信件，引起左派文化人攻擊胡適，是她私心毫不顧及整體的社會意義導致胡適陷入無端的是非。由此可看到，兩造除了對當時的信件往來內容、方式有所論爭外，同時也對反魯的方式有不同的想像。

筆者認為與蘇雪林對話的文章中，以劉心皇的〈欺世「大師」－－與蘇雪林女士「話」文壇「往事」〉[108]最為全面，並綜合了寒爵的看法，完整的挑戰蘇雪林的觀點。此文主要批評的論點有二，第一，蘇雪林並非反魯論述中的第一人，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人。第二，蘇雪林反魯的方式相當不高明，更可能製造反效果。

劉心皇在文章中羅列出歷來的反魯作家群，包括陳西瀅、徐志摩、高長虹、顧頡剛、郭沫若、葉靈鳳等人，反駁蘇雪林強調自己在反魯陣營的重要。但劉心皇將左、右派人士一併列舉，並且這些人與魯迅之間的爭論原因也大不相同，如此大雜燴式的將與魯迅論戰過的人置入相同框架，與蘇雪林所討論的是不同層次的「反魯」問題。所以這樣的陳述方式只是單純的針對蘇雪林而來，認為蘇在魯迅生前不敢反魯，死後才大鳴大放的以自己為反魯正宗，根本是欺世「大師」。

因為蘇雪林所陳述的「反魯」是帶有反共的意味，她所反對的魯迅是與共產黨有深入的接觸，甚至到了後來成為了左派所建構的「魯迅宗教」，兩人所討論的「反魯」根本上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劉氏當然也了解這一層，但為了解構蘇雪林的自誇言論，劉心皇才刻意將左、右派曾經與魯迅論戰過的人一一點名，以此質問蘇雪林：當這群人在與魯迅論戰時她人在哪裡。此外，劉心皇認

[108] 〈欺世「大師」－－與蘇雪林女士「話」文壇「往事」〉收錄於劉心皇編，《文壇往事辨偽》。

為蘇雪林只是感情用事的流於辱罵根本沒有任何思想，不但無法引起讀者共鳴，且只會激起讀者的好奇想要一窺被蘇雪林批評的魯迅究竟是誰，繼而成了替魯迅宣傳。

劉心皇的態度與蘇雪林大鳴大放呈現極大反差，也表現了反魯陣營並非鐵板一塊，兩造之間對於魯迅符碼詮釋與處理的不同，更可視為此次論爭的關鍵。雖然蘇雪林與寒爵相繼表明不再對此事作出回應，但雙方的爭執並沒有隨著蘇雪林、寒爵兩人的住口而終止，隔年劉心皇收集論爭文章出版《文壇往事辨偽》，將整件事上溯至文學史的層級，認為「文壇往事屬於文學史範圍，不容一字一句的虛偽！」。[109]觀看劉心皇所編的《文壇往事辨偽》內容多收錄他人的文章，少數自己的文章卻多聚焦於批評蘇雪林，而少有對魯迅思想及其文學的點評。一如他 1971 年出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內容談及魯迅時刻謹慎的以援引其他評論者的話來討論魯迅，或者流水帳的方式幾筆帶過，極其小心的面對威權體制下的政治禁區。[110]這本書所引發的爭議也讓蘇決定接受南洋大學的聘請到新加坡任教[111]，一直到 1966 年才回台灣成功大學並出版《我論魯迅》，集結過去已刊登或未發表與反共與反魯相關著作，也算是對於寒爵、劉心皇遲來的回應。

必須再行解釋的是，蘇雪林與劉心皇的討論到了最後成了私人恩怨的論爭，所顯示是魯迅符碼在戰後台灣文化場域的空洞化。1937 年以後魯迅符碼的話語權被共產黨接收後，「魯迅」一詞不再具有多重意涵，而被單方面與共產黨來鏈結。在政治正確的反共年代裡，當魯迅被視為共產黨的份子後，此符碼便不

[109] 劉心皇編，《文壇往事辨偽》頁 1。
[110] 關於這部分我將會在下一章節中繼續討論。
[111] 蘇雪林在自傳中這樣說道：「那些歪文和歪書，把我糟蹋一個不亦樂乎。大家雖都為我不平，但知道他們背景的可怕，便都噤若寒蟬，一聲不響。從五十一年到五十三年那兩年裡，我雖依舊教書，依舊寫文章，依舊作我的學術研究，精神時感受莫大的困擾，只想離開台灣，循跡海外，所以南大聘書一來，我便接下來了。」（蘇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 214）

再具有其他意義，與魯迅牽扯上任何的友好關係都會被視為共產黨的同路人。這也是為何兩人的論爭最後流於爭辯是否與魯迅關係友好的膚淺的問題，而掩蓋了魯迅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觀看當時的台灣文學場域，作為不在場的魯迅，卻在國民黨政權為保護自身安全、強化反共意識型態穩定的情況下，重新被提及、討論，甚至是做為攻擊其他文人的工具，使其成了團結台灣島內一致的「稻草人」。

這場論爭在一開始時就種下鬧劇一場的結局，無論是聲援蘇雪林或是劉心皇的其它論者，都無端的被捲入無解的是非當中。古遠清這樣解釋兩人的恩怨：

> 當蘇雪林用流氓大師、青皮學者、共黨匪徒來稱呼魯迅和用誣告寫黑信方式誣告劉心皇，而劉心皇又用編書的方式去傷害蘇雪林這位老作家的政治生命和藝術生命，甚至用徹底搞臭、搞垮蘇氏的政治棍棒時，這件事已走向「案件化」和「新聞化」，以與文學無關，與蘇雪林無關，甚至與劉心皇無關。[112]

確實是如此，這場論爭到了最後早已失焦剩下人身攻擊，討論魯迅已不再是重點，甚至是攻擊他人的工具。但我並不認為我們因此可以忽視這場論爭的意義，反倒可以藉此看到「魯迅」之於蘇雪林個人及當時代的意義。這部分可歸納為「蘇雪林個人」、「魯迅思想傳播」、「國府反共體制」三個方面來看它的影響：

第一點，就蘇雪林個人來說，在寒爵與劉心皇的批判下導致蘇雪林為了逃避流言而出走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並於 1966 年集結過往反魯文章出版《我論魯迅》一書，在魯迅逝世三十周年時出版，以回應寒爵與劉心皇對於她過往擁護魯迅的「指控」。雙方的爭論從 1954 年到 1966 年一共歷時十多年的時間，

[112] 古遠清，〈發生在台灣「戒嚴」時期的文壇往事辨偽案〉，香港《純文學》復刊第 14 期，1999.6，頁 58。

其中當然存在許多的私人恩怨，但同時也展現了蘇雪林與寒爵等的美學觀之不同，蘇雪林強調文學的獨立自主性，不應受到政治干預的唯美與趣味的特質，寒爵則較注重文學的現實意義，反映現實社會情況，而具有教育、政治等多面向的使命。[113]

第二點，以魯迅思想傳播來說，蘇雪林與寒爵、劉心皇的論爭是 1950 年代以後台灣文壇首次大規模的討論魯迅。台灣從日治時期開始有長久的魯迅文學、思想輸入的接受史傳統，新文學作家群：張我軍、賴和、楊逵、鍾理和等人都是魯迅小說的愛好者，其創作多少也受到魯迅的影響。但 1950~1960 年代因為反共戒嚴體制的關係，魯迅的作品在台灣是禁書，造成閱讀魯迅上的斷層，在評論方面許多研究者皆戰戰兢兢的面對這一段文學史，甚至僅是以附帶提及的方式來談，劉心皇即是一例。而這一場論爭是少數在台灣的戒嚴體制下可以公開討論、論辯與魯迅相關的議題，儘管論爭內容僅以魯迅為名實際上是了斷私人恩怨，但「魯迅」符碼的現身反映的是自 1930 年代以後蘇雪林反魯言論的延伸，成為關照台灣魯迅文化史不可忽略的一章。

第三點，以國府反共文藝體制來說，反共文學陣營並非鐵板一塊，內部具複雜的鬥爭關係，且會在不同的時期因應國家政策而又所調整。此外，在 1950 年代國民黨統治下「魯迅」符碼是個禁忌，就算是反魯論述在台灣文學場域裡也是(盡可能)不能出現。在台灣文壇過去的反魯論述通常都以單篇形式出現，蘇雪林與寒爵、劉心皇「反魯」立場的討論，是國府遷台後首次有大規模的討論魯迅。依蘇雪林的陳述，她的反魯專著在 1950 年代初期剛到台灣時就希望

[113] 王富仁曾這樣描述這群英美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極適切用於蘇雪林與其同時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在表面上是個人主義者，但是這種個人主義不是西方那種獨立思考、獨立選擇、獨立負責的個人主義。西方的個人主義是重意志、重個人奮鬥的，它可以在一種共同的追求目表上實現聯合而又在聯合中保持個人的人格獨立，而中國 30 年代的英美派知識份子則是不結盟式的個人主義。他們反對群眾性的聯合行動，同時又不能不在國家統一的法制形式下約束自己的言行。這種個人主義是他們變得極端無力，不但無法把他們的學理轉化為社會發展的實際力量，甚至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相互救助的力量。」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現狀》頁 228。

出版，但當局認為台灣沒有閱讀魯迅的傳統，更可能進而激起台灣人民關注魯迅，因此否決他的要求。雖說 1967 年蘇雪林還是出版了《我論魯迅》，而當局之所以願意開放出版，可能原因在於國民黨在台灣的反共清鄉運動已告一段落，而在冷戰體制下受到美國保護政權日趨穩固，也因此從過去的強制性取締逐漸放寬其標準，願意容納可能存在的異議之聲。

第四節　蘇雪林言論在香港文壇的發酵

香港由於地理位置上與中國相連，人員能自由流動與往來，所以情況極為特殊。此外，英、日兩國對殖民地的不同定位與想像，讓香港保有比台灣更多的中國文化的傳統。魯迅在 1927 年受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之邀來港，為香港民眾做了兩次的演講，且留下〈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兩篇演講後的紀錄，某程度的促成了香港「遲到的」新文學發展。[114]當時的《華僑日報》一連刊登數篇魯迅演講反響的文章，包括：碧痕〈文學革命〉、濟時〈會晤魯迅先生後〉、綠波〈我們一起來打破文學的階級吧〉等，都談及魯迅的演講對於舊文學中迂腐氣息的批判，以及抨擊英國殖民體制，認為這正是香港所需要的一帖良方。

到了 1950 年代以後，台灣處於戒嚴體制言論受到嚴密的控管，反倒香港在言論上並未受到太多的限制。基本上來說，華文的兩大市場——中國與台灣不約而同因應戰爭局勢，以及強人領袖的獨裁政權，呈現政治體制箝制文學創作的自由。相對來說，香港華語文學受到政治的介入就不若如此的全面，作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如此的情形下，香港的文學場域讓不同派系、立場的政治角力，存在著競合的關係。長期在台、港兩地生活的學者鄭樹森，就

[114] 目前的香港文學史都必然談到魯迅來港的這一部分，並將此視為中國新文學、新文化運動來到香港的象徵事件。

是這樣形容香港不同於兩岸的社會環境：

> 但大體上，殖民地政府無民主、有自由的統治方式，使到香港的文化空間在海峽兩岸之間，最是開放包容的。不論是共產黨或國民黨，右傾或親左，甚或是不見容於海峽兩岸的托派，都能夠在香港自由活動。香港文化人均可自由選擇，並各自宣揚信念或落實創作理想。因此，就當時兩岸三地的政治及文化情況來看，香港可說是一種「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容許歧異的聲音同時爭鳴，接受互相排拒的論述和平爭辯。[115]

鄭的說法反映香港在當時的眾聲喧嘩，在「公共空間」、「公共領域」是兩岸三地之間最為特殊之地。除了原有的英國殖民統治外，美國、中國、台灣也都介入了該地的文化場域。[116]這讓香港的情況更顯複雜，人人都能表達對於魯迅作品、思想的感受，但同時也受到不同勢力的介入有更多的論爭。

戰後香港成為左右翼勢力進駐的場域，在看似接受各方人馬進入的狀態下，事實上英國殖民政府依舊保有它的主體性，可以不必有任何理由隨時遞解任何人出境，以公權力維持自身政權的穩定。像是右派的趙滋蕃、王新衡，以及左派的司馬文森、劉瓊，都因為不同的理由而被遣送來開香港。也就是說，在英國殖民總督的統治下開放一定的空間給予左右翼人士，但同時也掌控不同路線的行動，以防止香港出現反動言論或是過為激烈的分子。[117]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香港一方面在冷戰體制的框架下，與中華民國（台灣）保持交流，另一方

---

[115] 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1998）頁 6。

[116] 美國出資培養的園地有：今日世界出版社的《今日世界》、友聯出版社的《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兒童樂園》、人人出版社的《人人文學》、亞洲出版社的《亞洲畫報》等。而屬於親國民黨的有：《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等刊物。直屬於共產黨或親共產黨的則有：《文匯報》、《新晚報》、《晶報》、《青年樂園》、《良友畫報》、《文藝世紀》等等。

[117] 誠如周承人所描述的：「因國家認同、政治理念不一，在政治上被分為左、右兩派，港英當局在意識型態方面，至少在表面上不用行政手段去營造或推行某種意識形態文化環境，只要不違背港英法律，各種主義和派別的宣傳活動一般都允許存在。但這不妨礙港英利用立法手段，清除或限制他們所不喜歡的人與事。因此，國、共雖然在香港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間，但也受制於港英的操弄。國、共冷戰，表面上是影片能否進入台灣市場問題，實質是政治鬥爭，港英則往往是台灣勢力的幫手。」周承人，〈冷戰背景下的香港左派電影〉，收錄於香港電影資料館 編，《冷戰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9，頁 25。

面為了維護英國在亞洲的利益，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互動，維持殖民母國在亞太勢力的最大利益。

也在如此的社會環境下，蘇雪林的反魯論述除了在台灣攪動起一池春水，也在香港文壇發酵引起爭論為作家群們所關注。當然，蘇雪林與香港之間的關聯最早源於 1949 年戰亂時期，她為了逃避中國的赤化，從武漢經由上海逃難到香港，在港待了一年後才赴法國就讀學位，其後斷斷續續與香港文壇有所交流。蘇雪林雖然人沒有到香港，但他在台灣的反魯論述也曾引起香港文化圈的反響，回應雖不若台灣一般大，但還是能夠看到香港評論者針對蘇雪林的反魯論述提出不同的見解。

一直以來魯迅被右派文人在人格上的汙名化攻擊不外乎三點：第一，魯迅善妒、好鬥尖酸刻薄。第二，魯迅轉向社會主義路線只是希望繼續獲得「青年導師」的位置。第三，魯迅性格、生活表裡不一對外與私底下兩種不同的樣子。關於這三點，不論是夏志清、劉心皇，或是這裡的蘇雪林，以及下一章鄭學稼、曹聚仁，對魯迅的批評都不脫這三點的框架。而在這三點之中又以第三點最具爭議性，對於魯迅此點的質疑多半是沒有證據的證人言詞藉以作人身攻擊。像是 1950 年代在台灣的《台灣新生報》上，太史公就是在這樣批判魯迅，他在文章中描述看到魯迅與景宋的內衣價格不斐，卻在有人拜訪時刻意換上樸素的衣服見客，以全知全能的觀點看見魯迅在人前人後的不同樣貌，解構魯迅在他人心中完美形象。[118]這種沒有實質證據的證人之言，言之鑿鑿的附會了魯迅生活與行為的表裡不一，不論是蘇雪林或是太史公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建構魯迅的

[118] 太史公，〈我來解剖魯迅 一〉，《臺灣新生報》，1950.9.7。他這樣說：「魯迅一向是以穿藍布大褂，布鞋向青年們表示他生活簡樸，而自己也以不修邊幅為自豪的。殊不知這正是他的做作處。魯迅的私生活享受是不遜於任何人的。……魯迅在家裡，和景宋所穿的睡衣，就是上海惠樂公司所買的最高貴的龍衣，那兩套的價錢，可抵魯迅的二十件藍布長袍。請問生活簡樸，講「普羅」的人，就應該這樣考究的嗎？非但此也，魯迅這件睡衣，是不肯讓人看見的，假使有人到他家去看他，他一定要先把睡衣脫了，換上一套白竹布短大掛。這是筆者親眼目睹，請問這一個虛偽的程度，又是如何?」

醜陋面，並依附於台灣的反共戒嚴體制大肆宣傳。

如此私密性的言論其目的是為了增加可信度，進而創造群體的共同意識，而與魯迅有過一面之緣的蘇雪林，借用見證者的權威主宰歷史的真實，建構不容質疑的真理。西方歷史學者歐恩（Walter J. Ong）提到書寫的權威性時是如此描述的：「書記載的東西是難以直接反駁的。即使讀者完完全全、徹徹底底拒絕書本所寫的，書還是重複它原先所講的。這就是為什麼「書的記載」和「真理」通常被等同視之的一個重要原因。」[119]同理，不論是中共或是蘇雪林都是希望創造其論述的權威性，透過言論的記載、出版形成白紙黑字的證言，更加強了說法的合理性，並在沒有反對意見同時存在下成為了經典。但這種零散、破碎、片段的交鋒，反倒讓論述者形成兩種反應：其一為繼而加強自我論述，如前所描述的「複述」反魯論述的防衛機制，讓蘇雪林不斷的反覆、強加信念的建構反魯論述。其二是與不同意見之論述進行對話，並且某種程度的修正自己原有的意見，鄭學稼的《魯迅正傳》就屬於這一類，以致於出現前後期兩種不同的版本。[120]

而蘇雪林的反魯論述不只如前述的造成台灣文壇部分作家的反擊，在香港也有多位作家發文為魯迅說話。像是蘇雪林在〈富貴神仙〉中描述魯迅是如何拿了政府的薪餉，在版稅部分每年又有一萬元的收入等等，透過他在日記裡詳細記載其生活開銷與他人欠款的紀錄，而咬定魯迅相當富有卻又吝嗇，事實上是「實利主義者」。蘇雪林極盡諷刺的在文章中一一細數魯迅賺了多少、如何節省，藉以建構其吝嗇、刻薄的形象，以此配合魯迅雜文的文風，來論證其刻薄、攻擊他人的行為從文字即可看明白。曹聚仁就曾在《魯迅年譜》回應蘇雪林在〈富貴神仙〉中對魯迅的表裡不一的抹黑，批評她造謠魯迅富有且吝嗇一

[119] Ong, Walter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79. 轉引自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 147。
[120] 詳見本論文的第三章。

事是不符合事實的，而真實是北新書局欠魯迅大筆稿費，也讓他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富裕。他說道：

> 魯迅有沒有錢。以我所知，魯迅並不是一個吝嗇的人，但是，他並沒有錢。那位攻擊魯迅十大罪狀的蘇雪林，卻說魯迅很富有，卻如盧杞一樣惡衣惡食，裝得很窮。〔…〕魯迅生前，其銷數只能以千計，解放以後，才進到以萬計。[121]

由此可見，左右派文人在香港文壇針對魯迅形象的攻防，不同於台灣的論爭流於蘇雪林個人的私人恩怨，而避開面對真實的魯迅面貌。台灣的文壇與魯迅相關的言論都以反魯出發，內部只是策略上的不同，僅於對於建構怎樣反對魯迅的形象理解上有所不同。

另外像是徐訏也相當感冒蘇雪林攻擊魯迅，並且也是不滿蘇雪林造謠魯迅關於金錢部分，認為他與青年交好是有目的的，是為了獲得青年朋友的支持。徐訏在上海時期與魯迅之間的關係匪淺，魯迅也曾在《申報》上論及其創作，並且曾致贈其墨寶，兩人之間的關係不亞於魯迅與曹聚仁。所以徐訏以自己的經驗以及所聽見周遭朋友的看法加以反駁：

> 台灣《傳記文學》上曾有蘇雪林寫魯迅的文章，刻薄陰損，似有太過。特別是關於魯迅在金錢上小器一節，我覺得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有人說，這是魯迅的想有群眾，是以小惠攏絡青年的手段，但許多事實是魯迅有時並不要別人知道是他的借助。我覺得魯迅對弱者貧者的確是有更多的同情心。[122]

---

[121] 曹聚仁這樣說道：「魯迅有沒有錢。以我所知，魯迅並不是一個吝嗇的人，但是，他並沒有錢。那位攻擊魯迅十大罪狀的蘇雪林，卻說魯迅很富有，卻如盧杞依樣惡衣惡食，裝得很窮。照一般錯惡推想，魯迅的書，銷路很不錯。但北新欠他的版稅，累積一筆很大的數目，直到他死後，還差得很多，有一時期，幾乎鬧到法庭上去的。魯迅的銷路增多乃在他死後，到了大陸解放，才有驚人的數字。魯迅生前，其銷數只能以千計，解放以後，才進到以萬計。我們不能拿目前的市場，來估計先前的市場的。」曹聚仁，〈魯迅研究述評〉，《魯迅年譜》（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67）頁 179。

[122] 徐訏，《場邊文學》（香港：上海印書館，1971），頁 222。

曹、徐兩人都以見證者的姿態為魯迅闢謠，反駁蘇雪林批評魯迅富有卻吝嗇、表裡不一。由此可看到，香港的魯迅論爭是以意識形態出發來爭奪詮釋權，發文反擊的曹聚仁與徐訏都與魯迅有過交情，在立場上中間偏左，或說對左翼有更多的同情。這樣的情形並非闡述台灣文壇僅存在右派論述，或是反魯論述這麼簡單而已，而是許多左派文人或是與魯迅交好的作家因台灣的政治因素而不敢發聲，像是臺靜農、黎烈文都是如此。也許因為許壽裳在戰後初期遭人暗殺的前車之鑑，因而使他們面對文壇的反魯論述，即便再怎麼偏頗，也不去碰觸可能涉及政治的相關議題，以免惹禍上身。有趣的是，不論蘇、徐都以見證者的姿態來論述魯迅，企圖加諸讀者真實的印象，如同前述般將書本所述成為真理般形成交鋒。

但如此私密性的敘述，使得魯迅論述在台、港兩地有不一樣的效用。由於台灣在國民黨政權下的反共文化政策，魯迅相關著作都遭到查禁，在市面上不能流通，以致於台灣讀者比香港讀者容易接受反魯論述中的魯迅形象。這不僅是因為沒有擁魯論述的在台生成，另一方面更是魯迅相關論述出現於台灣報章雜誌，所引起民眾的興趣與想了解的欲望會高過於香港，即便戒嚴體制中眾人皆知反魯是最終底線，但依然會希望接觸中國的左翼文學。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即便台港兩地針對蘇雪林的反魯論述形成文化共振，但是在共振上的反響卻呈現不一的狀況。

戰後台灣曾經發生過的兩場魯迅相關論爭，都呈現了短時間內集體、密集的交鋒，1950 年代《台灣新生報》上的魯迅論爭、1962 年蘇雪林在胡適逝世紀念文所引發的論爭都是如此。至於香港則因寫作自由空間大，所以面臨不同立場的言論時，儘管如蘇雪林如此偏激的反魯論述，其反應也不似台灣方面來得那樣強烈，甚而有更大的包容度接受其存在。也就是說，香港的這種跨地域

的論爭，並非同一時間點內密集的交鋒，更多的是在各自論述場域中提出不同的見解，並於閱讀之後有所回應或是參予討論，形成跨時間、跨地域的魯迅思想論爭。

香港本土作家梁秉鈞曾在回憶自己年輕時閱讀魯迅作品的情況時，這樣說道自己在香港的經驗，是如何與中國和台灣不同。他的說法與鄭樹森頗為相似，他說道：

> 在五、六〇年代香港閱讀魯迅，跟同時期在其他地區閱讀魯迅，一定是非常不同的經驗。台灣讀者因戒嚴令而不能閱讀魯迅；大陸在 49 年後雖有系統地去評論魯迅作品，卻主要是從政治角度和寫實模式入手。我當時在香港亂看書，反而有不同的感受，既無閱讀禁書的悲壯、也不會有閱讀聖經的戰戰兢兢。當然這也因人而異，香港當時和後來也有不少文人，緊貼兩邊的文藝觀點，要高舉批判寫實的大旗，或說魯迅不值得一看。當時香港亦是容許這些極端觀點並存的地方。[123]

梁秉鈞所反映的香港特殊位置更可提供我們理解：面對蘇雪林的論述時台港不同反應的根結原因在於社會環境的差異。但也因為可以自由的閱讀與討論魯迅，讓香港的文化圈更能持平的面對魯迅的多樣化面貌，甚而在沒有版權限制的年代裡，香港的讀書市場蓬勃、盜印風氣盛行，不論是正版或盜版的魯迅的相關作品、評論都是出版社與盜印商的最愛。[124]

總結來說，蘇雪林言論在台港兩地的發酵，將反魯論述隨著國民黨從中國帶向台、港兩地，並且與同樣為南來文人的作家群進行論爭。這一方面可以視為魯迅思想在海外的離散，持續延續著 1940 年代的論爭，也是魯迅思想在海外的演繹，於 1950 年代後發展出異於中國本地的魯迅思想。換言之，蘇雪林

---

123 梁秉鈞，〈我看《故事新編》〉，《香港作家》第 5 期，2001.10，頁 9。

124 詳細參考自：孫立川，〈歷史的斷片——「魯迅與香港」的三個考察〉，《香港作家》第 5 期，2001.10，頁 22。

的反魯歲月並未因為在台或在港的論爭而終結，相反的從她的回憶錄、文學史著作等等的出版與再版，都是反覆、重述反魯論述的權威，並於台港兩地掀起文化共振，造成兩地的文壇不同層面的反響。

第五節　小結

若拉長時間來看，蘇雪林的反魯論述一直以來在文壇傳播，除了前面提及的 1966 年《我論魯迅》外，1983 年出版的《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也延續過去的看法批評魯迅。該書將其人與文分開討論，一面稱讚他的小說〈阿Q正傳〉、〈狂人日記〉，散文《野草》，可又同時批判魯迅的人品。就如她對魯迅的總評：「魯迅文筆固不壞，品格之低連一個起碼做人的資格都夠不上[…]」[125]從文中的表述可以理解，經過了二三十年後，蘇雪林依然對魯迅不友善，並且將其視為比其他左翼文人更為邪惡者。其他左翼文人多半是過於天真的相信了共產主義，但魯迅、郭沫若之流卻是滅於良心的投機份子。[126]這種針對性的言論並未隨著時間的遠逝而減少，對於魯迅的痛恨仍於《我論魯迅》、《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中一目了然。1988 年蘇雪林在《香港月刊》上寫下〈大陸刮起反魯風〉，針對中國的反思魯迅神格化問題作老調重彈的發言，並指控魯迅曾經召妓來做道德批判。

總結來看，蘇雪林由擁魯走向反魯的「兩個問題」、「三種可能」，歸結出是時代轉變與魯迅逝世後的紀念風潮影響所致，以此激化蘇雪林用激烈言行批評魯迅最大的原因。而蘇雪林到了台灣以後，並未因為海峽兩岸的政治實體隔絕而不再言說魯迅、批判魯迅，相反的，為了淨化國府體制內部的「敵人」，

[125]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3）頁 6。
[126] 蘇雪林說道：「我屢次說左傾文人除了魯迅、郭沫若即若干只為謀求個人出路的一些投機份子外，好多文人還是基於良心熱情，並且太天真了，誤把共產主義當作救時良藥，不惜出死力為之效勞。」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3）頁 11。

時時刻刻共產黨的入侵，蘇雪林在言論中常常以「左派」一詞扣異己分子帽子。讓寒爵、劉心皇等人看不下去，趁著蘇雪林發文紀念胡適、批評魯迅時，掀起蘇雪林過去擁魯的文章，雙方激辯是否有反魯與應該如何反魯，最後也在台灣文學場域裡留下少有的魯迅形象論爭。

如果華語語系文學是反對中國文學中心的一種策略，冷戰時期以台灣為首的海外華語文學便是不可忽略的研究面向。延續於華語語系的架構來看，蘇雪林在台的反魯論述可被視為魯迅符碼的演繹與在地化，配合台灣在冷戰體系中的位置，衍伸出異於中國本土所建構的魯迅形象。當然這種演繹不論是兩個中國之爭，或是一中一台的架構，都展現了海峽兩岸不同政治實體的戰略目的，蘇雪林的反魯一方面是承繼自 1949 年之前的思考脈絡，也是符合其後兩岸以至於冷戰體制的政治氛圍所需。

換句話說，魯迅思想在台灣的出現與缺席都帶有濃厚的政治因素，蘇雪林與魯迅的恩怨在魯迅死後才正式展開，隨著政權的飄移在台灣繼續深化。放在華語語系的脈絡中來談，蘇雪林的反魯論述不僅是承繼著過去中國大陸時期的論述模式，也因為台灣社會的左翼勢力伏流，迫使蘇雪林的「反魯症狀」不時的發作，而將她的論述越發的推向偏激的道路。但同時之間他的反魯論述也帶有離散的特性，在頻頻回望中國中心的時，也存在以反魯論述作為反共文化的核心，希望透過逆反的方式，重新取得魯迅評價與中國文化論述的話語權。只不過蘇雪林的論述過於具政治與私人的特性，導致她的說法一直無法獲得太多的共鳴，反倒招致台、港左右派文化人的反彈，在海外的魯迅研究中留下了獨特的位置。

有趣的是，蘇雪林的反魯論述以及與寒爵、劉心皇的論爭，也連帶的影響鄭學稼所再版的《魯迅正傳》內容。鄭學稼在觀看過蘇雪林的反魯論述，及其

造成台港文壇的反彈後，也大幅的刪修原本《魯迅正傳》的內容，除了刪去不必要的情緒文字外，也參考許多書籍、資料增補了許多的內容，使其新版的《正傳》對魯迅形象有較為客觀的描繪，這部分的複雜影響關係我將於下一章中再來討論。

回首過往來路時，這一切是否冥冥之中都有註定。筆者在比對蘇雪林生命史與國民黨政權的命運時，總有著極為巧合的關聯，蘇雪林自從魯迅逝世後一腳踏入反魯事業，這樣的命運似乎與國民黨緊緊相扣。蘇雪林的一生必然與國民黨政權關係密切，隨著時間的流逝、上個世代人的凋零，台灣逐步走向民主化的進程。當然，換個角度來看，蘇雪林在面到 1930 年代共產黨排山倒海的筆戰，迫使了她走出了文學風雅、趣味的藝術層次，甘願為國家、自我陣營作文化界的一枚棋子，對抗共產黨的文化論述。

一如梁實秋對當時候環境的體認，認為「必要時文學必須投身於政治」，為政治作某程度的犧牲：「文學好比菜刀，菜刀本身是用來切菜的，但必要時，菜刀也可以拿來殺人。文學本身是描寫人生、刻劃人生，但必要時也可用來配合推展文藝政策，為政治而服務。」[127]梁的說法並非特例，蘇雪林也與之相同。更精確的來說，他們認為文學可以為政治來服務，但是政治不能箝制文學的言論與創作自由。也因此可以看到，蘇雪林的散文往往充滿清新、飄逸，但是對於政治卻依然如此執著，在看似矛盾的意識形態背後，其實是存在著一套屬於自由主義者內在的思考邏輯。除此之外，夏志清更是在文學史中強調文學的自主性，甚而司馬長風更認為任何政治都不應該干預文學創作，但他們在政治、文化評論時又是堅定的「反共」立場，其所展現的是，看似矛盾的政治與非政治文學的二元對立，但實際上存在一套自圓其說的敘事邏輯。

[127] 梁實秋，《文學因緣》（台北：文星出版社），頁 138。

第三章　「人」的魯迅：曹聚仁、鄭學稼的魯迅傳記書寫

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華蓋集　戰士和蒼蠅》

第一節　台港文化共振下「人」的魯迅論爭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說：「傳記是不敢具名的小說」，這句話饒富興味的成為真實與虛構辯證中最微妙的地方。怎樣是真實的魯迅形象，一直為當代討論魯迅最熱門的話題。現今汗牛充棟的討論成果裡，讓人們更加感到好似在迷霧之中認識魯迅。儘管「人」的魯迅形象呼聲取代了革命、戰鬥的魯迅，但如何才是描述真實的魯迅形象，眾人之間的分歧還是很大。在 1936 年魯迅逝世後，不論是中、港、台，或是國民黨、共產黨，許多文化人、政治人物會因為自身的角度詮釋魯迅，使得魯迅不只是過去的魯迅，更是現在的魯迅、當代的魯迅。但隨著左、右翼兩大陣營的和解，魯迅的形象也不再走向極端的天秤兩端，還給了魯迅一個較為合理的樣貌。但這樣的歸還後，魯迅真的已經走向人間了嗎？又或只是符合現今政治條件重塑魯迅？這個問題到現今依然值得我們繼續討論。[128]

根據統計，時至今日的魯迅傳記多達四十多部，累積了驚人的成果，而鄭學稼《魯迅正傳》[129]是中國文壇裡的最早出版的魯迅傳記，與歐陽凡海的《魯迅的書》幾乎是同時。不同之處在於，《魯迅正傳》通篇內容以批評魯迅為主，

[128] 現今的研究仍然無法持平或者較為客觀的看待，這一段時期的反魯論述，雖不若過往毛澤東時期的神格化魯迅，但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神聖不可動搖的地位至今依然沒有改變。而與他論爭的論敵們，至今也必然不或研究者的青睞，而在文壇不具客觀的評價。像是房向東的《魯迅與他的論敵》、《魯迅是非》，內容中明顯的偏袒魯迅一方而無客觀的研究分析，這是相當可惜的事情。

[129] 以下將《魯迅正傳》簡稱《正傳》。

使其在魯迅學上有重要的解讀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曹聚仁的《魯迅評傳》由於他本人與魯迅的交情深厚，加上其寫作、出版地點在香港有一定的言論空間，所以該書的問世被理解為當時候最為客觀、中肯的表現魯迅形象的傳記。

鄭學稼的《魯迅正傳》於 1942 年 3 月在重慶首次出版，之後在江西、廣東都有翻印的版本，到了 1953 年在香港亞洲出版社又再版了一次，最後在 1978 年台北的時報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修正過後的版本。從出版地來看，《魯迅正傳》的流通橫跨中、港、台三地，是反魯論述中最具系統、影響也最廣泛的一本。至於曹聚仁的《魯迅評傳》雖寫於香港，但早期在上海《申報》發表文章時，魯迅與曹聚仁就彼此有所往來，並也已有為魯迅作傳的準備。他的一生寫過多部與魯迅相關的作品、資料整理，像是：《魯迅手冊》（1948）、《魯迅評傳》（1956）、《魯迅年譜》（1967），與鄭學稼一樣都是海外重要的魯迅評論家。而這兩部海外最具代表性的魯迅傳記，在兩人不同的意識形態以及台、港兩地不同的文化脈絡下，於傳記中展演出具爭論的魯迅形象。

在 1950 年代以後，隨著冷戰體制的建制，鄭學稼的《正傳》透過具美國資金援助的香港亞洲出版社重新出版，並在盜版、印刷互通的情況下將影響力拓及兩地。[130]而《正傳》出版的同一時間，曹聚仁在香港也正與左、右翼勢力論戰，繼續堅持他的中間偏左的烏鴉精神路線。曹聚仁眼見國共兩黨政治力干預下的魯迅傳記的一一出版，也讓原本就有在構思為魯迅作傳的念頭付諸實踐。一如他在「引言」所提到的，他的傳記所欲對抗的是，坊間所流傳屬於國、共兩黨意識形態的魯迅傳記，希望在香港出版不一樣的魯迅傳記。他說：「坊間，

[130] 鄭學稼這樣說道：「筆者寫譯並出版了五十部書，銷路最好的是《魯迅正傳》。它脫稿於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重慶黃桷鎮附近的農村井潭，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勝利出版社在重慶初版，不久之後江西、廣東都有翻印版。一九五三年一月香港亞洲出版社重排第一版，以後台北有未得筆者同意的翻印版，到底翻印幾次，無從查考。」鄭學稼，〈增訂版序〉，《魯迅正傳》（台北：時報，1978）頁 1。

只有王 XX 的魯迅傳，那簡直是一團草，不成東西，而鄭 XX 的魯迅正傳，更是胡鬧，不僅荒唐，也侮辱了讀者。」[131]這裡的「王 XX 的魯迅傳」指的是王士菁於 1948 年在上海出版的《魯迅傳》，在當時因諸多外在條件的限制，也使這本《魯迅傳》被曹聚仁形容為一團草。[132]至於「鄭 XX」當然是指鄭學稼，曹聚仁以更為嚴厲的話語批評《正傳》是一部胡鬧的傳記著作。也因為這樣不左不右的身分，讓曹聚仁飽受左派與右派的雙面夾擊，在香港生活時不斷與人論爭。

曹聚仁初到香港時，因高度讚賞新中國的社會環境的言論，認為共產黨比國民黨更讓人民信任，此話讓右派文人大為光火開始圍剿他。除了馬兒、聶紫秋、天涯、松文等人外，國民黨所屬的報紙也加入攻擊的行列，這一場圍剿行動不僅於香港而已，在台灣的報紙也同時進行批判曹聚仁的運動。同時左派文人也與曹之間有所摩擦，因為他將共產黨政府與蔣經國的贛南政府比較，因而聶紺弩、馮英子、胡希明等人認為曹聚仁散播毒素、立場搖擺，在《文匯報》、《周末報》等報紙專欄攻擊他。根據當時的紀錄，在短短 20 個月中，罵曹的文章加起來有 800 篇之多，從這數字可以看到曹聚仁在文化圈的份量，也了解到在國共對峙的緊張情勢中，左、右派作家們是如何焦慮、鮮明的為自我陣營意識形態作辯護。[133]

雖說曹聚仁在港受到左、右兩派的夾擊，但這並未消磨他力求客觀撰寫《魯迅評傳》的想法。在此著作發表前，曹聚仁多年來蒐集、整理魯迅的相關資料，並編撰過《魯迅手冊》，一直到了香港才開始動筆為魯迅作傳。這裡有個值得

131 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新文化，1973）頁 3。

132 如同張夢陽所形容的：「由於時代環境的限制和作者的年輕，學力的不足，這本魯迅傳也存在明顯的不足。主要是引證過多，引述魯迅的原話過多，顯得冗長繁瑣。」張夢陽，《魯迅學在中國在東亞》（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頁 356。

133 參考自李偉，《曹聚仁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 275。李勇：〈在香港為繞曹聚仁的兩場論戰〉，收錄於《曹聚仁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09）。

討論的問題：從魯迅生前就說要為其作傳的曹聚仁，卻到魯迅逝世二十年才出版了《魯迅評傳》，究竟這長達二十多年的等待心境是有何轉折變化，又或礙於何種原因使他不動筆撰寫魯迅傳記呢？他自己提到：

> 我也期待了許廣平、許壽裳、孫伏園諸先生的《魯迅傳》出來，尤其期待周作人所寫的。誰知忽忽二十年，依然沒有影子。坊間，只有王士菁的《魯迅傳》，那簡直是一團草，不成東西，而鄭學稼的《魯迅正傳》，更是胡鬧，不僅侮辱魯迅，也侮辱讀者。因此，我要試寫這一部《魯迅評傳》——不是魯迅所預料的傳記。[134]

在曹的認知裡，魯迅的傳記應該交給他身邊最親近的人，長期觀察他的人來為他作傳，像是同窗好友許壽裳、妻子兼學生許廣平、學生孫伏園、曾經是戰友也是親兄弟的周作人都是作傳的人選。遺憾的是這些人並未有為魯迅作傳的打算，都「沒有膽量」撰寫魯迅傳記，為魯迅留下「真實」的身影，反倒是王士菁、鄭學稼等人寫出了顛倒是非黑白的文章，讓曹聚仁決定自己寫魯迅傳記。[135]而這樣的工作最終也只落到長期關注魯迅的曹聚仁頭上，成為他赴港後的重要使命，1956 年《魯迅評傳》的出版，終於實現了他所謂人性化的魯迅形象描繪，在那國共海峽戰爭激烈的對峙情勢中，為魯迅留下可受研究與討論的「真實」形象。在曹氏的眼中，他們的傳記都是服膺於政黨為政治而服務，將魯迅作為攻擊他人、抹黑他人、指責他人的工具，而曹聚仁想把魯迅「真實面孔」擺在天下人面前，表現出他所認為的真實形象。

但由於在中日戰爭的政治氛圍以及其後為了反抗專制的國民黨統治階級，塑造民族英雄往往可以號召更多群眾，動員出龐大的社會力量。也因為如此，描述有血有肉、有優點和缺陷的魯迅形象，理性的認識英雄的光明與黑暗面，

---

134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3。

135 曹聚仁提道：「而說魯迅的，也只能讓聶紺弩、王士菁、鄭學稼顛倒黑白，亂說一陣了；我要把真實的事實，魯迅的真面孔，擺在天下後世的人的面前。（那些接近魯迅的人，都已沒有膽量把真實的魯迅說出來。）」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42。

是無助於改革與戰鬥，這樣的聲音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裡是不被重視的少數言論。《魯迅評傳》序言的一段往往被人提及文字，可以視作曹聚仁書寫魯迅的重要立場，他在〈引言〉的一開頭這樣陳述的：

> 1933 年冬天的一個晚上，魯迅先生在我的家中吃晚飯，一直談到深夜。他是善於談話的，忽然在一串故事中，問了我一句：「曹先生，你是不是在準備材料替我寫傳記？」他正看到我書架上有一堆關於他的著作和史料。我說，我知道我並不是一個適當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寫法。我想與其把你寫成為一個「神」，不如寫成一個「人」好。[136]

曹聚仁提出如此的看法，而不是將魯迅視為共產黨的思想領袖人物，或是將其看成是中共同路人的匪類作家，在當時候可謂異類。但面對時代的洪流，曹聚仁深切的感受到想要形構真實的魯迅之艱難，除了史料文件的不齊全（當時他人已到香港）外，還要面對左、右兩派的人建構「擦脂抹粉」的魯迅形象，以及歷史的一去不回返的焦慮。[137]當然這一段與魯迅的見面談及寫其傳記的對話，並沒有其他證據可以佐證魯迅是否認可曹聚仁的說法，是不是曹聚仁為了強調自身傳記的重要意義因而自行神化其傳奇色彩。但也因為曹聚仁與魯迅曾經交往的經驗，使其傳記書寫給人更多的真實性的想像。[138]

「真實」的記憶與歷史早已在時間的一去不復返中消失，同樣的，王士菁與鄭學稼也認為自己的傳記才是表現魯迅的真實樣貌，所謂的「真實」似乎在不同立場、意識形態的前提下成為眾說紛紜。回到鄭、曹論爭的脈絡，鄭學稼面

---

[136]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

[137] 曹聚仁說道：「而今，我恍然明白了，我若不趕快把所知道的寫起來，那就等於一個泡沫，在轉眼之間，就消失的乾乾淨淨了。而說魯迅的，也只能讓聶ｘｘ、王ｘｘ、鄭ｘｘ之流去顛倒黑白，亂說一陣了；我要把真實的事情，魯迅的真面孔，擺在天下後世的人的面前。」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43。當然，也有評論者認為，曹聚仁這一段說法只是為了凸顯其傳記的正統地位，而且是有別於兩黨所把持的歷史。其這段說法因為沒有其他人證，所以極為有可能是自己所杜撰出來的。但無論如何，曹聚仁希望將魯迅寫成人，也刻意將魯迅表述為有「缺陷」的人，成為該傳記的最大特色。

[138] 極為有趣的是，魯迅曾經在給李霽野的書信中提及，他自己是不願意寫自傳，也不希望其他人為其作傳，自己只是個平常人，不需要立傳記。這樣的言論對照曹聚仁的說法，其實這一段軼事是否為真，更增添後人的想像與詮釋了。

對曹聚仁大力抨擊其書寫動機時，他也在再版《正傳》時的〈增訂版序〉回應曹聚仁的批評：

> 聶紺弩和王士菁對魯迅「顛倒」了什麼，不是我的事。我的初版《魯迅正傳》，只力說魯迅不是「革命家」，不是「革命的青年導師」，不是「前進的中國思想家」，與曹聚仁的《魯迅評傳》若干觀點並無不同。如果當時我對魯迅說得不完全，那由於我未閱全部魯迅的著作。它的基本觀點，並沒有與魯迅的真實生活相反，更未曾「顛倒黑白」。我所以要改增舊版，為著閱讀二十卷版的《魯迅全集》、十卷版的《魯迅全集》、兩本《魯迅書簡》、兩本《魯迅日記》，和魯迅夫人許景宋，魯迅的好友學生們著作，有更多的資料，可供我更客觀地評論魯迅。[139]

鄭的增訂版大幅刪修了內容，也是在回應曹聚仁的批評。這亦顯示了鄭學稼新版的《正傳》之所以刪修多處批評魯迅言論，可能是為了化解外界對其「不客觀」的刻板印象，因而在事隔多年之後試圖利用再版的機會重新解釋自己如何論述魯迅。有意思的是，兩人在對魯迅具有如何的形象爭得你死我活時，鄭、曹兩人同時也認為自己所撰寫的魯迅傳記只是為了呈現客觀的魯迅面容，而沒有任何神化、汙名化的企圖。這所顯示的是所謂「真實」的虛妄性，其遭受到個人意識形態的干擾下，沒有根本本真的魯迅形象存在。

進一步來說，筆者在本論文並非要考證鄭、曹兩人的魯迅傳記誰比較符合真實，如此的溯源不但無助於解決魯迅形象之爭，更可能忽略了冷戰體制下台、港兩地的特殊位置。是故，筆者將於下面分別探討鄭、曹兩人的魯迅傳記，並著重於分析「怎麼寫」、「寫甚麼」，透過個人書寫與時代的變化來探討兩者之間的關聯。

[139] 鄭學稼，《魯迅正傳》，頁 4。

第二節　敘事者的權力：鄭學稼《魯迅正傳》中的魯迅形象再現

早在魯迅剛去世不久，鄭學稼便用小說形式寫過〈兩個高爾基不愉快的會見〉，在小說中讓魯迅與高爾基互相謾罵攻擊一番，這篇創作可算是鄭最早的反魯論述。而《魯迅正傳》則是鄭的第一本的反魯傳記，內容具系統且流通於中、港、台三地，而他所建構的魯迅形象自 1953 年後更加影響到台、港以及其它自由陣營的讀者。《正傳》除了可堪稱是反魯的經典代表作外，其傳播的過程並非單純的再現了魯迅形象而已，更包含了反共陣營的意識形態。此外，鄭氏在「反共」、「反魯」的大架構下，也藉由刪修《正傳》的內容來修正自己的論述軸心，將不同版本的《正傳》呈現出「單音複調」[140]的反魯論述。換句話說，鄭學稼即便在建構魯迅形象上沒有太多的差異，以一貫的「反魯」為基本立場，但在不同版本之間的《正傳》卻也呈現了鄭在不同時期的論述意圖，這一點我們會在後面說明。而用「正傳」來撰寫魯迅本來就有貶意之意，一如魯迅為阿 Q 寫傳記一般，想來想去不知道用甚麼名目為其寫傳，最後就將就用「正傳」一詞，有意將魯迅與自己的小說人物阿 Q 相呼應，但實際是描寫魯迅真實生活的醜陋面貌。[141]

如同前一章節所討論的蘇雪林，在同時期的鄭學稼撰寫《正傳》最主要目的也同樣在於面對魯迅逝世後的地位被神化的問題，認為魯迅與其作品不應獲得如此高的評價，因此撰寫此書試圖打破共產黨將魯迅經典化。[142]我們若從該

---

[140] 所謂單音複調是指曹聚仁的《魯迅評傳》雖兩種版本內容上有極大差異，但不變的是對魯迅的批評態度，形成單音（反魯）複調（不同版本）。

[141] 魯迅在《阿 Q 正傳》裡為阿 Q 立傳時是這樣描述的：「總而言之，這一篇也便是「本傳」，但從我的文章著想，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潛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閒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具套話裡，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即使與古人所撰《書法正傳》的「正傳」字面上很相混，也顧不得了。」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512。

[142] 鄭學稼在《魯迅正傳》1978 年時報版的〈增訂版序〉說道：「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受中共指揮和影響的青年有『魯迅熱』。我反抗這股潮流，讀第一版『魯迅全集』後，決定在井潭的草舍菜油燈下寫完兩本書：『魯迅正傳』和『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鄭學稼，〈增訂版序〉，《魯迅正傳》，頁 2。

書全文脈絡來看，貫穿全書的魯迅形象描繪基本上著力於描寫兩個部分：第一，魯迅具有投機的性格，在不同的時期會為了依附政權而作思想上的調整。第二、魯迅不是革命家、不是革命的青年導師、不是前進的中國思想家，而單單僅是一位文學家。從這兩點我們可以導引出鄭學稼在建構魯迅的形象時，其目的是將論述的焦點放在魯迅個人性格、生平，以及魯迅的文學作品兩個部分。不但希望在文學上打破魯迅是中國五四運動代表人物的經典地位，亦希望透過其個人的言行舉止、生命經歷，以挖掘魯迅的「醜陋事蹟」，有意建構異於共產黨外的「真實形象」。[143]

必須說明的是，最早提出應持平的討論魯迅功過的並非曹聚仁而是陳獨秀，他在逝世一周年時的紀念文就說道，不想把魯迅捧為神，只想把它當成人來描述，有文學天才、獨立思想的作家，而不會趨附於任何政黨。[144]當然，在 1930 年代因托派身分以及其他相關因素逐漸被共產黨邊緣的陳獨秀，在此對魯迅形象所提出的諍言也必然沒有獲得任何的迴響，不過一直與陳獨秀保持交往的鄭學稼，也在此層面上繼承了反對神化、戰鬥化，回歸真實魯迅形象的想法，故在魯迅熱潮之中出版了如此格格不入的反魯傳記。

《正傳》大致來說將魯迅的一生分作五個時期，從這分期可以看到鄭學稼撰寫《魯迅正傳》的架構，將魯迅的生平事蹟以其行為與言論來拼湊，並分成下面五個時期：「求學時期」、「回中國擔任公職時期」、「五四戰鬥精神時期」、「與左、右翼文化人士論爭時期」、「領導左聯時期」五個時期分章論述。《正傳》將魯迅描繪為一位具有投機性格的知識份子，鄭學稼以中國在二十世紀初的時代變動作為軸線，與其生平背景比較，試圖證明魯迅在時代洪流變化並非站在前線的改革者，每一次中國社會的變動，魯迅總是站在搖擺不定、投機的

[143] 參考自：葛濤，〈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國新文化的方向—抗日戰爭時期的魯迅文化史（1937-1945）〉，《魯迅文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7）。
[144] 陳獨秀，〈我對於魯迅的認識〉，《宇宙風》第 52 期，1937.11.21。

位置，藉由動亂的機會取得最有利的先機。[145]鄭學稼相當巧妙的將歷史以扁平化，比較 1930 年代以後左傾的魯迅與五四運動時期的魯迅，藉此批判魯迅在擔任教育部僉事時並未參加社會運動，一方面批評共產黨所形塑的思想家、革命家魯迅是具有政治動機的陰謀，另一方面將魯迅塑造為在反帝、反封建社會運動缺席的怯懦份子，當中國的知識份子正為社會運動盡自己的心力時，他僅是安逸的留在公家機關擔任教育部僉事。[146]建構如此的形象其實具有一體兩面的功效，不但是批判魯迅在當時社會運動的缺席，其更大的意圖是解構共產黨所製造的革命家魯迅的形象。

如此的論述具有雙面刃的效用，不但透過批評魯迅的怯懦性格來解構共產黨神格化的魯迅形象，也是將已經左傾的魯迅排除在中華民國建國以及五四文化運動論述之外，以排他的方式建構國民黨在中國「道統」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國民黨政權為了保護其五四運動話語權的代表，則必須清除魯迅對五四文化運動的貢獻，藉由打擊魯迅也同時消除共產黨在文化政策上的蠶食鯨吞。國民黨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長期以來獲得「民族」論述的話語權，而為了恢復中華文化大一統的建國大業，也令其支持者在民族主義中默許了國民黨的專制威權統治。[147]然而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啟動侵華戰爭，其後在上海、華北等地都有小規模的侵略事件，但卻未見國民黨中央政府未對此有積極的回應，反倒陷溺於國內的兩黨戰爭，最終在 1936 年周揚等人所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奪取國民黨的「民族」論述的話語權後，才在 1937 年西安事變與輿論壓力下停止剿共一致對外。

---

145 鄭學稼說道：「周樹人先生到以魯迅筆名『馳名』全國時，對於『五四』大事，只記著童子軍式的報童，至於它的歷史意義等等，卻未見提及。無需說：那些『示威』的學生運動，站在教育部僉事的立場看去，是可憎是可恨，怎值得加以探究？」鄭學稼，《魯迅正傳》，頁 38。

146 鄭學稼又說道：「超過『不惑』之年的周氏，還未曾成為一個革命者，只是北平官僚群中的一員。我們十分明白，在那樣腐化的北京官場中，周樹人能混了那麼久的時間，是不容易的。」鄭學稼，《魯迅正傳》（台北：時報，1978）頁 44。

147 詳細可參考：向芬，〈軍政時期國民黨的新聞傳播制度〉，《國民黨新聞傳播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我們若以此社會脈絡來理解鄭學稼的魯迅傳記，就不難理解為何他必須在某些部份否定魯迅的貢獻，反對將魯迅視作具社會主義路線的青年導師、革命家形象，透過傳書寫時與當時候共產黨的論述進行對話：

> 他既未曾為任何青年的『導師』，他也不是曾『革』了任何反動者的『命』的革命者。他的官僚生活，更不像流浪的高爾基。就是他的著作，也不是對甚麼無產階級表同情或表現煽動的作用。他就是這麼一種人。目前若干人們，對他的過大恭維，和他們的生命史有重大的偏差，只掀露著一個弱點，用死人嚇活者。或且換句話說：利用死者達到自己政治上的陰謀。[148]

此外，鄭學稼也賦予了魯迅投機性格的形象，認為他反對「民族主義文學」的統一陣線，主要目的是希望獲得青年朋友的支持，在動亂之中搶得先機。所以給予魯迅「浪子之王」的稱號來反諷他，認為他的立場搖擺是具政治上的陰謀。他又說道：

> 他們只希望中國與帝國主義共存共榮（也許他們的主觀並不如此）地分為幾十個國家。那麼多的國家，需要那樣多的元首、官吏、參謀，而他們就不愁沒有一席。歷史走到這一地步，事後雖然可以引起我們的悲嘆，但當時卻不覺著它。他們有些地方和巴爾札克的名作「人間喜劇」內的「浪子之王」相肖似。[149]

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中所形容的浪子是具有知識的流氓，並且失業成為無業遊民，在法國形成特殊的階級。在《正傳》的脈絡中浪子所指涉的就是創造社、太陽社的左翼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是具知識的流氓，不斷的希望透過破壞、動亂來從中獲得好處。而在這群浪子之中魯迅的地位最高，是帶領他們的領袖，因而在《正傳》中給予他「浪子之王」的稱號。進一步來說，鄭學稼認為魯迅希望透過國家分裂而擁有較多的工作機會，不但是反對「民族主義文學」，也

[148] 鄭學稼，《魯迅正傳》，頁 54。
[149] 鄭學稼，《魯迅正傳》，頁 256。

藉由左傾的論述取得共產黨「革命導師」的美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投機份子。[150]

而鄭學稼更進一步認為，「浪子之王」若要取得地位除了要其他浪子加入支持外，煽動一般百姓的情緒也是慣用的伎倆，像是推動以拉丁文取代漢字就是一個例子。魯迅在 1933 年左右發表了一系列「漢字拉丁化」，是希望能以重新推動中國的文字教育，以拉丁文來拼音讓百姓大眾能脫離文盲。但在鄭學稼看來，這說法背後有政治意圖，是希望拉攏大眾的支持，而不見得是真的想幫助民眾。他對這樣的說提出這樣的批評，認為魯迅提倡「漢字拉丁化」是忘本的行為，為了遵循中共的路線所提出的荒謬看法：

> 如果漢字全『拉丁化』，實行五十年，沒有一個中國人，認得漢字，那祖宗的著作，那祖宗的著作不是等於付諸一炬嗎？沒有遺傳祖先文化的民族，能成為一個民族嗎？這不等於把嬰兒與汙水一同潑出去？！由於民族為統一，所以沒有『國語』，但是靠著方塊字，使我們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政府一張佈告能動員全國國民。[151]

這裡將魯迅建構為一位放棄中國文化傳統，不擁護中華民族精神的形象，認為他只因共產黨的政策中要普及一般大眾識字、閱讀的權利，因而放棄自身的文化遺產，如此的作法是「把嬰兒與汙水一同潑出去」一樣的荒謬。鄭學稼以「反傳統」來定位魯迅的思想，所以會認為魯迅想把傳統文化中優良的部分與封建文化餘毒一同屏棄，這說法其實是經由「大眾文藝」的角度將共產黨與魯迅串連起來了，繼而批評其雜文創作是依附共產黨的鬥爭工具。除此之外，鄭學稼也在文中反諷魯迅過著布爾喬亞生活，卻寫社會主義戰鬥文字，凸顯魯迅言行不一的荒謬，來說明魯迅是符合「浪子之王」的稱號的文氓。[152]

---

[150] 鄭學稼，〈浪子之王〉，《魯迅正傳》（台北：時報 1978）。
[151] 鄭學稼，《魯迅正傳》，頁 344。
[152] 鄭學稼是這樣描述魯迅生活與文字是不同的：「這等於說：魯迅不是文學家、而是政治鬥爭者——用共產黨的形容詞，該說是『革命家』。當然他不是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家，

從上面的說明可了解，鄭氏所建構的魯迅是具投機、怯弱、文氓等性格的形象，是站在「反共」的立場描繪魯迅形象，當共產黨神格化魯迅時，鄭氏則用批判魯迅的角度將他描述成醜陋的面貌。這種作法與蘇雪林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在社會既定的擁魯（擁共）／反魯（反共）的基礎上建構反魯論述，其所欲針對的更大部分在於共產黨的神格化魯迅，而魯迅本人真實形象為何，對他來說倒是其次的問題。不同的地方在於，蘇雪林一生都持極端的反魯論述立場，不論是中國大陸時期或是到了台灣之後立場都沒有動搖過，相反的，鄭學稼的反魯論述是具有變化性的，《正傳》的 1942 年版本與 1978 年版本更動在意識形態上也有所修正，下面我們將繼續解釋這問題。

第三節　反共政策下《魯迅正傳》的版本差異

鄭學稼的《魯迅正傳》有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 1942 年 3 月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到了 1953 年在香港亞洲出版社又再版；另一個修正過後的版本，是 1978 年台北的時報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這兩個版本在建構魯迅形象上差異並沒有太大，但實際的內容卻有大幅度的刪修與改正。鄭學稼究竟在書中刪減了甚麼，又修改了些甚麼內容？對此，他在〈增訂版序〉中提及新舊版本之間的差別：

> 這新版與舊版有下述之不同之點：第一、刪去諷刺魯迅的話；第二、盡量用可靠的紀錄，敘述魯迅的一生；第三、詳述魯迅思想的演變，並因之與創造社、新月派、民族主義派、第三種人論戰、和評言志派。第四、晚年反抗「奴隸總管」並不滿「國防文學」。第五、在七個附錄中，除第一版的「兩個高爾基不愉快的會見」（那是在抗戰時期寫的雜感），其他六篇，都各有意義…[153]

他曾自供對於唯物史觀是門外漢。他也不是活躍於戰場的『革命家』，而是坐在瀰漫著煙霧的書齋吐露他的『雜感』。」鄭學稼，《魯迅正傳》，頁 348。

[153] 鄭學稼，《魯迅正傳》，頁 4。

新版的《正傳》中不若以往一樣有太多情緒性的用語，並且有更多的參考資料作為論述的引證。舉例來說，因為魯迅與內山完造的接觸，在舊版的《正傳》中魯迅被指為是漢奸，新版的則大幅度的修正這樣的明確指涉，僅以「浪子之王」的稱號質疑魯迅是否希望中國一直保持動亂、分裂的狀態，好讓文氓可以在動亂中取得機會。

另外，除了他自己提及在新版《正傳》有參考《魯迅全集》以及相關作品集之外，像是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曹聚仁《魯迅評傳》、李何林《中國文藝論戰集》、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喬峰（周建人）《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等等都是新加入的參考材料。而新版《正傳》在參考完這一些資料後重新修訂內容，並加上了大量且詳實的註釋，以更為公正、客觀的形式出版新版《魯迅正傳》。若進一步比較兩個版本的章節目錄，可以發現鄭學稼增加的篇幅非常多：

（一）、《魯迅正傳》重慶（1942）、香港（1953）：

一、假洋鬼子　二、十四年僉事　三、吶喊　四、阿Q正傳　五、不准革命　六、浪子之王　七、革文學的命　八、傳贊

（二）、《魯迅正傳》台北（1978）：

一、假洋鬼子　二、十四年僉事　三、吶喊　四、阿Q正傳　五、與「正人君子」的論戰　六、廈大與廣大　七、不准革命　八、思想的武裝　九、與新月派論戰　十、浪子之王　十一、反民族主義文學　十二、與第三種人論戰　十三、評言志派文學　十四、「自由談」的插曲　十五、漢字拉丁化和雜感　十六、朋友　十七、叛徒　十八、同志　十九、反抗奴隸總管　二十、關於國防文學論爭　二十一、病死　二十二、蓋棺論定

附錄：一、魯迅的親屬　二、魯迅的收錄　三、魯迅的書帳　四、魯迅與蔡元

培　五、魯迅與顧頡剛　六、魯迅與內山完造　七、兩個高爾基不愉快的會見

這樣的改變是因應 1940 年代與 1970 年代的不同時代氛圍，所以鄭學稼也會挪用魯迅符碼來做當時代政治性的目的。是故，我們可以說，舊版的《正傳》側重於描寫魯迅的形象將焦點聚焦於個人上，而新版則大量增添文學史的內容，藉由魯迅作為探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側面，重建 1920 到 1940 年代的中國文學場域。

進一步來說，鄭學稼在撰寫舊版的《正傳》時所面臨的是共產黨取得魯迅詮釋權的時代，而鄭氏所欲解構的正是被經典化的魯迅。在書中將魯迅建構為具有投機性格、漢奸、浪子之王等形象，這樣的「詆毀」是另一種形式的以自身利益出發、意識形態凌駕於一切的建構魯迅形象，使得魯迅符碼成為當時相互攻擊的工具。

到了新版《正傳》時因經過大量的修改，內容不再只是描寫魯迅個人，而是將視角擴大討論當時代的中國文壇。1955 年「胡風集團」遭到毛澤東整肅的消息，在國民黨政權的特許下在台灣受到大肆報導。胡風作為魯迅的弟子，可說是魯迅晚年之後的代言人，他的被整肅在台灣的右翼作家的眼中，亦代表著魯迅路線遭到共產黨的鬥爭與圍剿。這樣歷史的發展影響了台灣作家探討魯迅的視角，由過去將其視為共產黨的同路人、投機者，轉向以誤入歧途的說法來詮釋魯迅。而鄭學稼在新版的《魯迅正傳》也一改過去強力批判魯迅人格的作法，而是藉由魯迅來批判共產黨，反倒賦予魯迅相較於過去更為「中肯」的說法。

當然，這樣的轉變除了是時空環境的變化所導致外，舊版《正傳》在中國與香港出版後所受到左派的攻擊與反彈，甚至連溫和左派的曹聚仁都在《魯迅

評傳》中強力抨擊，這些輿論都多少迫使鄭學稼修正過往論述，刪改批評魯迅情緒性的文字增補許多相關文獻和資料。以場域的概念來說，《正傳》的修訂也是在訊息流通和接收的編碼與解碼過程，透過讀者（接收端）的反饋，重新影響了訊息的「再生產」。

曹聚仁在文章批判鄭學稼就是明顯的例子，也都是影響了鄭學稼在 1978 年時報版本出版時內容的修正。他批評鄭的《正傳》是說其內容「更是胡鬧，不僅汙辱了魯迅，也汙辱了讀者。」[154]、「顛倒黑白、亂說一陣」[155]，而鄭也在新版的《正傳》回應：「我的初版《魯迅正傳》〔…〕，與曹聚仁的《魯迅評傳》若干觀點並無不同。如果當時我對魯迅說得不完全，那由於我未閱全部魯迅的著作。它的基本觀點，並沒有與魯迅的真實生活相反，更未曾「顛倒黑白」。」[156]由此可以看到曹聚仁的批評，以及《魯迅評傳》之內容對鄭學稼新版《正傳》的影響。這些透過讀者反饋 → 再生產的文字，除保留了原有作者的意識形態外，在內容更加貼近作者所設定的我群民意的趨向，並且接近時代的需要。鄭之所以會認為自己未有「顛倒黑白」，這種想像不見得是有意識的，更多時候就是因為自我意識內化與國家體制結合，將國家政權利益前置於對魯迅形象的想像。借用法農（Fanon, Franz）的話來說：

> 政治上教育群眾即是讓每個國民意識到國家的整體乃是個事實，也就是讓國家的歷史成為每個國民個人經驗的一部分[…]個人經驗不再只停留於個人層面，有限而萎縮；正因為個人的經驗乃是國家的並且是國家存在的一環，個人經驗因而可以展開成為國家、乃至於世界的真理。[157]

這種將個人與國家的結合，是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塑造而成，而國家的利益就會被置於前景，甚而優先於個人之上，形成個人即是國家、國家即是個人

154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3。
155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42。
156 鄭學稼，《魯迅正傳》，頁 4。
157 Fanon, Fran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Penguin: Harmondsworth.

的密切縫合。不論是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論述、反共論述，或是共產黨的國防文學論述都是如此，希望透過召喚個人對國家情感的奉獻，來達到戰爭、政黨對立、國家存亡的精神、肉體的最大動員能量。

如同趙彥寧在〈國族想像的權力邏輯：試論五０年代流亡主體、公領域與現代性之間的可能關係〉一文，解釋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取得流亡來台的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甚至成為國民黨政權下的人民信仰、依賴的領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反共的戰爭、戰亂使得軍事化、集體化的社會被強烈提出。讓當時人民將個人之間的差異特性隱蔽起來，並以戰爭優先作為服膺的最高原則。此外，由於美國的軍事援助使得國府在軍事武器上極具現代化，連帶使當時在台的人民感受到蔣介石政權是現代化的與資本主義化的。換句話說，經由軍事武器的現代化讓國民黨政權與現代化、資本主義化約等號，也更加強了蔣介石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鞏固了領導中心的論述與權力。[158]也因為如此，國民黨政權所積極推動的「反共」政策便容易被一般民眾所接受，這種意識型態在各種領域階層深植人心，在國家與大眾兩階層的配合與意識的相互滲透下，更加強鞏固了國民黨政權的意識型態，並建構國民黨政權為中國的正統性。人民也會以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為優先考量，國民黨政權對共產黨赤化台灣的焦慮，同樣也成為當時台灣人民的焦慮。

直到海峽兩岸社會局勢逐漸穩定後，國民黨政權修改過去「不談論」魯迅與左翼文學家的策略，開始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進行重建。最早有王平陵於 1952 年在《中國文藝》上連載〈三十年代文壇滄桑錄〉，以右翼的觀點重現中國左右翼文學論爭的現代文學史，可謂是台灣最早出現描述國共鬥爭下文壇情形的論著。之後更有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1971）、尹雪曼《中華民國

[158] 趙彥寧，〈國族想像的權力邏輯：試論五０年代流亡主體、公領域與現代性之間的可能關係〉，《戴著草帽去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台北：巨流，2001）。

文藝史》（1972）等文學史相關著作，成為當時台灣了解五四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重要來源。而鄭學稼在 1978 年台北出版的《正傳》也有相同的功用，除了是在建構魯迅形象外，也是希望透過魯迅的生平來建構中國現代文學史。換句話說，新版《魯迅正傳》持了在內容上較為持平呈現魯迅形象，所側重的也不再是魯迅個人而已，而是 1920 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發展，亦即以魯迅作為探討的一個側面，來觀看當時代中國文壇的發展變化。

如此的「敘史」情結是國民黨政權正視面對失去大陸河山創傷的開始，他們開始了解到唯有以說話來建構起自己的「歷史」的方式，才能忘卻失去歷史的傷痛面對未來。當然，是否真能走過傷痛是另一層次的問題，蘇雪林終身無法跨越傷痕就是一例。但鄭學稼的情況與蘇雪林有所不同，從對抗共產黨論述到後來建構屬於中華民國的歷史觀，其目的的改變也讓魯迅形象有所挪移，從過去的反對一切的魯迅，將魯迅與共產黨視為一體來敘述，到後來更多層面藉由魯迅來批評共產黨，其所敘述方式的改變背後展現了作者的意圖。所以我們可以將這種不斷敘史的動作、行為視為是種儀式化的過程，也就是說，透過書寫過去的歷史也是在創造歷史，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人民對於政權遺落的集體恐懼，是藉由書寫來取得安置，賦予自己中華民族的「道統」，而鄭學稼將自我與國家存亡問題的縫合，令其對魯迅的看法隨著政治局勢改變而有所修正。

就像他自己在〈蓋棺論定〉時對於魯迅所作的評價類似於夏氏兄弟的說法，認為他晚期走向了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誤入歧途，否則可以在小說創作中留下更好的評價。[159]這評價相較於過去是較為中性的，但鄭所欲面對的依然不是魯迅個人，而是透過魯迅來回應時代的政治情勢。如文化研究學者霍爾（Stuart Hall）

[159] 鄭學稼說道：「總而言之：魯迅真正的價值，就是他以文學家身分，指摘中國舊社會的殘渣。他是這工作的優秀者，他又是這工作在文藝上的唯一完成者。我有這一感覺：如果沒有中國的社會發展的混亂誤了他，他會在寫實文學中，占了一個重要的地位。」鄭學稼，《魯迅正傳》（台北：時報，1978）頁 544。

所述：「我們都從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寫作和說話，所由的歷史和文化也是特定的。我們所說的話總是『在語境中』，是被定位的。」[160] 鄭在舊版《正傳》主要解決的問題是社會神格化魯迅形象的論述，而新版的《正傳》則嘗試以魯迅來重寫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變化，這樣的差異顯凸顯了鄭學稼在不同時代中的不同位置，因而呈現出兩種因應時代不一樣內容的版本。

除了社會環境的改變以及歷史因素的使然外，蘇雪林與寒爵、劉心皇的論爭，以及其後所出版的《關於魯迅》內容，也都是影響鄭學稼修正自身論述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到在新版《正傳》的序言部分，鄭學稼就提到自己並不認同蘇雪林偏激的反魯論述，他這樣說：「當時名作家蘇雪林女士寫給蔡元培的公開信，雖欣賞魯迅的寫作，卻深惡魯迅的為人，曾列與我不能贊同的魯迅罪狀。」[161]雖然鄭學稼並未深談為何不認同蘇雪林，或者怎樣評價蘇雪林的反魯論述，但由此可以看到蘇雪林的反魯言論確實也帶給鄭學稼反思，偏激、煽動性言論的寫法並不會得到讀者的認同，反而易生反感。也因此，新版的《魯迅正傳》才會大量的刪去過去舊版中情緒性的字眼而增補史實材料，將 1942 年《魯迅正傳》對抗神格化魯迅任務卸下，轉而以魯迅作為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線索，進行另一種形式的文學史書寫。

第四節　包括在外：曹聚仁《魯迅評傳》的魯迅形象重構

曹聚仁的《魯迅評傳》[162]與鄭學稼的《魯迅正傳》一樣，受到國共戰爭的影響甚大，不同之處在於鄭學稼具鮮明的反魯與反共立場，相較之下，曹聚仁

[160] 斯圖雅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收錄於羅崗、劉象愚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 209。
[161] 鄭學稼，《魯迅正傳》，頁 5。
[162] 以下將曹聚仁的《魯迅評傳》簡稱《評傳》。

則是為了對抗國、共兩黨政治力介入傳記而寫《魯迅評傳》。曹聚仁一方面看見王士菁、鄭學稼等人帶起有色眼鏡在操弄魯迅形象，另一方面在等不到魯迅身邊的友人為其書寫傳記，所以於種種壓力下決定自己寫一部魯迅傳記。該書在出版後深獲好評，周作人盛讚：「魯迅評傳，現在重讀一遍，覺得很有興味，與一般的單調書不同，其中特見尤為不少，以談文藝觀及政治觀為尤佳，云其意見根本是『虛無主義』的，正是十分正確。」[163]南來文人李輝英說：「可以大膽的說，還沒有任何魯迅傳，超過曹著這一本。」[164]連思想屬於右派的司馬長風也認同曹聚仁的寫作：「讀完《魯迅評傳》，我不禁同意他確實是一個及格的史家。」[165]從這些評論中可以了解到，曹聚仁的《魯迅評傳》在文壇是受到左右派人士認可，至今在魯迅傳記中仍占有重要的位置。

回到曹聚仁的一生來看，他的生命見證了現代文學發展的顛沛痕跡，1900 年出生於浙江浦江蔣畈村，1922 年整理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演講出版了《國學概論》轟動了全中國，先後成為復旦大學、暨南大學的教授，並擔任《濤聲》、《芒種》等雜誌主編。到了抗戰時期加入蔣經國主辦的《正氣日報》，與國民黨關係良好，在國共鬥爭的時代是少數能往來兩黨的作家。1950 年開啟在香港的寫作生涯，一直到 1972 年病逝於澳門鏡湖醫院，終其一生為報章雜誌撰稿，也成為南來文人中最多產的一位作家。

香港作為他人生的中繼站（終點站），也是其歷史書寫的重要場域，多部傳記在香港的時期寫成，像是：《魯迅評傳》（1956）、《蔣百里評傳》（1963），甚或是關於自己一生的記憶都在香港留下紀錄。至於《蔣經國傳》（1948）則是先在上海寫成、出版，後於香港、台灣再版流通。除了上述的個人傳記之外，他也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圈留下大量的紀錄以及自身觀察，包括了：《文壇五十

[163] 曹聚仁，《魯迅的一生》（台北：新潮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87）頁 321。
[164] 曹聚仁，《魯迅評傳》〈跋〉（香港：世界出版社，1956）。
[165] 轉引自：丁淼，《我所認識的三十年代作家》（香港：香港文化互助出版社，1983）頁 121。

年》（1954）、《文壇五十年續集》（1955）、《人事新語》（1963）等等，香港是曹聚仁一生中留下最多文字記錄的地方，這包含了歷史紀錄、傳記書寫等等，曹氏曾經說到自己來到香港的任務是寫傳記、寫歷史，除了魯迅以外也包括了自己的自傳：

> 幾年前，有一回，我答覆一位比較知心的朋友的問話（他問我，究竟為什麼到香港來？）道：我是為了要寫許多人的傳記，連自傳在內，才到香港來的。第一部，就是要寫《魯迅評傳》。[166]

曹氏清楚的回答來港是為了撰寫多人的傳記，而《魯迅評傳》是第一本想寫的作品。為何會選擇香港做為書寫傳記的地方，這與當時的國共內戰情勢有極大的關係，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之後曹聚仁回到上海，面對中國的國共內戰，曹氏逐漸感受到中國所陷入的另一場動盪。直到 1950 年上海被中國共產黨接收，他感受到中共政權的不穩定，因此離開上海轉往香港成為香港南來文人的一份子。[167]

來到香港的曹聚仁因其敢言得罪了左、右兩派人士，在 1950 年代中期引起了論爭，這讓曹聚仁深感自己被國共兩黨包括在外，但這種感受並非感到被遺棄，反倒在這兩者之間不斷的轉換身分與位置。他的書寫既是屬於冷戰體制下國共戰爭的一部分，但卻身處於兩黨統治範圍之外，形成了介於兩者之間及其外（in between and beyond）的處境。雖說他的思想較接近左派，也曾經希望來台灣勸降蔣介石接收兩岸和談，但曹也清楚明白自己的性格與處事方法，導致他並不屬於也無法屬於共產黨的一份子。

曹氏的《評傳》在內容架構有兩大部分，一到十七章寫魯迅個人的生平傳

[166]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42。
[167] 羅孚，〈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收錄於鄧珂雲、曹雷編，《曹聚仁卷》（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277。

記，十八章到二十九章則是以各種角度來討論魯迅個人，如此的書寫不但能打破追求真實歷史的焦慮，同時也解決線性史觀所造成的歷史漏洞。前十七章的書寫是以魯迅的生命歷程按照時序堆疊，交代生活中發生的大小事，並將魯迅的家庭、文化活動、文學創作做了概略性的介紹；後面的十一章則可作為輔助線性的歷史所造成的漏洞，透過對魯迅的性格、日常生活、社會觀、與青年的交往、文藝觀、人生觀等等不同層面的觀察與側寫，豐富了魯迅個人的形象，將其不再是單一的線性角度，而是多軸心的全景式視域展現出魯迅的立體形象。

雖說當時中國的史學傳統仍以編年為主流，胡適的《章實齋年譜》或是曹聚仁編撰的《魯迅年譜》都是如此，都反映五四新文學、新思潮下，對於歷史的紀事仍是以按年編撰。但曹聚仁在魯迅傳記中，在線性的編年體上做了補強，跳脫歷史的線性發展脈絡，以議題的形式建構魯迅不同的面相。換句話說，這種「類線性史觀」的書寫，配合多面向的議題討論，不僅使讀者能夠了解魯迅生平，更可從中以單一議題了解魯迅這個人。

根據前面十七章來看，曹聚仁將魯迅放回「人」的行列，描寫魯迅幾個方面的缺陷，最明顯的部分是，曹聚仁在描繪魯迅形象時，形容他是一個「紹興師爺的調兒」性格上喜怒無常、罵人尖酸刻薄。這說法與鄭學稼有相似之處，不同的地方在於，曹聚仁認為魯迅罵人是有其原因的，他罵的人背後所代表的制度，只是那無形的整體制度結構往往在人的身上被體現。他說道：「既然他說攻擊的所諷刺的是一種制度一種思想，則某種制度下的那一群人當然要挨著他的批評，而某種思想附在某種人身上出現，某種人就要受著他的痛罵。」[168] 當然他也未否認這種痛罵是具有個人恩怨的因素，但曹認為我們為何單單放大魯迅罵人這一表層問題，而不去觀照他罵人的本意是為了向那不公的制度挑戰，

[168] 曹聚仁，〈魯迅先生的罵人〉，《曹聚仁雜文集》，頁 242。

這說法的層次明顯與鄭學稼、蘇雪林有極大的不同。

這一直以來是左右派人士對於魯迅「紹興師爺的調兒」評價上的不同，鄭學稼等自由主義、右派作家，包括林語堂、陳源、蘇雪林、劉心皇、夏志清等人，在討論魯迅的性格或是匕首式雜文時，往往都會認為魯迅性格偏激、好鬥並透過雜文攻擊異己份子，以彰顯自身做為「武林盟主」的地位。反觀像是曹聚仁等左翼陣營的作家，包括瞿秋白、馮雪峰、王任叔、曹聚仁、劉再復等等一脈，在討論到這一部分時往往會詮釋魯迅所針對的不只是個人而已，所欲討論、批判的是全中國的共相性問題。這背後可以看到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之詮釋角度完全相反，呈現一體兩面的解釋了不同的魯迅形象。

當然對比之下曹聚仁沒有那麼的袒護魯迅，並且也承認這是魯迅性格上的缺陷，批評魯迅的性格一點也不手軟，說他文章與性格上的「紹興刑名師爺」之風，「入人於罪，玩弄文句」的特長。是故，曹並沒有因此陷入二元對立的迷思，認為魯迅所罵的人一定是壞人，反倒在也在《評傳》中為魯迅的論敵作了某種程度的平反。他認為：

> 周氏兄弟的性格與文章風格，都是屬於紹興，有點兒刑名師爺的調門的。……刑名師爺，可以運用法律，卻也可以玩弄法律，深文周納，入人於罪，玩弄文句，規避刑法，這都是他們的特長。[169]
>
> 筆者特地要提請讀者注意，並不是魯迅所罵的人都是壞人，如陳源（西瀅）、徐志摩、梁實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學問淵博，文筆也不錯，而且很謙虛的。[170]

曹氏透過對魯迅的刻薄、不饒人的描寫，展現魯迅的性格缺陷，同時也為其論敵平反，認為這些作家們許多都是學識淵博的，並不像魯迅的筆下所顯現的形

[169]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0。
[170]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79。

象一般有問題。曹聚仁有意平衡兩造的說法，採取中性的角度來看魯迅與其論敵的關係，為魯迅與論敵的論戰持中立態度，相對於前面所批判傳記書寫者（鄭學稼、王士菁）的顛倒是非，似乎在這裡試圖與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魯迅傳記、相關論述對話。

有趣的是，《評傳》中沒有談及魯迅及其論敵的爭論過程，內部的問題、矛盾都略而不談，僅以幾句話帶過事件的發生的經過，從這可以思考的問題是：為何作為史家的曹聚仁不去探索魯迅及其論敵之間的辯駁過程，再給予兩造客觀的評價，而只是談論魯迅及其論敵的人格而已？這問題林曼叔在〈評曹聚仁的《魯迅評傳》〉也有提出，他認為曹違背史學家應有的態度，掩蓋論戰事實的真相，此外，林曼叔質疑陳西瀅與曹聚仁之間的關係，認為曹較為坦護陳西瀅希望博取他的好感。[171]

筆者認為林曼叔的質疑是有其一定的道理，這確實是《魯迅評傳》中的問題，而曹聚仁並沒有面對、梳理這些在魯迅生命經歷中的論戰細節。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作為史家的要務在於「蓋棺」才能「論定」，魯迅的論敵們多數仍還活在世上，所以沒有討論論戰的始末是可以理解的。若從這個層面上來解釋，也許我們比較能夠貼近曹聚仁的思維，了解他無法書寫爭論發生始末的難處。進一步來說，這或許是曹不希望落入解決魯迅與其論敵是非的泥淖，為了謹守「傳記」的客觀性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在觸碰魯迅與其論敵這問題時明顯的多所保留。

回過頭來說，曹聚仁是少數以同理心的方式描述魯迅的性格缺陷的史家，並不會為魯迅的性格缺陷做辯護，也不會為此批判他的人格有問題。這樣的研

[171] 林曼叔，〈評曹聚仁的《魯迅評傳》〉收錄於璧華編著，《曹聚仁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09）。

究一直到現今仍屬難得可貴，尖刻與多疑似乎是魯迅一直以來給予他人的印象，但多數研究者不是不願意面對魯迅性格上的缺陷，就是以此攻擊魯迅。能夠坦白面對魯迅性格問題，並以同理心來討論者少之又少。就像鄭學稼以「浪子之王」的稱號來諷刺魯迅，描述他的言行不一為了利益可以轉向，但曹聚仁在傳記中卻不會這樣形容魯迅，雖同樣承認魯迅在性格、行為上的缺失，但有更多部份會解釋魯迅為何性格有缺陷。

就像是 1924 年「楊樹達君的襲來事件」，一開始魯迅以為是文壇的敵人們刻意找人來攻擊他的，在文章中強烈譴責敵人們找一位青年到他家鬧事，事後證明魯迅的猜測是錯的之後，魯迅也立刻道歉為整件事情止住風波。[172]對此，錢理群曾在〈「多疑」、「尖刻」中的現代智慧——魯迅思維方法論〉如此詮釋魯迅性格上的多疑與尖刻：

> 是這樣病態的社會環境；四面充溢著陰謀、流言和陷阱，人與人之間滿懷敵意與猜忌，魯迅精神上時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他不得不「橫站」，提防八方來的，魯迅之「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正是病態社會、病態人際關係對魯迅心理、性格的扭曲與損傷，也是魯迅自我保護的反應與反抗。
>
> 如今世人只知批評魯迅多疑、尖刻，而不注意批判製造多疑、尖刻的病態社會，這同樣是「萬分古怪」的。對於我們民族最優秀的代表魯迅心靈的這種損傷與曲扭，正是不合理的舊社會的最大罪惡之一。難道不應該這樣提出並思考問題嗎？[173]

錢理群為魯迅性格的缺現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並認為這是舊社會下的產物，在魯迅身上所留下來的影響。如此的論述與曹聚仁相似，曹聚仁同樣認為魯迅性格上的缺點是舊社會的弊病，魯迅以小說、雜文批判中國人的陋習與性格，而這批判對象也包括了自己。曹聚仁在《魯迅評傳》中是這樣提到的：「從《阿

[172] 魯迅，《魯迅全集 集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73] 錢理群，〈「多疑」、「尖刻」中的現代智慧——魯迅思維方法論〉，《與周氏兄弟相遇》（香港：三聯書店，2008.10）頁 11。

Q正傳》所發生的社會意義來說：阿Q是一個中華民族「乏」的方面的典型人物，我們中國人，誰都有點阿 Q 相，連魯迅自己也在內。」[174]在曹的認知中，魯迅在小說中尖銳、諷刺性的批判也包含自己內，這樣的批判並非將自己置身事外，而是把自己包括其中，對於他人無情、犀利的人性解剖，也是對於自己體內愚昧國民性的反思。

當然，曹聚仁一直以來都認為人是複雜的，而魯迅亦是一位複雜的作家，其性格也必然存在著缺陷不必為其隱瞞。但是假使為了將魯迅描寫成人而描寫魯迅的缺陷，是否有可能陷入另一種形式的將魯迅刻板印象化呢？換言之，《評傳》一開頭就提及自己只想把魯迅當成人看待，並且描寫出不同於國共兩黨的魯迅形象。但假若只為了差異化與其他傳記的不同，而刻意討論魯迅的缺點或是與他人的論爭，那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擦脂抹粉，仍然不是以魯迅為主體，僅為強調「人」的魯迅而寫。

總括來看，曹聚仁的《評傳》出版後確實對中、港、台之間的魯迅論述產生一定的效用，試圖讓魯迅形象的發展回歸到「正常」的路途，一個具有性格缺陷的「人」的魯迅形象。曹聚仁透過《魯迅評傳》「先立傳後評述」的章節安排，在前面十七章交代了魯迅的一生，而後面十二章則評述魯迅創作、交友、家族、思想等不同面向，如此的重構是對應於左右翼政治力介入的魯迅傳記而來，希望還給屬於魯迅應有的面貌，展現多角度的魯迅形象。但是在還給魯迅原有的面貌時這個原初的面容究竟是甚麼？傳記書寫對於真實追求的不可及是否造成曹聚仁在書寫上的障礙，又或這成為他書寫的動力來源？下面我將來討論這問題。

[174]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65。

第五節　真實與虛幻的辯證：曹聚仁《魯迅評傳》寫史的趨力與障礙

義大利的歷史學家克羅齊曾說過：「一切的歷史都是現代史」，人們對於過往的歷史閱讀所反映的除了「過去」也包含「現在」，當歷史研究或歷史書寫從過往的求真，到了後現代世界不再在乎真實，那是對於真實／真理不可尋的態度展現，同時也不再相信有真實／真理的存在。新歷史主義雖屬後現代歷史思潮下的思想體系，但其所展現對於歷史的態度卻並非如此全面的否定「真實」，它雖同樣的明白意識形態、權力在歷史詮釋上的影響，但同時仍相信有個真實／真理的歷史存在。

現今評論者對曹聚仁的《魯迅評傳》的貢獻，大多聚焦於反對神化的魯迅形象，但我認為我們應該進一步問，曹聚仁如果反對神化或汙名化的魯迅形象，那他對歷史的態度是甚麼？而他又如何讓自己不陷入絕對的、武斷的魯迅形象建構？在這基礎上我們可以用新歷史主義的概念來談曹聚仁的歷史觀，看到他對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深刻理解與辯證過程。當然，誠如上一節所談及的，曹在《評傳》描繪有缺陷、盲點的魯迅形象，並嘗試為其缺點來辯駁，試圖表述他所認知的真實魯迅樣貌。

然而，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反映的是真實的不可得，卻要求自己盡力的朝向真實的歷史書寫邁進，新歷史主義者在「追尋真實的歷史」與自知「真實歷史的不可得」的矛盾中，反覆如薛西佛斯般的重覆追尋歷史真實的行為。這也讓歷史不但存在著開放的態度，同時也符合歷史存有終極真實的可能，只是這可能性的意義卻無法能夠純淨的被描述、被言說。這讓歷史書寫形成強大的動力，雖然無法企及真理，但在書寫的欲望上迫使人們朝向真實的歷史書寫邁進。一如希臘神話中的薛西佛斯，在受到天譴後被迫不斷的推著石頭上山頂，不過每當巨石即將達山頂時又會滾落回山腳下，薛西佛斯不斷的重複著將巨石推向

山頂，以打破受到天譴的詛咒。新歷史主義者就宛若薛西佛斯一般，雖然知道歷史的真實是不可得，但是在歷史研究中卻不斷的追求、嘗試趨近於真實。換言之，當權力無所不在的影響著歷史書寫，新歷史主義者雖自覺無法達到歷史的真實書寫，卻不會否定真實歷史的存在。

而曹聚仁的史識就像是新歷史主義學者一般，一方面批判王、鄭等人的魯迅傳記顛倒是非黑白，不符合真實的魯迅樣貌，但另一方面也認知到自己的魯迅傳記同樣也無法達到真實，因而不將《評傳》視為傳記，而是自己對魯迅觀察後的紀錄與理解：

> 筆者雖是一個史人，有志於寫一個比較合理近情的傳記；但我知道我自己也無法成為一面鏡子，反映出那真實的形容來。我有我的偏見，我自以為很公正的批判。[175]

曹聚仁了解自己的書寫必然只是其中的一種角度，更重要的是，歷史存在著終極的真實，也就是面具下的魯迅，那也許只有他本人才能看見的真實魯迅。換言之，偏見之所以存在，並非曹聚仁刻意以自我偏見來描繪魯迅，而是在力求真實的同時難免有部分的主觀想像，而自己的筆無法成為一面真實反映面貌的鏡子，表現出魯迅真正的樣子。

所以曹聚仁認為自己所寫的《評傳》並不是傳記。當然他這樣說或許是自謙之詞，但同時也反映對魯迅「真實」形象無法觸及的焦慮，卻又有必須書寫魯迅「傳記」的掙扎。即便《評傳》已具有傳記的架構，曹聚仁仍自謙此書不是魯迅所預料的傳記：「因此，我要試寫這一部《魯迅評傳》——不是魯迅所預料的傳記。[176]」曹的這番談話一方面是回應內心無法完全掌握魯迅形象的心情，

[175]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39。
[176]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3。

另一方面又是面對坊間幾部魯迅傳記的顛倒黑白提出控訴，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矛盾與掙扎，最後決定以折衷的「評傳」形式來代表傳記，而這之中以「評傳」為「傳」便具含了作者的評述與立傳人的真實生活兩個部分。

我們可以從曹聚仁解讀魯迅作品的態度，了解到他對於真實與虛構問題的時時警覺，在許多地方曾不只一次的表示，文章與人之間所存在著真與假的問題，內部牽扯許多複雜的因素，不能單純的把文本所呈現之物當成魯迅本人的意圖：

> 我們絕不能說是看了幾部魯迅的作品，幾篇魯迅的散文，就算了解魯迅了。魯迅表現在文章的是一面，而他的性格，也許正和文章所表現的完全不同。那些要把魯迅吹捧入孔廟的人，怕不使魯迅有「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之嘆呢？[177]

究竟魯迅的文章與本人之間有何種關係，曹沒有明確的談及，只是表示其中有很複雜的關聯，並不能將兩者視為等號來看。不只在《評傳》中如此提及，在他的回憶錄裡談到魯迅時也同樣重申不能以魯迅的作品來了解他這個人。[178]文章是否可以等同於個人這向來是眾說紛紜，在「相似」卻不「相是」的情形下，以考證方式將魯迅的小說發生背景、人物描繪投射成為魯迅本人或是其生命歷程，是無法解決文學的虛構性與生命經驗之間糾結、複雜的關係，以及存在於作家流動的心理意識狀態。不過在沒有其他方法之下，透過文章來了解一個人也是不得不的做法，只不過需要時時留心不能混淆了兩者。

也因為對於文字、敘事的存疑，曹聚仁本人也知道自己的著作必然只書寫

---

177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44。

178 曹聚仁在回憶錄裡這樣說道：「許多朋友問我：「魯迅究竟是怎麼一個人？」我說：「知人則哲，要了解一個人，談何容易。雖說，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但從一個人的文章來了解其人，比以貌取人還要渺茫一些呢！…」」曹聚仁，〈魯迅與我〉，《曹聚仁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上（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頁 419。

的其中一種角度，而《評傳》並不是原本想為魯迅所做的傳記，只是添加自我評論色彩的評傳而已。不過，綜觀《評傳》整本的內容，曹聚仁不自知的將自身的意識形態加諸在魯迅形象上，反映曹聚仁本人的立場而已。也就是說，儘管曹聚仁掙扎於寫史的真實與虛構，但因為過去與魯迅的私交，讓他看見左、右翼文化人士操弄魯迅符碼時會感到不滿，並以書寫《評傳》為魯迅解釋。也就是說，曹聚仁與其他作家、評論者最為不同之處，在於建構魯迅形象時會意識到真實的魯迅之不可得，因而在說法上總會有所保留、力求客觀、不會過分武斷，相較於其他海外研究者蘇雪林、鄭學稼、劉心皇、夏志清等人更顯出其獨特，而這也是《評傳》在冷戰體制下華語語系文學中特別的地方。

進一步來說，曹聚仁除了給予魯迅人性化的形象外，同樣的也在魯迅身上投射自我想像，無意識的從建構魯迅形象的過程中展現自己人生哲學與處事態度。換言之，《評傳》不只是表現曹所認知的魯迅形象而已，也投射了其內心理想化的魯迅形象，透過談論魯迅來與當代的文化、政治圈進行對話。所以當眾人在質疑魯迅雜文的尖酸刻薄時，曹聚仁是這樣為其解釋的：「『諷刺文學』和『政治黑暗』成正比，在言論不自由的圈子中，『反語』最用得著；魯迅先生的筆調也可說是時代的產物。」[179]曹以時代脈絡的角度切入理解魯迅的雜文為何會晦澀、難懂，且具有如此的多諷刺與反語，那是因為時代言論的不自由，所造成雜文在批判時政上必須多用反語來表達。這種貼近魯迅生命歷程與時代氛圍的詮釋，使其傳記雖未以第一人稱出發，卻在字句之中更能看到他更深刻的描繪出魯迅的形象，究竟在他的認識中魯迅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這樣形容的：「依我的說法，魯迅很精明，很敏感，有時敏感過分了一點。」[180]這「敏感」兩字鮮活的表述了魯迅形象，以及魯迅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了解到，因為這份敏感使得魯迅在文化、政治團體成為了「永遠的反叛者」，同樣

[179] 曹聚仁，〈魯迅先生〉，《曹聚仁雜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4）頁 234。
[180]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39。

的這份敏感使他與共產黨的關係只能是「同路人」而不能再更多，甚或是進入黨來領導共產黨的文化政策。

像是曹聚仁在 1930 年代和友人合辦《濤聲周刊》，提倡知識份子應做烏鴉而非喜鵲，在報章雜誌多做理性的批評，疏離於中心作客觀的評論者的角色。這種說法與態度就與魯迅「永遠的反叛者」極為類似，都處於批評他人同時自我批評的辯證之中，因而與任何的組織、團體總是格格不入，或說更強調自我的主體性。所以我們可以由此來看魯迅與共產黨的關係，這部分也是受到最多非議與討論，右派如蘇雪林、鄭學稼認為魯迅帶領左派文化人攻擊自由主義陣營；而左派如馮雪峰則認為，魯迅在 1930 年代前後因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蘇聯的小說因而思想有所轉向。但曹聚仁不同於兩派的看法，認為魯迅只是共產黨的同路人，而不是共產黨的領導者，也未曾加入共產黨。但進一步來說，曹聚人的認知是：魯迅不只是沒參加共產黨而已，他個人同樣是中國社會運動、革命運動的同路人，並不是一個運動者。他在面對此問題時是這樣為魯迅解釋的：

> 所以魯迅又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過問。我卻要問，要估量這是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夠做革命者。」在《兩地書》中，魯迅也曾說過：「凡做到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需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意使別人做犧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景宋說魯迅終生是一個思想的領導者，而不是實際行動者。[181]

曹聚仁注意到魯迅的反叛性，永遠都站在批評者的立場討論問題，也因此往往因為自己的過度「仔細」而無法做一個勇往直前的革命者。曹刻意引出魯迅自己的這段文字，說明魯迅不斷思辯的個性，其實與刻薄的刑名師爺文風有很大的關聯，藉此解釋魯迅在群體中的疏離位置。換言之，也因為魯迅的永遠批判者

[181]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35。

的立場，讓他對任何事情往往都是站在批判的角度，在不斷的質疑中就無法放手一搏的全力衝刺革命事業。這也呼應了《評傳》談論魯迅與革命之間的關聯，不論是早期與革命黨之間的關係[182]，或是日後與左聯之間的合作，在曹聚仁看來魯迅與社會運動是保持距離的，特別是與左聯的合作「這是左聯依靠著魯迅，而不是魯迅領導著左聯呢！」[183]

回溯魯迅與共產黨的來往雙方一直保持著合作的關係，但魯迅逝世後因共產黨操使「同路人」的位置逐漸移轉成「精神領袖」，至此之後魯迅成為共產黨的重要符碼，作為抗日、抗蔣對最佳工具。但曹聚仁與魯迅在上海的交往經歷，以及自己的所見所聞，使其撰寫傳記時會將這樣的情形提出來作澄清，希望將魯迅復歸為同路人的立場來談魯迅與共產黨的關係。這說法與西方的研究者米爾斯（Mills）相當接近，都認為魯迅並不屬於無產階級教條派，他認為魯迅：「更接近托洛斯基的較為開明的馬克思主義，而不屬於僵化的『無產階級文化派』」。[184]當然，以現今角度來看，這說法在現在獲得多數學者認同，但在當時候的冷戰環境中，政治強力主導文化場域的情形下，能夠如此持平而論的兩岸三地的地方只有香港。而曹聚仁站在香港此地的絕佳位置，使其能暢所欲言的表述自我立場，同時又與國、共兩個政權保持一定距離，利用香港的言論空間與國、共的魯迅論述來對話。

如同我們上一節所談到的，他的書寫既是屬於海峽兩岸國共鬥爭中的一部分，但卻身處於兩黨統治範圍之外，因而形成介於兩者之間及其外的處境。曹聚仁利用其個人的名氣，以及自身中間偏左的立場，讓他成為少數中國共產黨

[182] 我們看了這一段記載，可以知道當時當人的浪漫氣氛，也可見魯迅和光復會人關係的密切，也許這一類浪漫氣氛，不合魯迅的口味，所以他就不正式參加革命的組織了。引自：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34。

[183] 曹聚仁，《魯迅評傳》，頁 101。

[184] Mills, Harriet. ''Lu Xun :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From Mara to Marx''. In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HUP, 1977, 189-220.

能夠接受的海外記者，不定期的往返於中國與香港之間，將中國內部的消息通過香港與世界接軌。也因為他這特殊的身分，使他不像其他南來作家一般有著離散的與故國母土割裂之感，同時也不像留守於中國的作家一樣，在極權統治下失去言論與書寫的自由。冷戰時期他可以算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多次北行在中國採訪，為中共在海外發聲，甚或號召南來文人回歸中國。但也因為他自由往返中國與香港的特殊身分，使其雜文書寫必然的要有所保留，不能像其他南來文人可以大膽的批評中共的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更多的時候呈現了一種「妥協」的生命狀態。

曹聚仁一直以國共兩岸交流的仲介者自許，希望國、共雙方能夠和談，解決海峽兩岸對立的情勢。或許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他透過《評傳》所要表現的真實魯迅中，某種程度上也表現了自己的意識形態，以及對於當代政治、文化氛圍的態度。尤其在國家權力之至上，那文學必須服務政治的時代，個人變得渺小與微不足道，鬥垮政敵、豎立自我權威形象成為必要、也必然的作法。1955年胡風集團被整肅，代表著過去承襲魯迅永遠的反叛者的聲音，在共產黨體制的建立下被迫犧牲，如此的犧牲也許包含著文人之間的權力場域鬥爭，但更重要的是，胡風集團的潰散讓同樣是烏鴉的曹聚仁必然感受到：身為「烏鴉」無法在當時的中國生存的窘境，而認同「烏鴉精神」的魯迅，將不再是共產黨所允許的魯迅形象。

換言之，為魯迅留下紀錄也是為曹聚仁自己留下紀錄，在魯迅身上體認到反叛者角色的精神，是與自身的「烏鴉精神」相契合，透過為魯迅作傳、談論他的思想，同時也是為自身的精神留下最美好的印記。借用尉天驄描寫那一代落魄的中國知識份子形象，也可以套用在曹聚仁身上：

他們有些人背負著中國苦難的回想，懷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情，卻又無

> 處可歸。他們事事關懷，一落到現實之中，卻又甚麼也不是。他們不屬於任何黨派，不左不右，不右不左，沒有固定信仰的主義，言行之間卻又處處流露著理想主義的浪漫色彩，酒喝多了義憤得成了激進派，冷卻以後又成為虛無主義者。說他們是民族主義者，不如說他們是安那琪的同夥。他們是屬於追夢的一群，生來就是統治階層的批判者，落拓不羈，不畏權勢，不懂人情世故，一不小心，就會落入別人的圈套。[185]

曹聚仁那一種愛國的使命感、烏鴉精神的批判者立場，確實不能以和黨派來歸類。特別在那樣變動的時代下，兩岸政治肅殺氣氛濃厚，香港做為自由之地雖然可以自由創作，但同樣存在左、右翼勢力的對峙。曹聚仁能夠不受政治力干擾、不畏懼強權，寫下人性化魯迅形象的《魯迅評傳》實屬不易，畢竟，當沒有任何一個與魯迅親近的友人願意執筆為魯迅作撰的時候，曹聚仁以自己與魯迅的交往經驗，以及特別的史識和史觀寫下《魯迅評傳》，為後人留下與魯迅相關的珍貴資料與思考路徑。

第六節　小結

回顧魯迅的傳記史，最早有日本學者增田涉所撰寫的《魯迅傳》。增田涉透過內山完造的介紹與魯迅密切交往，近距離的接觸且討論，其密切程度以為後人稱為魯迅的私淑弟子，在費時十個月的時間寫下了《魯迅傳》。《魯迅傳》最早於 1932 年 4 月《改造》雜誌上刊載，後來於 1935 年翻譯成中文刊於台灣的《台灣文藝》。而這傳記的前言有關羅曼羅蘭對魯迅評價一事的真實性，引起郭沫若發文質疑。而代表殖民母國的增田涉與代表文化母國的郭沫若兩人在台灣雜誌上的交鋒，也受到台灣文壇的高度關注。雖然其後仍是不了了之的收場，但郭沫若本人也在受台灣學生訪問時同意，這場論爭不只是單純的文學評論論爭，同樣也包含了宗派之間的鬥爭。換句話說這也可看到魯迅與共產黨之間的摩擦，不只是與四條漢子之間的兩個口號論爭，也將彼此的分歧從中國本

[185] 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台北：印刻出版社，2011）頁 166。

地延伸到海外。除了增田涉的魯迅傳記受魯迅學界的關注外，小田岳夫超過十萬字的《魯迅傳》（1940）也引發許多的討論，該書具備完整的傳記形式敘述魯迅從出身到上海逝世，可算是首部完整的魯迅傳記，多次被翻譯成中國在報章雜誌上連載。

至於中國部分的魯迅傳記， 在 1940 年代數量雖不算少但多數都非嚴謹的傳記，而有較多的個人情緒成份於其中。除了有鄭學稼的《魯迅正傳》以及曹聚仁不斷提及批判的王士菁《魯迅傳》（1948）外，尚有歐陽帆海《魯迅的書》（1942）、王治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1943），以及林辰因病逝未完成的《魯迅傳》（1949）。這主要是受到戰爭所影響，顛沛的生活以及缺乏史料文獻導致魯迅傳記多以印象式書寫，內容有多有缺漏，但也為魯迅傳記奠定了一定的書寫基礎。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意外的魯迅傳記書寫少有著作出版，僅尹庚的《魯迅的故事》、唐弢《魯迅先生的故事》、朱正《魯迅傳略》三本而已，陷入了傳記書寫的空窗期，一直要到文革結束之後的 1980 年代才又進入了魯迅傳記書寫的高峰，有曾慶端、吳中杰、林志浩、林非、劉再復等人出版的魯迅傳記，進入了魯迅研究的另一次的高峰，也算是真正的開始還原魯迅形象的工作。

但在曹聚仁、鄭學稼之後，台、港兩地的文化界至今都沒有出現新的一本魯迅傳記，最為接近的是劉心皇的《魯迅這個人》，但其內容偏向透過魯迅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問題，所以仍不算是魯迅傳記。這種現象可以視為離散中國人的在地化，本土文化的興起與中國文化之間的融合、演繹，也間接的稀釋了魯迅在台、港文化界所受到的關注。換言之，鄭、曹兩人的魯迅傳記所象徵著的是南來文人／新移民海外的「回望中國」，儘管回望的原因不一、姿態不同，更受到了當地的政治體制所干預，形成了反抗政治中國與懷念文化中國的複雜情感，而這種情感的具象表現於一個充滿矛盾的魯迅形象上，以表述自我的意

識形態與價值。

由此，曹聚仁、鄭學稼的魯迅傳記最大的意義，除了這兩本書分別為台、港兩最重要的魯迅代表作之外，內容早於中國 1980 年代的魯迅傳記思考「人」的魯迅形象相關問題，也是值得被重視的。不可否認的是，如此的「人」的魯迅形象是帶有對共產黨政權的敵視所造成的，但也因為與中國的鏡像參照展現出華語語系的魯迅研究的特殊位置。究竟人的魯迅為何至今仍存在著極大的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當代不論海內外一定的共識都是反對過往冷戰體制下因政治因素所做的擁魯、反魯的論述，將政治先行於文學、歷史之前，而掩蓋了魯迅的思想、文學的真實價值。

隨著將魯迅復歸回人的位置之聲日趨熱烈，2013 年中國政府將魯迅從教課書中排除，引發知識界的一陣嘩然，其背後究竟是緩解多年來過度放大的魯迅經典地位，又或是為了維護政權所作出的政治動作，總是受人猜測而重新觀照魯迅思想與作品在當代的意義，這件事背後所凸顯的還是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糾葛，一個在中國當代最鮮明的案例。

第四章　典範的轉移：夏志清、劉心皇、司馬長風海外文學史的魯迅形象建構

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

魯迅〈一切藝術都是宣傳〉

第一節　文學史的「經典」論爭

哲學家班雅明（Benjamin, Walter）在《德國哀悼劇之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中提出「星座化的歷史」的概念，認為歷史是研究過去與現在的關係，歷史的研究決定過去是如何被闡述、回憶與建構，歷史不是線性的不斷前行，而是「去時間感」宛若星辰般的散佈在天空之中。當我們仰望天上的星星，並不會了解、明白每一點的亮光來自於不同時間點所散發出來的，我們的視覺只是扁平的接受了當下的亮點，並且透過串連與命名，在眾多星星之中賦予部分意義。歷史也是如此，文學史亦若是，我們都嘗試在浩瀚的歷史碎片之中拼貼「真理」，但事實上我們所建造的歷史只是創造出自己的倒影而已。

嶺南大學曾在 2000 年時召開了「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包括了夏志清、王德威、劉再復、溫儒敏、劉紹銘、鄭樹森、黃子平、許子東、梁秉鈞、王宏志、陳清橋、陳國球等人的與會，讓這一場會議在當年度成為華人學術圈的盛事。會議內容觸及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典律」問題，劉再復一段不斷為後人所引用的發言，正是引爆魯、張文學價值激辯的關鍵。他在會議中如此說道：

> 如果要在魯迅、張愛玲、沈從文、李劼人、蕭紅這五個作家中挑選一個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在魯迅與張愛玲之間彷徨，然後把票投給魯迅。這是因為，這兩位文學天才，一個把天才貫徹到底，這是魯迅；一個卻未把天才貫徹到底，這是張愛玲。張愛玲在去國後喪失藝術獨立性，成為『夭折的天才』。[186]

[186] 劉再復，〈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收錄於《再讀張愛玲》(香港：牛

這段言論馬上引起夏志清的反駁，並與劉再復針對誰才是「夭折的天才」進行交鋒，夏志清認為如果說張愛玲是因為「生活」而成為夭折的天才，那麼魯迅則是因為被共產黨所利用，這樣的妥協比張愛玲為了生活的情況更加不如。

兩人的爭執並未隨著會議的結束而結束，劉再復持續深化探討魯、張的文學經典問題，而許子東、袁良駿等人也對此議題提出進一步的討論。[187]劉再復在會議中感慨道，中國曾經因為政治因素而將魯迅神格化，一甲子之後魯迅被請下神壇之際，又擔心起另一個神話（張愛玲）的出現。劉的擔心並不是沒有道理，畢竟因為政治意識形態，數十年來魯迅被描繪成戰士、精神導師、堅貞的無產階級擁護者。一直要到文革結束之後才開始提倡「人的魯迅」研究，而他的矛盾性格、彷徨、無助的多重面向才在中國大陸受到重視。[188]

在面對「建構經典」上我們無法忽視「論述」的重要性，一如許子東所述：「文學神話（比如「魯迅」），雖然有人為製造的成份，但這種「製造過程」，背後總有些文化思潮、意識形態、歷史選擇的必然因素吧。[189]」的確是如此，任何經典的製造背後都牽涉了美學價值、意識形態、文化傳播等多重面向，張愛玲是否會是下一個魯迅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了解的是，最早在文學史裡「貶魯捧張」正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該書也為中國現代文學開闢出新的討論路徑。[190]

基本上來說，現今的現代文學史主要可分成中國以及海外兩大系統：中國大陸系統是以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1953）以降的史觀，至於海外則為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為代表。[191]相較於海外文學史的出版都在 1960

津出版社，2002）頁 37。

[187] 袁良駿，〈一場跨世紀的學術論爭－－我觀劉再復 VS 夏志清〉，《魯迅研究月刊》（2009.5）。

[188] 詳細論述可參考：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現狀》（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89] 許子東，〈二十世紀中文文學的發展：從吶喊到流言？〉，《香港短篇小說初探》（香港：天地圖書，2005）頁 244。

[190] 誠如王德威所述：「早在當今學者正義凜然的「干預」（intervene）文化政治，大談「重寫」文學史，或「重新協商」（renegotiate）中西小說觀前的幾十年，夏已經憑一己之力，「干預」、「重寫」，及「重新協商」現代中國文學了。」王德威，〈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 xvi。

[191] 此處是指一九六０年代以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意識形態，大致可以分成王瑤與夏志清兩個系統。以下將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簡稱為《小說史》。

年代以後，中共建國後旋即有不少文學史的問世，最早的一部是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3)，到了1950年代中期更有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1955)、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奠定了中國國內新文學史的寫作框架。王瑤《中國新文學史》是中國的現代文學史奠基之作，該書最大特色有二：第一，在所有作家中特別強調魯迅的地位，於文學史中以專章討論，其他作家都置入議題、體裁的架構。第二，凸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延安文藝作談會上的講話〉(1942)於文學史的重要性。確立左派文學思潮除了受到魯迅領導外，毛澤東為接續其後的提供重要理論、方向的舵手。而在王瑤之後，丁易與劉綬松的文學史則因政治氛圍激左而更符合共產黨的政策方針，在新、舊文學與左、右翼文學的劃分中更為二元對立。[192]

文學史作為敘事的一種方式通常具含著教育的意義，背後所展現的是敘事者的說話位置，現代文學史的發展正與中國近百餘年來社會、政治形成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義大利社會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就提出國家以兩種「領導權」的範式來「統治」人民，第一種是強制性國家機器以軍隊、警察、律法等方式管制人民，第二種則以教育、輿論、出版物等形式改造人民，具「潛移默化」的效果。而文學史的書寫就屬於第二種，以建立文學系譜的樹立正典來教育人民，告訴人民甚麼樣的文學作品才是好的，甚麼樣的作品是有價值和意義的。許多當代的魯迅研究者包括王富仁、葛濤都已經指出，魯迅成為現代文學的正典，除了其本身文學創作在當時代即為突出的水準外，也因政治勢力的干預使魯迅符碼被建立成為經典作家。

中國與海外文學史最大的差別除了意識型態之外，海外自由的學術風氣也讓其研究較中國呈現「眾聲喧嘩」。若援用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文學」概念來審視，更可以發現離開中國文學的領地之後的文學史，在各個地方也因應不同的社會情況而有所演繹，並且與原來的中國文學形成複雜且曖昧的鬥爭。也就是說，海外的魯迅研究不像中國有強大的政治勢力介入，出現較複雜的魯迅面貌，而這面貌與不同時空有著密切的關係，並且與中國之間產生某種程度的呼

[192] 詳細論點參考：許懷中，《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史論》(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

應與對話。[193]進一步來說，當中國新文學之父－－魯迅已是各種版本現代文學史必定討論的作家時，這些文學史又是如何詮釋這位與政治密切相關的作家，其背後又與當代共構怎樣的對話關係？

《中國現代小說史》從 1961 年出版後一直是西方世界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著作，經過劉紹銘及一群翻譯者的共同努力，在 1979 年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譯本，同年台灣也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將《小說史》影響力從海外正式帶進台港兩地。但早在《小說史》翻譯成中文版本在台、港，這兩地已有不少的評論者出版了現代文學史，包括尹雪曼、王平陵、周錦、司馬長風、李輝英、劉心皇等各路人馬，有人以團隊方式寫作文學史，也有人憑個人的力量，為新文學繽紛燦爛的年代留下歷史的紀錄。當然，會出現那麼多的文學史是那一代人，對於過往新文學黃金時期的懷念，以及流亡在外而產生述說自己仍是正統的慾望，這導致台、港兩地都有為數不少的南來文人、流亡作家，在「異地」書寫著現代文學史以表述自己與中國新文學的聯繫。

這種對話部分形成現代文學的在地化演繹，甚而呈現正統中國的詮釋與逆反，將現代文學的脈絡嫁接於台港文化陣地，像是劉心皇的《現代中國史話》、周錦的《中國新文學史》都延伸至「自由中國」時期。部分文學史則仍將時間凝著於 1949 年之前，並未將觸角延伸至分裂後的中國，像是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李輝英《中國現代文學史》都屬這一類。或許這書寫上的差異透露出作者是否承認「中華民國」的政權，或者更精確的來說，劉、周居住在台灣的兩位作家相對於司馬、李二人更為焦慮中華民國政權是否延續，以及「自由中國」地區的作家群是否被列入現代文學的系譜，這種焦慮導致了現代文學史的書寫時間產生了錯落不一的現象。

[193] 古大勇、黃科安這樣說道:「美國華人文化圈的魯迅研究呈現三個基本特徵：首先，一定程度的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部分魯迅研究更是淪為反共或冷戰的工具。其次，美國華人文化圈對魯迅的接受表現出與大陸不同的特色，雖然部分特定時期的魯迅研究淪為冷戰工具，但無庸置疑，其中也有一部分的魯迅研究能擺脫存在於中國大陸地區那種特定的「一體化」意識形態的影響，獲取一個相對自由學術環境，對魯迅進行多元解讀，呈現出眾聲喧嘩的研究生態。」古大勇、黃科安，〈意識形態偏見、眾聲喧嘩與經典認同－－美國華人文化圈的魯迅研究〉，《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第 6 期（2012.12）頁 134。

夏志清對於魯迅的看法集中於《小說史》，本章將討論該著作是如何建構魯迅形象，並以此與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1970）、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1978）比較，觀看不同文學史家是如何詮釋魯迅，並且在台、港兩地對話。雖然本章並不述及其他文學史，而聚焦於夏志清、劉心皇、司馬長風三人，主要的原因是這三本文學史對比於其他呈現更多作者主觀的意識形態，並與當時代的國民黨、共產黨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較多的區隔。是故，希望從討論這三部文學史，觀看美國、台灣、香港三地如何在文學史中建構魯迅形象，且與該地政治關係有怎樣的合作或拔河。

第二節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偏見與洞見

目前討論夏志清的魯迅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多數學者的論點在於質疑夏志清反共的美學，但同時也肯定他建構起異於中國的主流論述的文學史。綜觀現今針對夏志清魯迅研究的討論約莫可梳理為三個重點：第一，夏志清開創了魯迅論述的不同面向。第二，冷戰、反共意識形態造成夏志清偏頗的魯迅評價。第三，夏志清在文學史中「去歷史脈絡」的討論作品。必須說明的是，「開創不同的面向」與「給予偏頗的評價」恰好是一體兩面，作為文學史家必然在歷史詮釋上有所偏頗，只是夏志清的「偏頗」最終成為了海外魯迅論述的某種典範，與海外其他地方的文學史形成交互對話。[194]

歷經半世紀的傳播，夏志清的《小說史》早已成一家之言，影響華人地區的現代文學研究，像是當代的張愛玲風潮就是該書的貢獻。至於夏志清的魯迅評價，如同在開頭所述的，《小說史》除了開創了魯迅論述的不同面向外，由於時代與作者意識形態的關係，也造成其論述偏頗且去歷史脈絡。不論是獨特、偏頗、去歷史脈絡的優缺點，都與夏志清繼承「新批評」研究有關。夏志清並

[194] 如陳建忠所述:「如果我們試著理解這些流亡美國的知識分子的特殊精神狀態，則他們懷抱著對中國文學與文化高度的崇敬之心，欲續絕學與海外，可以視之為文化民族主義的展現。但是，他們卻也不約而同棲止於美國的冷戰學術機構之中，通過美國圍堵共產思想的經費與影響力，宣揚其反共及復興文化的理念。因此，他們的「魯迅論」，就絕非單純的冷戰思維下的文學研究而已，更是與他們的流亡身世、文化理念不可或分，這可能是過往批評冷戰學術功過時，較未留意到的部分。」陳建忠，〈冷戰時期夏濟安與夏志清的魯迅論〉，《文學評論》第 24 期（2013）頁 36。

不依循過往評論者的看法，以長期在美國所培養的新批評美學觀審視魯迅的作品，從《吶喊》到《徬徨》都細緻的分析小說內容，開創屬於他個人的評論。當然，夏的英國文學背景導致他沒有太多中國文學傳統「包袱」，此外在美國並無完備的相關評論資料等因素，都是影響他僅著重於文本細讀、書寫自己對文本的個人體驗。

總的來看《小說史》的重要性可歸納為兩點：第一，《小說史》是反共文學陣營最早的現代文學史。[195]儘管在「序言」時夏志清不斷的述說文獻、資料是如何缺乏，但對比於台灣在禁書查禁政策，以及香港因動盪而文獻散佚，夏所能接觸的現代文學資料已多於台、港其他評論者。[196]第二，《小說史》擺脫政治先行的評論方式，讓文學回歸文本內部意涵。如前面所述的在新批評的文本細讀下，對於文學作品的討論也是十分細緻且全面，在解讀作品時擺脫過往的政治立場（雖夏志清本身已持反共立場），讓魯迅的作品評論更加回歸作品本身。[197]

夏志清的魯迅研究可以「反『反傳統』」一詞來說明他具「洞見」的史觀，所謂的「反『反傳統』」有三個層次意思：其一是反對五四以降「反傳統」論述將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第二是反對「反傳統」論述的激進化，特別是共產黨所主張的文學應為社會、革命而服務之說；第三個層次為，在文學的社會性意義與藝術性意義中更著重於後者，而這一層的美學觀又以西方文學寫作的標準審視作品。在這三個層次上夏志清的魯迅研究表現出複雜的面貌，不僅小說解讀與時代有不同的新意，同時在文學評論中也帶政治性的批判。

換句話說，「反『反傳統』」可看見傳統與現代的千絲萬縷，並沒有承襲五

[195] 必須再行解釋的是，小說只是文學的一種文類而已，小說史並不能等同於整個文學史，不過也反映了當時代的整個歷史背景與文學發展脈絡。

[196] 夏志清說道：「耶魯那時候中文部門的書籍極少。它所藏的現代文學作品我全數翻看過後，就每月到哥倫比亞大學中日文系圖書館去借書。」、「除了借用兩家圖書館的書籍外，我自己新文學的藏書不多，差不多全是香港好友宋淇、程靖宇二兄郵贈給我的。」夏志清著，〈作者中譯本序〉，《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xxxvii。

[197] 誠如夏志清所述的：「民國三十八年前的作品，大部分不易在台灣見到，但近年來有好幾部新文學史問世，至少青年學子可藉以知道些人名、書名和大陸淪陷前文學發展的概況。」夏志清，〈人的文學〉，《人的文學》（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頁 223。

四運動後過度簡化的將兩者分立，嘗試在口號下觀看作家們如何在舊文學的養分中發展新文學。[198]他在《小說史》所述：

> 事實上，幾乎所有能夠忠實地描寫社會現實的左派文學，都和正統的革命文學和樂觀的共產主義文學不同。左派的寫實小說與晚清小說、魯迅一脈相承，自成一個諷刺傳統。[199]

夏志清不同於當時主流論述，將左翼文學與共產黨領導的文學結合在一起，而提出應分梳左派與共產黨的差異，因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對文學本體認知的分歧。此外，他也反對表層的看待口號的反傳統、反古文的五四文化運動，而重視討論這群五四文化運動健將在新文學的創作上所受到傳統文學、文化的影響。他自己也曾說道：「本來文學不分新舊，一般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提舊詩、舊小說，實在受縛於當年文學革命的偏見。」夏志清重新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三十年的盲點，在「反『反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異於中國主流論述的文學史評價，不論是文學美學或是文學內部的諷刺性，都與傳統文學有著深厚的聯繫。

整本《小說史》都可以看到夏志清「反『反傳統』」論述的努力，甚至提出許多具創見性的文學史論，比方說：不認同胡適提倡新文學而貶抑舊文學，認為文學與革命的論爭可以歸納為「留英、留美學派」與「留日學派」的對立等等，這都在在表現出他個人的文學史觀的洞見／偏見。夏志清的《小說史》與左翼學者的論述有著歧異，尤其是解讀魯迅的《阿 Q 正傳》以及雜文呈現不一樣的態度。第一，夏志清認為《阿 Q 正傳》獲得了言過其實的評價，事實上其藝術成就並沒有那麼高。第二，夏志清針對魯迅雜文與轉向問題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魯迅的轉向是希望繼續獲得群眾的擁戴，而不是真的認同共產黨理論。這兩部分解釋的不同不只是歷史見解的差異，同時也牽涉到不一樣的閱讀方法，展現了夏志清的反共意識形態，以及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獨特見解。

也許因為距離的關係，讓夏志清的魯迅研究走入美學探索，跳脫過往社會

[198] 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現代文學》復刊 1，1977.8，頁 42。
[199] 夏志清著、國雄譯，〈第五章 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獨立作家〉，《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105。

意義優先的評價，開闢出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路徑，而讓人也觀照到其他藝術成就價值極高的小說。夏志清〈阿 Q 正傳〉的批評反映其並不喜歡魯迅淺白諷刺性的作品，反倒是高度象徵技巧的〈藥〉、〈肥皂〉等篇章受其青睞。夏認為〈阿 Q 正傳〉是部「插科打諢」的作品獲得了過譽的評價，[200]《小說史》大力讚揚現代主義色彩濃厚的〈肥皂〉，而批判〈阿 Q 正傳〉的寫作技巧過於單薄、前後不連貫，這都表現出他個人強調創作的技巧、心理意識的美學觀，而較不注意文學對時代的意義。事實上〈阿 Q 正傳〉在發表後甫獲得肯定，包括了胡適、周作人、羅曼・羅蘭等人都給予該書好評，當然也有部分學者指陳其缺失，像是成仿吾就批評該小說結構上的問題，但整體而言給予其極高的好評。[201]

夏志清如同其兄一般強調文學創作的美學、象徵、隱喻，內容中是否有教化意義與啟蒙思想並非其評判標準，這就可以解釋《小說史》中對〈藥〉、〈肥皂〉的喜愛為何會多過〈阿 Q 正傳〉，但對現實社會來說〈阿 Q 正傳〉所獲得的反響與討論是遠比其他小說來得多的。換言之，對於藝術層面的要求成為夏志清整本《小說史》的重要評價標準，當然裡頭仍有許多反共「偏見」，並不能單純的以「新批評」研究方法帶過，刻意忽略了《小說史》中「史」的評論。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夏志清一反過去主流看法，較忽視〈阿 Q 正傳〉的社會性價值，而以美學作為評價作品的標準，試圖建立「反『反傳統』」的美學觀。

《小說史》除了政治性的批評〈阿 Q 正傳〉外也批評雜文，他覺得魯迅後期的雜文創作價值不高，社會批判性質濃厚且沒有太多美學技巧，並認為魯迅投入共產黨陣營後文學創造力盡失，只能雜文來掩飾創造力消失。他說道：「在他投共以後，雜文的寫作更成了他專心一意的工作，以此來代替他創作力的衰竭。……他反而參與一連串的個人或非個人的論爭，以此來掩飾他創作力的消

[200]夏志清這樣描述：「「吶喊」集中的最長的一篇當然是「阿 Q 正傳」，它也是現代中國小說中唯一享有國際聲譽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藝術價值而論，這篇小說顯然受到過譽：它的結構很機械，格調也近似插科打諢。這些缺點，可能是創作環境的關係。魯迅當時答應為北京的「晨報」副刊寫一部連載幽默小說，每期刊出一篇阿 Q 性格的趣事。後來魯迅對這差事感到厭煩，就改變原來計劃，給故事的主人翁一個悲劇的收場，然而對於格調上的不連貫，他並沒有費事去修正。」夏志清著、李歐梵譯，〈第二章 魯迅〉，《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33。

[201] 成仿吾，〈〈吶喊〉的評論〉，《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4.1。

失。」[202]從夏的論述語脈可以發現，其透過批判雜文進而也批評魯迅的人格，認為他那好辯的個性更於文章中嶄露無遺，且在投共後創作力便及衰竭。夏志清這種二元式的前期／後期、非共產／共產的簡化看待魯迅的思想，試圖製造：作家介入政治會導致創作力下降、品質不佳的邏輯。

夏志清認為魯迅的轉向並不是思想上真正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潮，而是希望向權力靠攏以持續獲得青年作家們的擁戴，並且跟隨時代潮流攻擊國民黨政權與親國民黨作家，以及當時反蘇聯、反左翼的文藝評論家。在夏志清的形塑下魯迅成了投機份子，為了獲得更多的掌聲、青年的擁戴而轉向，只是多唸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來「點綴」文章，事實上思想並沒有太多的轉變。[203]如此的說法呼應當時的親國民黨的學者，包括鄭學稼、蘇雪林等等批判魯迅也多由這樣的方向出發，鄭學稼以「浪子之王」來形容魯迅，認為他是大時代下的文氓；蘇雪林更直白的說左聯是由魯迅與郭沫若所領導，魯迅實質上是共產黨文化政策的領導人物。

夏志清對於魯迅這位文學人的政治行動頗不以為然，仍於「文學」與「革命」的關係上有所衡量，反對將政治、社會性意義介入文學史評價太多，捍衛美學作為文學書寫的主體。但持平而論，這種藝術優先的美學概念背後也隱藏著政治性的考量，因為「去政治」本身即是一種「政治」的表現，對於當下的政治性言論的不贊同、保持距離。換言之，夏志清強調藝術主體的美學立場本身蘊含了「反共」的意識形態，所謂的反共並不涉及對左派思想、文學作品的質疑，而是共產黨本身的文藝政策、政治介入文學的不滿。

夏的「反共」是立基於支持國民黨、反對共產黨，以個人政治判斷切入文學評論，而非僅討論藝術層面。之所以在此強調，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反共與親蔣並非絕然的等號，一如夏濟安的研究雖然仍立基於反共的意識形態，卻並未如夏志清如此的接近政治，這部分我們後續會談及。回到夏志清身上，他在《小說史》認為蔣介石若不是遇到日本侵略成就會更大，又說蔣介石的國家改革政

[202] 夏志清著、李歐梵譯，〈第二章 魯迅〉，《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44。
[203] 夏志清著、李歐梵譯，〈第二章 魯迅〉，《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43。

策滿腔熱血，是受到底下貪官汙吏的影響才有民怨，以及社會民不聊生。這種種的說法都可以看到夏志清的意識形態靠攏國民黨政權，並非單純在反共態度上支持而已，而是具某程度的認同、支持蔣介石。[204]

當然，如此的說法在反共文藝當道的年代裡並沒有甚麼稀奇，但《小說史》在藝術探究與政治評價上陷入矛盾，時而標舉藝術為宗的批評視角，時而流露出反共政治的宣傳話語，表現出夏在文學史「史識」上的猶疑，同時也是文學研究「藝術」、「人生」拿捏的兩難，其根本上所面臨的問題與魯迅在「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論爭所遇相差無幾。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發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主體的不同，前者著重於「文學」後者則關注於「革命」。在國家至上的風起雲湧時代，革命、政治的熱潮在文化階層蔓延，當時思想左傾的作家都將文學視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對社會現實的關注遠比文學的內涵來得更高。

回過頭來說，魯迅當時複雜的的想法，夏志清卻將其簡化的歸納為：魯迅的左傾是為了獲得青年支持，將他形塑成投機、立場搖擺形象，藉此抗衡中國神格化的魯迅形象。1949 年蔣介石政權撤退來台後，台灣與海外的許多作家都曾討論過魯迅與創造社、魯迅與左聯的糾葛，像是早期的王平陵、蘇雪林、夏濟安、夏志清、鄭學稼，甚至是較為晚近的玄默、劉心皇、胡菊人等人。如此的論述不僅意圖重構中國現代文學史，更是右派人士透過檢討與反思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左翼文化運動，希望從文化層面來了解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獲得政權。舉例來說，在《小說史》裡是這樣描述國民黨改革政策的失敗：

> 在進行改革的時候，蔣介石充滿一腔熱誠，很想讓中國變成一個統一的強國。他的改革，有些是值得讚許的，但是他的整個計畫，一開始就被那些受命推行這種道德紀律和思想信念的官員之無能偏狹所敗壞。這些官員，學問較差、文化水準也不太高，根本無力在辯證法上跟共產主義抗衡。甚至連領導宣傳工作大員如陳立夫和周佛海，也只能拿孫中山的教義來妝點門面和搪塞敷衍而已。在這十年中，共產黨在軍事上被打了，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可是在文化戰線方面，逐漸取得陣地，因為在這方

[204] 詳見夏志清著、國雄譯，〈第五章 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獨立作家〉《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97。

面，國民黨的勢力是最糟糕和彆腳的。[205]

國民黨的大敗不僅是因為在黨內多頭馬車相互箝制，對外也沒有一套完整的論述足以與社會主義路線抗衡。這種現象中華民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有貼切的描述：「二十年來國民黨掌握到的就是軍權和政權，共產黨掌握到的是筆權，而結果是筆權打垮了軍權和政權。」[206]1938 年國共兩黨共同組成「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共同一致以民族主義論述對抗日本侵華戰爭。

如前所述的，共產黨在文化陣地的成功，也讓他們即便受到武力圍剿還能利用輿論的力量對抗國民黨，「西安事變」作為兩黨鬥爭的關鍵，既阻擋國民黨的軍事攻擊，也扭轉了國共在政壇間的局勢。夏志清利用討論國共鬥爭比較出文化戰線的重要性，進而反思國民黨失去政權主要是沒有好的文化宣傳工作。而這種描述左翼文化運動的醜陋面，除了檢討、思索過往失去河山的原因外，透過敘述右派所認知的「真相」來解構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神聖性。

魯迅一直是文化界的指標人物，在共產黨有意的塑造下成了左翼文化界的精神導師，也因此解構魯迅神話同時也是解構共產黨政權。從夏志清對於魯迅的討論可以發現，裡頭夾雜著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以及對於中國的愛恨情仇。夏在處理魯迅著作時，雖不斷表達以文本細讀出發，但《小說史》在描述被神格化為中國新文學之父、被拱入神壇的偉大革命家的魯迅時，透過批判魯迅來轉化自身批評共產黨的立場，這是冷戰時代下反共陣營的慣用論述，因為魯迅符碼本身所代表的是更為駁雜的政治中國形象，而夏志清嘗試透過《小說史》創建不同於紅色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美學觀。進一步來說，如何建立起右派的文學史架構安置魯迅於文學史，與中國左翼文學史相互抗衡成了《小說史》重要的書寫動機。

這種與海外主流意識形態共生之論述，讓夏志清很快的在冷戰體系中取得重要的位置，《小說史》在異於國、共兩黨文藝政策與符合國民黨意識形態的

[205] 夏志清著、李歐梵譯，〈第二章 魯迅〉，《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99。
[206] 丁淼，《中共文藝總批判》（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頁 36。

曖昧地帶中獲得海外不同勢力的關注，不論是西方世界或是台灣、香港的文壇，《小說史》的出版旋即進入文學史的經典之作，成為各大專院校的重要教材。當然，這或許是夏志清長期努力所累積的文化資本，加上 1960 年代海外求學的研究者陸續回到台港兩地學校任教，以致於《小說史》出版後很快的為學界、文藝界所接受。少數異議之聲的質疑只是在寫了誰、不寫誰的文學史典範的爭議，卻不影響《小說史》在 1980 年代以後成為台港兩地現代文學史的經典。[207]

第三節　言說的艱難：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1971）中被隱藏的魯迅

相較於夏志清《小說史》獲得經典的地位，劉心皇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話》[208]則鮮少人提及，不僅因為它是一部結構不完整的文學史，同時也由於劉心皇的論述並未有太突出的看法，因而在現今常常為人所忽略。綜觀整本書以雜燴式的拼貼，一方面收錄了葉青、任卓宣、蔣夢麟、林語堂、羅家倫、杜果人、王平陵、胡秋原等人討論新文學運動的文章，另一方面援用自己過去對郁達夫、徐志摩、林語堂、周作人的研究成果組合而成。如此剪裁各家之言的組合式文學史導致內容駁雜，雖然有許多名家都是新文學發展的見證者，但當他們的論述僅只於回憶性文字時，也喪失了客觀評述與歷史保持一定距離。

當然，該書以「史話」為題就是想擺脫撰寫歷史的嚴謹，透過輕鬆的編排和筆觸來處理現代文學史的相關問題，但實際是希望以「史話」的書寫形式逃避那些無法涉及的文學史禁區。香港作家方寬烈在讀完後也同樣看到此問題：「劉著則因台灣懼共，對左派文人亦語焉不詳。」[209]換言之，《史話》內容比例失衡，或許是劉心皇並未具宏觀的文學史書寫意圖，更有可能是因為台灣當時政治、社會氛圍使然，以至於在書寫文學史時必須運用不同的策略突破官方

---

[207] 如同朱介凡在〈評中國現代小說史－－並提證文壇傳薪錄兼說文化戰問題〉對於夏志清的質疑，主要著眼點在於三十年代以降的海外華文作家只提及姜貴而未討論其他作家，這是朱介凡最大的批評主要點。朱介凡〈評中國現代小說史－－並提證文壇傳薪錄兼說文化戰問題〉，《文壇》250、251、252，1981.4~1981.6。

[208] 以下簡稱為《史話》。

[209] 方寬烈，〈司馬長風的傳奇〉，收錄於《司馬長風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出版社，2009）頁 57。

圖書出版法的管制與檢查，以建構出符合國民黨政權規範下的現代文學史。

詹姆士・史考特（James Scott）曾提出「隱蔽文本」的說法，來說明被統治者如何逃脫統治者的監控創造出屬於自身的論述策略，他在《統治和抵抗的藝術：隱蔽的文本》[210]一書中就以印度的種姓制度、白人與黑人的奴隸制度來說明被統治者所發明且流傳、溝通的書寫方式。這種隱蔽的文本不只存在於族群之間，湖南的「女書」也是類似的例子，在女性之間創造出屬於自我的書寫形式。

當然劉心皇的書寫並非要與統治者、國家機器對抗，而是原有的文學史論述間曖昧的討論魯迅，並給予魯迅正面的評價。但在國家機器監控，社會氛圍還未能太過清楚、明白的表述魯迅的情形下，劉心皇僅能策略性的運用「隱蔽文本」的方式來還原魯迅在文學史的地位。尤其是「史話」出版的前不久，陳映真才在 1968 年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遭到逮捕，在此社會氛圍中閱讀魯迅仍有極大的風險。所以劉心皇在《史話》不願意碰觸魯迅是有其原因可尋，但從劉的論述脈絡可看出他對魯迅的好感，也因此必須透過婉轉、隱微的方式陳述魯迅與現代文學發展的關係，以避免沾惹不必要的政治紛爭。

必須先說明的是，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相關出版品的監控與管制系統雖受制於出版法的管制，但更多時候是取決於執法者、檢查者的自由心證，而不會有既定的檢查模式與一定的明確的規範。換句話說，執法者有極大的權限可以決定誰可以談論魯迅，而談論魯迅的尺度與底線到哪裡，並且依照評論者的背景與政府的關係而有所不同。若先了解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劉心皇在《史話》為了擺脫管制與檢查，大致產生的兩種敘述魯迅的方式：

第一，以流水帳形式中性的帶過魯迅個人的事蹟，不帶太多評述的說明魯迅與新文學發展的關係。比方說在內文中劉心皇這樣說道：「魯迅的『狂人日

[210] Scott, James C,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記』在『新青年』上出現的時候，也還沒有第二個同樣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樣成功的第二篇小說。」[211]這段話的潛敘述可以轉換為：「魯迅〈狂人日記〉發表時，當時文壇並沒有其他小說能夠與之比擬，也因此談到此時的文學發展必定要談及魯迅的〈狂人日記〉，無法忽視其於現代文學發展的價值。也就是說，劉心皇透過這樣的寫法與國家體制表面「輸誠」，雖說是歷史事實「也還沒有第二個同樣惹人注意的作家」使其文學史不得不提及魯迅，但實際上劉想藉此強調魯迅在文學史上的重要，說明在新文學草創時期魯迅的重要地位。

第二，利用他人的文字討論魯迅與新文學的發展的關連。在述及魯迅對新文學的貢獻與關連時，劉心皇往往避免自己闡述而多用他人之語來說明。細看《史話》內容，劉心皇本人述及魯迅部分極少，反倒運用他人論述來談魯迅在文學史的位置。在《史話》裡收錄蔣夢麟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解釋魯迅的創作在新文學的重要性，林語堂的〈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談魯迅於 1930 年代中期與左派之間的糾紛。而《史話》中自己談及魯迅的部分非常少，文章以匆匆數筆流水帳交代〈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的寫作時間與概要，當行文到了敘述魯迅其人、其事時，劉又引述胡適、蔣夢麟的說法，刻意將自己擺在第二線的位置躲避直接敘述、討論魯迅。

但部分之處劉心皇還是會不經意的表述自己的看法，比方說在《史話》中有一段文字，劉先是引述了胡適對魯迅的討論，並於其後加入這樣的點評：「這是胡適對魯迅兄弟的評價，接著他又曾說明魯迅上共黨的大當，在死前又反共的經過。魯迅既然反共，在談新文學史時，不能不談他。」[212]於此，劉心皇刻意引述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話語，建構魯迅曾誤入歧途「上共黨的大當」與其後「反共」的身分，有意幫魯迅平反。劉希望利用建構魯迅「反共」的形象，並將其與左聯的合作說成是「誤入歧途」的方式，讓國民黨的文化論述接受魯迅符碼。由上述就可以看到劉心皇在《史話》中所潛藏的「隱蔽文本」，在政府高壓統治之下，希望在體制的縫隙內偷渡、討論魯迅，嘗試將魯迅符碼

[211]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台北：正中書局，1971）頁 221。
[212]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台北：正中書局，1971）頁 223。

合法化建構正面的魯迅形象。不過由於討論左翼作家在反共體制是種禁忌，所以為了避免麻煩劉心皇相當小心的帶過不做太多的評述，或者以他人之語來為自己的意見做佐證，藉此避開國家機器在言論、出版上的制約。這種小心翼翼的氛圍貫穿整本文學史，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整個社會逐漸開放後，劉心皇出版了《魯迅這個人》一書之後而有較多討論魯迅的文章。

細讀整本「史話」可感覺到討論個別作家時的內容比重失衡，並未具更全面的文學史、文化史的框架，光論郁達夫一人即用 70 頁，反觀有關魯迅的文字卻夾藏於各篇章，並沒有專章來分析，在敘述其形象與貢獻時也是相當含糊。極為有趣的是夏志清盛讚《史話》，認為該書針對部分作家進行深度評論，對比於周錦、司馬長風等人的文學史更具可讀性。他說道：

> 我認為四種巨型文學史間，他那本「現代中國文學史話」最令人滿意，雖然劉先生寫得是『史話』，沒有把重要的作家一一評論一番。唯其如此，那些他曾作過研究的作家，例如劉半農、郁達夫、朱自清、周作人、林語堂、徐志摩，其生平和作品之道頗詳，可以分章暢論。[213]

但劉心皇選取研究的作家都是符合官方意識形態，如此的「史話」的取材早已排除左翼作家的作品，不只是魯迅而已，被列為現代文學大家的其他幾位：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未在文學史上有所細部分析，篇幅又比魯迅少得許多，這背後可以看見政治算計痕跡鑿鑿。

或許我們可以說，劉心皇有意塑造屬於中華民國的現代文學史，特別是包括了 1949 年後「自由中國」作家群在台灣的狀況，所以其已限定了一定的範圍討論中華民國統治或與其政權相近立場的作家。也就是說，這「史話」不以民族立場作為文學史的書寫，而是以符合國民黨政權的政治立場來決定是否被寫入文學史。「魯迅符碼」也僅在符合國民黨政權意識形態的部分被闡述，曖昧的潛藏於文學史的一隅。但換個角度來看，國民黨也不再全然的封鎖魯迅相關論述而開始有更多的討論、轉圜空間。

[213] 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現代文學》復刊 1（1977.8）頁 51。

如前面章節所提到的，早在 1962 年胡適去世時蘇雪林一系列的批魯、擁胡、吹捧自己的文章，就引發劉心皇、寒爵、鳳兮等人的不滿，進而發文與蘇雪林有過論爭。當時候劉心皇的言論僅對蘇雪林過份吹捧自己與對魯迅態度的「昨是今非」提出異議，自己對於魯迅及其文學的看法是如何，卻也同《史話》一樣沒有太多著墨。直至 1986 年才出版了《魯迅這個人》，才看見劉心皇有較多篇幅表達了自己對魯迅的看法，以及對於 1930 年代文學史的見地。此書集結了劉心皇 1980 年代開始發表與魯迅相關單篇著作，專門討論魯迅與當時社會的關係，也連帶論及他所處的時代的文壇場域。也因此我們可以將《魯迅這個人》視為其文學史的延伸，從閃避談論到專論魯迅，這樣的轉變與時代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

而從劉心皇《史話》的迴避到出版《魯迅這個人》的專論，不是其個人對魯迅的態度的改變，而是外在的政治環境有所變化，使劉從迴避談論到正面論述。從整個台灣的社會背景來看，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全台實施戒嚴，國家權力透過軍、警、特等多項管道防止人民有非法行動，認定未經許可不得集會結社，並管控書報雜誌發行。一年後於 1950 年 5 月 23 日經由立法院決議通過「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將戒嚴狀態透過立法明文化。根據此項法律只要有匪諜嫌疑者，國家權力可以逮捕、扣押、審問、甚至針對住宅相關物品進行搜索。之後接連在 1951、1952 年通過「管制各種書刊進口命令」與「出版法」，嚴密監控出版刊物繼而控制台灣人民的言論自由。[214]

隨著台灣風起雲湧的民主化浪潮，蔣氏父子在任內被迫開放更多的空間與自由，尤以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震撼全球，加速了台灣民主化的腳步。另一個使魯迅形象轉變的關鍵是 1982 年魯迅長孫周令飛「叛逃」來台，在當時獲得極大的關注，台灣的媒體報導周令飛的背景時也介紹魯迅，而發生此事件讓台灣由私下、秘密的談論魯迅逐漸轉變為可以在公開場合討論。進一步來說，周令飛來台所引發報紙雜誌的魯迅熱，讓他在 1982 年出版了《三十年來話從頭》的自傳，裡頭有多談及自己的生長經過與中國文革社會情況，可以看

[214] 參考自：薛化元，《戰後台灣歷史閱覽》（台北：五南出版社，2010）。

見官方已抱持較為開放的態度，讓人民接受中國相關資訊與文學作品。[215]根據台灣歷史學者管仁健對當時社會情況的描述，周令飛來台事件後，台灣方面對魯迅的立場也有所開放，當時坊間開始出現許多討論魯迅的著作，或者盜印販賣魯迅的作品，甚至出版社盜印左翼作家的書籍都張冠李戴的以魯迅之名來販售以增加銷售量，形成非常特殊的社會現象。[216]

劉心皇《魯迅這個人》便在此社會氛圍下寫成，從過往的曖昧、避談到以專書討論，內容多圍繞於 1930 年代以後魯迅與左聯的紛爭，也補足了《史話》歷史敘述薄弱之處。比較兩本著作可發現，劉心皇對魯迅的態度沒有隨著時代而有所改變，雖不否認魯迅作為左翼知識份子的身分，但也都十分強調魯迅的「反共」位置。觀看《魯迅這個人》一書有意為魯迅平反，並且強調魯迅與其他左翼文學家的矛盾，不僅是左聯四條漢子而已，書中也拆解魯迅與茅盾的疏離，以及胡風利用魯迅的權謀，淡化或不論魯迅對國民黨政權批判。

劉心皇以魯迅為引子討論 1930 年代文壇的紛爭，最後留下這樣的結論：

> 一、屬於中共利用文藝的：它成立了「左聯」，利用魯迅的聲望，進行統戰的工作。但魯迅知道被利用，亦時有反抗的心聲。
> 二、屬於反「左聯」的文藝團體和個人的：這種文藝團體不僅拿不出令人欽佩的貨色，而且往往見首不見尾的不能持久的戰鬥。至於個人則更是往往虛幌一槍的居多。
> 三、屬於黨和政府的：沒有很好的文藝政策，即便有一些方案和計劃，執行的也不夠徹底。所以說，三十年代的文藝運動，不是左聯厲害，而是黨和政府的疏忽。[217]

由這三點可以看到，劉心皇努力為魯迅平反，同時對於國民黨政權在 1930 年代的文藝政策有所批評，若以現在的角度來看，劉心皇的《魯迅這個人》並沒有太突出的看法，但是回到 1980 年代，在當時社會氛圍談論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與魯迅的關係實屬一大突破。從《史話》到《魯迅這個人》可見劉心皇嘗試

---

[215] 綜觀周令飛整本《三十年來話從頭》儘管仍籠罩魯迅的陰影，但內文中並未太多談及關於魯迅的部分，反倒很多地方都能看見周令飛棄中國來台灣，除了是愛情因素外，擺脫祖父的盛名之累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216] 管仁健〈台灣出版業者怎樣強姦大陸書〉
部落格：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281895779 （2014.3.3）

[217]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台北：正中書局，1971）頁 180。

在文學史中給予魯迅公正的地位，並且在國民黨官方論述之外，嘗試沉澱後有更多的檢討，而這檢討聲所展現的是台灣政治體制從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逐步開放，於解嚴的前夕出現了可以討論敏感議題的縫隙。

第四節　民族大義的美學觀：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1978）的魯迅形象建構

司馬長風本名胡欣平，因戰亂 1949 年南下香港避難，在香港文壇是多棲的文人，其身分既是政論家、文學家，同時也是教育家，長期在《展望》、《大學生活》《兒童樂園》、《明報》、《中國學生周報》等雜誌撰寫文化、政論文章，1970 年代因受到徐訏的影響，從 1974 年開始動筆到了 1978 年歷時四年時間完成《中國新文學史》[218]。司馬長風的《新文學史》不似夏志清般有嚴謹的學術研究論述，也不若劉心皇的《史話》受到政治外力箝制，內容具備學術框架與回憶性雜敘，混雜了作者強烈的主觀美學，為香港留下一本極為特殊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219]綜觀《新文學史》整體評價貶多於褒，多數評論者認為這本文學史有許多疏漏，像是夏志清在〈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認為該部文學史不夠「嚴謹」，評論作家時並未完整將其著作閱畢[220]。劉以鬯說他對新文學的認識十分膚淺，且內容錯誤百出。[221]黃維樑則說該書「準的無一、雜亂無方」，雖然文字流暢，但在評點作家、作品時「輕率急就」太快作結。[222]李愚更是嚴厲的抨擊《新文學史》是「一部無知而充滿偏見的『中國新文學史』」。[223]然而，不論評論者如何批評，司馬長風的文學史仍在香港文壇具備一定份量，述及新文學史時絕對不忘他的貢獻。回到時代來看，《新文學史》問世之前香港坊間佔據著中國版本的文學史著作，包括先前所述及的幾本中國大陸出版的文學史，當

218 以下簡稱《新文學史》。
219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冊（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頁 373。
220 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現代文學》復刊 1（1977.8）頁 41。
221 劉以鬯，〈我所認識的司馬長風〉，收錄於林曼叔編，《司馬長風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頁 31。
222 黃維樑，〈略評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收錄於《香港文學初探》（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
223 李愚，〈一部無知而充滿偏見的「中國新文學史」〉《文學與美術》第 5 期，1976.10。

然也包含劉心皇的《史話》。相比之下，司馬長風的《新文學史》因香港的特殊環境，不像兩岸的文學史受國家機器控制，可自由發揮意見。王劍叢就說：「質量上比五十年代初期的那幾部教科書，有明顯的提高。不僅材料詳實，系統性強，對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深入了一層。」[224]也是在此基礎上，司馬長風的文學史與共產黨版本的文學史對話，並且提出反共立場的歷史敘述。[225]

綜觀整本《新文學史》主要的論點有二：

> 第一，這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鎖，乾乾淨淨以文學為基點寫的新文學史。
> 第二，這是以純中國人的心靈所寫的新文學史。[226]

而這也是《新文學史》的文學觀，希望文學擺脫任何政治外力束縛外，且強調文學中的中國特性，而在這兩個標準來看魯迅於文學史的地位就極為有意思。也就是當魯迅將文學作為醫治中國人國民性的方式，但這種啟蒙、改造的社會使命在司馬長風的論點中是不被看重的，並認為那是污染了純淨的文學園地，此外，是否能夠真正的表現出中國的特色，也是司馬長風所在乎的另一項標準。

司馬長風長期以來就有在發表政治性評論，散見於《明報月刊》、《中國學生周報》、《展望》的雜誌，內容多為反共的批評時政。但他的文學史最大的爭議不在於其反共色彩，而是反對「文以載道」的文學觀這點受到最多評論者的爭議，而是他的在文學美學觀時，要求文學不受任何政治的干擾，給予文學完整而乾淨的空間，這一點受到許多評論者質疑。當然，司馬長風批判「文以載道」的文學同樣是針對海峽兩岸的國、共兩黨將文學工具化，他自己曾這樣明

---

[224] 王劍叢，《評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兼比較內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文學》第 22 期（1986.10）。

[225] 雖說當時候香港除了司馬長風外也有李輝英的文學史，但兩人基本上算是同時期完成，所以就當時香港文化圈來看，1975 年之前是沒有自己本地作家所書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如同王宏志所述的：「至於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他決定以純文學作為評價作家作品的標準，實際上是對中共的現代文學史寫作一種最直接的抗衡，這可以聯繫到他一直在國內所堅守的反共立場，所不同的是他過去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寫政治評論的文章，而現在以『中國現代文學史』這種模式來進行抗爭罷了。」王宏志，《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頁 29。

[226]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冊（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頁 324。

白的說明：「我反對『文以載道』，不論甚麼道，是只就文學與道的關係而說，並未涉及任何『道』的內容，也並未涉論各種對道的具體態度。」[227]在司馬長風看來，文學可以反映人生，但是卻不可以為人生而書寫文學，這裡頭的差異在於文學是否是具主體性的存在於世，有一獨立於天地屬於自己的客觀價值，而不是附屬於承載社會性啟蒙、教化的意義，成為了政治與社會的附庸。

魯迅的作品多半是為了反映人生與現實，並且在文本中帶有啟蒙教化的意義，這些「文以載道」的「工具」都被他視作粗陋、寒素的寫作。所以司馬長風在文學史中描寫魯迅時便多所批評，他說：「偏用文學作品表達思想，固然毀了文學，也必然糟蹋了思想。」[228]司馬長風便在此脈絡下批判魯迅的雜文，認為魯迅的雜文只是「濫用文字罵大街」而已，在文學史中根本沒有花任何篇幅細究。[229]舉例來說，他在談及〈狂人日記〉時就這樣批評魯迅：

> 魯迅是說把小說（也可以說是文學），看成了「改良社會」的工具，在他看來，小說並不是為了表現藝術的美，而是利用小說形式，藝術裝飾來傳達「改良社會」的思想，來激動人們去改良社會。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他便不再多作藝術加工，因此藝術之肉每每包不住「改良社會」之骨，作品未免太寒素，有時太簡陋了。又因為「不太去寫風月」，使作品缺乏彩色和情調。讀來如置身在陰暗天幕下的冰原上。〈狂人日記〉以及其後大部分作品都表現上述的缺點，而「狂人日記」的粗糙，又冠於其他諸作。[230]

司馬長風認為魯迅的創作動機是為了改造社會，所以當文學書寫已達此標準之後，就不會進一步的追求作品的藝術層次。〈狂人日記〉最是最好的例子，作品色調灰暗且缺乏情調，粗陋的行文只為了鋪陳「禮教吃人」的價值。除了〈狂人日記〉之外，司馬長風也用不少的比重論述〈阿 Q 正傳〉的缺點，他借用魯迅自己對〈阿 Q 正傳〉的批評來證明現今文學史評價上的錯誤，試圖重新給予「第一傑作」不同的評價。他認為〈阿 Q 正傳〉文字難懂、阿 Q 角色無統一

---

[227] 司馬長風，〈答覆夏志清的批評〉，《中國新文學史》上冊，昭明出版社，1973。後收錄於林曼叔編，《司馬長風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頁 131。

[228] 司馬長風，〈反抒情的文學論〉《新文學史話－－中國新文學史緒編》（香港：南山書屋，1980）頁 83。

[229] 司馬長風，〈雜談雜文〉《新文學史話－－中國新文學史緒編》（香港：南山書屋，1980）頁 120。

[230]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冊（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頁 69。

個性，獲得如此高的好評是因為表現中國民族的劣根性，而獲得世人過譽的讚賞，而在藝術層面不屬於一傑作。[231]

許多評論者對司馬長風這樣「純美學」的看法都提出異議，王劍叢就曾質疑：「司馬長風的這個觀點顯然是偏頗的。甚麼也「不為」的純文學，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現的。」[232]王宏志也以他政論家的角色提出質疑，認為一個「政治思想這樣強烈分明的人，能夠寫出一部完全拋開政治、『乾乾淨淨以文學為基點的文學史』來嗎？」[233]這質疑並非沒有道理，司馬長風追求純文學是否是其目的，又或訴諸「純文學」只是手段而已，最終仍然抱持某種意識形態。在眾多評論者中陳國球的看法相當特別，他認為司馬長風並沒有完全將文學與政治二分，只單純的擁抱「純美學」而已，司馬長風所擁抱的純文學其實是要求文學能「鍾於感受」、「表現自己」，並不會受到外力的干擾。[234]

在這觀點上夏志清與司馬長風甚或前面所述的蘇雪林都有相似之處，這些作家都有反共的意識形態，但文學觀也都不同意文學作為政治的宣傳工具。夏志清在《小說史》說：「文學既然要載道，對藝術有時就不皇顧及了。現代中國作家對外國文學作品認識的機會極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外國作家索感興趣的，以思想為主，藝術成就其次。」[235]而司馬長風也對載道文學有相同的批評：「我們反對文以載道，是從文學立場出發，認為文學自己是一客觀價值，有一獨立天地，她本身即是一種神聖目的，而不可以用任何東西束縛她、摧殘她，迫她做奴婢做侍妾。」[236]兩人都認為文學不能受政治干預應有獨立的地位，反對文學為政治而服務做政治的宣傳品。比較來看，司馬長風的說法又比夏志清來得絕對，認為政治可以干預文學就是「為人生」的藝術價值所造成，所以創作如何可以不為任何只單是藝術層次，是司馬長風所追求的文學價值。

---

231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冊（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頁 108。
232 王劍叢，《評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兼比較內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文學》第 22 期（1986.10）。
233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頁 118。
234 陳國球，〈詩意與唯情政治－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226。
235 夏志清著、劉紹銘譯，〈第一章　文學革命〉，《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xvi。
236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冊，頁 5。

這就可解釋中國大陸文學史系統與海外文學史系統在理解魯迅作品時的差異，在中國左翼路線下的魯迅作品解讀，標舉魯迅作品的社會意義已是共識，並且更進一步認為這是呈現社會性思想的左翼路線。至於海外系統，不論是夏、司馬兩人對〈狂人日記〉與〈阿 Q 正傳〉的載道都有批評，不同之處在於兩人信仰不一樣的美學價值，也因此雖立論相似的批評〈狂人日記〉與〈阿 Q 正傳〉，甚至都注重文學的美學與藝術，但夏志清所崇尚心理描繪的現代主義小說精神，與司馬長風鍾情的牧歌式中國美學完全不同，兩人之間的美學差異也引發了文學史書寫的交鋒。

夏志清於〈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四種合評〉評論司馬長風的《新文學史》時，主要批評他在強調美文的同時抹殺了西方文學思潮對中國的影響，甚或太過強調了中國文學的特殊情懷，標榜自我民族的特性，而容易陷溺於為他者而書寫的異國情調。[237]面對夏志清的質疑，司馬長風以〈答覆夏志清的批評〉重砲回應，認為「文學作品必須具有民族性，才能在世界文壇上競躍」，過度的模仿西方的技巧與內容，將無法創造屬於中國所獨有的文學。[238]他在其他地方也曾闡述這看法，對模仿西方沒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感到憤怒：「文學形式上模仿西方，連個人的感受也模仿西方，這才是真正可悲的『失落』！失落了民族性，也失落了個性；換言之失落了獨創性。」[239]司馬長風認為中國之美之所以為世人所見，不再遵從西方的美學價值，而是創造出屬於中國自身特殊的藝術特色。

司馬長風的想法與當時在香港新儒學觀有類似見解，特別是與儒學大師唐君毅先生的看法也有頗多契合處。司馬長風在〈憶唐君毅先生〉一文中就寫到自己承襲唐君毅先生思想的經過，同樣也提到建構「中國人文精神」的重要。[240]唐君毅反對以進步潮流之名行拋棄傳統歷史、文化的西化風潮，他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中就展現了這樣的焦慮，認為文化若一味的求變而不固守

[237] 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現代文學》復刊 1（1977.8）。
[238] 司馬長風，〈答覆夏志清的批評〉《現代文學》復刊 2（1977.10）。
[239] 司馬長風，《新文學史話－－中國新文學史緒編》（香港：南山書屋，1980）頁 67。
[240] 司馬長風，〈憶唐君毅先生〉，刊載於《明報月刊》第 13 卷第 3 期，（1978.3）。

其根本，這並非進步的思想反倒是種輕薄的態度。[241]司馬長風的焦慮並非單一特例，面對反共世界的自由陣營，美國透過「美新處」大量進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學作品，逐漸改變了台、港兩地的文學品味，使得現代主義的作品成為了 1960 年代以後的主流文藝思潮。

中國的 1930 年代初期林語堂所提倡的「性靈文學」也有類似的說法，都強調人內在的靈魂的封閉性，絕對排斥自我之外的國家、民族、人民、社會的關注，希望文藝自然流露本性必須擺脫社會的約束。而林語堂、周作人的說法在當時也引發左派文化人的攻擊，魯迅就認為他們的作品是在：「麻痺民族靈魂的麻醉性作品」。[242]那是在中國風雨飄搖的時代下所產生的文學反映現實的結果，當時整個文化界多半具左傾思潮，少數如林語堂、梁實秋等新月派的立場，則仍將文學視作藝術表現、超脫現實之作。而司馬長風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與西方十九世紀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潮有極高的相似，其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功利性的訴求都是源自德國古典美學與法國唯美主義。但這種表象上是去政治的美學觀點，其實背後具強烈捍衛傳統中華文化，與當時香港殖民社會以及反共意識形態密切相關。

進一步來說，筆者不願評斷夏、司馬的是非對錯，兩人的美學觀之差異是信仰的不同，因而無法以一致的標準來評判。司馬長風嘗試走出一條既非依附國、共兩黨的「文以載道」文學，同時有別於夏志清以西方理論、美學觀為標準，創造出以文學自身作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的文學面貌。這條道路具捍衛中華傳統文化的意識形態，一方面是回應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破壞傳統文化，另外一方面是對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入侵。不僅如此，司馬長風撰寫《新文學史》時，正逢英國殖民政府收束香港中文大學的自主權，以西方教育的體志強壓這群帶有強烈民族使命的南來學者，這問題引起了在香港人極大的反彈，因而在文學、文化上會更加擁抱中國的特殊性，排斥以西方美學作為評判標準。這所呈現的是當時香港的時代氛圍，華人與英國殖民體制的衝突、香港政治、社會環境與中、台兩地的不同，也同影響了司馬長風文學史的內涵。

---

[241]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灣：三民書局，1971）。
[242] 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 4 卷，頁 575。

必須多作說明的是，對司馬長風而言，這種中國式的特色是必須擺脫文言文的枷鎖而具白話、淺白的敘事，他認為《吶喊》、《徬徨》都還有許多文言文的影子，相較來說《野草》、《朝花夕拾》則掙脫了這樣的束縛所以也較為生動。然而這種白話文書寫卻同時必須具備中國地方特性、風俗，表現民族性與地方特色，同時具有浪漫、抒情的美文，在這些條件下文學史便以沈從文的作品為標準。而在推崇純淨、易懂的白話文背後所展現的是民族情感的大一統，超越兩岸的政黨政治，並具有接續五四以降的新文化運動之使命。

所以司馬長風在《新文學史》中僅對〈孔乙己〉、〈藥〉、〈故鄉〉、〈在酒樓上〉有所讚譽，其中又以〈故鄉〉、〈在酒樓上〉獲得最多的好評，認為這幾篇相較於其他更富人情味，重要的是揭露社會病苦的作用不大。[243]特別是他以極大篇幅討論〈在酒樓上〉，認為此篇如〈孔乙己〉、〈故鄉〉一般擱置了反傳統的使命，同時小說內容雅俗共賞並具卓越的寫實主義技巧，在小說鋪陳上具備濃郁的中國景物描繪，將新文學與傳統白話文學接連在一起。這樣的評論可以在司馬長風另一本文學史《新文學史話》得到更進一步的印證，他在談及一般讀者、魯迅、司馬長風本人三者對魯迅小說喜好之不同時，是這樣分類的：

> 關於魯迅的小說作品，可由下列三種意見來說明。
> 一、魯迅自己對〈藥〉、〈肥皂〉、〈離婚〉評價最高。
> 二、一般人則讚賞〈阿Q正傳〉、〈祝福〉和〈狂人日記〉。
> 三、我則偏愛〈在酒樓上〉、〈故鄉〉和〈孔乙己〉。
> 第一組小說，〈離婚〉較佳，其餘兩篇都有嚴重缺點。關於〈藥〉，缺乏戲劇化焦點，〈肥皂〉則主題過於晦澀，必須用考證的眼光，才能會意主題所在。第二組小說，太偏重社會意義，概念過剩，〈阿Q正傳〉技巧漏洞太多。第三組小說，技巧圓熟，富人生彩色，形式與主題達成和諧。[244]

司馬長風所喜歡的作品除了具中國民族特色外，同時也有著抒情的色彩，而這也更加清楚表現其美學觀。而事實上第一類魯迅較滿意的小說作品，是現代主義色彩較濃的小說，也是夏志清於《小說史》評價較高的幾篇，但在司馬長風眼裡流於晦澀、難懂的作品。

---

[243]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冊，頁107。
[244] 司馬長風，《新文學史話－－中國新文學史緒編》（香港：南山書屋，1980）頁14。

當然文學史的敘述必然包含著作者個人的主觀意識形態、生活經驗與美學品味，所以我們很容易可以藉此扣連起司馬長風在香港的生活。因為在現實生活他與香港有很大的衝突，一位北方南來的文人、不會說廣東話，對西化的香港極度不適應，這些種種因素讓他對原鄉懷有濃烈的鄉愁，且對西化事物感到反感。[245]這也成為他書寫現代文學史的動機，希望文學史保留中國抒情美學的一面，以自我主觀情感的方式評判文學，而魯迅也在此標準上遭受檢驗，只有部分符合其美學的抒情與鄉愁作品受到褒揚。這樣的情感或許如陳國球所評述的，是對中國的眷戀與鄉愁導致在文學史中汲汲營營追尋純淨的中國想像。他說道：

> 在司馬長風的時空裡，白話文的作用不在於回應當前的政治現實，而只在於建構內心的「中國想像」，或者說是，重構那分鄉土的回憶（…）香港的語言環境與司馬長風的中國想像有很大的衝突，可是司馬長風卻對此不捨不棄，甚至要努力將這個中國想像純潔化——要求文學語言的「純」，排斥駁雜不純的「歐化」和「方言化」現象。[246]

陳國球的精闢分析解剖了司馬長風潛藏於文學史中的鄉愁，也因為這份鄉愁讓他特別稱許魯迅的〈故鄉〉、〈在酒樓上〉。這兩篇小說的主人公都在追憶過往的回憶，卻又因為現實的挫折與故鄉人事景物的變化、不復返陷入無以名狀的憂愁。他在評述這兩篇小說時用到「富於人情味」、「每句每字都有根」的評語，但這或許是因為這兩篇作品與他的現實生活有所共鳴，所以對這兩篇小說有較多的好評。但我更認為，這種鄉愁所凸顯的是這些南來的文化民族主義者與英國殖民政府之間所存在的尷尬關係，更可進一步視為美援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嘗試收編，部分右派文化民族主義者在與西方勢力對峙後最終轉向支持共產黨，主要原因是認為未來中國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具中國代表性，因而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與民族主義的大旗下「回歸」，《盤古》雜誌就是個明顯的例子。[247]

---

[245] 如同陳國球所述：「香港雖是司馬長風一生居住最久的地方，但他總覺得是在異鄉作客，因為他心中存有一個由回憶和想像合成的，包括語言、文化、風俗、民情的中國鄉土。」陳國球，〈詩意與唯情政治－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217。

[246] 陳國球，〈詩意與唯情政治－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215。

[247] 羅永生，〈六、七O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人間思想：亞洲現代思想計畫》2012 夏季號。

有趣的是，儘管司馬長風寫《新文學史》之目的是眷戀過往中國鄉土、民情，且有意對現居的西化香港世界表達不滿。但事實是司馬長風的《新文學史》的史識與中國、台灣兩地極為不同，依然被認定為具有濃厚香港特色的文學史。一如黃修己的評論：

> 七十年代後期出版的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便有著獨異的思想色彩，不妨稱之為『香港色彩』。在現實的政治觀、文藝觀上，與大陸和台灣保持距離，在歷史的淵源上，不能不與三十年代後的自由主義作家，有著或一定程度的瓜葛，因而高度評價如沈從文、朱光潛、劉西渭的創作和評論。（…）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產生這部著作，也許所反映的正是香港的獨特風格。[248]

他也不依循過往文學史的老調，以自己的美學主觀評判重新建立起獨樹一格的文學史書寫，與兩岸的現代文學史呈現極為有趣的對話關係，在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建立起反共、反殖民主義色彩，使其文學史有代表香港特殊價值，象徵著香港在國共兩黨統治地域之外的特殊且曖昧的位置。

司馬長風《新文學史》強調文學必須表現的中國式特色，除了因為個人的鄉愁之外，也是為了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去國族化」。由於戰後香港殖民政府認為最有可能威脅英國在港地位是國、共兩個政權，為了避免香港人民與這兩個政權有太過密切的往來，一方面切斷中國與香港邊界的自由進出，同時建立起有系統的身分制度，此外透過「中文中學會考」、「香港中文大學」的設立等教育制度的改革，收編國共兩黨在香港的教育系統，以文化、教育層面改造新一代香港人的歸屬與認同，並將殖民體制的操控由經貿層面轉向文化層面，增加香港人民西化的色彩，更加全面的掌控庶民的生活。[249]而東西文化揉雜的香港，因殖民政府的管控、削減中國文化使其日益稀薄，這也讓司馬長風在文學史中不斷強調中國現代文學的中國特性，並且將其作為審視文學好壞的重要標準之一。

---

[248] 黃修己，《評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收錄於林曼叔編，《司馬長風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頁 280。

[249] 詳參見：黃庭康著、李宗義譯，《比較霸權　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

換言之，司馬長風的文學史具有著屬於香港此地才會產生的特殊色彩，即便他本人不認同香港這地方，現實是他的文學史卻也因香港在冷戰的特殊位置，才能夠脫離國共兩黨國家機器的箝制有自由書寫的空間。這也包括他在文學史中表現自己的鄉愁、去政治的美學觀，都是兩岸所不能有的意識形態。當「去政治」也成為了一種政治表態時，司馬長風的《新文學史》與香港殖民政府相同，都希望突破兩黨的政治勢力控制，但另一個層面來說，《新文學史》所強調的中國特色也正是其藉以對抗逐漸西化的香港殖民政府的策略。

第五節　小結

由上所述可以知道，文學史的撰寫是透過作者自我意識進行過去與現在的時代對話，一如班雅明「星座化歷史」所闡釋的，在歷史的拼貼過程中所反映的是作者自身的樣貌，不論是夏志清、劉心皇還是司馬長風，都可以看到書寫文學史作為作者與時代互動的痕跡。而美國、台灣、香港三地的文學史創作，所涉及的是「回望中國」的問題。就如史書美對這種回望的描述，認為這不僅是種離散更是在地化的演繹：「華語語系也可以表述出『中國中心主義』（China-centrism），假設它永遠滿懷鄉愁地回望中國，是中國為文化祖國或價值根源（無論是否為民族主義者）；然而，華語語系更多時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反中國中心論的場域。」[250]從夏、劉、司馬三人的文學史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回望中國」，一方面具有濃烈的原鄉情懷式的敘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另一方面又帶有政治性動機的建構異於共產黨論述的文學史，兩者之間都透露出「華語語系」文學的特性。

夏志清在冷戰體制的中心－－「美國」學習、任教、寫作，最終完成了《中國現代小說史》，在西方世界成為認識中國文學的必讀經典，其後經過了劉紹銘、李歐梵等人的翻譯，回到華語世界影響台、港兩地的文化界，至於中國大陸則到了 2005 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簡體版，正式將影響裡帶進中國。雖說夏志清的反共立場使其描述魯迅時代有所偏見，但細讀《小說史》仍可感受夏志清

[250] 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　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頁 58。

對魯迅有極高評價，〈藥〉、〈肥皂〉、〈祝福〉等小說都以極大的篇幅分析。但在文學之外，夏志清對魯迅個人卻有諸多批判，不只是批評政治性的雜文根本不算是文學，同時也都論及魯迅轉向等等問題。從論述上依然反映夏志清的反共立場，並以此評判魯迅及其文學創作，與當時代的冷戰體制氛圍交互影響形成共生關聯。

劉心皇的《現代文學史話》以較為鬆散結構的「史話」形式，寫成一本夾雜他人意論與自己點評作家、文學的文學史。不同於夏志清的寫作可以自由發揮、表達意見，劉心皇由於受到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圍影響，政府以戒嚴法、出版法囿限了言論自由，導致在書寫文學史時很多地方語帶保留，刻意與魯迅保持距離。像是他談論魯迅時很多地方只是輕輕帶過，必要說明之處則用坊間名家現有材料，這都是因為政治壓力之故，另劉心皇必須透過如此方式來陳述文學史中的魯迅。1980 年代以後因為政治氛圍鬆動，加上 1982 年魯迅的孫子周令飛來台，變相的使國民黨政府以默許方式開放閱讀、討論魯迅的作品。劉心皇的《魯迅這個人》便在此脈絡下寫成，該書內容仍充滿反共的意識形態，以揭密的形式敘述魯迅與 1930 年代的文壇。

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又是另一個特殊的例子，作者強調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具有抒情、美感和中國式特色，此外文學不應是政治的附庸應具備主體性，任何文以載道的作品都不算是好文學。細看司馬長風的文學史可以感到濃郁的鄉愁，以及對過往文學發展的回應，這與他所出的香港環境極為有關。在香港這一高度西化、現代化的城市，粵語與英語主導的地區，讓他這一位南來文人生活感到格格不入，所以在文學史中可以看到他不斷訴諸要文學寫作出中國式的特色，反對模仿西方的創作風格。而這樣的文學史觀造就了司馬長風獨愛魯迅的〈故鄉〉、〈在酒樓上〉幾篇教具東方意象與抒情意義的作品，政治批判性的雜文的與描寫心裡意識的現代化作品都不受其喜愛。

從這三部文學史中，可以看見「鄉土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論爭浮上檯面，尤其在夏志清與司馬長風兩人對於魯迅小說審美標準的交鋒，正顯示了 1970 年代以後的兩種美學價值的論戰，並且將這場論戰形構為中國／西方、

左翼與自由的兩大議題。[251]若以布爾迪厄文學場域「力」的流動概念來看，我們可以區分為在當時的兩大社會脈絡的文藝美學觀之差異，左翼文學認為：文學必須介入政治具有改造社會的使命；自由主義文學（右翼）則認為：文學具獨立自主性，以文學本身作為主體來表現創作的技巧與思想。而這之間存在場華語文學系文學場域的拮抗與對立，主聲調為台、港、美等海外評論者頻頻回望中國形成論述間的對立，但同時之間隱藏在主聲調之下的旋律是著台、港、美三地的評論者同時在華語語系文學架構中交互對話，並反映與當時的殖民地政治、威權政治之間的關係。

海外的評論者在面對自由陣營的反共文學、鄉土文學時便產生有趣的變化。像是夏志清就是同時支持反共文學與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小說史》將姜貴的《旋風》列為經典時，就可見其並不迴避政治性創作而就藝術價值作評判標準。以司馬長風的《新文學史》雖然內容並為涉及這兩部分，但以他純文學的美學觀便必須排除任何政治汙染文學的可能。而我們在第二章蘇雪林與劉心皇的論爭便提及相關議題，以蘇雪林的性格與相關評論來看，是配合國民黨政權支持反共文學的，但同時間反對具社會關懷、站在中下階層立場描繪小人物的鄉土文學。至於劉心皇則可以算是寫實主義文學、鄉土文學的評論者，《史話》雖未明言對反共文學的看法，但卻是支持鄉土文學的，只是礙於國民黨政治體制而說法趨於保守。從這裡可以看到海外的評論者所位處不同的批評位置，以及其所展現的意識形態在台、港、美之間的交互作用。

除了上述三部海外的文學史外，整個冷戰時期在台港兩地所出版的現代文學史尚有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0）、尹雪曼編《中華民國文藝史》（1975）、周錦《中國新文學史》（1976）。尹雪曼編的《中華民國文藝史》集合四十二位學者、專家共同編寫而成，並與國民黨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正中書局」出版，其言論與國民黨官方立場有高度的契合。而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周錦《中國新文學史》兩本則多為介紹性質的著作，是為了教學所撰述的文學史改論，並未有太多的深入論述當時時代與作家，評述魯迅時也相當

[251] 鄉土文學陣營希望將此論爭建構為中國與西方民族文學的論爭，但現代主義文學陣營則以左翼與自由的價值觀來建構這場論爭，兩方都透過言說的方式希望能夠取得其論述的合理性。

保守，多以五四啟蒙、教化立場討論。但內容涉及政治立場與左右對立時，李輝英與周錦又各自朝向左、右兩端靠攏，所以在文學史的寫作上較無太多的新意。[252]

海外各家文學史在討論魯迅時極具共識的讚揚其小說、批評雜文，並且認為魯迅的左傾是受到中國共產黨利用，或者說是為了獲得青年們的支持，與中國大陸所建構革命、戰鬥的魯迅形象呈現明顯的二元對立狀況。不同之處在於，雖然在冷戰體制中「自由陣營」的反共意識形態是一大框架，但由於香港、台灣、美國的不同政治體制，導致海外的文學史更為眾聲喧嘩而形構出多樣貌的魯迅形象。

[252] 王宏志曾說，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教科書式的文學史，許多部份都只是簡略帶過，而整體架構與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相似，但在內容上未若王瑤等中國大陸版的文學史如此左傾，反倒流露出更多的愛國色彩。詳細情形可參考：王宏志，〈第三章　教科書式的現代文學史〉《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

第五章　海外的回聲：魯迅《野草》中黑暗面的研究及其演繹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故鄉〉

第一節　庸眾與孤獨者：魯迅研究的不同道路

文學史的建構與冷戰體制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是前面所提及的夏志清、劉心皇、司馬長風，他們三人各代表的美國、台灣、香港三地的反共體制的文學史書寫，或是夏濟安海外魯迅研究與美國冷戰體制的縫合，都可以見到個別作家在大環境下表現自我的政治立場與文藝美學觀。而這群人的對話對象除了在地的讀者群外，也隱隱然的提出了不同於中國本土的觀點，有意在魯迅的文學與思想上，提出異於中國共產黨的詮釋角度。。

《野草》一直以來都是海外魯迅研究的重點，特別是「夢」總引人好奇，研究者嘗試從中追尋魯迅內在精神的辯證軌跡。[253]章依萍曾談及《野草》在魯迅創作生涯的位置，他說：「他的哲學都包括在他的《野草》裡面。」[254]然而如此的內斂、晦澀的創作文字卻成為左派的攻擊對象，將魯迅的虛無感放大為頹廢、與資產階級靠攏的佐證。最終《野草》研究並未能在 1950 年代的中國有太多的研究成果。反觀海外的研究在夏氏兄弟的帶領下開枝散葉，尤其是夏濟安的《黑暗的閘門》，是當今公認海外魯迅研究的重要代表著作。

夏濟安到美國的路程極為曲折，先是從上海到香港才又轉至台灣，並短暫在台大外文系任教。1955 年春季在台北的美國新聞處安排，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英文系一學期，1959 年再由洛氏基金會資助到華盛頓大學，之後又擔任了柏

[253] 魯迅的《野草》一共有九篇直接寫夢，透過夢與現實的模糊不可辨析之處，闡述自我對社會的看法。

[254] 章依萍，〈古廟雜談（五）〉，《京報副刊》，1925.3.31。

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座講員、副研究員。夏濟安在美國的十年歲月留下不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由夏志清協助編輯的《The Gate of Darkness》（譯：《黑暗的閘門》）是其代表作。裏頭討論了瞿秋白、魯迅、蔣光慈、丁玲等多位左翼知識分子，從 1920 年代到 1930 年的心境轉折與時代變動。而其中關於魯迅的研究又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兩篇論文，分別從文學與文化活動層面討論魯迅的心理意識與時代關聯。

與夏濟安同時代的左翼學者，面對魯迅《野草》內在思想的矛盾、徬徨時，往往選擇以避重就輕的方式，忽略魯迅精神世界的矛盾與辯證。僅僅強調其革命的戰鬥精神，以及為青年導師的面向。右翼學者、評論家更不用說，1949 年後國民黨將魯迅書籍列為禁書，監控出版系統的言論，閱讀魯迅的傳統在台灣成為極為隱微的伏流，檯面上除了零星的反魯論述，根本沒有有系統的討論。兩岸的政治力介入導致魯迅符碼被政治綁架，共產黨的革命導師形象，與國民黨的拒談、封鎖魯迅相關消息，成了兩個極端的路線。1950 年代以後海外所發展出異於兩岸的第三條道路，或者說更為多樣化的魯迅形象，在香港這相對「自由之地」才開花結果。當然在香港仍有左右翼勢力的介入，操縱著魯迅在世人前的面貌，但相對而言有較多的自由度展演多樣化的魯迅形象，像是曹聚仁、司馬長風的魯迅研究都有較為持平的觀點。

但海外另一脈絡的異質之聲，是由旅居美國的夏濟安、夏志清兩兄弟所開展。夏濟安的魯迅研究是在海外研究的重要資產，影響所及不只西方世界，也對台、港、中的學術圈有一定的影響。誠如鄒賢堯所述，「美華」的魯迅接受因為距離的關係（實際距離、政治距離），使得「魯迅對他們有著遠距離的輻射，而他們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干擾，給與魯迅審美的觀照。[255]」但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這樣的第三條道路並不是就僅僅單純的是美學討論而不具任何意識形態，只是相較於兩岸著重於魯迅的政治立場與現實主義文學脈絡，海外更為聚焦研究魯迅作品中的現代主義色彩。

[255] 鄒賢堯，《征服時空　魯迅影響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121。

回溯 1950 年代中期夏濟安的魯迅黑暗面研究，在「庸眾」的革命與反革命浪潮中成為最突兀的「孤獨者」，從魯迅「詩化」的散文著作《野草》中萃取他複雜的思想，並以此作為討論核心，觀看魯迅精神世界的變化。在本章節中筆者將討論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兩篇文章，並嘗試探索從夏濟安到李歐梵魯迅黑暗面的海外脈絡，以此為主軸與舒蕪的說法來比較，並關注其後李歐梵是如何繼承這一脈絡的魯迅研究。

第二節　冷戰體制下夏濟安的魯迅研究的位置

《黑暗的閘門》一書為夏濟安赴美研究的成果，總括了他從 1959 年到 1966 年之間的中國左翼文學、文化研究。他在魯迅研究上討論其散文、詩作多過於小說，強調作品彷徨、黑暗的一面，以及他在左聯內部的矛盾處境。夏濟安曾經表示過，魯迅是中國近代最偉大作家之一，其次兩位為張愛玲、張恨水。[256] 他對於魯迅作品的喜愛可以從他的研究中看出端倪，也是當時海外的研究者中少數擺脫政治力介入而給予魯迅高評價的研究者。[257]當然，夏濟安在魯迅研究中仍然秉持反共的立場，且在反共中看到魯迅抉擇的困難與掙扎。他認為魯迅是「病態般的天才」，而給予小說與散文高度的評價，但也對魯迅的後期參與政治活動感到惋惜。

夏濟安的魯迅研究多於美國完成，而如此的位置有其值得討論的意義。冷戰體制所產生的現代主義文學，在當時文化界是時尚、前衛的主流美學，不管是台灣或是香港陷入這股浪潮之中。不可否認的是，現代主義文學在當時之所以流行，是對反共僵化的文藝政策的反叛，但與此同時的引介現代主義美學，同樣的也將美國的價值觀置入台港的文學脈絡之中，依然存在者反共的色彩。這就可以理解為何夏氏兄弟可以一面秉持反共的意識形態，同時也以西方的現代主義美學為標準。如同《黑暗的閘門》一書所收錄的六篇文章：一、「軟心

[256] 莊信正，〈才情．見解．學問〉，《異鄉人語》（台北：洪範出版社，1982）頁 11。
[257] 不可否認的是，任何的創作、研究都不可能完全的擺脫政治力的介入，特別是在冷戰體系下的台灣、美國，但相對來說美國的研究自主性給予了夏濟安一定的空間，展現他所認知的魯迅形象。

腸」的共產黨員瞿秋白；二、蔣光慈；三、魯迅與「左聯」之解散（按：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四、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五、「五烈士」之謎；六、延安文藝座談會真相。篇篇是堅決反共的論文（夏志清語），只不過這種反共所呈現的並非仇恨、鬥爭，而是觀照到大時代下作家迫於無奈的抉擇，呈現的是「同情的批評」。[258]

這種「同情的批評」是在理解的基礎下進行批評與反思，一如漢娜・鄂蘭對於服膺法西斯政權的官僚的批評，認為他們並非「根本之惡」而是「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所謂平庸之惡意指：這群人所做的事情並非真正的惡，而是服從於制度的規範，但這種服從卻也助長了邪惡本身的擴展以及對他人的危害。而夏濟安討論左派知識份子也用類似的角度，這當然也包括了魯迅在內，以「同情的批評」關注大時代中左翼文人的掙扎與選擇。只不過這樣的詮釋角度仍帶有反共的中心價值，在批判左翼立場時，也觀看「平庸之惡」的左翼知識份子與中國共產黨體制的關係。

體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不只纏繞著左翼作家，夏濟安自身也切身感受在國民黨政權下的被迫妥協的生活。他的魯迅與共產黨體制之間關係的研究，很大程度也反映了自身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下生活的感受。也就是說，夏濟安赴美最大的原因除了受到其弟夏志清的鼓勵，以及美國相關單位的資助外，台灣的政治因素也可能是迫使他決心離開的重要原因。

台灣自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政府便開始展開一連串的言論打壓，而 1952 年出版法修正案的通過、1954 年的文化清潔運動，更是顯示國民黨有系統的收編、監控社會的言論自由。整個 1950 年代反共文藝當道的時候，國家政治力強力主導了台灣文壇的發展，1954 年的文化清潔運動、1955 年的戰鬥文藝，甚至是 1957 年《自由中國》及《文星》雜誌都遭受到政治壓力。中國同時期的反右、整風運動風起雲湧，海峽兩岸的毛、蔣政權都以高壓統治的手段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258] 詳參見夏濟安，《夏濟安選集》分別由陳世驤與夏志清所撰寫的序與跋。夏濟安，《夏濟安選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

夏濟安的《文學雜誌》是學院派刊物，其內容多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思潮，並且多討論、刊登純文學作品保有文學的獨立性，刻意避開政治敏感性議題。但在出版法的限制下，台灣社會卻無法公開的閱讀、研究左翼相關著作，也迫使夏濟安決定離開台灣，轉往美國進行中國左翼文學研究。夏濟安的六年上海經驗，也讓他執著於梳理上海文壇的權力場域關係，而在擔心觸碰敏感的政治議題下，決定離開台灣遠渡美國從事左翼文學的研究。梁實秋曾經這麼回憶夏濟安離台前的與他餞行：

> 夏濟安先生在出國的前一天來看我，告訴我他明天動身飛美。餞行是來不及了。我問他幾時回來。他眨眨眼，把身體移到椅子的邊緣上，吞吞吐吐的說：「別人問我，我都回答說半年後回來。梁先生問我，我得講實話，我不回來了，能夠不回來我就不回來了。」我聽了並不太吃驚，因為我早已聽說他有這樣的意思。[259]

「能夠不回來我就不回來了」是個關鍵，究竟是甚麼原因讓夏濟安出走後不願意再回來，遠離他所鍾愛的文學和創作？現今多數學者解釋夏濟安的出走時往往援引李歐梵的說法：「他是在雙重疏離下進行學術研究的：不僅疏離於自己的祖國，而疏離於他真正感興趣的文學和創作。」[260]不論是余夏雲或是陳建忠的解釋裡都持類似的看法。但夏濟安的選擇究竟是出於無奈而背離他的文學與創作，又或是為了文學與創作而必須出走，二者之間的主從關係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進一步來說，若以為夏濟安在台灣時期的文學創作、辦雜誌是做「心愛的文學和創作」，而到了美國之後的魯迅研究與左翼文化研究是「投身政治研究」，這無疑忽略了當時台灣內部高張的政治壓力，導致夏濟安隱身於教學與文學領域，而他的出走恰恰就是要擺脫政治上的束縛，希望更自在的進行學術研究。

當然我們可以解讀為，夏濟安的出走美國很可能是服膺於另一種體制與另一種意識形態，這裡存在著複雜的因素。除了前面所述，夏濟安離開台灣是為

[259] 梁實秋，〈悼念夏濟安先生〉，收錄於夏志清等著，《夏濟安先生紀念集》（香港：現代出版社，1978）頁 15。
[260] 李歐梵，〈光明與黑暗之門〉，《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三聯書店，2009）頁 185。

了脫離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此時他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資助在大學做學術研究，並於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擔任副研究員，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在冷戰體制下進行中國研究。只不過遠離了戰火與中、台保持距離，不但讓夏濟安更能清楚的梳理兩岸政治，以及過往左翼文化運動的發展脈絡，同時美國的學術機構所典藏的珍貴資料，很多都是戒嚴時期的台灣所無法閱讀的重要檔案文獻。也因此，夏濟安的中國左翼文化研究雖與國民黨的政策相契合，但卻無法在此政權下做深刻了研究與反省，同時面對敏感的左翼文化問題，又不希望為了符合政權利益說出違心的看法。在此困境下「出走」成了夏濟安唯一的可能，到了美國才有更多的空間開展三十年代以降的文學、文化研究，尤其是魯迅研究在台灣是個禁忌，但在冷戰體制的美國則是重要課題。

張鳳棲認為，夏濟安留在美國作「中共研究」有助於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透過在海外的影響力可以協助台灣的進行反共事業。[261]這種說法是以冷戰體制的框架將台美視為同一陣營的戰略夥伴，而夏濟安的反共研究有助於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只是如此的助益卻沒有明確的文獻資料可以證實。換個角度來說，這樣的研究成果在當時是不可能在台灣的期刊雜誌所刊載，對魯迅、蔣光慈、瞿秋白等人有較為中性、持平的討論，是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的台灣政治氛圍所不容的。雖說《夏濟安選集》（裡頭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一篇）在 1970 年就在台灣出版，但其內容聚焦於魯迅作品文本與內心意識部分，並未涉及太多政治的論述，所以當時體制並未取締，是有其脈絡可循的。但相較來說，夏濟安其他討論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文章，就沒有那麼「幸運」的可以在台灣出版或刊載。

夏濟安的意識形態不容於兩岸的政治體制，反觀美國給予的待遇與研究中心的資料收藏，都是讓他的魯迅研究得以深化在美國發芽的原因。雖然夏氏在美國的研究成果並未能即時的在華文學術圈得到回響，但透過夏志清的轉介、林以亮的翻譯，以及李歐梵等人的繼承與深化，都是使得夏濟安的魯迅研究在

[261] 張鳳棲，〈我所知道的夏濟安〉，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主編，《永遠的懷念》（台北：編委會，1967）頁 31。

台灣、香港、中國產生影響力。夏氏兄弟在美國開闢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海外勢力在追隨者的不斷增多下逐漸龐大，並以邊緣的姿態對兩岸的中國現代文學開啟了討論的空間。一如魯迅在〈故鄉〉所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夏濟安的魯迅心靈複雜的研究經過數十年的傳承與影響，終於在中國與海外獲得眾人的反響，形成現今魯迅研究重要的一個支脈。當然有關夏濟安的魯迅研究究竟提出怎樣的觀點，如何被繼承者深化，又與中國大陸的研究產生對話，這些問題我將會在下面逐一討論。

第三節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與〈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的研究

夏濟安在研究中更著重於《野草》散文集，並透過這散文集討論魯迅的精神世界，在原有的革命、戰鬥形象的魯迅研究成果中，展現不一樣的魯迅形象。夏濟安認為，魯迅作品中文字曲折極具現代主義、象徵主義色彩，除了表現了戰鬥性格外也展現抑鬱、矛盾、掙扎的心理狀態。而魯迅《徬徨》、《野草》時期（1924～1927）的創作所呈現精煉語言、象徵文字、模糊、晦澀的內容，正是夏氏兄弟所欣賞的魯迅作品表現形式。

在藝術性的討論上，夏濟安給予魯迅詩作高於其他文類評價，並將《野草》看成是魯迅沿襲傳統文言文創作。對他而言，《野草》是魯迅作品裡的佳作，那介於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創作，使其在文字與內容上展現了簡潔與濃烈的意象。[262]一如他介於絕望與希望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思想意識，他的筆調在夏濟安看來也是展現了新舊文學過渡的狀態，而這狀態卻也寫出了中國文字的美感與精鍊。夏濟安的魯迅黑暗面研究影響後來的「魯迅學」甚深，李歐梵的魯迅研究就是夏濟安的繼承者，《鐵屋中的吶喊》[263]延續夏濟安的研究，深化討論魯迅的矛盾性格。1980 年代後中國的學者王富仁、錢理群、汪暉等人對於《野

[262] 夏濟安說道：「在寫作技巧的培養上，他違背了自己的心意。他的白話文中雖運用了許多文言的字彙和修辭法，最能顯示出他在歷史上的矛盾地位的卻是他的詩。他的詩作不多，只是偶一為之。但無可否認的，那些全是很好的舊體詩；至少在簡潔、尖酸、諧謔等方面，可以比美他最好的白話文，而且也具有那份「凝結的火焰」，和「紅影無數，糾結如珊瑚網」於「青白冰上」的奇絕的美。」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夏濟安選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頁 17。

[263]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草》的研究也有許多觀點與夏濟安相近，強調探討魯迅作品的藝術性以及其所反映的心理意識，這部分從海外回到中國的思想共振是時代因素使然，造成中國與海外在不同時期卻又相同的觀看到了魯迅思想上的矛盾與虛無，以及「中間物」般的肩負著時代的責任。

從夏氏所編輯的《文學雜誌》可以發現，雜誌內容多引介西方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當然包含了展現人性幽暗、荒蕪一面的存在主義作品評論，像是〈現代藝術與存在主義〉、〈孤寂的一代〉、〈卡謬論〉等等，都在在展現他的美學品味。由此可知，夏濟安到了美國會研究魯迅的黑暗面是有其脈絡可循的，一方面找尋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五四文化傳統的禁忌面，一方面嘗試探討中國現代文學裡的現代主義色彩。作為中國新文學之父的魯迅，正好成了最佳的研究對象，其作品不但是五四文學的代表，且受到尼采、叔本華等人的影響，而在內心自我意識、存在的探究上也比當時代其他作家來得深刻。如同夏志清對〈魯迅作品的黑暗面〉的評價：

> 〈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尤其是最難得的「同情的批評」，因為在我哥哥以前還沒有人把魯迅的內心生活和他同中國傳統的愛恨關係這樣精深地討論過。魯迅在三十年代當左翼作家聯盟的傀儡，因之今日大陸被人捧上天，在自由中國有些人想把他打入地獄。事實上，魯迅未被共黨利用前，胡適、陳源都認為他是文學革命後及少數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雖然有些讀者看不到魯迅的作品，從濟安錄自《野草》、《朝花夕拾》的片段裡，也會驚訝他想像的奇特。[264]

換句話說，夏濟安既未陷入國共兩黨的魯迅神格化、汙名化的二元對立，也未如其弟一般把他的創作以前、後期對立。夏濟安對魯迅的矛盾精神、思想進行剖析，嘗試依循魯迅思想的脈絡來理解其生命的選擇，這種「同情的批評」站在反共的立場上指謫魯迅意識形態的錯誤，卻同時透露出對他才華的欣賞，試圖在魯迅左傾的生命歷程裡梳理他為何走向社會主義路線的原因。

李歐梵是這樣解釋當時的情形：

> 中國知識份子在「感時憂國」精神號召之下，著重於文學內容的載道，

[264] 夏志清，〈夏濟安選集 跋〉，收錄於《夏濟安選集》，頁 227。

> 希望透過文學的力量改變社會，在文學創作上也紛紛走向現實主義的道路，因而在作品的表現裡表現出三個特點。第一，援引西方新思潮對於傳統中國的進行批判，製造出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第二，如此的反傳統精神是出自於對中國政治狀況、社會文化氛圍的不滿，利用文學作為批判政治、社會的工具。第三，反映出人們處於新舊交替時刻對於國家腐敗的挫敗，那是一種滿懷希望憧憬卻同時存在疏離感、失敗感的矛盾情緒。[265]

當然，魯迅走向左翼的道路並非夏志清所言的單純，魯迅與共產黨合作並不是為了獲得青年學子的愛戴這麼簡單，同樣的魯迅與左聯的糾葛也不完全是宗派間的歧見與領導權的鬥爭，而在本質上仍陷入革命與個人的辯證。一直以來魯迅與左聯內部就是格格不入的，在左聯的成立大會上他毫不留情面的「叮嚀」左聯的朋友們：「『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而「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266]這讓強調黨的領導地位的左聯與魯迅長期處於緊張關係，四條漢子：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與魯迅在政治方向上一直不合。[267]

在那一個毛澤東將魯迅奉為精神導師的時代，魯迅形象所被凸顯的是「批判封建的舊有傳統」，以及「為中下階層發聲」兩個部份。然而夏濟安在〈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中認為魯迅之所以偉大並不在於表現革命、戰鬥意識(光明)，而是期待光明的同時卻又直面黑暗閘門的沉重重量。他說道：

> 魯迅的黑暗的閘門的重量，有兩個來源：一是傳統的中國文學與文化，一是作者本身不安的心靈。魯迅敏銳地感受到這兩種具有壓迫力、滲透力、而又無可避免的力量。人們也許不會同意他認為年輕的一代可以教導道能擺脫這些暴力而自由生活的論調，但他終於拼命地發出希望的吶喊。他的英雄姿態暗示失敗，而他為自己選擇的位置幾乎是悲劇性的。他所以用那個傳說中被壓死的英雄的典故，正顯示出魯迅的自覺無力抗拒黑暗，而終於接受犧牲的道理。這個自覺賦予他的作品一種悲哀，成為他的天才的特色。[268]

---

[265]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　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頁 230。
[266] 魯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魯迅全集》第 4 卷，頁 238。
[267] 可參考：王宏志，《魯迅與『左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張寧，《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268]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夏濟安選集》，頁 21。

肩負在魯迅身上的重量，來自於「傳統的中國文學與文化」與「作者本身不安的心靈」，魯迅認為傳統文化的「荼毒」造成禮教吃人，多少社會的禮俗、民間信仰的荒誕都是殘害國民性格的原因。至於自身不安的心靈，一方面來自於1923 年的與周作人決裂，使其痛失文壇路上的親密戰友，也加深了個人的孤獨感。此外，五四運動風起雲湧後卻又無以為繼的面臨中國的分裂，當時政治局勢的紛亂、軍閥割據動盪，也都是魯迅本身不安心靈的重要原因。

翻開《野草》我們可以看到此時期魯迅對自我生命的思索，生與死之間的意義，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對魯迅來說他不畏懼死亡，因為死亡所代表的是曾經的存活的痕跡。存在與虛無並非二元的，而是互相依存的，無時無刻的虛無感、性格的陰暗面反倒成了他走向光明的最大動力。如同〈希望〉中援引匈牙利詩人斐多菲的經典名句：「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269]，那希望與絕望之間，正顯現其內心焦慮不安與無家可歸的惶惑。只是如此的徬徨是走向光明的未來，或是死亡的絕境，這就不得而知了。

夏濟安抓準了魯迅「黑暗的閘門」的核心意象，站在光明與黑暗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希望驅散黑暗拯救孩子們，另一方面又讓自己肩負沉重閘門，隨時有犧牲的自覺。魯迅這樣說：「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默在黑暗裡了。然而黑暗又會併吞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沉默。[270]」魯迅將自己當成影子一樣，不論是光明還是黑暗都無法生存，只有在光明與黑暗同時存在的間隙才會出現影子。但與此同時，魯迅又不希望徬徨於明暗之間，倘使如此不如沉默於黑暗之中。從這短短的兩句話，可看見魯迅內心反覆辯證的軌跡，在社會的進程中成了中間物，不得不的被迫之中必須與黑暗戰鬥，而自己同時也是黑暗的的一部分。

夏濟安更進一步的描述魯迅的矛盾性格，且說明魯迅偏向對黑暗面的戰鬥而未著墨光明到來的希望與新生，主要原因就是沒有人知道黑暗的時間究竟還要持續多久：

[269] 魯迅，〈希望〉，最初發表於《語絲》，1925.1.19。後收錄於《魯迅全集》第 2 卷，頁 182。
[270] 魯迅，〈影的告別〉，最初發表於《語絲》，1924.12.28。後收錄於《魯迅全集》第 2 卷，頁 169。

> 用光明與黑暗等對比的隱喻永遠不能使人完全了解他，因為其中還有一些有趣的，介乎暗明之間深淺不同的灰色。天未明時有幢幢的鬼影，陰森的細語和其他飄忽的幻象。這些東西在不耐煩地等待黎明時極易被忽視。魯迅即是此時此刻的史家，他以清晰的眼光和艱深的感觸來描寫；而正是他有心以叛徒的姿態發言時所缺少的特質。他對一些較為黑暗的主題處理尤為重要，因為沒有人知道天未明的時間究竟要持續多久。[271]

自辛亥革命後原以為推翻帝制就會有新的中國，沒想到袁世凱復辟、軍閥割據的接踵而至，讓中國又陷入另一種形式的困境。從吶喊到徬徨，生命隨著時間持續戰鬥越發顯得無力，面對未來的不確定也讓魯迅陷入黑暗的情緒，但同時又在黑暗之中持續戰鬥。這或許是「作家的魯迅」與「社會改革家的魯迅」之間的矛盾，光明與黑暗之間讓魯迅有更深沉的思索，包括他自己與社會的關係。面對魯迅的精神世界，夏準確的看到魯迅夾雜在絕望與希望的反覆心情，並認為當時候在右派的詮釋下魯迅的尖酸刻薄被過分強調了，也因此將其才華視為「天才的病態」，以不同於海內外主流論述的詮釋。魯迅一直無法擺脫內心的矛盾，那一種自剖式的反省總令其一再的陷入虛無，即便是被眾人認為轉向馬克思主義路線，那尖刻、多疑的雜文書寫，依然表現出他對任何事物的不信任。。而這樣的矛盾性格，也讓魯迅在左聯的位置十分曖昧，既被視為名義上的領導人卻又沒有實際的領導權，在「兩個口號的論爭」與左聯核心領導人決裂，有著宗派與路線上的爭執。

若說〈魯迅作品的黑暗面〉是呈現魯迅及其文本的精神思想，〈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則以文化史的層面來看他與左聯的愛恨糾葛，透過這兩篇文章也展現了夏濟安本人對於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學、歷史）的評價。新中國建立後，當中共試圖忽略曾經有過的內部紛爭時，夏濟安的左聯內部紛爭研究便具有時代性的意義，不但在研究中闡釋左聯內部的路線、宗派之爭，同時也解釋了中共為何會在短暫的幾年之中獲得多數的民意基礎。

夏濟安〈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寫於 1959 年，在夏志清的研究基礎上延續討論左聯作家群的矛盾，來看政治權力籠罩下作家們的個體性是如何被侵蝕的。該文章的一開頭就援引魯迅〈無花的薔薇〉做為引子：「待到偉大的

[271]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夏濟安選集》，頁 30。

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272]」所以從〈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可以看到，文章從魯迅是左聯「曖昧的領導人」開始談起，到其後的「兩個口號論爭」，以魯迅的生命史為軸線觀看圍繞在他身旁的左聯內部論爭。[273]這引文呈現了四個時空的的不同意義，相當高明的串連起（1）1920 年代的魯迅話語、（2）1930 年代魯迅與左聯的關係、（3）1940 年代以後魯迅被神格化的情況，以及（4）1957 年反右運動下的胡風事件。文章通篇嘗試在文化史的層面來討論魯迅與左聯的合作與抗拮，就是希望透過揭發魯迅在左聯時期與中共之間的對立，來解構中共所建構的魯迅論述。他在文章中聚焦討論魯迅一脈，包括茅盾、丁玲、馮雪峰、胡風等人如何與周揚、夏衍、陽翰笙等人在領導權的爭奪，以及兩個口號論爭時期路線上的對立。

細看該文內容，夏濟安早已跳脫文學研究的範疇，而以政治、社會史的角度來詮釋左聯內部的文化鬥爭。比方說在討論「兩個口號論爭」時，他解釋當時中共為了吸收更多人民的支持，透過路線上的轉變以反日做為主軸來擴大城市中的支持群眾。特別有意思的是，夏濟安以一種客觀、持平的觀點闡述兩黨的鬥爭，不似夏志清有鮮明的立場。像是他在談及蔣介石於上海的鎮壓左翼行動時，是以「suppression」（鎮壓）一字，而不是「destroy」（消滅），就已凸顯他的史觀是不同於國民黨，而是較為客觀描述情況。[274]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夏濟安的〈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並非單純的文化運動回顧，更是動態的觀照左聯內部無止歇的對峙，並將 1950 年代中期以後反右運動與 1930 年代左聯的發展相互對照，呈現中共文化陣營內部門閥之間的鬥爭。同樣是反共陣營，不同於國民黨政權或其他評論者，不加細分中共文藝活動的內部派別差異，夏濟安更為注意裡頭的合縱、連橫，甚至是延安、上海的左翼兩大重鎮的文學發展與拮抗。

---

[272] 魯迅，〈無花的薔薇〉，最初發表於《語絲》，1926.3.8。後收錄於《魯迅全集》第 3 卷，頁 274。

[273] TSI-AN HSIA(1968). "The Gate of Darkness" : LU HSU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74] TSI-AN HSIA(1968). "The Gate of Darkness" : LU HSU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119.

夏濟安雖不像夏志清明顯的表述「反共」立場，但是他的左翼研究是希望梳理這些作家究竟是為何會走向左翼的路線。也就是說，夏濟安嘗試在擁魯、反魯二元政治論述中重新找回文學性的魯迅評價，但這樣的評價也同時包含了自身的意識形態，透過討論魯迅與左聯關係描繪 1930 年代以「革命文學」對文學自由的戕害。也就是說，他不僅藉由魯迅的黑暗面，來思索魯迅為何最終走向社會主義，同時也探討在中共建國後一直不願觸及的「魯迅與左聯關係」以及「兩個口號論爭」。

而夏濟安會對左聯的分裂產生興趣，主要是希望重塑魯迅與共產黨合作的時代，觀看魯迅與黨的關係以及神格化過程。從時間點來看，夏濟安 1916 年出生，1937 年在上海唸大學，接觸魯迅作品時他已經加入左聯並被奉為精神領袖。在上海的七年時光（1937～1943）所經歷的不只是全面對日抗戰，也必然目睹了魯迅逝世後所引發的愛國遊行熱潮，以及中共在上海的一連串藝文組織、活動。換言之，左翼在上海的文化運動一定也對夏濟安的生命造成影響，這也是為何他到了美國後會熱衷於 1930 年代的左翼研究。

換句話說，夏濟安的上海經驗讓他經歷文壇的複雜面貌，當時許多同情無產階級的上海作家或是左聯的同路人，並不完全聽命於中共或是同意中共的文藝政策。在夏濟安的認知裡魯迅也屬於這一類人，這種同情是建立於人的個體性，反對集體性的鬥爭與干涉了作家的寫作自由。上海現代派作家群正是這一類的代表，他們同情無產階級的處境，也曾嘗試描寫勞工、農民的生活，施蟄存〈追〉、杜衡〈機器沉沒的時候〉、穆時英〈咱們的世界〉徐訏〈旗幟〉等等，都是現代派作家嘗試描寫中下勞動階層的文學作品，但他們多數都沒有加入共產黨成為黨員。[275]由此可裡了解支持社會主義路線的作家群相當龐大，但內部路線的歧異卻在中共的「國防文學」口號聲中被忽略，尤其是中共與魯迅在左聯之間的領導權之爭，刻意受到掩飾甚至在中共建國之後成了禁忌。

這種侵蝕作家個體性的事件宛若回聲般的飄盪在過去與現在，夏濟安的寫作既是回溯過往魯迅與左聯之間的爭執，同時也在回顧 1950 年代一連串的反

[275] 李洪華，《上海文化與現代派文學》（台北：秀威出版社，2008）。

右風潮對於文化人士的打壓。我們可以將《黑暗的閘門》的內容解讀成：夏濟安所回應的不僅是 1936 年以後中共所神格化的魯迅論述，同時也是對 1950 年代後期中共的反黨、反右鬥爭運動的反思。魯迅一脈包括丁玲、胡風、馮雪峰等人在中共建國後遭到鬥爭，所凸顯的正是左翼路線內部的權力鬥爭。也就是說，夏濟安的《黑暗的閘門》所談論的是左聯內部從過去到現在的路線問題，透過溯源回 1930 年代左聯成立前後，觀看魯迅、馮雪峰、胡風、周揚、夏衍等人的恩怨，以理解中共的反右、整風運動。

總結來說，夏濟安的魯迅評價是複雜的，他嘗試探討魯迅內心意識的黑暗面，並理解其內在的矛盾與掙扎，以至於後來的轉向。《黑暗的閘門》一書是夏濟安在美國的研究成果總結，其內容涉及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左翼文化運動議題，而這議題都是在台灣所不能涉及的禁忌。這樣的高壓政策使得夏濟安感到心灰意冷，對於國民黨也同樣不抱持任何好感而希望逃離，這使他的研究同時存在批評國府體制的隱喻。他在〈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中曾這樣描述中共在 1930 年代的文藝政策：「但是藝術不是他們的核心價值，甚或不是主要關心的事物。他們所關心的是如何將藝術奉獻於階級鬥爭，利用熱血、死亡、勝利來獲的人性的解放。」[276]而這批評正好也是他有感於國民黨政權為了「反共」而犧牲了藝術的獨立性，以反共文藝政策箝制作家創作。由此看來，夏濟安離開台灣到了美國後尋找文學創作、研究的自由，並進行左聯內部的研究，不僅是反思共黨內部的矛盾，同時也是對 1950 年代兩岸文藝政策的重新省思。

於此我們可以為夏濟安的魯迅研究做整理：第一，他的魯迅黑暗面研究著重討論〈野草〉的矛盾與象徵，不同於當時戰鬥、光明的魯迅形象。第二，他的左聯研究並非只是研究過去，而是包括探討當下的反右運動，並於論文表現左聯內部的宗派鬥爭。第三，他的魯迅研究展現了異於兩岸神格化、汙名化的描繪，以更為如實的文字記錄魯迅與左聯。也因為上述這三點意義，讓夏濟安的魯迅研究別具價值，與兩岸形成極為有趣的對話。

[276] TSI-AN HSIA(1968). "The Gate of Darkness" : LU HSU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101.

下面筆者將比較舒蕪與夏濟安的魯迅黑暗面研究，透過對兩造的比較將可以更深化的理解左、右翼知識份子，如何在同一文本中詮釋出不一樣的魯迅形象。藉此理解魯迅研究者在政治力介入下的分道揚鑣，並又怎麼在 1980 年代呈現某種程度的合流。

第四節　舒蕪與夏濟安魯迅黑暗面研究的兩種路徑

針對魯迅黑暗面的研究並非始於夏濟安，錢杏邨一早已見《野草》中所反映魯迅的孤獨與徬徨，但他卻未看見同時存在的奮力抵抗與戰鬥。[277]由於《野草》呈現高度的象徵主義技巧，與曲折晦澀的內心表述，因而當時代的研究者多少會誤讀其意涵。不只是錢杏邨而已，劉大杰將其歸納為現實主義的一支也可算是另類的誤讀。[278]其後雖有李長之、許欽文、雪葦等人關於《野草》的藝術性的研究，但真正將其與魯迅思想做整體的解析還是舒蕪。

1946 年舒蕪的〈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一文，該文的問題意識在於追尋「魯迅為何而戰」，就展現對魯迅精神黑暗面的探索。文中舒蕪認為魯迅對抗虛無是從本體進行，攻擊一切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中國人以及社會的黑暗面。反觀夏濟安則以現代主義的角度詮釋魯迅徬徨時期的作品，認為這樣的虛無與不穩定恰恰呈現魯迅內心矛盾。[279]由此可以看到舒、夏兩人的研究表現了不同的面向，也分別代表了中國大陸研究與海外研究的兩種路徑。

舒蕪是馬克思主義精神啟蒙派中《野草》的研究者，我們可以看到舒蕪〈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將魯迅的直視黑暗、反封建、個體性解放概括成「戰鬥性格」，但同時也關注到魯迅思想的複雜。[280]舒蕪更進一步認為，革命必須

---

277 錢杏邨，〈死去了的阿 Q 時代〉《太陽月刊》第 5 期（1928.5.11）。他說：「他始終不能做地火，只有希冀著。只有希冀地火來到時，好讓他大笑，歌唱。這是革命的旁觀者的態度。也就是魯迅不會找到出路的根源。於是魯迅只描寫黑暗面。」

278 劉大杰，〈吶喊與徬徨與野草〉《長夜》半月刊（1928.5.15）。

279 舒蕪在文章中說道：「當別人往往是『去革命』的時候，他卻是首先『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革掉『不革命』的自己的命，把自己變成『革命人』，然後凡有革命人所做出來的事，才都自然是革命的事。」舒蕪，〈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原發表於上海《宇宙風》第 2 卷第 4 期，1946.10.18。後收錄於舒蕪，《舒蕪文學評論選》（安徽：安徽出版社，1994.8）。

280 參考自：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92。

先從革自己的命開始做起，魯迅與黑暗面戰鬥並非期待光明的到來，而是單純向黑暗搗亂。他認為相信光明在與黑暗戰鬥之後就旋即到來是天真的謊言，只為了能得到光明才與黑暗戰鬥是本末倒置，是根本上的不願意直視黑暗，而活在光明的謊言。魯迅說：「但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嗎？倘必須前面貼著『光明』和『出路』的包票，才雄赳赳的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281]在魯迅看來與黑暗戰鬥是種本能，倘若戰鬥的目的為了光明，不但會弱化的反抗的本質意義，更會使自身陷溺於期待可能來到的光明而放棄對黑暗的持續痛擊。

舒蕪雖在文中沒有涉及魯迅有沒有轉向、如何轉向的問題，但是卻明白指陳魯迅意識到的道路是一種「始終意識到悖謬的悖論性道路」。這種思想是一種不斷自我否定的過程，透過本質性實有的黑暗與虛無轉化，為他開拓光明的動力來源。他藉由《野草》關注到魯迅內心的黑暗與虛無，將共產黨與魯迅之間劃出一條很深的界分，具有左翼文化陣營內部自我批判的意識。

時序進入 1920 年代，魯迅的吶喊與徬徨幾乎是同時產生。相較於《吶喊》系列的戰鬥意識，《彷徨》與《野草》系列可以看見魯迅參與社會改革運動後的一次又一次反省。這當然與軍閥割據與外國勢力侵略的社會時局有關，讓他思索著筆與文字能為中國做些甚麼。[282]雖說之後魯迅在瞿秋白等人的拉攏下向左翼文化團體靠攏，轉向支持社會主義路線，繼而被擁護成左翼文化陣線的共主。但回首來路時，這一段徬徨時期的公案卻也出現不同的詮釋角度。進一步來說，魯迅的徬徨、矛盾與他的生命經歷以及社會局勢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可以從他為《野草》英譯版所寫的序言，看到他當時的心境，與後來寫序時（1932 年）的之不同。他這樣解釋那時期的寫作：

> 因為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有時措詞就很含糊了。〔……〕後來，我不再做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已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而至於這樣

[281] 魯迅，〈鏟共大觀〉，《魯迅全集》第 4 卷，頁 107。
[282] 魯迅這樣說道：「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魯迅，〈寫在《墳》後面〉，最初發表於《語絲》，1926.12.4。後收錄於《魯迅全集》第 1 卷，頁 300。

的感想存在。我想，這也許倒是好的罷。[283]

難以直說的是魯迅的生活陷入低潮，這影響到他的創作表現，與周作人之間的爭執、分家對他的打擊尤大，他在許多地方都多少透露了與弟弟這文學戰友分道揚鑣後的失落。此外，他也在此時翻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而這亦影響了他後來的寫作。[284]如此的失落心境必須是到與左聯合作後才有所改變，魯迅的匕首式雜文成了主要的寫作形式，他將生命大量投入於政治運動，並嘗試相信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是一條可以改變中國命運的藥方。也因此，魯迅加入左聯後，既不再有此心境作這樣的創作，也不願意再陷入徬徨、猶豫的心境。

就如同魯迅對自我過去的否定，左翼研究者如何擺脫魯迅生命的虛無與黑暗，展現其光明、革命的一面以符合時代，這是個棘手問題。像是魯迅研究專家王瑤就是個例子，他在《中國新文學史稿》（1951）以大量的篇幅來描繪吶喊的魯迅形象，以二十多頁談他的小說與雜文。但《野草》卻僅以短短 28 行帶過，刻意忽略《野草》在魯迅作品中的重要地位。[285]王瑤在〈論《野草》〉裡是這樣解釋《野草》在魯迅生命中的意義：

> 《野草》中的主要內容就反映了這一思想矛盾的歷程，因此這部作品不但不因為它包含有一些空虛寂寞的感情而減去光彩，而且由於它反映了一個偉大的革命者在前進的過程中如何克服負荷，嚴肅的進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因而給我們以具大的啟示和教育。[286]

在文中王瑤極力維護魯迅的政治正確，企圖將其創作的矛盾、以「夢」托寓解釋為魯迅個人意識的成長過程，以及國民黨的外在壓迫所導致形式以象徵形式書寫、內容存在著虛無的情況。回過頭來說，我們不難想像在新中國建立初期，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精神導師是不容許被沾染上任何汙點的，連思想的困頓、掙扎都被掩蓋，希望以最為光明的一面為世人了解。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的避重就輕，所代表的是在中共定調下的革命魯迅形象是不容許研

---

283 魯迅，〈《野草》英文譯本序〉，收錄於《魯迅全集》第 4 卷，頁 365。
284 可參考：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89。
285 夏偉，〈"野草魯迅"與《鐵屋中的吶喊》－－兼及李歐梵與王瑤、唐弢之比較〉，《社會科學戰線》2013 年第 3 期，頁 186。
286 王瑤〈論《野草》〉，收錄於《王瑤文集》第 6 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頁 285。

究者挑戰。必須要到 1980 年代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初，才開始有研究者在有限的自由中投身討論魯迅的黑暗面。

舒蕪是當時少數詳細討論魯迅《野草》的左翼研究者，比較夏濟安與舒蕪的研究可以發現，兩人的魯迅思想詮釋有著相似之處。針對魯迅「革自己的命」的觀照更有異曲同工之妙，認為魯迅身上揹負著原罪，在追尋國民性的改革同時也不斷的反省自己是被改革的對象。舒蕪與夏濟安都賦予魯迅悲劇英雄形象，不同的地方在於兩人在直指魯迅的「黑暗面」中，卻又看見了他面對世界的不同姿態。舒蕪側重討論魯迅面臨自己的黑暗面而轉化成戰鬥精神，而夏濟安則較強調他內心的虛無。

換句話說，儘管兩人的論述乍看之下十分相似，但論述方法、策略、對象與意圖卻十分不同。不論是舒蕪或夏濟安都看到魯迅思想本源的複雜，同時帶有與時代之惡一同犧牲的原罪意識。不同地方在於，舒蕪與夏濟安以各自需要解讀魯迅的複雜性格，舒蕪認為這樣的矛盾成為魯迅戰鬥精神的來源，夏濟安雖也看到這部分，但更強調矛盾背後魯迅的黑暗與不安，其所見的魯迅與黑暗面，最終的立基點還是在於對舊中國社會的改革。夏濟安的魯迅黑暗面研究，是關注本身內部意識的新舊文化衝突，甚至是他對於革命的懷疑，以及對新舊中國都有著相同共通的醜陋之處。[287]不僅如此，舒、夏兩人的魯迅研究另一個差別在於，舒蕪並不認為魯迅的思想有前後期之分別，但夏濟安則與多數的解釋相同，認為魯迅後期精神思想轉入了社會主義道路與前期有所差異。

兩人對於魯迅思想是否轉向在認知是有所落差，連帶的也影響了舒、夏兩人觀照到黑暗面。舒蕪主張將魯迅的戰鬥精神視為一整體，並聚焦於魯迅如何的面對自身的黑暗面。這與主流的魯迅研究者，像是瞿秋白、毛澤東、馮雪峰、聶紺弩等人的說法明顯不同，主流論述在毛澤東的《魯迅論》下，多強調魯迅的階級鬥爭與民族解放立場。但舒蕪卻在文中剖析魯迅與自身內部的黑暗戰鬥的精神，並將其視為魯迅戰鬥動力的來源。舒蕪這樣闡釋的：

[287]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夏濟安選集》，頁 30。

> 魯迅，用他的正視黑暗的眼，正視黑暗的中國，就在這樣的國家裡面「走」出了他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必須通過自衛，才能實現犧牲；必須通過冷酷，才能實現熱情。[288]

舒蕪與胡風的魯迅觀相似，都強調魯迅思想並沒有轉向問題，雖然其創作表現形式有前後期之分，但本質上的意義是相同的。雖說到了 1952 年之後因為政治因素，舒蕪背棄了胡風的路線，甚至批判胡風為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但在 1940 年代兩人確實對於文學的看法是頗為契合的。舒蕪的文章並未以馬克思主義詞彙來描繪戰鬥性格，從通篇文章的內容可以看見，舒蕪以含糊的戰鬥、反抗概念貫穿魯迅的精神，有意模糊他轉向的部分，將其抗爭的精神連結於社會主義鬥爭脈絡。

舒蕪唯心式的魯迅研究在 1940 年代雖非主流，但展現不同於共產黨強力形塑魯迅戰士的光明形象。而他筆下的魯迅與黑暗的戰鬥僅僅只是為了戰鬥黑暗，這一觀點到了新中國時期就顯得非常尷尬。這種對於黑暗、虛無的唯心式研究，在那時代很容易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也因此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場場反右的「獵巫」運動，整個 1950 年代中國的魯迅研究受到一連串的反右派運動傷害。許許多多傑出的研究者都被打成右派，包括：胡風、馮雪峰、許杰、李長之、黃藥眠、舒蕪等人，都被打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陣營，造成整個中國魯迅研究的一體化、極左化。這也許與胡風集團和周揚為首的共產黨主流論述之間的不合有關，但更深層的磨擦在於共產黨在神格化魯迅的同時，也勢必要消除魯迅獨立於黨性之上的獨立個體性的價值。這正揭示著魯迅在 1927 年的預言：

>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甚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89]

究竟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宗派之間的鬥爭導致新中國成立後混亂依

[288] 舒蕪，〈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頁 319。
[289] 魯迅，〈小雜感〉，原發表於《語絲》1927.12.17。後收錄於《魯迅全集》第 3 卷，頁 556。

舊，反右鬥爭後共產黨把持魯迅論述的主導權，在剷除異己中建立起黨統一威信，但也同樣的使魯迅研究陷入了最黑暗的「挫折期」。雖說其後出現一批新的年輕研究者，像是：邵伯周、吳中杰、卜林扉、陸耀東、林志浩等人，但是他們的魯迅研究若非符合共產黨的左翼民族論述方針，就是於敏感問題點到為止而已。[290]

反觀海外方面因為各個國家、地區情況，魯迅研究呈現不一的情況，但魯迅黑暗面的研究還是由夏濟安在美國開啟。儘管在當時除了夏濟安外還有：黃松康[291]、米爾絲（Harriet C. Mills）[292]等多位，都指出魯迅與共產黨之間的不穩固關係，並認為兩者之間是盟友而非魯迅接受共產黨的支配。但是由於無法取得進一步的資料，因而研究者們沒有更多的文獻來佐證這樣的說法。一直要到接續的李歐梵等人才補足了這一塊的空白，也促成了在兩岸政治正確的寫實主義風潮下開展出新的研究趨向。[293]

第五節　李歐梵的繼承海外魯迅研究

夏濟安在美國的魯迅研究，不同於中、台兩地的政治化的論述，而延續魯迅黑暗面的研究，接續其後的李歐梵繼承著夏濟安魯迅研究中的特殊位置，也同樣在這一脈絡下持續深化黑暗面的討論。反觀，中國的魯迅研究必須要到1980 年代中期才有較大的突破：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徬徨》綜論》、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兩部是當時中國魯迅研究史重要的專論。這兩部論作重新探尋魯迅個人內在精神世界，與過去「民族魂」、「革命導師」的魯迅形象有極大的差別，反倒與海外的夏濟安、李歐梵的魯迅研究出現「共識」，在「黑暗的閘門」、「歷史的中間物」的概念裡走出過去政策主導下的魯迅詮釋。[294]

---

[290] 詳細可參考：袁良駿，《當代魯迅研究史》（陝西：陝西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頁 195。

[291] Sung-K'ang Huang "Lu Hsun and New Cultural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Amsterdam: Djambatam, 1957)

[292] Harriet C. Mills, "Lu Xu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From Mara to Marx." in ibid.

[293] 這一脈絡除了李歐梵最受矚目之外，包括了林毓生、陳炳良等人的研究也在夏濟安的框架下深化了海外的魯迅研究。

[294] 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1987 年出版英文版，而台灣則為 1995 年由風雲出版社出版繁體

回過頭來看，許多研究者在討論李歐梵時都將其系譜化為承繼夏志清，將討論視域關注於夏志清與李歐梵的異同，[295]但在魯迅研究上李歐梵更似夏濟安而非夏志清，這我們從《鐵屋中的吶喊》中就可見其影響。《鐵屋中的吶喊》是李歐梵魯迅研究的代表作，大致觀點都在本書呈現，其餘部分散落在其他著作，像是:《現代性的追求》、《中西文學的徊想》、《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上海摩登》等等。李歐梵曾如此自述夏濟安對他的影響：

> 夏濟安的〈魯迅小說中的黑暗力量〉、〈魯迅與左聯的解體〉兩章對魯迅作了極為精采的刻畫。這種魯迅影響的陰影始終籠罩著我整個的與魯迅研究，這就是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說的那個詞——「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經過了差不多十年的焦慮，我最終放棄了任何想超過的念頭，而乖乖一心一意的效法先生了。[296]

李歐梵的自白透露出兩點：第一，他的魯迅研究受到夏濟安深刻的影響，甚至出現了「影響的焦慮」。在《鐵屋中的吶喊》可以看到夏濟安〈魯迅小說中的黑暗力量〉(〈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魯迅與左聯的解體〉(〈魯迅與左聯的分崩離析〉)的影子，專書的第二部分是〈魯迅小說中的黑暗力量〉的延伸，第三部分則是〈魯迅與左聯的解體〉的深化討論。第二，雖說李歐梵自述自己的魯迅研究放棄了超越夏濟安的念頭，而只希望效法夏濟安，但細讀《鐵屋中的吶喊》，但能夠發現李歐梵在許多論點突破了夏濟安的研究基礎，包括深化對《野草》的析論、將魯迅的傳統與現代文學整合為一體，給予雜文正面的好評等等，都表現出夏、李兩人的魯迅研究的繼承與開展。

李歐梵在魯迅研究上不只承繼夏氏兄弟，同時也受到捷克學者普實克的影響甚深。雖說夏志清與普實克曾因《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內容有過論爭，且在

版，1999 年中國長沙岳麓出版社出版簡體版。

[295] 許多研究者都會將夏志清與李歐梵來比較或討論其關係，像是：張毓純，《當代中國文學的思想脈絡——夏志清、李歐梵與王德威的傳承與變遷》(台灣：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2011)。鄭闖琦，〈從夏志清到李歐梵和王德威———條八〇年代以來影響深遠的文學史敘事線索〉，《文學理論與批評》，2004 年第一期。彭松、唐金海，〈海外華人學者現代文學研究的傳統因素——以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為例〉，《文學評論》，2007 年第 5 期。

[296] 李歐梵，〈光明與黑暗之門——我對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三聯書店，2009）頁 182。

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下形成各說各話的情況，但李歐梵有效的整合了兩者的論點，嘗試在「政治偏見」外有效的開闢出新的魯迅研究道路。[297]回過頭來說，李歐梵在魯迅研究的繼承與開創之間面對了極大的掙扎，一方面來自於夏氏兄弟的「影響的焦慮」，並且希望在這兩人之上更加正面的給予魯迅應有的評價。另一方面也必須面對中國學者將魯迅形塑為革命導師的官方說法，千篇一律的成為當時代魯迅研究的主旋律。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李歐梵在魯迅研究上繼承夏濟安孤獨者的道路，但同時也持平看待整體著作及其時代意義，希望將魯迅安置在中國文學應有的位置。他在《鐵屋中的吶喊》這樣說道：

> 我在本書中的研究，走了非毛角度使魯迅非神化的一步，依靠的是承認他的內在悖論和矛盾，並盡我所能地恢復他的寫作藝術方面的本來面貌，證明它是文學，而不是政治思想。因為我得出的結論是：魯迅並非一位有體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後一貫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發展也並非順著一條從社會進化到革命馬克思主義決定論的路線。在我看來，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緒（內心的鬼）轉化為藝術的意義結構，這種意義結構是絕不能膚淺地僅僅理解為抽象的「革命意圖」的。[298]

如果說我們以陳獨秀於 1937 年〈我對魯迅之認識〉強調「人的魯迅」作為起始，「人的魯迅」這一脈絡試圖對抗中共所建構的革命、神化魯迅形象。[299]而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正是學理化的個人、文學的魯迅研究的集大成，系統化的以魯迅的生平為經、創作作品為緯，細讀方式分析作品中的藝術技巧與作者精神世界。

李歐梵說明魯迅與五四的關係時承襲夏濟安的說法，將其解釋為：「背著傳統的重擔，走出傳統的陰影，另創一片新的藝術世界。[300]」多次在文章中強調魯迅作品有許多的「隱喻」與「寓意」，而這些隱晦的意義折射他對這世界

---

[297] 尹慧珉在譯後談及：「本書作者李歐梵原是夏濟安的學生，他對普實克也十分尊重，普實克身後的論文集《抒情詩與史詩》就是李歐梵所編纂的。從本書可以看出，其中既有對這兩位漢學界前人師承的痕跡，又有所發展豐富，也有選擇的揚棄。」尹慧珉，〈譯後〉《鐵屋中的吶喊》，頁 221。

[298]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196。

[299] 陳獨秀，〈我對魯迅之認識〉，《宇宙風》第 52 期（1937.11.21）。

[300] 李歐梵，〈五四文學與魯迅〉，《中西文學的徊想》（香港：三聯書店，1986）頁 12。

的想像，不論是小說或是雜文的研究都著重討論現代主義技巧與內涵。[301]此外，李歐梵注意的另一個重點是「抒情性」，這觀點延續普實克的《抒情詩與史詩》，認為如此的抒情性是源自於中國傳統詩學，並同時鏈結於世界的抒情文學系譜，接近於海塞、紀德、伍爾芙，甚或是喬伊斯。[302]

李歐梵同樣非常重視《野草》的價值，雖只有短短 23 篇文章但李歐梵在書中特立一個專章，甚至在討論雜文時又不時的提起《野草》，都表現出他認為《野草》在魯迅創作歷程的重要性。李歐梵認為魯迅在《野草》時的技巧，是在新舊文體中的交融、轉換，內容呈現抒情與頹廢色彩，卻以意象、隱喻曲折的文字建構這本散文集。[303]一如鄭闖琦所述，李歐梵在中國文學史的範疇中梳理頹廢線索，並以魯迅的精神世界特別是《野草》時期作為核心，建構出從魏晉到《紅樓夢》到《野草》的一脈相承，也是他所認同頹廢風格的重要流派。[304]

針對魯迅左傾的原因夏濟安沒有太多的描述，只聚焦討論左聯內部魯迅派與周揚派的鬥爭，藉此解釋 1950 年代一系列的反右運動是內部宗派的對立。李歐梵在《鐵屋中的吶喊》補足了夏濟安從〈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到〈魯迅以及左聯的分崩離析〉的空白，〈對文學和革命看法的變化和發展〉一章討論從 1926 年開始魯迅是如何與創造社、梁實秋論爭，並且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書籍，最終轉向與左聯合作。李的研究有意與中國說法對話，同時也希冀走出英美學派重視魯迅前期而反對後期的說法，在這兩種論述之間走出第三條路，反對將魯迅的左傾視為中共整體的一部分，而僅將魯迅定位為關心、同情、認同社會

---

301 受到夏濟安影響的新一代海外學者皆持類似觀點，包括曾留學海外的香港學者陳炳良有同樣如是說：「我們更進一步了解魯迅的文藝思想。不論多少批評家說他是社會主義作家，他的作品仍是浪漫的、主觀的、象徵的。」陳炳良，〈魯迅在五四前後的思想〉，《文學散論》（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頁 189。

302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65。

303 李歐梵說道：「魯迅向中國古代詩人一樣，很能在詠物中作召喚性的、即引起聯想的描寫。但他的語言很少直接的，詞與往往是奇異的形象組成，整篇的語境有時也可以超現實的隱喻的層次會意。」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92。

304 鄭闖琦說道：「李歐梵進而梳理出一條中國文學史上頹廢線索，這就是從魏、晉、唐、晚明的一些文學，到《紅樓夢》、王國維的文學評論，到魯迅《野草》等作品，到 30 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和張愛玲巔峰時期的小說、到朱天心的小說。」鄭闖琦，〈從夏志清到李歐梵和王德威：一條八O年代以來影響深遠的文學史敘事線索〉，《文學理論與批評》，2004 年第 1 期，頁 11。

主義路線。他說道：「文學與革命的理論問題以及在政治承擔框架以內確定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的問題，而不是革命策略的問題。」[305]由此可見，李歐梵既不似夏志清一般認為魯迅像共產黨「投降」，又不若王瑤等將轉向單純的看作是加入革命陣營，甚或蘇雪林、鄭學稼般認為左聯與共產黨是由魯迅領導，而是在夏濟安的基礎上細部梳理魯迅從徬徨轉向激進的心靈流動，以及他與共產黨、左聯所保持的一定關係。

由上述可以了解，雖說兩人的魯迅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繼承關係，但夏濟安與李歐梵最大不同在於對魯迅雜文的評價。夏濟安對魯迅雜文太過直白與絕對的批評，甚至認為政治性的雜文並不屬於創作，而李歐梵則希望給予較為正面的評價，同時也在黑暗面的立基點上來分析。李歐梵這樣談及自己與夏濟安在雜文上見解的不同：

> 由於內容有明顯的政治性和論爭性，這些雜文是否可以和小說、散文詩、舊體詩等一樣視為「藝術創作」就成為一個問題。有些西方學者是持否定態度的。我的意見則相反，認為如果我們想以中國的文學傳統為背景來衡量魯迅作為現代作家獨創性的程度，雜文恰恰應是非常重要的一面。[306]

這段文字裡李歐梵清楚解釋與夏濟安立場相左，夏濟安與舒爾茨都認為魯迅的文學創作到了 1926 年就結束了，其後的雜文寫作都不算是他文學的部分。[307]而 1926 年以後魯迅的寫作大多數都是雜文，少數被視為「油滑」的故事新編作品也未獲得夏氏兄弟與舒爾茨的好評。夏濟安認為，魯迅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讓他走出原有的黯淡、陰暗情緒，轉而激進的道路並且積極的介入政治運動，但創作也因而中止。[308]夏志清也有類似的看法，在《小說史》中也同樣沒有將雜文視為創作：「在他投共以後，雜文的寫作更成了他專心一意的工作，以此來代替他創作力的衰竭。」[309]從這裡可以看到，夏氏兄弟因反共意識形態的因素，以及對政治介入文學的質疑連帶的影響對魯迅雜文的看法，當然這也是整

[305]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137。
[306]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頁 112。
[307] TSI-AN HSIA(1968). "The Gate of Darknes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128.
[308] TSI-AN HSIA(1968). "The Gate of Darknes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128.
[309]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 44。

個海外華人的魯迅研究關於雜文的討論多半停留於政治層面，像是蘇雪林認為魯迅的雜文就只是謾罵、人身攻擊，夏志清則認為魯迅的雜文表現出其創作力下滑的事實，唯獨李歐梵的雜文研究嘗試在中國與海外的評述中找尋雜文討論可以對話的空間。

《鐵屋中的吶喊》裡以專章討論雜文創作的價值，並且歸納出魯迅雜文幾點重要特點：第一，李歐梵觀照魯迅的雜文並未如五四主流的反傳統，不以新舊二元論的昨非今是評判好壞，而引古人之言對照今人之行，再現現今社會依然存在著傳統的陋習。第二，魯迅的雜文常以警句、格言的方式呈現，並且在早期具濃厚象徵色彩，許多篇章都是以「雜感」方式呈現。第三，魯迅雜文雖說表現出前期抒情、後期議論，但在後期的雜文中仍帶有隱喻與抒情。李歐梵強調魯迅早期的雜文有濃厚的隱喻，而這種「隱喻方式」（metaphoric mode）的文章具複雜的多層次意義。到了後期與論敵論爭的文章雖顯辛辣的諷刺、尖刻、好鬥、帶有摧毀性，但這些感受正來自於社會的黑暗使其感到必須戰鬥，帶有偏執的瘋狂書寫著批判性雜文。[310]雖說這些特點展現了李歐梵對魯迅雜文的見解並嘗試賦予文學上一定的評價，但在文中仍不時依循的夏濟安的說法，以致在《鐵屋中的吶喊》中陷入了「影響的焦慮」。

李歐梵認為若將雜文剔除魯迅將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作品，但這一層的焦慮卻也掩蓋不住他某種程度上同意夏氏兄弟的見解，認為魯迅後期的雜文藝術有待商榷。他說道：「從文學的角度看，這些雜文未免籠罩著過多的對社會事務的關心，焦點過於集中在較狹窄的主題和範圍之內，視界和深度感則由此而削弱了。」[311]這裡透露出李歐梵面對夏氏兄弟研究的「影響的焦慮」，在〈雜文：對生活和現實的種種觀感〉可見他對雜文評價的猶疑，一方面不認同夏濟安與舒爾茨將雜文屏除於魯迅的創作之外，但同時也認可魯迅雜文部分篇章的藝術價值不高。如此的矛盾使得李歐梵的解釋仍然不脫夏濟安的脈絡，對《野草》以及早期高度隱喻性、雜感式的「雜文」有很高的好評。

---

310 參考自：李歐梵，〈第六章　雜文：對生活和現實的種種觀感〉，《鐵屋中的吶喊》（台北：風雲出版社，1995）。

311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127。

由上述我們可以理解，李歐梵是如何在夏濟安的基礎上進行魯迅研究，並且補足了《黑暗的閘門》的不完整。從夏氏兄弟到李歐梵這一脈絡的海外魯迅研究在文本的分析上獲得極高的重視，且著重討論魯迅的創作技巧以及精神世界的矛盾、複雜成為當代魯迅研究的重要一支。然而在中國方面，到了 1980 年代前後中國在文革結束走向改革開放，魯迅研究者也逐漸揚棄過去神化、革命家的魯迅研究，轉而進入文本細讀與魯迅晦澀、曲折的精神世界。包括我們前面所提到的王富仁、楊義、錢理群、汪暉的研究專著之外，另外像是孫玉石、李國濤、閔抗生等人的研究也開始擺脫教條式研究，以藝術層面來討論魯迅的作品。[312]而這些人的魯迅研究，部分因受到海外學者的影響所以有相近、承襲的觀點，另一些人則因時代的開放而嘗試在擺脫枷鎖後進入魯迅的禁忌，探索魯迅的心靈的掙扎，並與中國自身變動時代有著某程度的對話。

第六節　小結

其實李歐梵的魯迅研究除了受夏濟安影響外，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313]在魯迅精神思想研究也同時對李歐梵有很大啟發，在《鐵屋中的吶喊》裡都可看見援用情況。不同於李歐梵在《鐵屋中的吶喊》作細緻的文本分析，林毓生則主要研究魯迅面對劇烈變動中的中國時內心意識的的流動情形。在林毓生、李歐梵的論述中否定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而更深層的探究魯迅如何在外在表現與內在意義中存在著傳統與現代的交融。[314]

不僅如此，《中國意識的危機》1988 年在中國出版後，也同時對中國學界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像是汪暉的魯迅研究就有許多概念參考於此，由此可見

---

312 李歐梵在討論《野草》時，也加上註釋解釋當時中國大陸的魯迅研究情形，他是如此談到的：「本書出稿寫作之時，中國學者還囿於魯迅的『革命性』的框架內。對《野草》很少談論，即使談到，也是強授以革命的意義。不過，從 1981 年以來，一般的調子已經變了，開始注重期壓抑的情緒和高度形象化的語言，以此作為分析的起點。」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109。

313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 「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江西：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Lin Yu-sheng（1979）.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314 林毓生認為，魯迅、陳獨秀、胡適等五四時期的思想家，往往陷入傳統與反傳統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他們既是激烈的反傳統文化健將，但卻又不自覺具某種程度的繼承中國傳統文化道德觀。

海外與中國的魯迅研究的對話。換言之，現今夏氏兄弟、林毓生、李歐梵海外學者的論述已成為經典，其論述中對魯迅形象同時呈現的褒與貶，也正符合「人的魯迅」口號希冀將魯迅請下神壇恢復到人的面貌，也因而受到新時期中國大陸的重視，在渴望與世界接觸的同時魯迅研究成了重要的溝通橋樑，也是冷戰以後由對立走向對話的重要媒介。換言之，這股海外的魯迅研究並未僅限於在海外華語語系文學中發展，同時宛若回聲般的重新影響了 1980 年代後的中國大陸魯迅研究，形成了中國與華語語系之間的交互對話與影響的情形。這讓自 1950 年代反右運動後逐漸消失的魯迅思想轉向、黑暗面研究的伏流，伴隨著中國體制上的逐漸開放而浮出地表，兩造針對這議題的持續深化讓魯迅黑暗面研究自 1980 年代以後都是海內外最為重要的研究議題。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夏濟安以降「同情的批評」的評論成了海外研究者解讀魯迅的角度，他們一面強化魯迅的文學在藝術層面的價值，同時放大魯迅與共產黨之間的衝突，嘗試解構他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以及其光明、戰鬥的精神導師形象。這看似將魯迅請下神壇覆歸於人的形象，但實際上背後仍可見冷戰體制下共產／自由陣營的不同論述語境在魯迅形象建構上的競合關係。也就是說，魯迅個體性的研究雖然彰顯其思想是獨立於共產黨之外而不被集體主義所綁架，但這一特點卻被冷戰體制下資本主義陣營過度放大與張顯，即便海外的研究者夏氏兄弟、李歐梵等人研究的目的並沒有強烈的政治動機，但其意識形態與研究成果卻成為政治角力的重要武器，讓資本主義陣營可以試圖解構中共的文化論述，並在魯迅與共產黨之間見縫插針。當然中美的政治情勢緩和，中國逐步的走出文革的陰影後，海內外的文化又開始重啟交流，對於魯迅研究也在此時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所以說 1980 年代中國的魯迅研究與海外的合流，在學術上擴大了魯迅研究的基礎並凝聚一定的共識，讓海外的研究成果為中國所接受，有助於魯迅研究反思過去擁魯與反魯之間的政治性詮釋之盲點。我們也可以解讀為：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中國研究者的魯迅論述也如同經濟政策一般的逐步向西方靠攏，但學術圈內部對於「如何定位魯迅」以及何為「人的魯迅」這樣的一個命題，卻成為新的魯迅研究中所面臨的難題。

接續其後的海外學者的魯迅討論當屬王德威最受關注，雖然他不是魯迅研究專家，但王以幻燈片事件作為討論中國現代性與殖民性的二元辯證，在華語學術圈引發不小的討論。他最早評論魯迅的文章可以追溯到 1986 年的《文星》上發表一篇名為〈重視《狂人日記》〉的文章，其後又於 1988 年於《中國論壇》發表〈「真的惡聲」？魯迅與當代大陸作家〉在當時台灣文壇荒蕪的魯迅研究圈中頗獲重視。[315]

而近年來王德威〈從「頭」談起：魯迅、沈從文與砍頭〉[316]以幻燈片事件的斷頭作為引子，探討魯迅創作動機源自於黑暗與絕望，於此也陷溺於如此的虛無之中。他的說法在魯迅研究界獨樹一格，其新穎的切入角度立刻獲得眾多的討論，部分學者認為這種說法可能擴大詮釋「砍頭」可象徵意義，僅僅關注魯迅的「絕望」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反抗」，而異於現階段的魯迅的基本共識。但不論如何王德威嘗試在現階段魯迅討論中帶出新的意義，某種程度上來說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

王德威在該文中所顯現的「揚沈貶魯」的意識形態，其背後所帶有的是對於正典的文學史價值觀的再思考，正如他在「華語文學」概念的看法，認為「華語語系文學」的發展具有逆反的效用，由海外對於中國具有強烈的解構性質，甚或在文學試圖建構以海外作為正典的美學觀。這種從邊緣出發的逆反其目的在騷動中國文學的典律化，時時以海外的位置提出對應的論述來達到對話的效果，一如李有成的評論：「王德威似乎有意藉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泯除海內、海外的界線，使之成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317]這共同體打破國族疆界以語言為範疇，在場域內部進行文學詮釋權的競奪。但事實上來看，在王的內心中卻先驗性的存在著反轉過往中國文學史敘事的意圖，從夏志清到王德威一脈反思文學中改革教化的意義，他們以「感時憂國」一詞來概括 1920～1960 年代的作家們的書寫，其內在的中國因素之造成創作的囿限，而魯迅便在此脈絡下成

[315] 王德威，〈重視狂人日記〉，《文星》101，1986.11。王德威，〈「真的惡聲」？魯迅與當代大陸作家〉，《中國論壇》26：3（1988.5）。
[316]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317] 李有成，〈離散與華文文學〉，華文文學論壇：台北與世界的對話研討會，2007.12.7。

為他們口中的反面教材。[318]也因此我們可以看逐漸取代左翼／右翼的文學論爭是政治／非政治的架構，這就可以說明從夏濟安之後的海外魯迅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到了 1980 年代輸入回中國成為文革之後中國大陸魯迅研究者的重要思想資源，並且在華語語系的框架中形成對話與交流，甚而形成新的一種以美國為首跨越中、港、台華語文化圈中的新霸權論述。

也就是說，位處邊緣的海外研究者實際上在全球化與冷戰體制架構下，比中國大陸的魯迅研究者更加處於中心的位置，隨著蘇聯與共產勢力的逐漸衰退，美國佔全球主導性的地位日趨穩固，連帶的以美國為首的第一世界學術研究體系的研究成果，更能夠利用冷戰體系將有利或符合於資本主義陣營的思想透過輸出來影響其他地區與國家，特別是宛若回聲般的影響中國。換句話說，以現今的研究成果來看，儘管夏濟安、夏志清、林毓生、李歐梵、王德威等人的學術研究不在中國產生，但不論是因為語言因素或是任職單位、機構的關係，導致他們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視野中比中國的研究者還代表中國。

[318] 2014 年王德威受蘋果任報訪問時曾談到，在感時憂國之中「魯迅則是個反面教材」。網路新聞：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116/14874594 （最後流覽日期：2014.6.1）

第六章　魯迅思想的東亞區域框架思考

在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有倆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他倆的來歷有些不明，不曉得是追慕不返母親的慈愛，自己走出家來，也是不受後母教訓，被逐的前人之子。
他倆不知立的什麼地方，也不知什麼是方向，不知立的地面是否穩固，也不知立的四周是否危險，因為一片暗黑，眼睛已失了作用。
他倆已經忘卻了一切，心裡不懷抱驚恐，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種的直覺支配著他們，——前進！
他倆感到有一種，不許他們永久立存同一位置的勢力。他倆便也攜著手，堅固地信賴、互相提攜；由本能的衝動，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處的前途，移動自己的腳步。前進！盲目地前進！
無目的地前進！自然忘記他們行程的遠近，只是前進，互相信賴，互相提攜，為著前進而前進。

賴和〈前進〉

1. 彷徨與前進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在 1928 年寫下〈前進〉這散文，內容述說兩兄弟面對黑暗、未知的前方一同並行時，雖然內心藏著驚恐卻依然相互扶持前進到那未知的前方。這篇散文是因應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而寫，1927 年左翼人士連溫卿、王敏川獲得了文協主導權後，調整路線走向左傾與激進的道路，使中間派與右派的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退出自組台灣民眾黨。當時賴和在兩個組織都有擔任職務以及機關刊物撰文，他不願意看到的反抗陣營因內部矛盾導致瓦解，所以寫下〈前進〉表達自己對於分裂的看法以及內心的遺憾。〈前進〉的內容所述說的兩兄弟便是指涉分裂後的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希望雙方能繼續合作，一同帶領台灣對抗日本殖民政府。

面對改革、革新派的路線不同，賴和與魯迅形成生命上的反差。對比於同時期魯迅受到左右翼文化人士的攻擊，最後才在共產黨的授意下拉攏魯迅加入文化陣線，賴和反倒站在調和左右翼文化人的高度，成為兩個陣營共容的作家。

當然筆者並非在評價兩人誰優誰劣，而是同樣的大時代左右翼對峙時，魯迅與賴和與文化圈關係之不同，魯迅虛無主義的徬徨態度對革命有更深沉的反思，賴和則不斷的思索啟蒙、教育知識份子與民眾的關係。雖是如此，但仍可以看到兩人面對未知時相同的感受，魯迅的「寂寞舊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於一卒，荷戟獨徬徨。」亦或是賴和的「由本能的衝動，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處的前途，移動自己的腳步。前進！盲目地前進！」，孤獨者的彷徨與盲目的前進，所面臨的是時代巨輪的看不見終點與出口，「彷徨」與「前進」，好似輪迴一般的困擾著當時代的兩岸知識份子。（也許現在也是如此）

事實上，魯迅整整大了賴和一個世代，賴和在文學的學習道路上也受到魯迅的影響，在他的藏書列表中能看到魯迅的作品在內，甚或〈高木友枝〉、〈一個同志的批信〉也都有魯迅作品的影子。[319]不只是賴和受到魯迅的影響，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都有閱讀魯迅作品的經驗，包括張我軍、葉榮鐘、楊逵、鍾理和等等在不同程度接受魯迅思想，並且轉化成個人的創作養分。以鍾理和來說，他在日記或其他場合都表述對魯迅小說的喜愛，而引起他共鳴的部分是知識份子面對愚昧國民性的掙扎。像是魯迅的〈狂人日記〉、〈故鄉〉、〈在酒樓上〉等著作，與他個人在美濃家鄉對抗同姓之婚的傳統倫理有種精神性的契合，而他的創作〈山火〉、〈假黎婆〉等等也與魯迅作品有可以對照之處。如此的傳播與影響往往被後來的學者以主流、支流的說法劃歸為主從關係，而忽視了各個地方的交流與演繹，其實不應該以主流、支流來劃分，更多的是思想的運用，並轉化為屬於自身的資源。猶如賴和的好友吳新榮所說的：「賴和在台灣，正如魯迅在中國，高爾基在蘇聯，任何權威都不能漠視其存在。」[320]作為反抗者對抗威權，思想資源的轉介與流動，是普世性的價值，在全球各地都能達到共鳴。

[319] 賴和的〈高木友枝〉與魯迅的〈藤野先生〉、〈一封同志的批信〉與〈犧牲謨〉都有可以比較與相似之處。

[320] 吳新榮（史民），〈文藝通訊〉《台灣文學》第二輯，1948.9。

另外，日本的魯迅研究也在殖民統治時代影響著台灣，大量留學日本的台灣人在當地接受了魯迅思想。像是葉榮鐘就曾在留學日本時發表與魯迅相關的文章，楊逵收藏的一套《大魯迅全集》是日本警察入田春彥贈送之遺物。該版本是由日本的魯迅研究者共同編輯，包括鹿地亘、井上紅梅、增田涉、山上正義、日高清磨磋、小田岳夫、松高茂夫，並且聘請茅盾、許廣平、胡風、內山完造當顧問。此外，更直接的影響還有增田涉的〈魯迅傳〉曾在《台灣文藝》刊載，並引起郭沫若〈〈魯迅傳〉中的謬誤〉反駁。增田涉與郭沫若背後所代表的是魯迅集團與左聯領導集團的衝突，殖民母國與原鄉祖國的論爭，在台灣文壇掀起討論的漣漪。

由上述的介紹可知，台灣的魯迅思想傳播與接受主要是來自兩條路線，其一是中國白話文學系統，另一是日本語文學系統。這兩大系統所共構的是東亞思想的流動路徑，以及面對東亞一體化問題的想像。早在一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許多中、日、韓學者就已開始針對東亞問題提出想法，日本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岡倉覺三、大川周明的「大亞洲主義」與中國的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等論述，也是在這樣的架構下被建立。其後太平洋戰爭下的日本「大東亞聖戰」，為求建立一個亞洲整體區域架構的穩定、和平體系，以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營造出以日本為首的「新東亞共同體」。也因此提出了「八紘一宇」的概念，使日本人、中國人、蒙古人、朝鮮人、菲律賓人等都能被想像成具淵源的親族關係，打破原有國家領域得藩籬整合東亞區域各個國家。[321]從上述來看，過去在以日本為主體的東亞概念，往往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存在二元的對照性，在利用學習西方思潮與從東方自我體內價值和精神找尋與西方抗衡的力量。

[321] Peter Duus、小林英夫編，《帝國という幻想：「大東亞共榮圈」の思想と現實（東京：青木書店，1998）。

然而東亞一體對抗西方文明、列強的思考，在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戰敗後也暫而告終，取而代之的是全球的美蘇對立之冷戰體制，亞太地區所構築起的東亞島鏈封鎖蘇聯、中國等共產勢力，原有的東亞一體化之想像也隨之瓦解。台港兩地也在資本主義陣營的串聯下有了密集的交流，並且接收了大量流亡的南來文人。多數南來文人抱持的反共、反魯立場，並且在兩地舉起反共大旗，將自身置入國共對立的框架，以及全球冷戰體制。

2. 冷戰體制下的魯迅思想傳播的三大問題

而本論文所處理的，正是討論這一批南來文人到了海外之後，如何在冷戰體制中建立起反共、反魯的論述，而反魯論述又在不同作家的身分位置上，以不同姿態回望與面對中國現況。也由於冷戰體制的架構，原有的東亞區域想像與思想流動被迫受到改變，原本談論魯迅的作家、研究者都因政治因素而噤聲，透過這一層的了解，我們又可以怎樣來看待，中國與台、港之間所存在的思想資源運用與拮抗。

本論文聚焦處理海外魯迅研究者，包括蘇雪林、寒爵、劉心皇、鄭學稼、曹聚仁、夏志清、司馬長風、夏濟安、李歐梵，便是在如此的社會脈動中開展魯迅文化史。而這之中在歸納之後所梳理的是三大問題：

1.魯迅論述與冷戰、國民黨反共體制縫合。

2.魯迅思想如何置入大一統的文化中國

3.海外魯迅研究論述的逆反中國與在地演繹。

而這三大問題雖然在時間上會有所重合，但我們仍可看到是依循著時間有著承襲的遞進關係。所以在本論文討論裡，也是依序的處理這三個問題，藉此

看到魯迅思想在台港兩地傳播與演繹的重層變貌。

「魯迅論述與冷戰、國民黨反共體制縫合」上所牽扯的是個人與體制的關係，對於作家、評論者來說，在時代之中往往不自覺「體制」對自我意識形態的囿限，以為自己具主體能動性表述了主觀意志，但實際上卻仍然受到國家、體制的滲透與干預。劉心皇在撰寫《現代中國文學史話》時，為了規避出版法令的限制以及反共文藝政策，雖然對於魯迅抱持一定程度的好感，卻不敢在《史話》中表現，而以流水帳形式或借他人之語的陳述來討論魯迅，從中嘗試偷渡自我主觀看法。如此的消極抵抗／配合體制所反映的正是國家體制干預個人意識形態，使個人被迫與反共體制縫合，並隨著時代的演進、言論的逐步開放適時的調整自我論述。

蘇雪林的魯迅論述剛好又是不一樣的例子，她不似劉心皇一般的消極抵抗／配合體制，而是主動獻身於國家、民族的文化脈絡。她的反魯論述比其他人都激進，甚或強度遠高於國民黨政權的文藝政策所要求，甘願成為反魯、反共文化論述的打手。蘇雪林雖不斷的宣稱，所謂的文學必須具有獨立自主的創作空間，且以幽默、具品味的方式來表現，但自己的文學評論卻又如此的介入政治，形成弔詭卻又並行的狀態。這樣的情況在司馬長風、夏志清身上都能看到類似的樣子，為了對抗中國共產黨的赤化，某程度是可以犧牲自己的文學來為政治服務。

「魯迅思想如何置入大一統的文化中國」這部分則有以香港的作家、評論者最為明顯，本論文所討論的曹聚仁、司馬長風都是抱持中華文化一統的構想的人。曹聚仁政治立場遊走於國共兩黨，雖被定位為左派，但同時對蔣經國有高度的評價，到了香港之後嘗試穿梭於兩岸促進和談與統一。這樣的政治態度也反映於他所書寫的魯迅形象上，相較於其他作家更加凸顯魯迅的

民族主義立場，並且強調魯迅永遠的反叛者態度，對於一切真實與真理都抱持懷疑，這都與其香港身份與特殊位置有關係。

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不斷反覆提及，文學創作上純美學與中國式特色的標準，一方面批評國、共兩黨將政治力介入文學，也攻擊夏志清等人的所帶有的西方美學思潮。他認為中國人必須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美學觀，擺脫政治的枷鎖以藝術作為文學的主體，否則容易陷於宣傳品而喪失創作精進的可能。當司馬長風談論到所謂「中國式」的藝術觀點時，是跳脫政黨政治的框架，以更廣大的民族論述來審視。而這種審視所表現的是司馬長風在香港生活的格格不入，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遍地追尋不到中國特色，導致離散的南來文人更嚮往追求中國原鄉的符碼與特殊性。所以可以看見司馬長風在討論魯迅時，不斷批判其政治意識形態，並且從中找尋中國的特色與符號，在從評論中流露出自身的思鄉之情。

「海外魯迅研究論述的逆反中國與在地演繹」則牽涉到冷戰體制的權力架構，華語語系文學在冷戰的協力之下反攻大陸，現今在文化論述的主導權上還佔了上風。我們可以看到夏氏兄弟在美國接受反共相關單位的獎助學金資助，令其在美國完成了《中國現代小說史》、《黑暗的閘門》，讓這兩本著作成為西方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此外，夏氏兄弟透過教育體制、翻譯出版等形式的介入，讓魯迅論述在台港兩地深根，並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將影響力延伸至中國大陸。如此的逆反性使得地緣上的邊緣論述其實才是文化上的中心，在美國推廣「普世價值」時連帶也將夏氏兄弟的論述帶回華語語系文學中，形成當今解讀魯迅不可忽視的一個支脈，甚至成為主流（流行）。

至於「在地演繹」我們可以以鄭學稼為例，鄭學稼的《魯迅正傳》1942 年的與 1978 年的版本有很大的出入，早期的版本所欲對抗的是正在興起的神

格化魯迅形象，所以在內容上有諸多人身攻擊言論，希望透過反魯傳記來解構共產黨塑造的魯迅風潮。而這部分因為時間的遞嬗，到了 1978 年後因海峽兩岸關係趨於緩和，兩地所爭奪的是正統中國的政治與文化意義，以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佔據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新版的《魯迅正傳》的重點不在單純討論魯迅，而是建構屬於中華民國的正統歷史，具某程度的文學史的效果。然而，這種轉換其實也可將其視為鄭學稼魯迅論述的演繹，配合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現實狀況轉化原有的論述內容，以魯迅來談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的國共文化場域鬥爭，以及共產黨內部的紛爭，為現今的歷史做更多原因的探索與解釋。

這三大問題的討論是構築在冷戰體制的社會脈絡，以及依附冷戰體制所衍伸的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換句話說，不論是史書美或是王德威的華語語系文學，所欲探討的是如何安置海外華文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應該處於怎樣的關係。在這之中的「逆反」與「演繹」，所表述的是面對中國的不同姿態，但卻依然處於冷戰結構，所以也必須回歸到如此的框架，並將美國因素納入考量。

必須再行說明的是，這三大問題除了是三個不同層面外，同時是具時間演進的。也就是說，魯迅思想從最早的受到黨國體制因素控制，到其後代表著正統文化中國，以及重新思索魯迅思想意義與價值，這背後所牽涉的是台、港兩地從 1950 年之後是如何在當代觀看中國，並且回望過去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及 1930 年代左翼文化運動。但同時間，這三大問題又不完全是線性的順序發生，而是時間有所重疊，同時存在並且並進的三個層次。

然而不論台灣或香港的文學發展，魯迅思想的影響力正在大幅的下滑。這並非擁魯或反魯層次上的問題，而是台、港兩地因文學的娛樂化與文學的

本土化等等諸多因素，導致具魯迅思想的重要性逐漸被取代，或者在恐中因素中成了犧牲品。但相對而言，日本卻一直都有著閱讀魯迅的傳統，甚或將魯迅研究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一支。這或許與這兩地長期處於冷戰體制，所導致其學術傳統的忽略中國現代文學與左翼文學。但若放大區域框架以「東亞」的角度來看，卻又能看到更為符合布爾迪厄「場」概念中的權力流動關係。

3. 魯迅思想的「東亞」區域整合的可能

張崑將有個有趣的說法，為我們省思台灣、中國之間的關係有非常大的幫助。他提到：

> 在台灣，中國則是「超巨大的他者」，因此只要這個「超巨大他者」存在一天，台灣永遠都會有「壓迫意識」、「認同混淆」的心理壓力。而台灣如果永遠存在於壓迫意識中，則溝口與子安所談的理性「東亞論述」或「中國論述」，在台灣根本發不出芽來。壓迫意識好像是台灣人揮之不去的緊箍咒，去了一個舊壓迫，又來了一個新壓迫，好像理所必至，勢所當然。但是，這個「新」的壓迫到底是本來應該不必有的，或是自己加速「求」來的，或者已成為政權利用的工具，以至成為一種背反的「壓迫意識」循環論，到底如何解套?我認為應該重新讓台灣回到脫軌已久的「東亞」軌道上，讓台灣重新看到「東亞」的存在，才能讓「東亞」看到台灣的存在。[322]

中國這巨大的他者，很容易讓台灣在面對全球其他地方時先陷入兩岸論述的桎梏，而無法與其他國家正常發展。另一方面這巨大的他者更是構築在冷戰體制的對立，讓台、港兩地的文化圈更為向美國傾斜，導致東亞區域的思想資源共享、論述，一直無法有效的突破美國的干預與區域的整合。

[322] 張崑將，〈如何從台灣思考東亞〉，《思想》第三期，頁 195。

當然在「東亞」問題的討論上，以中日韓最為成熟，並往往將這三地的區域架構以「東亞」一詞概括。如同陳芳明所述的「東亞文學中的魯迅」，他所指陳的東亞是指日本、中國、朝鮮、台灣，這屬於東北亞的區域。[323]但我這裡所指涉的「東亞」並不全然的將範圍定位於東北亞而已，而是整個亞太的區域都可以視為「東亞」的範疇。在「場」的流動中，有著不同於地理空間所表現的親疏遠近關係，彼此之間的合縱、連橫更顯示出「東亞」區域的複雜程度。而這放置於魯迅思想傳播的架構中，也表現「魯迅」在這些地方所具的特殊意義。

而東亞之間的魯迅討論與政治意識型態有密切的關聯，不僅於中、港、台三地而已，其他的區域也會形成多聲道的對話。像是冷戰時期的新馬地區，在接受魯迅思想時，是將其視為文化中國的經典，不同於台港兩地將其看作共產黨的同路人，呈現不同層次的魯迅符碼解讀。進一步來說，新馬地區由於受到英國殖民，以及多族群的衝突，也因此，接受魯迅思想背後所代表的是文化中國的認同，挪用中國資源來對抗殖民主義與其他族群的文化衝擊。如同王潤華所述：「魯迅最後竟變成代表中國文化或中國，沒有人可以拒絕中國，因為魯迅代表了中國在新馬的勢力。…反對魯迅等於反對『戰鬥』，反對抗戰，反對反殖民主義，最後等於反對中國文化。」[324]這部份的魯迅符碼運用就不同於台、港兩地，也與日本、韓國形成同的層次，在東亞區域中展現不同的面貌。

除了個別區域的不同魯迅思想運用外，魯迅也成為跨國、跨地區對話的重要符碼。舉例來說，日本學者丸山昇與香港學者陳炳良，就曾經在 1980 年代末期針對魯迅與共產黨關係等相關問題有過論爭。陳炳良嘗試解釋魯迅與

[323] 陳芳明，〈台灣與東亞文學中的魯迅〉，收錄於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編《一九四九以後　當代文學六十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頁 168。
[324] 王潤華，《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頁 97。

共產黨在 1930 年代的政治、文化史，同樣也包括了在其後的魯迅文化史中所衍生出來的諸多相關議題，包括魯迅如何罵論敵、魯迅被神格化的過程等等。但在詮釋過程中，特別是述及魯迅與左聯之間的關係，這一部分在意識形態的不同引起丸山升攻擊，透過質疑陳炳良文獻資料的錯誤，來否定他的魯迅研究成果。另外像是日本學者藤井省三與台灣作家陳映真、曾健民等人，也因台灣在「日殖」下語言問題背後所表述的「民族主義」，讓論爭延續著台灣歷史的詮釋權問題，以及台灣與日本、中國之間的關係為何。同時間也連帶牽扯了兩造的意識形態是否符合魯迅思想，魯迅的研究者應該具備如何的史觀更進一步的交鋒。從上述兩個案例可以發現，魯迅文化史的對話與論爭並不僅限於兩岸三地，也包含了其他國家不同的詮釋角度與策略，特別是日本的魯迅研究成果是除了華語國家、地方外成就最高的地方，也有較多的跨國對話。

當然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與日本文學有著密切的互動，晚清的文學、文化運動就深受日本的啟蒙文學的影響，包括魯迅與周作人翻譯的《域外小說集》就是從日文翻譯來，日本白樺派的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人對《新青年》的影響，都展示了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除了受日本文學的影響外，魯迅思想也反轉輸入的關係，而輸出魯迅思想進入日本文壇。從最早與魯迅有接觸的增田涉、鹿地亘、山上正義到竹內好、伊藤虎丸、丸山升等人，可以見到日本魯迅研究的系譜之完整，表現出日本的藉由魯迅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同時也透過魯迅關照無產階級的結盟問題。[325]這所反映的是在東亞局勢中除了左、右翼之間的魯迅形象建構之不同外，同時也牽涉了各個國家、地方的民族情緒。而這部分的「當代魯迅問題」是過往以中國中心的研究所忽略的，跨地域的交流與討論所呈現的魯迅思想挪用、轉譯，在現今的政治與文化脈絡中不斷的被重新演繹。

[325] 方長安，《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台北：秀威，2012）。

不可迴避的是，東亞研究必然牽扯到政治問題，疆界如何劃分與觀看的視角同樣也影響到問題的提出與議題的設定。這也讓「兩岸」問題很難置入東亞多邊脈絡下來討論，且在百年來的歷史因素與愛恨情仇中，更加無法理性的看待他者的面容。如同孫歌所分析的，更是一針見血的談到東亞研究的盲點：

> 在東亞是否能夠形成共同體的問題上，大陸中國人的主流想像是中國是否能再度成為中心；而台灣知識界迴避這個問題，恐怕有一個潛在的因素是台灣在東亞的定位——因為他們也需要尋找一個「中心」，但是卻很難自認為台灣會成為中心，同時也難以認同中國大陸成為中心。[326]

與其將雙方的關係鎖在兩岸議題上，不如透過更為開放的東亞視域作為兩造對話模式，也唯有建立多邊關係的權力網絡，才能讓中國拋擲中華文化中心的虛幻想像，並讓台灣正視自身存在部分中華文化歷史沉積的事實，而不必再為國家定位問題干涉了文化流動的正常發展。不論是張崑將或是孫歌都同樣看見東亞視野中，中、台的文化論述都是重要的，與其將視角放在兩岸的架構，而訴諸民族主義的統一或分裂，倒不如放置於東亞權力網絡審視其變化。換言之，東亞視角作為一種方法，不但可以打破兩岸論述的侷限，也同時讓所謂的華文研究從狹隘的中華文化道統中心論獲得釋放，回歸文化傳播的流動與變動，創造去中心的多邊關係架構。

而魯迅文化史在東亞遲遲沒有進一步的開展，最主要原因也在於東亞區域框架的尚未成熟。不論是歷史因素阻礙彼此的認識，或是美國因素干擾了國與國之間的交流，我們依然沒有擺脫冷戰體制的框架與思維模式。像是中、日、台三邊釣魚台爭議，中、越兩國南海主權紛爭，所反映的依然是延續冷

[326] 孫歌，〈橫向思考的東亞圖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2 期，2011.6，頁 218。

戰的圍堵策略。[327]當然，我並非要為中國崛起所夾帶的強大民族主義，導致其他國家倍感威脅來卸責。而是美中兩國在東亞的對峙，某個程度上是複製了冷戰時代的對立情勢，並且進一步形成濟合作又拮抗的平衡形勢。

4. 人神之辯

最後我想談的是，過去中國共產黨曾經神化魯迅形象這一看法已成共識，不過如何建構起「人的魯迅」卻又是眾說紛紜。魯迅研究從文本分析到個人的歷史考察，書信、日記、愛情的考證，排山倒海、五花八門的論述，所展現的是魯迅研究的過份放大與研究倫理的再思考。

魯迅的作品是否應該被移出中國中小學教科書，這問題已然成為近年來當代魯迅研究的探討熱點。「少不讀魯迅」這一句話是否表述了魯迅對人性的刻薄批判並不適合青年人的閱讀，又或是面對魯迅研究「熱潮」的另一種反制。相較於中國在「神人之辯」的反思，台港兩地的魯迅研究一直沒有真正的進入教育體制。雖有在課本中有少數篇章或是課外補充教材討論魯迅，但在貴古薄今的教學傳統裡，魯迅與其作品又有多少的空間完整的在課堂上被認識？如同中國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國，卻沒有將人民帶往新世界，國民性的愚昧讓號稱民主的大地生靈塗炭，改變體制而沒有改變內涵時，一切的變動都是枉然。

但總的來說，魯迅符碼的轉化與演繹依然可以為中國與他者交流的切入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空交錯，共同編織了我們如何觀看魯迅，他究竟是怎樣的人與作家。曾經崇拜魯迅是時代潮流，曾經批判魯迅也成為潮流，

[327] 當然，現今的中美衝突是否是延續冷戰架構這說法眾說紛紜，但一致的看法是中國已然取代俄國，成為冷戰後最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

時至今日無這問題也將繼續成為這個世紀討論與研究的議題。

參考書目

一般書目：

1. Sara Ahmed , Strange Encounters, “Strange Encounters：Embodied Others in Post-Coloniality” , New York： U.S.A, 2000.
2. 丁帆等著，《中國鄉土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 上海魯迅紀念館編，《上海魯迅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2）。
4. 下村作次郎著、邱瑞振譯，《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5. 丸山升著、王俊文譯，《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在中國文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 山田敬山著、秦剛譯，《魯迅：無意識的存在主義，2012》。
7. 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8. 內山完造著，何花、徐怡等譯，《我的朋友魯迅》（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2）。
9. 孔海珠，《痛別魯迅》（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4）。
10. 孔海珠《魯迅：最後的告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11. 孔慶東，《正說魯迅》（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
12. 文訊雜誌社，《2007 青年文學會議：「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2008）。
13. 方寬烈 編，《葉靈鳳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1）。
14. 止庵，《周作人講解魯迅》（南京：江蘇文藝，2012）。
1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6. 王宏志，《魯迅與「左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7.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18. 王明，《魯迅新論》（台中：文听閣，2011）。
19. 王家平，《民國視域中的魯迅研究》（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3）。
20. 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1. 王培元，《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廣西：廣西師範大學，1999）。
22. 王富仁，《中國反封建革命的一面鏡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23. 王富仁，《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24. 王富仁，《中國需要魯迅》（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25.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6. 王富仁、趙卓著，《突破盲點——世紀末社會思潮與魯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
27. 王景山，《魯迅書信考釋》（北京：文化藝術，2013）。
28. 王森春、許芳蘭著，《魯迅新聞觀及其報界緣》（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 2012）。
29. 王德威、陳思和、許以東編，《一九四九以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30. 王潤華，《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

31. 王曉初，《魯迅：從越文化視野透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32.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33. 北京博物館編，《魯迅研究資料》第 14 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5。
34. 古遠清，《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2）。
35. 古遠清，《從陸台港到世界華文文學》（台北：新銳文創，2012）。
36. 台靜農《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台中：文听閣，2011）。
37.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 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38.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
39. 司馬長風，《新文學史話——中國新文學史續編》（香港：南山書屋，1980）。
40. 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
41. 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導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
42.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譯，《魯迅與終末論　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北京：三聯書店，2008）。
43. 向芬，《國民黨新聞傳播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44. 朱文華，《魯迅、胡適、郭沫若連環比較評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10。
45. 朱正，《魯迅的人脈》（上海：東方，2010）。
46. 朱正，《魯迅傳》（香港：三聯出版社，2008）。
47. 朱崇科，《魯迅小說中的話語形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8. 朱曉進、楊洪承、唐紀如編，《魯迅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49.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2005。）
50. 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湖南：湖南文藝，1991）。
51. 何方，《黨史筆記》（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52. 何義麟，《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台北：稻鄉出版社，2006）。
53. 吳中杰，《魯迅的抬棺人：魯迅後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54. 吳翔宇，《魯迅：時間意識的文字建構與嬗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
55. 吳鈞，《魯迅詩歌翻譯傳播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
56. 宋志堅，《孔子論・魯迅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57. 宋德宣，《新儒家》（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58. 李怡，《魯迅的精神世界》（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2）。
59. 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60. 李勇，《曹聚仁研究》（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61. 李洪華，《上海文化與現代派文學》（台北：秀威出版社，2008）。
62. 李玲玲，《魯迅向左，新月向右》（南京：江蘇文藝，2012）。
63. 李偉，《曹聚仁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64. 李新宇，《愧對魯迅》（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
65. 李歐梵，《中西文化的徊想》（香港：三聯書店，1986）。
66. 李歐梵，《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三聯書店，2009）。

67.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68. 李繼凱、趙京華、黃喬生編，《言說不盡的魯迅與五四：魯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1）。
69. 汪浩，《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台灣政策 1949～1958》（台北：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70.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08）。
71. 汪暉，《汪暉讀魯迅《破惡聲論》《吶喊・自序》講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3）。
72. 沈鵬年，《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行雲流水記往二記》（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
73. 辛曉征，《國民性的締造者：魯迅》（武漢：湖北教育，2000）。
74. 阪口直樹著、宋宜靜譯，《十五年戰爭期的中國文學》（台北：稻香出版社，2000）。
75. 周令飛，《三十年來話從頭》（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1）。
76. 周國偉，《魯迅與日本友人》（上海：上海書店，2006）。
77. 周錦，《中國新文學史》（台北：長歌文學出版社，1977）。
78. 周蕾，《原初的激情　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台北：遠流出版社，2001）。
79. 孟樊，《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06）。
80. 房向東，《魯迅是非》（上海：東方出版社，2008）。
81. 房向東，《魯迅與胡適：「立人」與「立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
82. 林非、劉再復，《魯迅傳》（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83. 林曼叔編，《司馬長風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09）。
84. 林淇瀁，《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
85.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出版社，1993）。
86. 林賢治，《反抗者魯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87. 林賢治，《魯迅的最後十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4）。
88. 河原功 著、莫素薇 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科技出版公司，2004）。
89. 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出版公司，2002）。
90. 金耀基，《中國的現代轉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91. 侯吉諒編，《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台北：海風出版社，1995）。
92. 柳書琴，《荊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93. 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場域》（新竹：清華大學，2006）。
94. 紀維周，《說不盡的魯迅：疑案・軼事・趣聞》（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
95. 胡尹強，《為愛情做證：破解《野草》世紀之謎》（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96. 胡秋原，《文學與歷史》（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97. 胡菊人，《文學的視野》（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986）。

98. 倪墨炎，《真假魯迅辨》，上海：上海人民，2010。
99.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100. 夏志清等著，《夏濟安先生紀念集》（香港：現代出版社，1978）。
101. 夏濟安，《夏濟安選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
102. 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主編，《永遠的懷念》（台北：編委會，1967）。
103. 孫乃修，《思想的毀滅：魯迅傳》（香港：明鏡出版社，2014）。
104. 孫玉石，《《野草》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105. 孫玉石，《走近聾實的魯迅：魯迅思想與五四文化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06. 孫郁，《對話魯迅》（貴陽：貴州人民，2009）。
107. 孫郁，《魯迅與現代中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108. 孫郁，《魯迅與陳獨秀》（北京：現代，2013）。
109. 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譯，《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110. 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北：稻鄉出版社，2007）。
111.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
112. 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113. 耿傳明，《魯迅與魯門弟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114.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 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115. 袁良駿，《當代魯迅研究史》（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116. 馬以鑫，《中國現代文學接受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117. 高旭東，《跨文化視野中的魯迅》（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118.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
119. 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11）。
120. 張承良，《論魯迅文學世界的個體思想呈現》（廣州：廣東人民，2011）。
121. 張杰编，《魯迅藏同時代人書信》（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122. 張東寶，《問魯迅漢字何罪》（廣州市：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123. 張釗貽，《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24. 張進，《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25. 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126. 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
127. 張夢陽，《魯迅雜文研究六十年》（浙江：浙江文譯出版社，1986）。
128. 張夢陽，《魯迅對中國人的思维批判》（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129. 張夢陽、李宗英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北京：知識產權，2010）。

130. 張寧，《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上海：復旦大學，2006.12）。
131. 張福貴，《「活著」的魯迅：魯迅文化選擇的當代意義》（北京：社會科學，2010）。
132.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133. 張鐵榮，《比較文化研究中的魯迅》（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134. 曹清華，《詞語、表達與魯迅「思想」》（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
135. 曹聚仁，《曹聚仁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
136. 曹聚仁，《曹聚仁雜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4）。
137. 曹聚仁，《魯迅年譜：校注本》（北京：三聯書店，2011）。
138. 曹聚仁，《魯迅評傳》（北京：三聯書店，2011）。
139. 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73）。
140. 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9）。
141. 梁偉峰，《文化巨匠魯迅與上海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142. 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新加坡：風華出版社，1977）。
143. 許祖華、余新明、孫淑芳，《魯迅小说的跨藝術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2）。
144.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上海峨眉出版社，1947）。
145. 許壽裳，《魯迅傳》（北京：國際文化，2011）。
146. 許寶強、羅永生 選編，《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147. 陳方競，《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北京 ：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48. 陳光中，《走讀魯迅：一代文學巨擘的十一個生命印記》（台北：華品文創，2012）
149. 陳光中，《走讀魯迅》（北京：中國文史，2011）。
150. 陳光興，〈亞洲作為方法〉《去帝國　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
151.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152. 陳芳明，《左翼台灣》（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153. 陳芳明，《殖民地台灣　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154. 陳建忠，《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　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
155. 陳建忠，《書寫台灣・台灣書寫　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
156.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157. 陳思和著，《從魯迅到巴金：陳思和人文學術演講錄》（上海：中西書局，2013）。
158. 陳炳良編，《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第四屆現當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1994）。
159. 陳偉華，《魯迅、郭沫若研究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9）。
160. 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161.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

162. 陳漱渝、唐正杰等著，《魯迅與中國現代女作家：匕首与玫瑰》（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
163.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8）。
164. 陳鳴樹，《魯迅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165.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
166. 喬麗華，《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上海：上海科學院，2009）。
167. 寒山碧 編，《徐訏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09）。
168. 彭瑞金，《台灣文學史論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6）。
169. 斯圖爾特・霍爾編，徐亮、陳興華譯，《表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70. 曾健民，《1945 破曉時刻的台灣》（台北：聯經出版社，2005）。
171.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
172. 陽翰笙，《左聯紀念集 1930～1990》，（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
173. 黃子平，《歷史碎片與詩的歷程》（香港：三聯書店，2012）。
174. 黃俊傑，《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台北：正中出版社，2000）。
175. 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台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176.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177. 黃庭康，《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
178. 黃曼君編，《毛澤東文藝思想與中國文藝實踐》（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179.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出版公司，1998）。
180. 黃錦樹、張錦忠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181.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182. 黃繼持編，《中國文學精讀：魯迅》（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183. 楊義，《魯迅文化血脈還原》（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184. 楊劍龍，《魯迅的鄉土世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185. 楊劍龍編，《魯迅的焦慮與精神之戰》（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
186. 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2007）。
187.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87）。
188. 葉榮鐘 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1983）。
189. 葉繼奮，《文學人學論視域中的魯迅經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190. 葛濤，《被遮蔽的魯迅：魯迅相關史實考辨》（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2）。
191. 葛濤，《魯迅文化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192. 葛濤、谷紅梅編，《聚焦「魯迅事件」》（福建：福建教育，2001）。
193. 鄒賢堯，《征服時空：魯迅影響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94. 雷世文，《魯迅研究大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195. 靳叢林，《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196. 靳叢林、劉中樹編，《魯迅死因之謎》（台北：人間出版社，2014）
197. 廖明秀，《魯迅對神話傳說人物形象再造之時代意義研究》（台北：天空數位圖書，2012）。
198. 綦彥臣，《我從來就不喜歡魯迅：從政治異見到文化異見》（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
199. 翟自成，《中共文藝政策論文集》（台北：時報出版社，1983）。
200. 齊宏偉，《魯迅：幽暗意識與光明追求》（南昌：江西人民，2010）
201.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台北：正中書局，1970）。
202. 劉心皇，《魯迅這個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
203. 劉心皇編，《文壇往事辨偽》（台北：自費出版，1963）。
204. 劉柏青編，《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簡史》（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5）。
205. 劉紀蕙編，《文化的視覺系統（I）帝國──亞洲──主體性》（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206. 劉登翰等編，《台灣文學史》（福建：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
207. 蔡源煌，《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台北：光復，1990）。
208. 蔣興立，《左翼上海——三〇年代左翼都市小說論》（台北：新銳文創，2012）。
209. 鄧珂雲、曹雷編：《曹聚仁卷》（香港：三聯書店，1998）。
210. 鄭學稼，《魯迅正傳》（台北：時報出版社，1978）。
211. 鄭學稼，《魯迅正傳》（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212. 鄭樹森，《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台北：洪範書店，2013）。
213. 魯迅，《魯迅全集（第 1～18 冊）》，（北京：人民文學，2005）。
214. 黎活仁編，《國際魯迅研究輯一》（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
215. 黎湘萍、李娜主編，《事件與翻譯——東亞視野中的台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216.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
217.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
218. 錢偉，《思想與文學傳統間的魯迅》（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19. 錢理群，《活著的魯迅》（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220. 錢理群，《與周氏兄弟相遇》（香港：三聯書店，2008.10）。
221. 錢理群，《錢理群中學講魯迅》（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222. 霍布斯邦，《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
223. 薛化元，《戰後台灣歷史閱覽》（台北：五南出版社，2010）。
224. 璧華編著：《曹聚仁作品評論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09）。
225.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社會出版社，1998）。
226. 顏家炎，《論魯迅的複調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27. 魏韶華、李紅玲、劉紅濤著，《從魯迅到老舍：兼及東亞的視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

228. 羅崗、顧錚主編，《視覺文化讀本》（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229. 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30. 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譯，《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231. 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9）。
232. 蘇雪林，《我論魯迅》（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233. 蘇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90）。
234. 蘇雪林，《蘇雪林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235. 蘇雪林，《蘇雪林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7）。
236.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　日記卷》（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蘇雪林作品集編輯小組，1999）。
237. 蘇雪林，《蘇雪林散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
238. 蘇雪林著、張昌華彙編《蘇雪林自傳》（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239. 饒鴻競等編，《創造社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學位論文：

1. 方筱華，《魯迅的兒童文學觀研究──童話譯作的實踐考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2. 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躲，碩士論文，2005）。
3. 王瑞達，《魯迅與五四反傳統精神》（台北：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4. 江文丕，《魯迅《吶喊》、《彷徨》與明恩溥《中國人素質》之國民性比較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5. 吳佳馨，《1950 年代台港現代文學系統關係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濟安、葉維廉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6. 吳怡萍，《北伐前後婦女解放觀的轉變：以魯迅、茅盾、丁玲小說為中心的探討》（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7. 汪詩詩，《魯迅、卡繆，尼采讀者──接受比較研究》（台北：輔仁大學法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8. 阮芸妍，《中間物思想重探──魯迅書寫中的主體問題研究》（新竹：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9. 具景謨，《魯迅小說主題意識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10. 林奇佐，《書寫魯迅──重思魯迅小說及思想養分》（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11. 林昭賢，《魯迅雜文創作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12. 阿西雅，《魯迅與契訶夫小說的比較研究》（桃園：元智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3. 高維宏，《重探 1920～1930 年代台灣與中國文學的兩種前衛性實踐》（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14. 張淑伶，《魯迅受俄國文學影響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15. 張清文，《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16. 張燕萍，《人間的條件——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17. 強勇傑，《五四前《悲慘世界》故事中譯的底本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18. 疏淑貞，《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原鄉意識——以魯迅、沈從文、老舍、張愛玲為例》（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6）。
19. 莊培堅，《魯迅小說死亡主題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20. 陳俊益，《跨海的古典、生根的人文：梁實秋文學與文藝思想在台傳播及影響》（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2）。
21. 陳麗妤，《俄國漢學家謝曼諾夫專著《魯迅和他的前驅》析論》（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22. 傅化誼，《論魯迅小說中的「我」》（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23. 彭明偉，《五四時期周氏兄弟的翻譯文學之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24. 黃正文，《魯迅留日期間對其一生人格塑造的影響研究（1902～1909）》（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25. 黃燦銘，《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研究》（台東：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26. 楊若萍，《魯迅小說人物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27. 楊傑銘，《魯迅思想在台傳播與辯證（1923～1949）── 一個精神史的側面》（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28. 楊雅琄，《吳趼人與魯迅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觀點運用》（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29. 楊靜欣，《徘徊與擺盪——論魯迅作品中的宗教向度》（桃園：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30. 廖美玲，《魯迅與賴和小說主題之比較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31. 劉祖光，《魯迅肉體生命意識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32. 劉蓉櫻，《魯迅《故事新編》研究》（台北：台北教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33. 鄧慧恩，《日據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新竹：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34. 鄭懿瀛，《魯迅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從「吶喊」到「彷徨」的心路歷程》（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35. 蕭敏亨，《美國冷戰時期的文化外交與美國形象的塑造：美國新聞總署及《今日世界》的發行》（台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36. 蕭綺玉，《《野草》與魯迅的黑暗思想》（高雄：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37. 戴嘉辰，《魯迅、周作人民間文學理論研究》（花蓮：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38. 謝易澄，《魯迅雜文語言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39. 簡明海，《五四意識在台灣》（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40. 顏健富，《論魯迅《吶喊》、《徬徨》國民性建構》（台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期刊論文：

1. Lee, Haiyan,'The Other Chinese ： Remancing the Folk in May Fourth Native Soil Fiction',"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33：2,2007.9,p9-34.
2. McDougall, Bonnie S.,' Book Reviews－－Madmen and Other Survivors：Reading Lu Xun's Fiction. By Jeremy Tambling',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vol.47, 2007, p536-538.
3. 于治中，〈現代性的悖論與開展：汪暉的思想視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2 期，2008.12，頁 325-363。
4. 子安宣邦著，賴俐欣譯，〈日本近代批判與「奴才論」的觀點：竹內好與兩個魯迅〉，《文化研究》第 6 期，2008.9，頁 19-31。
5. 山口守，〈作為契機的鄉土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第 24 期，2013.12，頁 21-42。
6. 王忠愈，〈現代散文化抒情小說—王蒙與魯迅、郁達夫的一脈相承〉，《國文天地》第 181 期，2000.6，頁 62-68。
7. 王鈺婷，〈冷戰局勢下的台港文學交流——以 1955 年「十萬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測驗」的典律化過程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 19 期，2011.6，頁 83-114。
8. 王德威，〈「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漢學研究》第 65 期，2011.6，頁 245-278。
9.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2012.12，頁 11-37。
10. 王德威，〈歷史，記憶，與大學之道：四則薪傳者的故事〉，《台大中文學報》第 26 期，2007.6，頁 1-46。
11. 王潤華，〈魯迅誕辰 130 周年後的魯迅論述：眾聲喧華 VS 意識形態－－與魯迅在虹口墓園、紹興故居於研討會相遇的對話〉，《時代評論》第 4 期，2011.11，頁 43-55。
12. 田漱華，'A Tentative Analysis of Some Expression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Regionalism in Dazai Osamu's Sekibetsu and Lu Hsun's Teng Ye Xian Sheng',"航空技術學院學報"6：1，2007.8, p407-417.
13. 白立平，〈翻譯「可以省說許多話」——梁實秋與魯迅論戰期間有關譯作的分析〉，《清華學報》第 39 卷第 3 期，2009.9，頁 325-354。
14. 任佑卿著，焦艷譯，〈翻身：抗美援朝時期中國的反美大眾運動與冷戰國民的形成〉，《人間思想》第 3 期，2013.2，頁 137-160。
15. 吳建國，〈織就語絲文似錦，吟成苦雨意如麻—魯迅逝世七十周年的反思與感言〉，《新觀念》第 219 期，2006.9-10，頁 65。
16. 吳家嘉、張晏瑞，〈民國記憶與魯迅主義——專訪北京師範大學李怡教授〉，《國文天地》第 28 卷第 3 期，2012.08，頁 99-103。
17. 李京珮，〈台靜農與魯迅的文學因緣及其意義〉，《• 明道通識論叢》第3期，2007.9，頁 28-50。
18. 李怡，〈吃魯迅的奶水長大〉，《明報月刊》第 415 期，2000.7，頁 27-28。
19. 李義男，〈美新處「學生英文雜誌」內容分析——該刊傳播目的與技術之探討〉，《新聞學研究》第 9 期，1972.5，頁 257-318。
20. 李歐梵，〈文化觀察：韓國・西九龍・魯迅〉，《亞洲週刊》第 19 卷第 2 期，2005.1.9，頁 10。
21. 李麗，〈魯迅與周作人兒童文學譯介活動之比較〉，《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4 期，2011.10，頁 172-205。
22. 汪修榮，〈顧頡剛與魯迅的恩恩怨怨〉《傳記文學》第 529 期，2006.6，頁 105-113。
23. 周淑媚，〈文化診斷中的病痛隱喻——以魯迅和郁達夫的病痛與文學創作為例〉，《通識教育學報》第 15 期，2010.6，頁 1-23。
24. 林慧君，〈聽，誰在說話——談〈孔乙己〉與〈社戲〉的敘述者〉，《國文天地》第 268 期，2007.9，頁 65-70。
25. 林賢治，〈魯迅：守夜者〉 ，《新地文學》第 12 期，2010.6，頁 43-87。
26. 林賢治，〈魯迅"帶著枷鎖跳舞"〉，《新地文學》第 12 期，2010.6，頁 148-151。
27. 林賢治，〈魯迅的反叛哲學及其運命〉《新地文學》第 12 期，2010.6，頁 88-131。
28. 邵建，〈「硬骨頭」與「喪家狗」──一九三〇年代魯迅與梁實秋的文化論戰〉，《傳記文學》第 534 期，2006.11，頁 27-46。
29. 侯作珍，〈魯迅與張愛玲文學的現代性與虛無感〉，《文學新鑰》第 3 期，2005.7，頁 157-174。
30. 俞頤申，〈鑄歷史文化的豐碑－－訪上海魯迅紀念館設計者欺同和〉，《新觀念》第 219 期，2006.9-10，頁 66-69。
31. 徐秀慧，〈魯迅與瞿秋白左翼文翼理念之異同——從〈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談起〉 ，《研究與創新》第 12 期，2011.1，頁 17-18。
32. 郝譽翔，，〈路漫漫其修遠兮——從魯迅與瞿秋白再探五四世代〉，《文訊》第 282 期，2009.4，頁 65-66。
33. 馬森，〈新文學作家的思想轉向——《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第十四章)〉 ，《新地文學》第 19 期，2012.03，頁 19-37。

34. 尉天驄，〈魯迅現象〉，《文訊》第 343 期，2014.5，頁 33-42。
35. 張君玫，〈德希達、魯迅、班雅明：從翻譯的分子化運動看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東吳社會學報》第 19 期，2005.12，頁 57-100。
36. 張恆豪著,Tsai, Suefen 譯,' A Pervasive and Profound "Vision of the Times"－－A Comparison between Lai Ho's Guijia [Going Home] and Lu Xun's Guxiang [My Hometown]', "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vo21, 2007.7,p123-140.
37. 張景華、蔣驍華，〈東方主義與魯迅的譯風突變〉，《中西文化研究》第 11 期，2007.6，頁 93-102。
38. 張業松，〈文學史線索中的巴金與魯迅——悼巴金並紀念魯迅逝世六十九周年〉，《中國現代文學》第 8 期，2005.12，頁 3-23。
39. 張毓婷，〈戰鬥精神之外——論黃榮燦的《台灣阿美族豐收舞》〉，《台灣美術》第 72 期，2008.4，頁 100-120。
40. 張慧瑜，〈「被看」的「看」與三種主體位置：魯迅「幻燈片事件」的後(半)殖民解讀〉，《文化研究》第 7 期，2008.12。
41. 張耀杰，〈魯迅其人的愛恨情仇〉，《傳記文學》第 93 卷第 1 期，2008.7，頁 105-109。
42. 張耀杰，〈魯迅對顧頡剛的「黨同伐異」〉，《傳記文學》第 537 期，頁 70-83。
43. 曹清華，〈左翼視野下的民眾——魯迅與福柯的一個比較〉，《人文中國學報》第 17 期，2011.9，頁 413-438。
44. 章健，〈紀念魯迅，就是要倡導牛的精神——訪台商、《新觀念》發行人郭承豐〉，《新觀念》第 221 期，頁 12-13。
45. 許雪姬，〈評黃英哲《台灣文化再構築一九四五～一九四七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國史館館刊》第 29 期，2000.12，頁 229-244。
46. 郭承豐，〈《新觀念》的「吶喊」：紀念魯迅「牛」展開始收件〉，《新觀念》第 218 期，2006.7-8，頁 1。
47. 郭承豐，〈最後的魯迅〉，《新觀念》第 219 期，2006.9-10，頁 1-a2。
48. 郭鐵成，〈魯迅：作為一種文化〉，《當代中國研究》第 103 期，2008.12，頁 133-147。
49. 陳光興，〈補課：回應錢理群的〈「魯迅左翼」傳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7 期，2010.3，頁 291-298
50. 陳芬蘭，〈「抗美援朝」的戰爭記憶——1954 年來台「反共義士」的口述歷史〉，《台灣史料研究》第 38 期，2011.12，頁 166-181。
51. 陳芳，〈「文章有神交有道──記「二〇〇六香港魯迅論壇」〉，《明報月刊》第 490 期，2006.10，頁 71-73。
52. 陳芳明，〈台灣文學與東亞魯迅〉，《文訊》第 267 期，2008.1，頁 53-61。
53. 陳芳明，〈台灣魯迅學：一個東亞的思考〉，《文訊》第 248 期，2006.6，頁 7-9。
54. 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 52 期，2012.12，頁 211-242。
55. 陳瑋鴻，〈在 21 世紀的台灣與魯迅相遇：錢理群在台演講側記〉，《思想》第 14 期，2010.1，頁 319-323。

56. 陳德錦,〈魯迅《在酒樓上》的敘事方式再探〉,《人文中國學報》第 15 期,2009.9，頁 311-326。
57. 陳德馨,〈大眾文化中的圖像詮釋——從一幅表現魯迅論戰精神的漫畫說起〉，《藝術學研究》第 10 期，2012.5，頁 209-254。
58. 陳輝,〈魯迅與蔡、胡紅學之爭〉,《傳記文學》第 520 期，2005.9，頁 82-87。
59. 陳學然,〈章太炎與魯迅的師徒交誼重探——兼論二氏的學思關係〉,《台大中文學報》第 26 期，2007.6，頁 241-284。
60. 彭明偉,〈周氏兄弟的翻譯與創作之結合：以魯迅〈明天〉與梭羅古勃〈蠟燭〉為例〉,《中國學術年刊》第 29 期，2007.9，頁 137-165。
61. 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 1922 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 ,《政大中文學報》第 7 期，2007.6，頁 153-181。
62. 彭歌,〈如果魯迅還活著〉,《文訊》第 327 期，2013.1，頁 71-79。
63. 曾健民,〈談「魯迅在台灣」：以 1946 年兩岸共同的魯迅熱潮為中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7 期，頁 259-276。
64. 硯香,〈當祥林嫂和魯迅相遇〉,《明道文藝》第 367 期，頁 126-133。
65. 程惠敏,〈典故細說——跟魯迅遊紹興〉,《中國旅遊》第 342 期，2008.12，頁 118-119。
66. 黃文倩,〈重返、鄉土、病的隱喻－－陳映真早期小說對魯迅的國民性思考的接受與衍義〉,《時代評論》第 4 期，2011.11，頁 56-67。
67. 黃英哲,〈黃榮燦與戰後台灣的魯迅傳播（1945～1952）〉,《台灣文學學報》第 2 期，2001.2，頁 91-111。
68. 黃清順,〈「舊瓶新裝」看〈鑄劍〉——對「魯迅式風格」的「新歷史小說」作整體觀察〉,《國文學報》第 41 期，2007.6，頁 133-187。
69. 黃惠禎,〈承先與啟後：楊逵與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系譜〉,《台灣文學學報》第 8 期，2006.6，頁 1-32。
70. 楊昌年,〈魯迅的「狂人日記」〉,《歷史月刊》第 158 期，2001.3，頁 109-112。
71. 楊傑銘,〈論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中魯迅思想的傳播與接受〉,《國史館館刊》第 26 期，2010.12，頁 47-73。
72. 廖振富,〈論葉榮鐘詩作手稿及其相關資料之研究價值〉,《台灣文學學報》第 9 期，2006.12，頁 13-43。
73. 廖淑芳,〈互文、改編與讀者的閱讀生產——由陳若曦小說〈春遲〉中的性騷擾與阿 Q 的關聯談起〉,《興大人文學報》第 43 期，2009.9，頁 171-190。
74. 趙剛,〈重建左翼：重見魯迅、重見陳映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7 期，2010.3，頁 277-289。
75. 劉正忠,〈摩羅，志怪，民俗：魯迅詩學的非理性視域〉,《清華學報》第第 39 卷第 3 期，2009.9，頁 429-472。
76. 劉益州,〈注視的他者與他者的注視——論魯迅〈狂人日記〉中「互為主體」的人際結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第 30 卷第 2 期，2011.6，頁 125-137。
77. 歐崇敬,〈跨世紀轉型時期的宏大哲學思想論述者：從嚴復到魯迅〉,《當代中

國哲學學報》第 2 期，2005.12，頁 121-156。
78. 練美雪，〈痛苦的盜火者—劉季倫談魯迅〉，《新觀念》第 219 期，2006.9-10，頁 60-63。
79. 蔡振念，〈魯迅的人性關懷〉，《幼獅文藝》第 649 期，2008.1，頁 62-64。
80. 蔡登山，〈另眼看作家系列五：長夜憑誰叩曉鐘——許壽裳為魯迅而死〉，《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 94 期，頁 11-15。
81. 蔡登山，〈永不忘卻的記憶——魯迅與內山書店〉，《新觀念》第 221 期，2007.1，頁 16-19。
82. 蔡登山，〈許壽裳在台灣——讀許壽裳日記、書信〉，《傳記文學》第 618 期，2013.11，頁 83-95。
83. 蔡登山，〈橫看成嶺側成峰——多重視角回看魯迅〉，《新觀念》第 219 期，2006.9-10，頁 54-59。
84. 盧世達，〈隱蔽的話語——論魯迅《故事新編》對晚清小說的「現代性」承續與開創〉，《有鳳初鳴年刊》第 5 期，2009.10，頁 419-433。
85. 蕭全政，〈戰後美援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政治學報》第 21 期，1993.12，頁 121-144。
86. 錢林森，〈尋求現代中國「才智」——20 世紀中國文學在法國的譯介和接受〉，《中西文化研究》第 16 期，2009.12，頁 3-16。
87. 錢理群，〈「魯迅」的「現在價值」：對韓國學者劉世鐘教授的回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3 期，2009.3，頁 211-218。
88. 錢理群，〈活在當下中國的魯迅〉，《思想》第 23 期，2013.5，頁 1-24。
89. 錢理群，〈部分台灣青年對魯迅的接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7 期，2010.3，頁 299-325。
90. 錢理群，〈魯迅與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去世 70 週年的回顧〉，《思想》第 3 期，2006.10，頁 1-27。
91. 錢理群，阮芸妍整理，〈「魯迅左翼」傳統：「與魯迅重新見面」台社論壇的主旨演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7 期，2010.3，頁 221-258。
92. 韓振乾，〈魯迅作品在韓朝之傳播〉，《中西文化研究》第 16 期，2009.12，頁 114-118。
93. 聶永華，〈魯迅、聞一多的《莊子》散文藝術研究〉，《國文天地》第 264 期，2007.5，頁 60-64。
94. 顏秉直，〈魯迅的《故事新編》與神話小說〉，《醒吾學報》第 29 期，2005.6，頁 171-183。
95. 顏健富，〈「易屍還魂」的變調——論魯迅小說人物的體格、精神與民族身分〉，《台大文史哲學報》第 65 期，2006.11，頁 113-149。
96. 顧鈞，〈論早期魯迅的科學小說翻譯〉，《中西文化研究》第 7 期，2005.6，頁 97-103。